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Post-WWII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aiwan

陳良潮

Liang-Chao Chen

指導教授：邱榮舉 博士

Advisor: Rong-Jeo Chiu,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Jan. 2022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博）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聲明書

本人已完全瞭解本所學術倫理之定義與行為規範，特別是針對抄襲之規範。本人保證，提交學位口試論文的所有內容是由本人撰寫。本人也保證，論文中所引用之他人著作，皆按規定引用。如有涉及違反著作權法、本所學術倫理行為規範、以及其他相關法規，願擔負相關法律責任。

Declarati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for Student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Institute's policy on academic integrity in general and plagiarism in particular. I undertake that all the material presented for examination is my own work and has not been written for me,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ny other person. I also undertake that any quotation or paraphrase from the work of another person has been duly referenced in the work which I present for examination. I also acknowledge that I shall bear all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any disciplinary and legal action taken in accordance with Copyright Act, the Institute's policy on academic integrity,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立書人 Student Name :

陳良潮

(親筆簽章 Signature)

學號 Student I.D. no. :

D97341009

日期 Date :

2022

12 / 28

(YYYY/MM/DD)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本論文係陳良潮 (D97341009) 在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完成之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1 年
1 月 26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
證明

口試委員：

邱榮舉

(指導教授)

趙永茂

田君美

副盈俊

周嘉辰

所 長：

范世駿





摘要

本論文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主要研究目的有二：一、探討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相關學理及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二、解析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之關係，並舉例說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的重點領域與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

本論文主要研究問題有二：一、如何具體化臺灣國家發展論，並且運用在解析戰後臺灣的政經發展？二、如何採用上述具體化國家發展論，解析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之知識經濟、能源產業轉型發展與兩岸經貿發展？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途徑有三：一為歷史研究途徑；二為國家發展研究途徑；三為制度比較研究途徑。至於研究方法，主要是採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主要重點分為三項；一、由國家發展學理結合既有政經發展論述脈絡化具體化臺灣國家發展論；二、以臺灣國家發展論解析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三、以臺灣國家發展論在此政經發展脈絡中，解析知識經濟、能源產業轉型發展，以及兩岸經貿發展。本論文探討之內涵大多為戰後臺灣政經轉型過程，實質政策之產官學與社會論證過程中，緣於筆者從事政策研究之志業，逢時引入基礎理論解析參與政策論證之作；包括第一次政黨輪替國家發展政策、客家文創產業、知識經濟、能源轉型與美中及兩岸經貿等議題，並且銜接邱榮舉教授所致力，以科際整合總體發展觀之「國家發展」學術建構，在本論文以國家發展學理，結合臺灣發展論述之脈絡化具體化過程中，成為臺灣國家發展論之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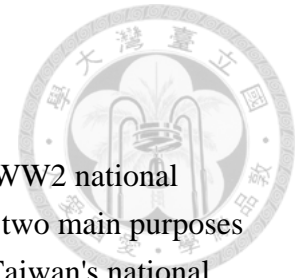
本論文主要創見有：一、運用「國家發展論」「具體化」、「脈絡化」成為「臺灣國家發展論」。二、比較制度分析架構的政經整合建構。三、以臺灣國家發展論架構強調結構化影響解釋臺灣的政經發展。四、以「技術與產業發展分析架構」探討「出口導向」的產業升級轉型發展模式。五、以基本經濟學理論之生產因素構成結合國際代工模式分析臺灣知識經濟發展。六、以臺灣經濟發展的特性分析臺灣知識經濟之文創產業發展。七、以能源特性解析臺灣能源產業市場機制可能運作情況。八、能源低價格彈性需求特性解釋溫室效應。九、整合政經比較制度分析架構結合軍事主義論與科技發展分析美中與兩岸經貿。

關鍵詞：

國家發展 比較制度 臺灣政經轉型 美中與兩岸經貿 知識經濟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he Post-WW2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economic transition in Taiwan. There are two main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first,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ost-WW2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with that span to explore the context of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WW2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ra of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energy industry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development.

There are two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to concretize the theory of Post-WW2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apply it to the analysis of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 How to use the above-mentioned concretized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to analyze the knowledge economy, energy industry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ost-WW2 politic and economy?

The main approaches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are "historical approach", "national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s for the method, it is mainly based on "document analysis".

The main focus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ey points:

1. Combin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therefore concretize the context of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2. Analyze the context of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theory of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3.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analyze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energy industry, and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development.

There are nine main points:

1. Use the the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concretize and contextualize it into the theory of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2. Construc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3. Explain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emphasizing structural influence, in the framework of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4. Discus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s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ith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alysis framework.

5.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factors of basic economic theorie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oundry model, Analyze Taiwan's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development.
6.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s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7. Analyze the possible operation of Taiwan's energy industry market mechanism based on energy characteristics.
8. Discuss greenhouse effect based on low price elasticity of energy.
9. Integr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combine militarism theor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analyze US-China and cross-strait trade and economic exchanges.

Keywords:

N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System, Political-Economic Transition in Taiwan, US-China and Cross-Strait Trade and Economic Exchange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目 錄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聲明書	iii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v
中文摘要	vii
英文摘要	ix
目錄	I
圖表目錄	III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其重要性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13
第四節 論文結構重點說明	16
第二章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發展的國家發展論	19
第一節 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	19
第二節 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	31
第三章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	47
第一節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研究之重要論述	47
第二節 國家發展論與政治經濟學觀點的戰後臺灣政治發展分期 問題	49
第三節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面對的基本政經情 勢	53
第四節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脈絡分析	55
第五節 戰後臺灣政黨輪替後的國家發展	64
第六節 小結	67
第四章 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	71
第一節 臺灣產業超越傳統的「國際代工」「威權社經結構」角 色	72
第二節 知識經濟時代臺灣的技術創新發展	76
第三節 知識經濟時代臺灣新增產業舉例：臺灣客家文創產業	84
第四節 小結	95
第五章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的重點領域舉例：能源產業轉型發展 ..	99
第一節 戰後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	100

第二節	因應「京都議定書」之臺灣能源產業轉型.....	114
第三節	從亞洲石油市場型態探討臺灣石油產業國際化.....	125
第四節	臺灣透過對話因應當前國際能源安全之挑戰.....	137
第五節	小結.....	141
第六章	戰後臺灣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舉例：兩岸經貿發展.....	151
第一節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與產業軍事主義.....	151
第二節	1940年代到1990年代臺灣的兩岸經貿發展.....	154
第三節	後冷戰時期美中與兩岸經貿發展.....	163
第四節	戰後臺灣受產業軍事主義影響下的兩岸經貿.....	177
第五節	小結.....	184
第七章	結論.....	191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創見.....	191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203
參考文獻	205
壹、中文	205
貳、英文	212



圖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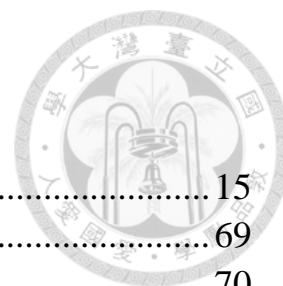


圖 1-1：本博士論文研究架構圖	15
表 3-1：臺灣製造業產業別國內名目生產毛額分配比例	69
表 3-2：2017 年臺灣排名全球前三大產品	70
表 4-1：臺灣、OECD 及亞太國家知識經濟指數評比	97
表 4-2：臺灣智慧財產投資概況	98
表 5-1：能源供需平衡表(原始單位) (一) (二)	144
表 5-2：發電裝置容量統計表(一)(二).....	148
表 6-1-1：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 (2001-2021).....	187
表 6-1-2：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 (1985-2000).....	188
表 6-2：臺灣對外與對中國大陸投資	189
表 6-3：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	19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其重要性

壹、研究動機

1980 年代末，筆者從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後，即進入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此後（包括離開中經院進入臺綜院）即在財團法人政策研究單位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從事政策研究工作離不開如何運用理論規劃政策策略，以及檢視建立實現政策的制度與機制，因此經常需思考理論的應用，但與理論的關聯未必如純粹或基礎研究之學者般，旨在發展或印證理論，本博士論文的基本研究定位也如是，但或也可獲得理論印證發展的一些討論貢獻。在中經院有兩種工作方式，一種是以自行研究的方式，再將自行研究的成果提出；另一種接受政府部門委託的研究計畫。當然這兩種背後都存在政策需求的目的。作為政策研究人員處此(自1980-1990年開始)期間，面對臺灣政治上經歷民主化，經濟上經歷自由化、國際化與民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經歷改革開放，兩岸經貿關係解凍的過程的情勢；必須在知識上進行認識此情勢的研究工作，以掌握相關的知識，並運用知識，據以研究建構政策思維。進入大陸所是筆者優先的選擇，當時中國正從計畫經濟摸索轉型建立市場經濟制度，這個過程有許多經驗與理論上的空間，觀察研究社會科學的本質問題。例如：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差異嗎？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異同為何？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有許多的機緣，發現真實世界需要創新的觀念、思想、理論予以聯繫。

大陸所的研究工作最珍貴的是必須面對基本層面變革的理論創新問題，必須花很長時間熟悉中國從計畫經濟制度如何重新引入市場機制，臺灣的學術傳統基本上都有市場經濟理論的訓練，但面對中國制度轉型的研究卻是沒有先例可循的，這是興趣之所在，採取的途徑是從科技與制度的關係切入（關於當時觀察中國制度由於其改革原點為不同於臺灣熟知的市場經濟的計畫經濟，因此自己以不同經濟制度的特性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但直到最近幾年筆者才在發展研究學會以比較經濟制度特性與比較政治描述整體的中國模式，發表論文〈從「中國模式」的特性分析探討美中貿易衝突〉(2020)，其中討論了可能仍屬不完整的市場內涵，且有計畫經濟歷史脈絡的中國基本模式，因此除基本需要了解中國特有制度以及發展問題，必須認識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的研究除了有助於了解制度，也因而發展出以生產過程的觀點分析臺灣與中國產業發展趨勢。生產過程的分析與傳統經濟學習用的分析方法不同，但與政策實務有關的議題，這個方法可以協助更細微看到經濟生活與經濟政策的意義。而在政策的觀點上，當時也已運用研究知識，在「國統綱領」制定前，於《經濟前瞻》發表〈大陸政策的長期規劃〉(1990,7)，依中國政經情勢轉型發展分階段建構大陸政策，達成「整合」，此一構想與其後制定的「國統綱領」架構可相互對照。

在這個 1980 年之後的主要政策觀察、研究工作期間，臺灣與世界正經歷著基本情勢的轉變，關於 1980 年以來的基本情勢轉變的論述，主要仍需相對了解戰後以來的發展，已有如下的系統，例如：1.臺灣政治發展論述；2.臺灣經濟發展論述；3.臺灣政經發展論述；而且以上論述除了歷史發展脈絡的系統介紹外，也都包含有理論應用在其中協助其論述能有系統性架構；而關於臺灣發展的論述都包括了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尤其美、日、中），另外這段期間裡，有 4.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成立，包括「大陸所」、「國際所」與「臺灣所」，為一主要屬政府出資承接政府委託研究案的財團法人的研究架構，此一智庫的設立顯示當時的政府對基本情勢轉變需要策略知識系統增強的看法。在此可以看到主要由政府出資的智庫在政策研究的組織架構包括「大陸所」、「國際所」而與「臺灣所」並立，呼應關於臺灣發展的論述中顯現的，臺灣「外部環境」對「臺灣發展」佔有重要影響的觀點。

所以對此基本情勢的轉變的認識，必須一提，應注意及包括冷戰時期（尤其 1980 年之前）全球有著市場經濟相對於計畫經濟的政治經濟體系背景，在這個背景裡 70 年代末中國開始嘗試改革開放，90 年代初蘇聯解體。而處此情境之中，再認識到臺灣的發展與外部環境的高度關聯，因此可以發現臺灣產業與經濟策略體系牽涉全球性及自身的本質性議題極富探討意義，並且引伸出政策研究人員的民主政治體系政策討論所依賴整體架構思考問題，此一有著發展總體觀的思考架構，其實與邱榮舉教授長期關心臺灣發展，在學術領域推動「國家發展」領域獲得確立之努力一致，因而可運用既有的國家發展學理思考架構整合。因此從此一「研究動機」的介紹來看本博士論文題目「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所可能展現的意義，¹其實顯現的是這段期間臺灣面對所處情勢與環境的具有政策意涵的發展情勢與可能相關理論之間的脈絡探索。且由此也可以發現臺灣政策所需面對的環境，與臺灣自身的規模比較，是一個浩瀚宇宙，從事政策研究人員，能力極有限，但卻必須思考選擇如何適當碰觸廣泛關聯、牽涉本質性的問題的方法。至少從可能對臺灣的發展產生深重影響的美中貿易衝突的內涵，包括彼此制度歧異，以及科技、產業能量與發展意圖的比較，與可能的不相容，可以見到。因為無法逃避這些因素成為影響臺灣相關領域發展及策略選擇的問題。

貳、研究目的

本博士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二：

1. 探討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相關學理及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

¹ 得益於很早就認識身處傾向於基礎研究的大學，且關心與投入臺灣發展相關議題的邱榮舉教授，蒙他依據對此有著基礎研究傾向領域的熟知，所做的指引與建議，才會回到臺灣大學著重科際整合的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進修，接觸國家發展研究所、政治研究所、社會科學院與臺大的知識空間；其中從國家發展研究所的理論課程脈絡，與趙永茂教授與吳若予教授在政治研究所課程，所彙整的臺灣政經學者致力臺灣政治發展的論述脈絡裡獲益頗多。論文口試期間蒙兼具政策專業與學術素養的田君美研究員、劉孟俊研究員與本所國發所周嘉辰老師在主題架構安排與分析性取捨釐清，以及社會科學實證意涵強調的指導。過去任職的中華經濟研究院與臺灣綜合研究院的知識環境也提供重要支撐。

2. 解析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之關係，並舉例說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的重點領域與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

參、重要性

本博士論文題目為「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約 1980 年代始，臺灣經歷明顯的政治與經濟轉型，本博士論文嘗試探討此一轉型之後，延續之前的發展脈絡結合此一「轉型」影響下的「國家發展」。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²「教育目標」探討分析「國家發展」之「理論」，乃是整合「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諸理論之理論；而在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教育特色」裡則強調「科際整合」與「國家政策」取向，因而可見「國家發展」之「理論」為具有「國家政策」取向的關於「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之「科際整合」，並且不論在「教育目標」或「教育特色」裡，也特別標列包含「中國大陸研究」及「兩岸關係」領域，可見「國家發展」及「國家發展」之「理論」都將此兩類領域列為必須重視的範疇。依據以上論述檢視本博士論文之各章節之主題及其系統關聯及其內涵，筆者希望能夠在有限、部分的範圍內，最大程度「理論性」的顯現此「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表現，及其「理論」探索。

近幾年「美中經貿衝突」議題，在「美中經貿快速發展」中廣受矚目，當然美中經貿關係除快速發展之外，也不只「衝突」而已，還存在著各種「競合」關係，因而牽涉著多面向的科際整合議題。而此一議題也已成本博士論文探討主題之一。並且可發現此一議題與「臺灣產業與經濟政策與策略」存在著深刻關係，或許可以臺灣戰後以來與美國有著緊密的「國際代工」角色，之後此一角色加入「兩岸經貿」因素解釋之，進一步可發現此種產業關係甚至牽涉「軍事主義」理論關心的議題，且此種關係為「國家發展」之一環。再因臺灣本身內部也經歷著明顯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轉型發展，因而從這個關係可以發現，臺灣產業與經濟策略體系牽涉「全球性」及「自身的」「本質性」議題極富探討意義，本博士論文也探討在此轉型過程中的「超越國際代工」與「能源產業轉型」主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其實可以從已有的現象圖景顯現出來，而此圖景可以得到統計數字的支撐，並且也可以從既有關於「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論述裡看到，因而在實際的面向，其也構成「國家發展」的一部分。

具有「全球性」的「本質性」意義的「美中經貿衝突」關聯著「臺灣產業與經濟政策」；並且「臺灣產業與經濟政策」也與「自身的」自由化、民主化經濟與政治制度變遷發展相關，構成「國家發展」之圖像。這個問題與撰寫本博士論文者的角色定位（為一在臺灣長期從事相關領域的「政策研究者」）加在一起，可以發現探討此一題目深具意義。本章緒論進一步介紹研究動機、問題意識，以及撰寫本博士論文的目的以及希望探討的主要問題，並且可以從其中導引出第二章以及其後各章關於相關學理的討論。而此類相關學理的探討其實探索的是這段期間台灣面對所處情勢與環境的政策與可能相關理論之間的脈絡探索。

在社會科學方面，關於「國家發展」之定義，早期主要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要

² 曾建元（2000）。〈三民主義走入歷史-三民主義研究所開出新局〉，《臺大校訊》，584 期。

內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學術領域蓬勃發展，各種學理（概念、理論等）紛紛提出，例如：「國家發展論」。再者，關於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也受到學術界的更加重視，進而倡議推動「科際整合」，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研究領域，大多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作為「國家發展」之定義的相關研究，一直欠缺以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兼具為主要內涵作為「國家發展」之定義的相關研究，筆者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加強政治經濟學的素養，特別重視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盡量將學術與實務相結合，從國家發展的角度，深入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此類主題之研究極具挑戰性，過程極為艱辛，但是階段性的成果相當豐碩且具開創性，因此本博士論文在國家發展研究領域極具重要性。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或可嘗試先聚焦「美中經貿衝突」思考，因此議題有其代表性意義；而「美中經貿衝突」的根本在於「不平衡」嚴重，並且引發一方認為是造成自身經濟問題的主因；而更甚的是認為「結構」問題，例如「政府的介入」，是關鍵因素。因此「比較制度」的理論應用與探討，是本博士論文學理的基本且最重要著力點之一。而包括臺灣自身與外部發展中的政經制度變遷，以及其在軍事主義論理與基礎產業能源顯現意義的「發展理論與歷史脈絡」方法，應用於本博士論文的學理探索也是另一個重要的支撐點。

壹、相關概念檢討

本博士論文在既有的「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治發展」論述中，帶入「國家發展」的概念，討論臺灣發展相關議題，其意義何在，應予進一步討論。

一、「國家發展」及其相關學理

「國家發展」討論戰後開發中國家的總體發展議題，尤其聚焦「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互鑠發展，因此「國家發展」學理即為研究此一議題之學理。全球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其實是在全球的西方國家已然進行數百年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情境裡，探討如何追上已有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議題。這個議題裡已有兩個極為顯著的學理典範，就是「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除此之外，全球範圍也仍有其他發展理論典範，「國家發展」論主張多應用既有的學理典範。由於全球已然存在成功的工業化、現代化國家體系的發展現況，而且此一發展也很可能在全球範圍繼續擴展或深化，因此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可能包含兩種情況；一種是與已開發國家有著緊密關聯的發展；另一種是相對獨立，但能獲得現代化因素並取得現代化效果的發展。

若與上述這兩種較顯著的學理典範對照比較，「現代化理論」比較強調開發中國家未必需與已開發國家有著緊密關係；而「依賴理論」描述中南美洲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緊密關係以發展，卻是一種失敗案例。而相對的與中南美洲案例比較，戰後臺灣的發展雖然也與已開發國家有著緊密的關係，但與中南美洲國家不同，卻是一個成功的開發中國家發展的案例。而且臺灣在全球格局中有其獨特的關鍵

地位，因此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是一個極富探討價值的議題。而如何辨明其中理則及有效的影響因素，則為此一探討富含意義之處。

二、「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

「國家發展」強調「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互鑠發展」，而且是包含兩者的「總體發展」。而政治學與經濟學分別將他們的研究領域界定為，「政治學」研究社會「合法的人身強制手段使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政治現象，並且現代社會往往將此強制力使用限制在一定的層面範圍之內。「經濟學」則研究社會如何運用人力與物質資源手段，滿足人類生活中的物質欲望，以維繫人類生活與生命發展。並且現代社會往往將此類社會經濟活動，以私有財產制與自由就業結合作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並且在此基礎上，現代社會的發展促進資本的大量使用，以及技術的不斷進步。而此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也促使奠基於合法強制力的政治體系，面對更複雜的經濟社會環境，而必須強化經濟政策職能。因此也使得「國家發展」所關心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互鑠」領域不斷的深化與擴大。

經濟學者認知了「經濟發展」理論，是一個具有「總體觀」與「創新觀」的經濟長期發展理論。政治學者則認知了「政治發展」理論，為政治體系不斷世俗化、理性化，不斷分化以求達到政治整合，提高效能，以期能夠治理經濟社會環境的理論。至此政治體系為了因應經濟社會及內外情勢變遷挑戰的特性，以及「經濟發展」必須具有總體觀的認知，為兩者之間如何互鑠找到了可能連結的介面。但是除了互鑠部分外，與「國家發展」的意義比較，仍可以看到「國家發展」有著明顯的開發中國家面對既有的全球現代化領先發展的已開發國家的情境的思考，因而也強調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這點就成為「國家發展」中的「政治發展」及「經濟發展」，與既有的「政治發展」或「經濟發展」論述可能的不同所在。而就臺灣既有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論述的內容來看，此種外部情勢影響的強調也將成為「臺灣國家發展」之「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與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與「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之間，可能值得比較之處。就臺灣的情境探討，則必須關注臺灣在全球格局可能的特別地位，並且在此條件中討論「臺灣國家發展」之「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例如第三章之軍事主義之討論。

三、政治經濟發展、轉型與制度

「政治發展」認為政治體系為因應環境的挑戰，將會帶動政治結構進一步專業分化，以及政治文化朝向世俗化、理性化方向轉變發展，影響政治體系的發展。政治體系環境包括國內外情勢挑戰；其中包括了在這裡應該強調的經濟社會的變遷發展，也是「經濟發展」議題。關於現代化「經濟發展」議題，熊彼得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用、利息和景氣循環的考察》一書明確將此一經濟發展理論的討論，限定在自由競爭市場制度裡討論創新發展，但創新發展中不同的技術帶來的不同產業大規模發展，反過來可能需要不同的市場或其他經濟制度條件支撐其運作發展，在此則未獲討論。而戰後受到重視的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則必須強調是在討論開發中國家從傳統經濟社會開啟現代化「經濟發展」的議題。

當然傳統經濟社會未必能夠具有如熊彼得所設定的現代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制度條件，那麼這些發展經濟學所討論的發展是否包括此一制度的發展呢？當然在

其他諸多條件的影響，以及相對傳統經濟的創新因素的引入會帶來開發中國家產業與經濟活動的轉型發展，但這種轉型發展是否如同「政治發展」所強調的部分一般，也包括經濟制度的轉型發展，這是應該要注意的。在「國家發展」著重「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互鑠發展裡，建構一個結合政治體系一般架構結合自由競爭市場特性的架構，以廣泛做為比較不同社會或不同發展階段的政經制度架構，應對「國家發展」議題的討論有所助益。再者「國家發展」思想架構裡也強調既有已開發國家體系對開發中國家現代化可能的影響，因此在臺灣案例的討論中，在臺灣具有獨特地位的條件裡的軍事主義及自由市場經濟的制度發展的討論裡，美國具有特別的地位，其中也包括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市場機制發展。

貳、相關學理檢討

早期臺灣經濟政策與美國產業、經濟與市場有著密切關係，後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臺灣也推動「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經濟政策與之前有明顯的轉變，而影響臺灣產業與經濟的外部市場構圖也加入了「中國因素」，而有明顯的轉變，而正如本博士論文題目所顯示，本論文聚焦「轉型」發展，在臺灣面對的外部環境仍存在本質性杆格的情境裡，本博士論文探討此一議題，首先應用「比較制度」以及「發展脈絡」的學理予以簡要探討。

一、比較經濟制度

以比較經濟討論臺灣發展型國家理論論述，以及關於臺灣經濟發展的各種政策論述。

關於「比較經濟制度」的方法論，孫殿柏(1985)在其著作曾略作界定，及整理此一領域所用的方法。他認為「比較經濟制度學」「以現行經濟制度做比較研究，自應就當前各國的經濟制度分析比較之」並且據此解釋此一領域所慣用的方法，認為「不過此一工作自必龐大」，「因此，現在適用的比較方法是把現行經濟制度就其大體試做分類」，這是他所提到的第一個方法。他的著作出版於1985年12月當時中國已在探索經濟改革，也就是在探索計畫經濟的轉型，但世界仍處在冷戰的時代，蘇聯仍未垮台，實行的是計畫經濟。因此他提到的比較經濟制度的分類往往明顯包括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兩個基本類別。所提到的第二個方法，「是找出某一制度的典型問題在其他制度裡的比較，這是橫向比較」。第三個方法則認為應就各種制度的系統脈絡探討。

除孫歐柏的方法論回顧之外，Conn, Daniel(1978)也作了「部分」的方法論回顧，他的回顧著重在如何探索得到一種適合比較分析各種不同經濟制度的「一般架構」，以這個一般架構觀察分析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構成這個一般架構裡的各個變數、變項都應是影響各種不同經濟制度的關鍵變數、變項。他認為純粹經濟理論與比較經濟學雖然各自獨立發展，但卻具有很近似的架構，因此他對「嘗試以經濟理論分析經濟制度」的「經濟制度理論」作一簡易的文獻回顧，旨在提出一個更一般性的論述，以證明不論就純粹經濟理論學者或比較經濟學者，他們之間不僅彼此一致，甚至可有相同的理論架構。為介紹這個具有一般性的架構，他先回顧Koopmans與Montias(1971)的理論體系的主要組成項目，然後選擇Neuberger與Duffy(1972,1976)的架構，包括訊息、決策與動機三個結構，作為他的一般性架

構。

而以經濟制度的「基本模式」進行制度的比較討論，自由市場制度，它常被描述成具有例如，「私有財產」、「經濟自由」、「決策分散」、「市場機制」；但計畫經濟制度則相對被描述成具有「公有財產」、「官僚主導」、「決策集中」、「計畫運作」；因此可以分別討論不同制度裡的「政府角色」、「消費者主權」、「貢獻所得說」、「經濟周流」等重要觀念的實際狀態如何的問題。而當前全球關注的所謂中國模式則是從「計畫經濟」開始，以「增量改革」置入「自由市場經濟」內涵的「改革後的中國經濟模式」，那麼它的基本模式、特性又如何描述？這個經濟「基本模式」與「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計畫經濟」比較有著怎樣的「基本特性」？而臺灣在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脈絡裡，經濟制度的基本模式呈現何種狀態？

二、比較政治（一般政治體系架構）

政治學領域中的「比較政治」是極重要的一個部分。其中包括以「政治體系的一般架構」對不同的制度做比較(Almond, Gabriel A. and Powell, G. Bingham Jr., 1978)。「比較政治學」運用一套共同的「政治體系」「架構」，對不同的政治體系進行比較分析，首先界定「政治體系是社會在其國內國際環境中，有意識的制定和追求集體目標的工具，而這個政治體系的運作是依靠合法的人身強制進行的」，將比較政治學這一套政治體系架構，其中包括政治體系內的「角色」、「結構」、「文化」的比較探討，本博士論文則探討將其應用在所分析的經濟制度的基本性質討論裡；認為著眼於分析目的，將此「政治體系的一般架構」應用在「比較經濟」的比較分析裡，具有特別的意義。

比較政治的政治體系架構：政治體系是社會全體系統裡的政治體系；政治體系是社會全體系統裡的關於社會共同集體強制力的運作體系；在社會全體系統裡的政治體系的社會共同集體強制力運作是在體系與環境相對與關聯裡運作的；因而體系與環境之間有輸入、轉換、輸出的關係，此種關係即為體系的行為，此種行為即為政策的表現；體系可再細分為結構與角色的內部構成，而具有某種影響長期行為的文化，即心理傾向；政治體系必須具有合法性才能存在，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是與合法性的相關，以及其相關部分；政治文化就是對政治體系、結構的認知、感情、價值傾向、評價的態度，包括環境與政治體系之間的範圍邊界的決定；可以體系功能、過程功能、政策功能描繪體系。

政治體系架構強調以下特性：含政治體系的全社會系統觀各成份間的關聯性；政治體系的系統觀政治的體系內部組成的各因子（角色）之間的系統關聯性脈絡存在；而有角色、結構、體系、文化、生態組織結構觀；共同集體強制力的建構及合法性建立、維持；全社會（政制體系外）環境輸入、轉換、輸出機制觀（例如在臺灣政治發展的案例，以之檢討威權的建立與維持、強化及民主化之轉變、建立、鞏固）；體系的機制觀，有規則存在的機制，對外環境關聯，對內結構、角色關聯，有功能，能達成目的，獲得成效，有運行的能力，有運行的規則，對體系的自覺認知調適，結構、文化架構的調適，及無時無刻的微調；政策觀，體系目的及以政策表現。

據此筆者直接嘗試將比較政治的政治體系架構就經濟政策—即體系關於經濟領域的政策，略作衍伸思考調整描述如下：政治體系是在包括經濟體系的社會全體系的政治體系；政治體系是包括經濟體系的社會全體系裡的關於社會全體系的共同集體強制力運作的體系；共同集體強制力的運作是在政治體系與環境相對與相關聯裡運作，而經濟體系即為此環境的一環；因而體系與環境之間有輸入、轉換、輸出的關係，此種關係即為體系的行為，即為政策的表現，而經濟體系為環境的一環，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有關的輸入、轉換、輸出即為經濟政策表現；體系可再細分為結構與角色的構成，而具有長期心理傾向的文化，社會成員同時扮演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的角色，經濟與政治體系的關聯、期待，有體系合法性的關聯，長期心理傾向裡關於經濟領域的是重要的部分；可以體系功能、過程功能、政策功能描繪體系的運作，當然可適用於與經濟有關的體系運作，以描繪經濟政策。

三、歷史脈絡研究

內容包括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與美中貿易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研究，並且將之前關於比較經濟制度以及政治體系，與其中之經濟政策的描繪應用在此歷史脈絡的描述中。此歷史脈絡包括政治發展的威權、威權轉型與民主化各時期，進行威權、威權轉型與民主化的社會描述、在全社會體系的政治體系描述以及經濟體系描述。在經濟發展上，則包括進口替代、出口導向；傳統產業、科技產業升級換代階段。

四、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

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由兩條軸線構成，一條軸線是產業產品的研發-生產過程，如熊彼得所提到的技術變遷過程，發明、創新、擴散，更具體的包括關鍵技術與設備研發、設計、量產、技術擴散四個階段；另一條軸線則是有如產品生命週期所討論的，社會產品的發展具有更新換代的過程包括早期、成長、成熟等階段；或者將之更具體描述為一個產品在市場上經歷著諸如實驗室研發、半成熟、成熟、夕陽四個階段。將這兩條軸線整合在一個空間裡，例如將實驗室研發、半成熟、成熟、夕陽四個階段作為直軸，由上到下；將關鍵技術與設備研發、設計、量產、技術擴散四個階段作為橫軸，由左到右。

可以看到任何一種產品的發展過程在此兩軸線構成的空間的位置圖示構成，以及圖示的發展趨勢，而此一圖示構成相對於發展趨勢，也是一種發展能量的圖示。因此由此直軸與橫軸構成的圖示裡，可以看到一種技術或新產品產生的「自然的」由左上角的「向右」「向下」的趨勢；而此一「新的」技術或產品之得以在左上角出現，並且得以「向右」「向下」發展，往往先有著「成熟」技術與產品在已經完成「設計、量產、技術擴散」階段的能量支撐下獲得的成果。這是技術與產品發展的「自然模式」，往往出現在已開發的先進國家的產業發展裡。而在先進社會尋求「國際代工」的「國際分工」建構裡，他們往往會將這個圖示構成裡靠下端與右端的部分，經由「代工」交給工資較低廉的社會承做。因此可以經由對產業的「歷史脈絡研究」在此種圖示結構裡設定參與國際分工裡一個社會生產的產品以及技術能量所處的位置，以及它所可能發展的方向，結合前述的政治體系與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歷史脈絡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具有的



意義。

參、國內外相關研究檢討

國內外與本博士論文所欲探討的相關研究已然極為豐富，而本博士論文嘗試將其作某種整合聚焦，以探討戰後臺灣國家發展，及其外部重要環境因素之一中國的明顯變動。以下介紹相關個別領域的豐富論述。

一、關於國家發展理論的學理探討

《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龐建國, 1993) 與《國家發展》(王佳煌, 1998) 兩本論著關於「國家發展論」的討論, 提供了國家發展理論的基本思考架構。

《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作者提出本書基於對臺灣國家發展, 或現代化發展的關心, 探討「國家發展理論」, 並且主要將「國家發展理論」置於「社會科學」之「社會學」之「社會發展」之「國家發展理論」領域之學術知識體系之定位裡。而此學術知識領域主要組成之理論典範包括戰後基於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之冷戰格局而受到重視發展的「現代化理論」, 及反映當時主要開發中國家, 例如中南美洲國家, 在此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裡的現代化發展產生障礙困境的「依賴理論」, 二種有著明顯時代背景環境反射, 並且論述立場有著明顯衝突的「理論典範」。因此此一「國家發展理論」的討論即在透過綜合理論, 探索其中可能的國家發展的意義及價值, 並且嘗試以「依賴理論」之較為中和之「依賴發展論」, 作為選擇嘗試詮釋臺灣之發展經驗的理論。

此外,《國家發展》一書則認為「國家發展」與「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比較, 為一「總體發展」的概念, 並且應採取科際整合的態度, 整合各種理論典範建構「國家發展理論」; 其中也將「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列為主要的理論典範, 但也明確認為其他的理論典範也應包含在內; 尤其此書強調國家發展應在「全球」、「區域」、「國家」等等層次裡思考討論, 也應在不同的功能性分工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裡思考討論; 但本書也認為應特別著重「政治」、「經濟」的互動整合。

二、關於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論述可說極為豐富

即以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經濟研究院、臺灣綜合研究院等主要關注經濟議題的智庫而言, 當然他們研究論述之中, 有許多都屬與臺灣經濟發展所需或所顯現的情況。

而政府部門也對此有一定的論述出現, 例如國發會所出版的〈臺灣經濟發展歷程與策略〉一書, 將臺灣自 1950 年之後, 以每十年為一期, 以當期相對的經濟發展特徵將臺灣經濟發展分階段描述此一歷程。關於這些特徵一時間劃分的階段, 其他的論述脈絡也有類似的表現, 而國發會出版的論述其實更多在介紹各個不同階段政府所採行的策略, 這些策略包括是否採行市場化的政策。除了政府出版之外, 也有許多其他的論述在相同的脈絡, 描繪臺灣經濟發展的情況, 可以看到臺灣經濟發展是採行了市場化的政策, 但政府正確的策略選擇與實行也是促成

臺灣經濟發展成效的重要因素。

不同於政府論述脈絡，高立民所著臺灣奇蹟則強調外部世界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作用，如戰前的日本與戰後的美國在臺灣經濟發展裡的角色，包括美國市場提供臺灣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美國政府透過美援促使臺灣政府採行市場化政策，這個論述也強調了臺灣經濟發展過程裡政府扮演的角色。

另外，劉進慶以及他留日時的老師與同學，也提出獨立於政府論述的臺灣經濟發展著作。

三、關於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政治經濟探討已有許多論述詮釋

〈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蕭全政, 2001), 〈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蕭全政, 2004), 《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吳若予, 2007),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 1991) 以及關於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的〈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趙永茂, 2007), 碩士論文〈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楊舒媚, 2008), 這些文獻構成與最近發展息息相關的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詮釋脈絡。〈邁向鞏固的民主：臺灣案例〉(李西潭, 2001), 〈臺灣民主化分析-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李西潭、張孝評, 2002), 則以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角度探討臺灣的民主化，且認為應聚焦「民主鞏固」。與前述以「一個中國」因素詮釋，戰後臺灣特別的「威權體制」形成及其結構的論述脈絡，可相互對照比較以進一步討論，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的論理。

從戰後到陳水扁當選總統這一段期間，〈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這一篇論文以威權體制階段與威權轉型階段，對臺灣歷史發展做政治經濟分析，並以「一個中國」的架構做為分析的核心觀念。「威權體制」包括蔣介石與蔣經國主政時期，「威權轉型」為蔣經國晚年與李登輝主政時期。此文論述臺灣此一期間的歷史發展基本上採取整合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文化層面的方法，並且以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網絡與變遷的「一個中國」原則做為分析論述的核心概念。延續此一論文〈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一文沿用相同的論述分析方法，討論相同期間臺灣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議題，將政治與經濟問題做更密切的整合，但同樣甚少觸及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的討論（只用了一段）。關於這段期間臺灣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議題《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有以國家理論觀點的豐富資料與撰述，以及《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對於認識「臺灣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可有莫大助益。論文〈臺灣統籌分配稅款制度的政治性〉則探討威權轉型期間統籌分配稅制度的根源與政治權力的互動分析。

趙永茂的〈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一文，認為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仍然沒有擺脫原來國民黨政府權力統合、權力侍從、利益妥協的窠臼，造成新的政商貪腐結構，但臺灣與臺灣人民主體性卻也有更堅實的建構，對兩岸、區域及全球的戰略發展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另一篇趙永茂的〈從地方治理論臺

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探討經由地方公民社會的建構鞏固臺灣民主發展。楊舒媚的碩士論文〈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廣泛回顧相關的理論並蒐集整理大量的相關文獻與資料，並引述文獻嘗試以民主鞏固的觀點發展論述討論陳水扁執政八年對臺灣民主化發展的影響，其中也將這八年對臺灣民間社會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予以整理列表顯示。另有許多學者對第一次政黨輪替八年間的政治發展也撰寫論文分析。

四、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與發展的論述也非常豐富

中國經濟制度的描述應該注意以下的特徵，中國是從一個有著龐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制度的條件裡，開始進行制度實用但仍宣示希冀顧及社會主義本質的漸進市場化改革，此一改革被稱之為「堅持共產黨領導，公有制為主體，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改革，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將改革後的制度，以不同於世界上既有的自由市場的（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稱呼。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有基本模式上的針對性的歧異；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上仍有多少屬計畫經濟的成分？多少已可屬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分？當然這是「分析上」的思考，另一個問題當然必須注意真實的結構在原有的計畫經濟裡引入市場經濟的內涵，將產生如何的化合效果？甚至已不再適合以單純的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觀察分析其運作效果。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必然需要大量的論述嘗試建構這個新的試驗。在漸進改革的總過程中，今日中國仍延續既有一貫的繼續「深化改革」的政策態度。或許表示這個論述嘗試建構的過程，仍然有著廣泛而大量工作需要投入，未來終將如何改革或轉變，仍繼續是個引人關注的議題。關於這些論述既有的部分，或者可以從幾個方向介紹關於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與發展的論述，首先，是推動改革的官方論述，包括官方文件與新聞發布；其次，官方文件與新聞之外的學者專家的論述；第三，是海外的論述與調查。

官方論述部分，在過往以及新近的改革發展過程中，已有大量的資料，例如新近的，新華社（2020）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習近平（2017）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例如過去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93 年 11 月 14 日通過）。而學者的論述或許應從計畫經濟的論述開始，例如，李震中主編（1985）的《計畫經濟學（修訂版）》；而所有制問題也是一個重點領域，如鄒東濤、歐陽日輝（2008）的《中國所有制改革 30 年》；李松森（2006）的《中央與地方國有資產產權關係研究》。

關於整體經濟改革尤其市場部分的，吳敬璉（2005）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關於基於原計畫經濟特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周振超（2009）《當代中國政府”條塊關係”研究》；也有許多以中國模式為名的論述，如潘德斌等（2012）的《中國模式：理想型態及改革路徑》；海外的論述與調查，例如何清漣、程曉農（2017）的《中國：潰而不崩》；吳介民（2019）的《尋租中國》；梁文傑（譯），斐敏欣（原著）（2017）的《出賣中國》；自中國加入 WTO 美國官方也將觀察中國是否轉型

市場經濟列為重要工作，而有例行性的調查報告，例如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9) 的〈20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五、筆者的博士論文已發表政策研究論述也屬相關研究範圍

本論文作者自臺灣大學經研所畢業後即在中經院大陸所從事政策研究，在此一崗位工作，首先必須瞭解中國經濟的特別的制度與發展，這是從事這領域工作者必備的基本能力，在當時就是必須認識何謂計畫經濟？計畫經濟與在臺灣的人們所熟知的市場經濟有著基本的差異，必須認識這種差異，而改革開放，就是在這種有著明顯差異的計畫經濟裡引入市場化的內涵，在這個基本的架構裡（但直到最近才在發展研究學會以比較經濟制度與比較政治描述整體的中國模式，發表論文〈從「中國模式」的特性分析探討美中貿易衝突〉，討論可能仍屬不完整的市場內涵，且有計畫經濟歷史脈絡的中國基本模式將如何產生廣泛的影響，如成為美中貿易衝突中的關鍵性因素），〈大陸政策的長期規劃〉，從中國制度的角度，預想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但也處理經貿議題《WTO 補貼議題談判立場之研究》。

在中經院大陸所筆者的分工領域，是著重從事中國科技發展的研究，而有如下論述的提出；歷史研究法從生產過程看〈大陸彩電工業概述〉及〈當前大陸改進產業技術政策分析〉、〈大陸科技實力剖析〉、〈大陸科技政策的探討－「二元結構」的發展模式〉、《大陸科技發展研究》、《大陸科技體制改革-效益機制分析(草稿)》、中國產業科技體系、〈大陸電子工業科研潛力〉、〈兩岸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分析〉、〈以「科技系統整合」做為今後發展的策略〉、〈論建立兩岸技術市場合作的展望及其效益〉，而在筆者轉至臺綜院之後也持續關注此一領域的議題，《中小企業投資之技術問題與對策研究》、〈科技發展之研究與文化創新〉、〈「運動」產業能成為臺灣主流產業嗎？〉、〈挑戰 2008：臺灣經濟超越傳統國際代工角色的努力〉。並且進而因應社會與政策發展擴及客家與相關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客家研究與客家發展〉、〈「客家研究」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界定〉（《2009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臺灣客家文化產業研究回顧與展望〉、〈臺灣產業與族群文化發展關係試析－以客家文化為例〉、〈國語法草案基礎有待釐清〉（《客家》）。

筆者在臺灣綜合研究院任職期間，分工領域則偏向中國能源發展（如果無法市場化的資源與制度（國家制度）將需要思考哪些問題？有如下的研究產出：〈大陸能源環保發展趨勢與兩岸交流探討〉、《中油公司大陸華南油氣品市場輪轉規劃研究》、《大陸華東地區油氣品市場調查與行銷通路分析》、《大陸能源戰略發展對我國能源安全影響及其因應策略分析》、《大陸能源短缺及其因應措施之整體影響分析》、〈大陸油品市場展望探討〉、〈「供給－需求」架構分析中國能源政策之意涵〉、《大陸能源經濟與法規之研究》、《大陸能源環保策略與能源法規之研究》。與石油地緣政治關係密切之《2020 年中共能源需求分析》，而這段期間也是臺灣探索能源產業自由化的時期，而有相關的研究。〈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的理論探析〉、〈因應京都議定書的臺灣能源產業政策探討〉、〈從亞洲石油市場型態探討臺灣石油產業國際化〉、〈國際石油市場走向及其對臺灣石油產業發展的影響〉、〈國際石油市場走向與東亞石油企業的轉型經營〉、〈透過對話因應當前國際能源安全的挑戰〉。

肆、研究問題

筆者針對本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進行相關的國內外研究檢討之後，乃進一步提出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

1. 如何具體化臺灣國家發展論，並且運用在解析戰後臺灣的政經發展方面？
2. 如何採用上述具體化國家發展論，解析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之知識經濟、能源產業轉型發展及兩岸經貿發展？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Approach)

一、歷史研究途徑

此一研究主題是在真實的歷史發展脈絡中顯現的，因此應在歷史發展的脈絡裡探討，例如美中貿易發展的過程，中國從計畫經濟實行改革開放的發展過程，臺灣經濟發展過程，臺灣政治發展過程，這些發展脈絡與理論觀點的相互印證，包括比較經濟制度與比較政治一般架構的觀點的相互印證，可以探討所關心的問題意義所在。

二、國家發展研究途徑

1. 整合應用理論的政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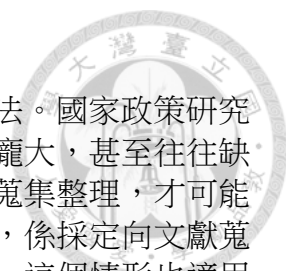
政策研究旨在探討可行的政策，可行政策的獲得必須對政策環境有深刻的認識，而真實的政策環境往往需要依賴理論才能夠獲得系統性的深刻認識，甚至理論需要整合才能更接近政策環境。回顧過去數十年臺灣經濟政策，從既有的著作裡可以發現存在多樣的理論觀點，而不同的時期也可以看到明顯的差異，尤其在本博士論文主要關注的戰後臺灣，特別到了 1980 年代之後，這個變動不只發生在臺灣本身，也發生在與臺灣關係密切的外部世界，面對這種特別的變遷，恐怕更需思考理論整合應用的助益。當然政策研究的途徑與理論的相關在於應用，而不是著重在理論基礎知識的累積，這點是必須辨明的。

2. 基於國家發展理論的既有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論述的脈絡化研究

「國家發展理論」聚焦政治經濟發展，整合理論典範，以期提供政策規劃理論參考，以此架構研究臺灣的發展議題，可依據各種論述之間的比較，以及互相補充，將既有的關於「臺灣發展」、「臺灣政治發展」、「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經發展」的諸多論述在此架構下予以脈絡化，並且在此脈絡化裡獲得在國家發展理論的定位，有異於以國家發展的架構思考可能的政策。

三、制度比較研究途徑

政策環境與政策形成的體系，都與其所處的制度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必須注重制度樣貌的探明。並且以比較制度的方法，包括比較經濟制度與比較政治，可以更容易得到相關思考方向的指引。因此在探討此一博士論文議題時，常常注意制度比較研究的內涵與方向，並將其與研究內容結合，預期可以產生明顯的效益。



貳、研究方法(Method)

本博士論文的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主要是採文獻分析法。國家政策研究及臺灣國家發展研究，所需的資料與支持知識可能非常複雜而龐大，甚至往往缺乏充分的現成知識作為支撐，必須透過一切可能的資料來源的蒐集整理，才可能提高資訊與知識的運用效率，因此本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係採定向文獻蒐集與整理、分析方法，這是從事國家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這個情形也適用於本博士論文所需面對的情況，但是此一方法的運用重點在於定向與資料蒐集整理策略，包括適用理論的適當選擇。

參、研究架構

本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為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本博士論文以「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發展與國家發展論」的建構為核心；其中包括「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及「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兩部分。以「制度比較研究途徑」結合「歷史研究途徑」，在包括「整合應用理論的政策研究」、「基於國家發展理論的既有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論述的脈絡化研究」的「國家發展研究途徑」裡，進行此一核心之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學理架構塑造。研究架構分為五個重點：一、「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發展與國家發展論」之建構，以國家發展論之架構，脈絡化臺灣政治發展與臺灣經濟發展論述，在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中，運用現代化理論之軍事主義論，以及整合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架構，建構此一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二、依此「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發展與國家發展論」，探討「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及其政策意涵。三、在應對臺灣外部發展與內部政經轉型的「結構化」挑戰中，探討臺灣之知識經濟時代應對。四、能源為國家發展之基礎領域，並且其技術特性深重影響轉型挑戰，同時全球相關領域也面臨巨大變動挑戰，也是本研究架構之重點之一。五、以此「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發展與國家發展論」，探討在美中經貿變動衝擊裡，對臺灣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岸經貿。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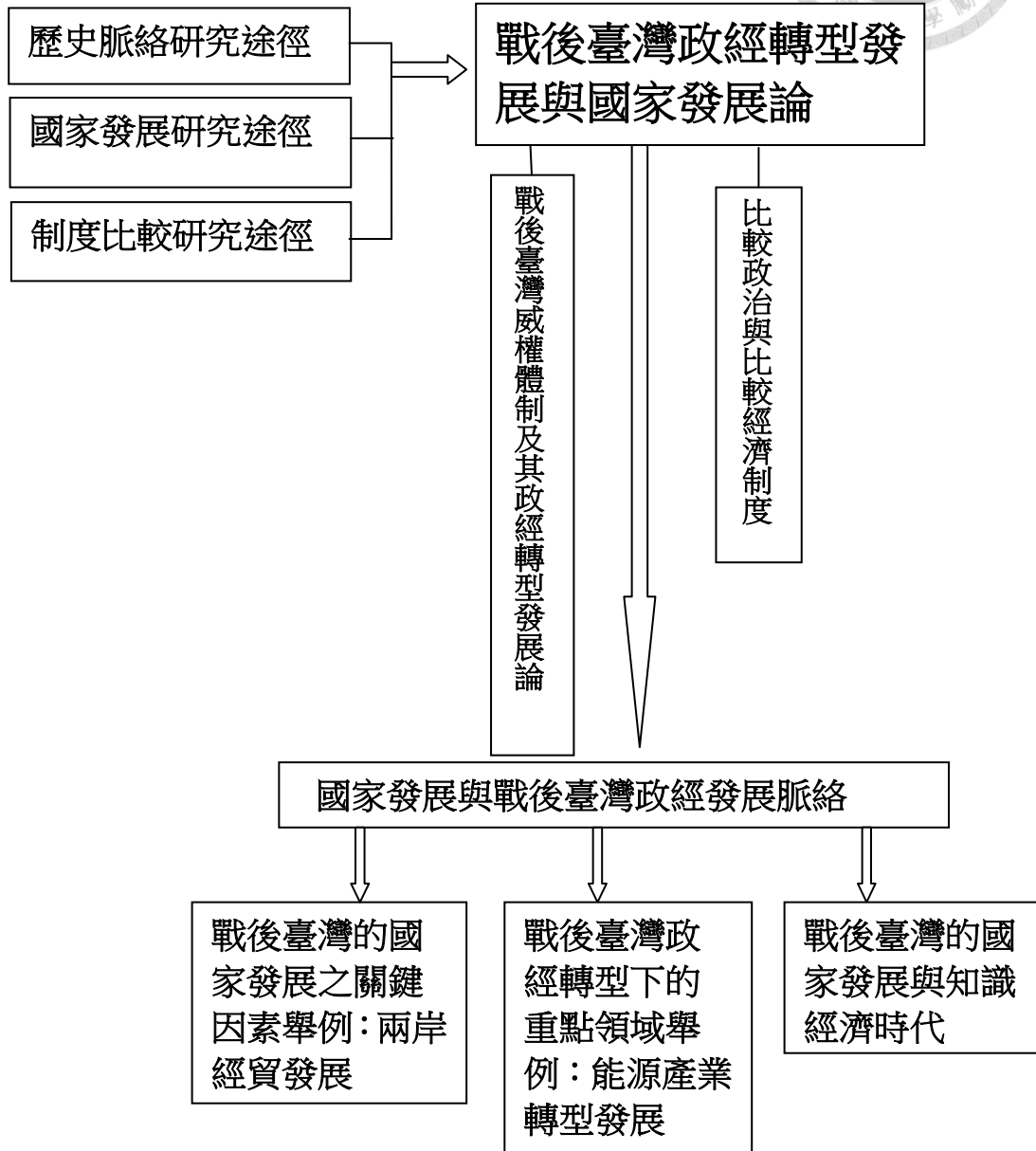


圖 1-1 本博士論文研究架構圖



第四節 論文結構重點說明

本博士論文第一章強調採取「國家發展論」，以探討「戰後台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此外在「研究途徑」上，也包括結合「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的「制度比較研究途徑」，以及就實際戰後臺灣「歷史真實」探討的「歷史研究途徑」，並盡量將其整合應用構成此一論文研究的學理基礎。而「研究方法」則主要運用文獻，與各種陳述與分析的資料。因此本博士論文研究，係採上述「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關於戰後臺灣國家發展之主要相關學理之國家發展論。

在第二章第一節〈戰後台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則在「國家發展論」聚焦政治經濟發展，整合理論典範，以期提供政策規劃理論參考的思考架構下，探討臺灣的發展議題，並將既有的關於「臺灣發展」、「臺灣政治發展」、「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經發展」的諸多論述在此架構下予以脈絡化，再以「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理論作為此「系統化建構」的理論軸線。其發展變遷與臺灣內部以及外部情勢有著密切關聯。因此在此「相關學理」之「系統化建構」軸線架構可與相關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論述整合連結。且此政治經濟發展的實際與理論都與台灣外部情勢關聯緊密，將「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論引入其中，可得增益理論解析之效。今日臺灣已然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也有相關論述，可資應用以分析相關的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臺灣與外部情勢從歷史發展過程中，都可見到相對不同的「制度構成」，是影響此過程發展的重要因素，第二節〈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則將「比較政治」的「一般架構」，與基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特性」構成「比較經濟制度」架構，加以整合，而以之討論包括戰後臺灣政治經濟制度狀態的各種不同制度，以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第三章運用前述的〈戰後台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探討〈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在這一章的第一、二、三各節討論「威權體制」的「結構化」問題，及其在「威權轉型」與「民主鞏固」裡的相關議題，以及可能的與實際的對政黨輪替帶來的政策選擇影響。第四節運用「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理論，探討〈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脈絡分析〉，賦予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的新觀點，結合「威權體制」的「結構化」問題，第五節〈戰後臺灣政黨輪替後的國家發展〉討論了「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政策選擇；而此「發展脈絡」在「兩岸經貿」議題裡也產生影響。

第四章〈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承續第三章第五節討論「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政策選擇，在面對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脈絡裡，運用前述的〈戰後台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認識「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政策選擇，可以看到在這樣的脈絡裡，基於政治認知，對「知識經濟時代」有了更多的強調，第一節討論〈臺灣產業超越傳統的「國際代工」威權社經結構〉角色。在戰後臺灣產業發展，「國際代工」的角色一直有著主導性意義，而基於本博士論文「國家發展相關學理」分析，筆者特別舉例來說明，「第一次輪

替」政黨希望能夠推動明顯的轉變，自然更願意強調第二節所論〈知識經濟時代臺灣的技術創新發展〉與第三節〈知識經濟時代臺灣新增產業舉例：臺灣客家文創產業〉。

第五章討論〈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的重點領域舉例：能源產業轉型發展〉，能源屬低價格彈性的「基礎產業」，具有「安全面」的意義，並且有其生產與使用的技術特性，在臺灣政經轉型過程中，是一必須關注的重點領域。這一章的第一節討論〈戰後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在關注能源低價格彈性與例如電力調度問題上，討論能源產業是否能夠自由市場化的理論問題。第二節則討論在轉型過程中的〈因應京都議定書之臺灣能源產業轉型〉，溫室議題是轉型過程的另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議題。由於此一轉型牽涉的技術條件特性，此一議題的發展必然與第一節的討論有著密切相關，而且此一議題的發展，也必將牽動之後第三、四節的發展。第三節與第四節則思考臺灣石油產業面對的國際市場情勢。

為深入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筆者特別在第六章探討〈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舉例：兩岸經貿發展〉。本博士論文之「國家發展論」可分為〈戰後台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與〈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兩部分；前者的整體架構仍然是討論本章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架構，且特別著重軍國主義理論與比較制度理論結合的討論，第一節討論〈戰後臺灣政經轉型與產業軍事主義〉。之後本章依歷史發展特性分階段討論，第二節〈1940年代到1990年代臺灣的兩岸經貿發展〉，與第三節〈後冷戰時期美中與兩岸經貿發展〉並且加入美中經貿的討論。第四節再整個思考分析此一議題。





第二章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發展的國家發展論

本章主要在進行「關於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主要的相關學理」之「系統化建構」，以期將之應用於本博士論文所關注探討的「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的各項主題。第一節將此「國家發展相關學理」之「系統化建構」，在「國家發展理論」聚焦政治經濟發展，整合理論典範，以期提供政策規劃理論參考的思考架構下，進一步連結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在此「國家發展理論」架構下加以脈絡化；之後再以政治、政經學者群集智慧學力建構之「戰後臺灣政治發展」論述作為此「系統化建構」的論述軸線，此一論述已有基於「威權體制」作為初期起始狀態的政治「轉型發展」架構，並且此一架構涉及「經濟」等領域，也與臺灣內部以及外部情勢有著密切關聯。

因此在第一節中也將與此一論述軸線密切相關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予以整合連結，並且由各種論述之中可見，由於臺灣政經發展與台灣外部情勢關聯極為密切，因此引入並運用「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理論，所獲得認知與論述顯然對此一論述之推展甚有助益。在此置「威權體制」作為臺灣政經轉型之原態，由此無論歷史真實與理論論述皆可見臺灣已然朝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發展，可以之作為基本框架，並進一步探討分析「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各相關面向。由於此一「國家發展相關學理」系統所涉及的臺灣與外部情勢，都可見到相對各方有著不同的「制度構成」，並且此種比較性歧異，在各方共同構成的局勢中扮演重要角色，故第二節將「比較政治」的一般架構，與基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特性構成「比較經濟制度」架構整合，而以之討論包括戰後臺灣政治經濟制度狀態在內的，相對各方的各種不同制度，以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第一節 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

壹、方法論

真實世界存在，如何認識？以概念系統、理論建構—理論系統的世界，解釋此一真實世界，理論系統是從真實世界抽象而來的，抽象建構的理論系統世界可以多大程度解釋真實世界，是理論系統的建構是否成功的重要判準，但理論系統世界是真實世界的抽象，表示它並不完全等同於真實世界，但一個好的理論系統世界常被當成真實世界的代表看待，因為真實世界不經由理論系統描述，常被看成繁雜龐大零散充滿矛盾不確定的世界，是難以全面認識的世界。因此一個好的理論系統建構的世界，可以關鍵性的增加人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但理論系統建構的世界應未必能百分百解釋真實世界，因此可能存在不只一套理論系統建構的世界，而有更多理論系統建構的世界，並且它們之間存在明顯的歧異，但只要它們對真實世界具有明顯的解釋能力，那麼它們就可以成為人們認識真實世界的工具箱裡的一套工具，這種方法論的態度在《臺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張苾蕪譯，

Winckler, E. A. & Greenhalgh, S., 2005)³裡可以看到，而《國家發展》(王佳煌，1998)⁴也主張相同的方式討論「國家發展」，因此就出現了「一種由有著明顯不同架構綜合解釋的」「綜合論」；而另一方面在「比較政治」以及「比較經濟制度」裡往往嘗試以一組抽象的概念構成架構系統，去解釋不同的真實的政治體系或經濟制度(Almond, Gabriel A. and Powell, G. Bingham Jr., 1978;孫殿柏，1985)⁵。

貳、國家發展論的思考建構

一、《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與《國家發展》兩本論著關於「國家發展論」的討論

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1993)⁶一書，是從社會科學學術知識體系的分類建構及其發展定位討論「國家發展理論」。首先《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是從對「社會科學」相對於「自然科學」之「科學」性質討論開始，再帶入屬「社會科學」體系主要的一分支「社會學」(其他分支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的廣泛系統分類架構。其次「國家發展」屬「社會學」之「社會變遷」領域之「發展社會學」中之理論建構領域。並且龐建國認為由於「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為「人」的群體，相對於「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為「物」，加之「人」自身雖有「自然天性」，但在「自然天性」的基礎上卻也有著自主的「適應」環境「創造」、「發明」的能力，因此以研究「人的群體」為對象的「社會科學」，至今仍無法如「自然科學」般獲得具有「普遍性」「通則」的知識，而仍需不斷探尋具有政策指導價值的理論。

尤其在人類歷史與文明不斷發展與演進的過程裡，人類群體自身的結構也有著各種不同的變動發展，並且也仍處在必須不斷適應外在環境條件的影響的情境之中。因此「社會科學」的發展必須不斷緊跟這種變動，並且由其表現探索蘊含其中的深刻本質理論。(龐建國，1993:6-7)雖然《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將所討論之「國家發展理論」定位在「社會學」之「社會變遷」領域之「發展社會學」中之理論建構領域，但「社會科學」之其他分支「政治學」、「經濟學」，也都相對有著「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研究，關於這部分，《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雖將「國家發展理論」主要定位在與「發展社會學」的聯結，但亦指出關於「發展」之研究，「經濟學」的「經濟發展」研究，仍屬極具重要性不可忽視的研究領域。(龐建國，1993:30-38)

加以「發展」議題，例如「發展社會學」在「社會學」「社會變遷」領域受到重視與獲得發展，與二戰後的冷戰格局裡，全球存在著「開發中國家」與「已開

³ 張苾蕪(譯)，Winckler, E. A. & Greenhalgh, S. (原著)(2005)。《臺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臺北：人間出版社。

⁴ 王佳煌(1998)。《國家發展》。臺北：臺灣書店。

⁵ (1) Almond, Gabriel A. and Powell, G. Bingham Jr.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2nd.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Limited. (2) 孫殿柏(1985)。《比較經濟制度》。臺北：三民書局。

⁶ 龐建國(1993)。《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發國家」相對的，發展程度存在很明顯差距的情勢有著密切關係。因而「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議題是「發展社會學」之「國家發展」必須面對的議題，也是「經濟發展」研究必須面對的議題，其實是歷史上「發展」議題的重點關注因素，也影響了「政治發展」。而如何探尋「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嚴重落後的原因，並尋求相應的理論、策略，以推動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縮小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乃是「國家發展理論」的旨趣。

由此來看，可以看到「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成為「國家發展理論」關注的兩個相對的理論門派。雖然在戰後情勢背景支撐下，可以看到這兩個理論門派得到顯著發展，但其實他們的發展都可以追溯遠期過去的根源，而之後「東亞」的有別於全球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特殊發展表現與經驗，也提供了不同的理論發展養分。將「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兩個理論門派做比較，可以看到他們的基本取向差異。「現代化理論」是一種探尋，並且將「已然」現代化的「已開發國家」促成現代化發展的相關因素，與仍未獲得相似的現代化發展的「開發中國家」的相關因素進行比較，並且指出「開發中國家」應就這些相關因素進行調適，以期獲得「開發中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社會動力。而「依賴理論」則對「已開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採取「批判」的態度。認為「已開發國家」是資產階級透過「對內」及「對外」的「剝削」來完成自身的現代化發展，「開發中國家」在此情境中之所以無法獲得長足的現代化發展，根本原因即在於受到「已開發國家」領先建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宰制，阻礙了「開發中國家」獲得現代化發展的機會。

二戰後南美洲之發展經驗似乎否定了「現代化理論」的觀點，而支持「依賴理論」觀點；但另一方面，除了日本之外的東亞較成功的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的發展例子，則似乎否定了「依賴理論」的觀點。當然不同理論門派的理論取向也可能繼續調整，例如「依賴發展論」的觀點對傳統的「依賴理論」的理論取向，有著明顯的差異，1992年出版的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Hall, Stuart & Giben, Bram (eds), 1992)⁷ 也與傳統的「現代化理論」的論述架構不同，例如論述的對象是歷史上走上現代化發展的歐洲，其中內容包括〈現代國家的發展〉(第二章)與〈現代經濟的興起〉(第三章)；〈現代國家的發展〉包括「戰爭與軍事主義」與「國家與資本主義」(Held, 1992)等內涵⁸；〈現代經濟的興起〉則論述「自由競爭市場」的思想及發展⁹ (Brown, 1992)。而《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則也強調「重新接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傳統」(龐建國, 1993:230)，並且選擇以「依賴發展論」「歷史結構研究途徑」分析臺灣的發展經驗。

王佳煌的《國家發展》(1998)一書採取與龐建國的《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

⁷ Hall, Stuart & Giben, Bram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⁸ Held, David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tuart Hall & Bram Gi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p.71- 125.

⁹ Brown, Vivienne (1992), *The Emergency of The Economy*. In: Stuart Hall & Bram Gi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p.127- 175.

發展經驗》不同的取向討論「國家發展」。王佳煌首先將「國家發展」界定在：「目的在整合有關發展的理論典範，提出綜合性的、多層次的、多觀點的理論架構，同時為實際的國家發展策略與政策提供參考的架構」（王佳煌，1998:1），從這裡可以看到王佳煌的《國家發展》與龐建國的《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以「發展社會學」的「國家發展理論」研究「國家發展」的取向有所差異。王佳煌是以採取「整合」各種「發展」理論的方式進行；而就「發展」一詞而言，包括「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文化發展」，但認為應選擇「政治經濟層面的發展」做為最合適的論述軸心。並且就既有的「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國家理論」、「區域研究」各種理論典範，應採取認識其分別在「世界」、「區域」、「國家」分層次特性，而加以適當整合。並且強調此種理論整合架構的目的，在於具有滿足明確的政府採取政策與策略的參考價值。（王佳煌，1998: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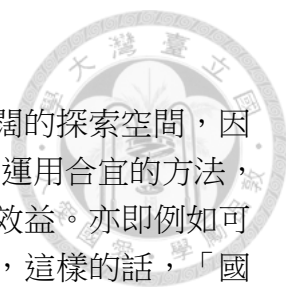
王佳煌的這種分層架構的思考模式與《臺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張苾蕪（譯），Winckler, E. A. & Greenhalgh, S.（原著），2005）相似¹⁰，但在理論典範的整合上《臺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頗強調「自由主義」理論典範，《國家發展》與《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都明顯予以忽略。或許從《國家發展》希望採取「整合」各種「發展」理論的態度，衍伸《國家發展》應也不排斥將「自由主義」理論典範做為可以參考整合的理論典範，但問題在於如果這樣做，那麼應如何安排這個架構？而《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聚焦在「依賴發展論」「歷史結構研究途徑」，那麼將會如何回應這個思考？或者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理論典範，也可能做為「歷史結構研究途徑」的一個邏輯上的特例？

面對這個問題王佳煌的《國家發展》既然將其理論架構，以成為政府政策策略參考為目的，而實際的政府政策策略制定過程，基於「自由主義」的觀點仍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雖然王佳煌的《國家發展》的內容討論沒有明顯提到，但仍應是其必須涵括的內容。在這一點龐建國的《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就顯得較不明顯。其實「自由主義」理論典範，例如「自由競爭市場」理論是被視為源自人類「自然天性」的理論建構，那麼如果「國家發展」理論忽略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在其理論建構中，恐怕將會限制自身理論的有效性。在這裡必須注意以「開發中國家」為對象的「發展經濟學」的內容，與熊彼得的「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用、利息和景氣循環的考察》（Shumpeter, Joseph Alois, 1912）¹¹）內容的差異。熊彼得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用、利息和景氣循環的考察》是在「市場機制」的「經濟周流」¹²裡討論「發展」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國家發展」論面對既存的現代化全球與區域體系特別應注意的問題。而以「開發中國家」為對象的「發展經濟學」雖以市場經濟理論為基礎，但對此與發展有關的市場經濟運作內容則著墨較少。

¹⁰ 同註 3。

¹¹ 何畏 易家詳等（譯），Shumpeter, Joseph Alois（原著）（2001）。《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用、利息和景氣循環的考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¹² 參考本章第二節「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之討論。



經由前述討論筆者認為「國家發展」論其實存在著極為廣闊的探索空間，因而若能針對選定的研究對象，觀察其特性，選擇適當的切入點，運用合宜的方法，應該比較能夠獲得有著政策策略意義的「國家發展」論的建構效益。亦即例如可以選擇臺灣作為理論建構對象，以探討臺灣的「國家發展」論，這樣的話，「國家發展」論的討論才不至於漫無邊際。而既然採取這種「案例」式的方法，那麼就可以先考慮結合運用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與「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以建構「臺灣的國家發展論述」。這也是定位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體系中的「國家發展研究所」，關於「國家發展」論的定位觀點¹³。進而再以臺灣的「政治學」、「經濟學」有著「自由主義」的傳統來看，「臺灣政治發展」論述與「臺灣經濟發展」論述應有著「自由主義」的基礎。與此相呼應，應用「現代化理論」亦應將討論歐洲現代化的理論的內容納入。而「依賴理論」顯然的全球架構，「已開發國家」體系對「開發中國家」的高度領先發展以及影響；還有戰後特別的全球「自由與共產」陣營「制度嚴重對立」格局，都應是必須關注的結構因素。再就「臺灣」特別的「空間」與「意義」位置來看，「中國因素」是一個必須置入思考的重點之一。

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更名國家發展研究所之後，2013 年立法院也通過《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整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單位，成立「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行政院國發會」）¹⁴。「行政院國發會」願景為「國家發展策略運營總部」¹⁵，前身主要機構為「行政院經建會」，「行政院經建會」成立於 1977 年，但其實可以追溯到 1948 年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之後 1963 年改組為「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73 年再改組為「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經設會」則於 1977 年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¹⁶。目前「經建會」與「研考會」等機構整合成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扮演「國家發展策略運營總部」的角色，因此包含此一歷史脈絡發展研究的臺灣「國家發展」論，應可與此歷史脈絡相對

¹³ (1)本論文在第一章，第一節，叁、重要性，已有介紹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關於「國家發展」論的定位觀點之內容。頁 3-4。

(2)同註 2。

¹⁴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立法 政策統合協調邁向新里程 102 年 8 月 6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網址：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立法 政策統合協調邁向新里程（102 年 8 月 6 日）（ndc.gov.tw）。

¹⁵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本會會徽〉，《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網址：國家發展委員會-本會會徽（ndc.gov.tw）。

¹⁶ 王昭明（1994）。〈溯行經濟奇蹟-誰決定財經大計？〉，《遠見雜誌》，7 月號。
于國欽（2014）。〈美援會的那些事兒〉，《工商時報》，1 月 19 日。

映，反映各個階段的情勢與體制；當前的「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則是處於臺灣已然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主導的代工產業升級至科技產業代工的階段。因此也是當前臺灣「國家發展」論進一步發展思考必須面對的情勢環境條件；例如面對「政治民主化」臺灣「國家發展」論必須思考政黨輪替因素的影響。

二、「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論述脈絡

依前述討論可見「國家發展」討論之主題，是在「全球」觀點中，西方國家已先發展出了現代化、工業化文明，此一文明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各方面，獲得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強大發展趨勢，此一趨勢不只在西方社會維持繼續發展的趨勢，而且在全球其他「開發中國家」，也可能產生此種現代化、工業化文明發展的空間擴散作用。這種擴散可能是開發中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發展，也可能是與既有的西方現代化發展有著密切關聯的，開發中國家現代化發展。因此與此相應關於開發中國家如何進行現代化發展已有二套最明顯的理論典範，一個是「現代化理論」，主張開發中國家可以自主的學習既有現代化國家的範式，而得到現代化發展成果；另一個是「依賴理論」範式，認為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是在與既有現代化國家，有著密切關聯的情境裡追求現代化發展；當然也應注意到還有一種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建構的範式，但該種範式是一種比較特別的樣例。

戰後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樣例，最先受到重視的是緊鄰北美的中南美洲國家現代化發展，在這個地理空間區塊的開發中國家現代化發展實踐，可以看到自主現代化發展的範式並不實際；比較接近中南美洲現代化發展實際表現的是「依賴理論」，但「依賴理論」所描述的卻是中南美洲開發中國家受到來自已開發國家剝削，甚至可稱為「失敗」的現代化發展樣例。也就是從中可以看到此種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是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存在緊密關係的發展範式，但此種範式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卻是一種失敗的範式。不過另一方面，雖然同樣與已開發國家有著緊密關聯，時間稍晚於中南美洲的失敗，東亞的幾個開發中國家卻似乎獲得成功的樣例，其中臺灣也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臺灣奇蹟》一書¹⁷就是以「奇蹟」形容臺灣的現代化發展表現；此書提到與中南美洲經驗比較，「臺灣經驗」所具有的獨特意義，認為美國在此現代化發展中具有重要角色意義，但卻認為「政府角色」才是決定性因素。或者這個觀點可以銜接關於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以「發展型國家」理論描述的「台灣經濟發展論」。而關於開發中國家「政治」因素在現代化發展中的意義以及現實挑戰，呂亞力的《政治發展》¹⁸討論作為「國家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領域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發展」相關議題；此書在此可被視為呼應「臺灣政治發展」在《臺

¹⁷ 胡煜嘉（譯），Gold, Thomas B.（原著）（1987）。《臺灣奇蹟》。臺北：洞察出版社。

¹⁸ 呂亞力（1995）。《政治發展》。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灣奇蹟》中扮演了如何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可視為呼應《臺灣奇蹟》中對美國角色意義的認定，《臺灣政經發展諸論辨析》¹⁹則強調臺灣的發展過程確實是在「全球格局」有著重大影響的情境下發生的；而且在此一格局中「自由主義」理論的「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也得以產生良好的作用，使臺灣有著不同於「激進主義」理論描述的中南美洲困境，關於這一點或許應歸功於「保守主義」所強調的臺灣歷史文化因素。

蕭全政的〈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²⁰就是以「全球格局」的「一個中國」因素，解釋臺灣戰後「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以及此後的政治發展。趙永茂的〈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²¹則更深入的探討「威權體制」的廣泛社會與文化的結構化影響，將成為影響臺灣政治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

參、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理論軸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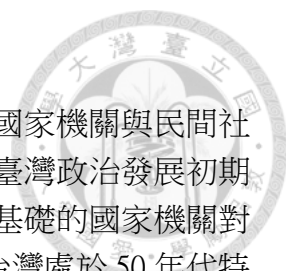
本博士論文關於「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在「國家發展理論」以整合理論典範，聚焦「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互動影響「發展」的思考架構下，探討臺灣的發展議題，並將既有的關於「臺灣發展」、「臺灣政治發展」、「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經發展」的諸多論述在此架構下予以脈絡化；然後引用臺灣政治發展的論述脈絡作為學理發展的軸線，政治學較常見到關於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論述建構有如下的分期：「威權體制」、「威權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等；初始期為「威權體制」時期，其後則有由初始狀態轉型的「威權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的發展。因此首先必須界定「初始期」的意義與狀態，此為發展論述首先必要的設定，其後才能依據論理建構此一發展論述。也正是由於臺灣政治發展論述設定的「戰後臺灣政治初始期」為「威權體制」，並且將「威權體制」界定為一「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的體制，因此此一關於臺灣「政治發展」的論述架構，所關注的領域就不會完全只是關於臺灣「政治」發展的論述，而必然會跨領域及於「經濟」、「公民社會」、「文化」諸領域。蕭全政的〈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是屬於政治經濟學觀點的一種代表性論述。²²

¹⁹ 同註 3。

²⁰ 蕭全政（2001）。〈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編），《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頁 63-8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²¹ 趙永茂（2008）。〈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頁 161-67。

²² 同註 20；以及參考蕭全政（2004）。〈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臺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頁 1-25。



此一臺灣政治發展論述，首先將現代國家的內部結構分為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二部分；民間社會再分為市民社會、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臺灣政治發展初期的「威權體制」建構成形，則首先論述「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的「威權體制」，在戰後台灣處於 50 年代特有的全球冷戰時空背景裡，被以依據「一個中國」的核心觀念政治「合理化」建構成形。「威權轉型」就是在有著「跨領域」與「跨臺灣內外空間」觀念架構裡建構的「威權體制」為「初始狀態」情況下，在「跨領域」與「跨臺灣內外空間」「情勢」「發展轉變」下獲得發展的，為繼續維持政治合理性，適應新的跨領域內外情勢需要，而有「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活潑化」的發展，也是國家機關對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民間社會控制與支配鬆解的過程，也是最高權力者透過掌控國家機構普遍控制支配民間社會的鬆解。

此一發展過程在政治領域就是論述劃分為戰後臺灣的「威權體制」、「威權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在經濟領域則為戰後臺灣產業升級發展，「進口替代」轉型「出口導向」以及經濟制度由國家機關對經濟領域的控制與支配鬆解的「經濟自由化」過程²³。是一種由「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政治與經濟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的「威權體制」，朝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轉型的過程；亦即「威權體制」為一非「自由民主」的制度，在戰後國際情勢的參與建構以及發展影響下，朝向「自由民主」的制度轉型的過程。同時國際局勢是由「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陣營相對於「計畫經濟極權」共產陣營構成冷戰格局，戰後臺灣在「一個中國」的核心觀念裡，歸屬於西方獲得「自由民主」陣營的參與、支持發展與共產陣營的中國對抗，但戰後臺灣「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計畫經濟極權」制度雖有明顯不同，卻也與「自由民主」制度仍有著明顯差距，而此一轉型發展過程則是朝向「自由民主」制度的方向轉型發展，並且意味著更遠離「計畫經濟極權」制度。

在此種論述架構裡，大約 1980 年代開始，臺灣政經轉型的發展其實並非單一的轉型事例，約當此時開始處於相對陣營的「計畫經濟極權」共產陣營也從中國開始產生大規模轉型情勢。首先，實行「計畫經濟」的中國²⁴，開始以「增量漸進」

²³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台灣經濟發展歷程與策略》。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²⁴ 本文使用「中國」一詞，與政府組織裡的「大陸委員會」的「大陸」指的是相同的對象；這個用法的討論曾經引起許多政治上的關注，但本文只要求所指對象明確無疑義即可，政治上有人偏好使用「大陸 VS 臺灣」認為使用「中國 VS 臺灣」有主權的爭議，但約在 2000 年之後的某段時間，同一批人卻主張這個用法代表一個中央一個地方，因此主張此一用法，反對使用「大陸 VS 臺灣」。本文的用法認為只須確定與「大陸委員會」的「大陸」指的是相同的對象不會產生

「市場化」改革的方式，實行「改革開放」政策²⁵，似乎使其經濟制度與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有所拉近，也使雙方經貿關係從過去的絕對隔絕，開始融冰發展，甚至在一段時間之後發展速度極為迅猛，但其實此種經貿關係仍受限於制度以及其他諸多因素，而存在著明顯的失衡以及潛在的激烈矛盾衝突因素。而這種制度與發展的相對也深刻影響臺灣的轉型與發展。在本章第二節之後將以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學的方法探討制度差異的內涵。

肆、密切相關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理論

相對於戰後臺灣政治發展論述對於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相關的歷史脈絡做了明晰的學理論述，與其有著密切關聯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相關的學理論述也有許多，這些論述的著重點各有偏重，其中之一為政府部門出版的論述，例如臺灣有國發會所出版的〈臺灣經濟發展歷程與策略〉一書，將臺灣自 1950 年之後，以每十年為一期，以當期相對的經濟發展特徵將臺灣經濟發展分階段描述此一歷程。關於這些「特徵－時間」劃分的階段，其他的論述脈絡也有類似的表現，而國發會出版的論述，其實更多在介紹各個不同階段政府所採行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是否採行市場化的政策。除了政府出版之外，也有許多其他的論述在相同的脈絡，描繪臺灣經濟發展的情況，此一學派或可稱為「發展型國家理論」²⁶，可以看到臺灣經濟發展是採行了市場化的政策，但政府正確的策略選擇與實行也是促成臺灣經濟發展成效的重要因素。

不同於政府論述脈絡，經濟學者的論述則更強調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裡的市場機制運作的貢獻，張漢裕分別就投資、教育、人力與制度、政策等因素探討²⁷，並且學者基本上認為臺灣經濟發展應以市場機制經濟理論論述²⁸。相對於集中強調市場經濟機制，高立民所著《臺灣奇蹟》則也強調外部世界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作用，如戰前的日本與戰後的美國在臺灣經濟發展裡的角色，包括美國市場提供臺灣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美國政府透過美援促使臺灣政府採行市場化政策，另外這個論述也強調了臺灣經濟發展過程裡政府扮演的角色²⁹。其實強調這些因素的論

誤會即可。

²⁵ 吳敬璉（2005）。《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台北：美商麥格羅 希爾國際公司 台灣分公司。

²⁶ 瞿宛文（2017）。《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緣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

²⁷ 張漢裕（1974）。〈美援期間臺灣經濟之發展及其戰略因素〉，《經濟發展與經濟思想》，張漢裕博士文集（二）。台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頁 67-104。（原載公論報，民三十七年四月九日）

²⁸ 于宗先（總主編），歐陽勳 黃仁德（本集主編）（1994）。《臺灣經濟發展總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²⁹ 同註 17。

述不少，且林炳炎的《保衛大臺灣的美援》也是值得參考的。³⁰外部作用不只是在因素市場結合產業技術升級的討論，也包括制度因素的培養。而對此外部因素影響的戰後臺灣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理論，運用福特主義與軍事主義可強化戰後臺灣此一歷史脈絡的論述分析。另外，劉進慶以及他留日時的老師與同學也提出獨立於政府論述，以及重點選擇與論述架構不同於臺灣經濟學者的臺灣經濟發展著作。³¹

而《臺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辨析》³²一書，則綜合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論述臺灣的政經發展，認為這些不同理論流派都對認知臺灣的發展可有助益。而《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一書³³則以國際市場分工製造的角度，描述臺灣的產業與經濟的構成與發展。關於國際市場的分工製造，世界銀行的《全球生產網絡與東亞技術變革》³⁴則不只是針對臺灣，而就全球的分工佈局加以描繪，當然可以認為臺灣的國際（代工）分工發展，應屬此一東亞與全球架構中。筆者認為在本博士論文中，若能再以「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³⁵透視相對於國際總體規模廣大的市場而言，規模較小的臺灣，在所謂的「國際分工」架構中，以「貿易導向」作為發展經濟的基本架構，所具有的更清晰意涵，進而再結合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理論與比較制度理論，聯結冷戰與後冷戰轉型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更深入周延提供思考分析的視角。

簡而言之，筆者認為在「國家發展論」以整合理論典範，聚焦「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互動影響「發展」的思考架構下，探討臺灣的發展議題，並將既有的關於「臺灣發展」、「臺灣政治發展」、「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經發展」的諸多論述在此架構下予以脈絡化；在此脈絡化的「臺灣經濟發展」則注意以下因素的影響：1.全球現代化文明發展的基本態勢；2.全球格局之美國布局；3.變遷的臺灣政治體系，包括「發展型國家」的政府角色，以及政黨輪替的去結構

³⁰ 同註 3；以及參考林炳炎（2004）。《保衛大臺灣的美援》。臺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

³¹ 雷慧英等（譯），涂照彥（原著）（1993）。〈第五章貿易〉，劉進慶等著，《臺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初版），頁 275-330。臺北：人間出版社。

³² 同註 3。

³³ 雷慧英（譯），谷蒲孝雄（編）（1995）。《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臺北：人間出版社。

³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譯），Yusuf, Shahid & Altaf, M. Anjum & Nabeshima, Kaoru（編）（2004）。《全球生產網絡與東亞技術變革》。《世界銀行東亞系列研究叢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³⁵ 第一章第二節之貳之四，頁 8-9。筆者參與經建會研究計畫整合技術擴散與產品生命週期理論之分析架構；陳良潮（1994）。〈第五章兩岸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分析；（第四節兩岸產業技術發展能力）〉，于宗先主持，《兩岸產業競爭趨勢分析》，經建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

化政策思考；4.傳統社會威權體制現代化市場機制的缺乏，與出口導向參與美國市場帶動的現代化市場化發展；5.臺灣歷史文化對變遷政治體系運作及現代化之市場化的影響。



伍、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³⁶

從戰後臺灣政治發展此一理論軸線，連結密切相關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理論，可以看到美國對臺灣的政治經濟支持，在此臺灣戰後政經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角色，其中除了全球冷戰架構的戰略考量之外，也應思考美國本身的經濟發展需求也得到照顧才更有可能。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軍事主義的論述中，包括「（全民與經濟的）全面戰爭(total war)」、「後方前線(home front)」、「管理型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等觀念，可以發現這些關於軍事主義的觀念，其背後都必須關聯工業化的策略的思考，可以特別單就工業化策略的角度思考這些觀念的涵義。並且既然是牽涉工業化的廣泛策略，它們自然也將會產生就業與社會、勞動型態等不同層面的效果。學者以福特主義論述美國式的產業社會經濟模式，在此理論架構下也可以看到對臺灣產業政策效應產生更廣泛的政策意涵。

將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連結，可以幫助解釋戰後美國在臺灣政經發展選擇的參與政策，特別在與軍事主義中的工業化問題有關部分，產業發展大量生產模式是工業化的重要議題，福特主義強調產業透過技術創新發展大量生產的產業模式成為市場經濟制度面動員力的創新，此種制度面的創新也成為推動「管理資本主義」產生的因素之一。如果戰後美國工業的福特主義模式最有代表性，那麼戰後臺灣扮演國際分工基地的工業化發展過程與福特模式是否有著關聯？福特模式的大量生產與純粹的大量生產模式不盡相同，包括強調有利大量生產的技術創新，提供員工更優厚的待遇，因此在追求此一目標的過程中是否也把較不合理的產業部門移往海外，例如早期的臺灣，提供外商勞力密集產業的投資機會。除了在戰後台美之間，此一理論的連結也可應用在 1980-90 年代開始，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而迅速發展的美中與兩岸經貿的討論。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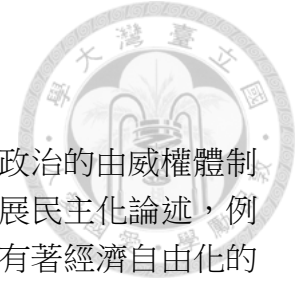
³⁶參考以下文獻： Held, David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tuart Hall & Bram Gi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p.71- 125.

Allen, John (1992). "Fordism and Modern Industr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ms of Modernity*, eds. John Allen, Peter Bram & Paul Lew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229- 274.

McGrew, Anthony (1992), "The State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ms of Modernity*, eds. John Allen, Perer Bram & Paul Lew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65- 126.

Mann, Michael (1988). *States, War &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c.

³⁷ 丁樹範 (2005)。〈市場因素與一九九零年代以後的中國裝備體系的改革〉，《中國大陸研究》，



陸、戰後臺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論述

在此戰後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理論描述脈絡裡，相對於政治的由威權體制鬆解的政治民主化過程，而有針對此一主題的戰後臺灣政治發展民主化論述，例如趙永茂、楊舒媚與王業立的論述，在經濟領域也理論聯動著有著經濟自由化的論述。

趙永茂的〈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一文³⁸，認為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仍然沒有擺脫原來國民黨政府權力統合、權力侍從、利益妥協的窠臼，造成新的政商貪腐結構，但臺灣與臺灣人民主體性卻也有更堅實的建構，對兩岸、區域及全球的戰略發展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趙永茂的〈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探討經由地方公民社會的建構鞏固臺灣民主發展。楊舒媚的碩士論文〈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廣泛回顧相關的理論並蒐集整理大量的相關文獻與資料，並引述文獻嘗試以民主鞏固的觀點發展論述討論陳水扁執政八年對臺灣民主化發展的影響，其中也將這八年對臺灣民間社會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予以整理列表顯示。另有許多學者對第一次政黨輪替八年間的政治發展也撰寫論文分析。本論文（尤其第三章可以顯現）則擬儘可能依循此一討論的脈絡，就此一段期間的產業與經濟政策進行政治經濟探討以參與討論。

2000 年臺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政黨輪替」的出現被認為是臺灣進入「民主鞏固」期的表徵，「政黨輪替」與「定期改選」、「權責相符」都是防止掌權人濫用權力，發揚憲政基本精神的必要手段。進入民主鞏固時期的臺灣必須持續進行不只是政治，還包括其他各個面向諸如經濟、社會、教育的改革，並且應該鞏固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領導中心³⁹。（王業立，2000；李西潭，2001；李西潭、張孝評，2002）

相對於政治民主化的理論討論，在經濟制度領域則有經濟自由化的討論⁴⁰，並

第 48 卷，第 1 期，頁 29-52。

丁樹範（2006）。〈全球化下的中國國防工業〉，《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頁 1-22。

³⁸ 趙永茂（2008）。〈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頁 161-67。

³⁹ 王業立（2000）。〈政黨輪替實現 民主鞏固期來臨〉，《中國時報》，3 月 20 日，第 15 版。

李西潭（2001）。〈邁向鞏固的民主：臺灣案例〉，載於高永光等編，《民主與憲政論文彙編》，頁 437-46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李西潭、張孝評（2002）。〈臺灣民主化分析-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十卷，第二期，頁 45-8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且可以看到這是民主化政黨政治關切的核心議題之一，同樣的也有許多論述討論經濟自由化的問題，並且可以看到經濟自由化議題仍可細分為許多不同的次領域，例如本博士論文則嘗試處理能源產業的自由化理論⁴¹。基本上由「威權體制」作為戰後臺灣政治與經濟初始期制度狀態，而有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轉型發展，作為轉型的標竿制度就是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並且此種政治與經濟制度所支撐的外部世界，就是支持臺灣面對中國的外部體系；相對於此，中國所屬的共產陣營所實現的「計畫經濟極權」制度，與此種「自由民主」的制度卻是有著尖銳對抗性的制度，下一節將以「比較經濟制度」與「比較政治」結合的「一般架構」對各類制度做一理論比較，並將之作為本博士論文之理論基礎。

第二節 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⁴²

壹、「比較經濟制度」方法論與「比較政治」的「一般架構」回顧

一、理論回顧

關於「比較經濟制度」的方法論，孫殿柏所著的《比較經濟制度》(1985)⁴³一書，曾略作界定，及整理此一領域所用的方法。他認為「比較經濟制度」「以現行經濟制度做比較研究，自應就當前各國的經濟制度分析比較之」並且據此解釋此一領域所慣用的方法，認為「不過此一工作自必龐大」，「因此，現在適用的比較方法是把現行經濟制度就其大體試做分類」，這是他所提到的第一個方法。他的著作出版於1985年12月當時中國已在探索經濟改革，也就是在探索計畫經濟的轉型，但世界仍處在冷戰的時代，蘇聯仍未垮台，實行的是計畫經濟。因此他提到的比較經濟制度的分類往往明顯包括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兩個基本類別。他所提到的第二個方法，「是找出某一制度的典型問題在其他制度裡的比較，這是橫向比較」。第三個方法則認為應就各種制度的系統脈絡探討。

⁴⁰ 孫震(2003)。《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台北：三民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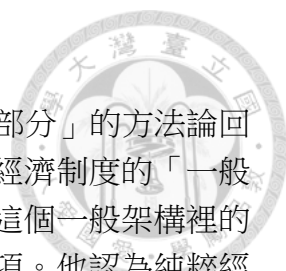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

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1993)。《政策白皮書(綱領篇)》，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⁴¹ 陳良潮(1998)。〈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的理論探析〉，《能源季刊》。

⁴² 部分內容發表於「第十二屆發展研究年會」。陳良潮(2020)。〈從「中國模式」的特性分析探討美中貿易衝突〉，第十二屆發展研究年會。11月，7-8日，台北：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

⁴³ 同註5(2)。



除孫歐柏的方法論回顧之外，Conn, Daniel(1978) 也作了「部分」的方法論回顧，他的回顧著重在如何探索得到一種適合比較分析各種不同經濟制度的「一般架構」，以這個一般架構觀察分析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構成這個一般架構裡的各個變數、變項都應是影響各種不同經濟制度的關鍵變數、變項。他認為純粹經濟理論與比較經濟學雖然各自獨立發展，但卻具有很近似的架構，因此他對「嘗試以經濟理論分析經濟制度」的「經濟制度理論」作一簡易的文獻回顧，旨在提出一個更一般性的論述，以證明不論就純粹經濟理論學者或比較經濟學者，他們之間不僅彼此一致，甚至可有相同的理論架構。為介紹這個具有一般性的架構，他先回顧 Koopmans 與 Montias(1971)的理論體系的主要組成項目，然後選擇 Neuberger 與 Duffy(1972,1976)的架構，包括訊息、決策與動機三個結構，作為他的一般性架構。⁴⁴

此外在此一關心的主題裡，筆者在本節也引用「比較政治」的，關於「政治體系的一般架構」對不同的制度做比較(Almond, Gabriel A. and Powell, G. Bingham Jr., 1978)。「比較政治」運用一套共同的「政治體系」「架構」，對不同的政治體系進行比較分析，首先界定「政治體系是社會在其國內國際環境中，有意識的制定和追求集體目標的工具，而這個政治體系的運作是依靠合法的人身強制進行的」，將比較政治學這一套政治體系架構，其中包括政治體系內的「角色」、「結構」、「文化」的比較探討，應用在所分析的經濟制度的基本性質討論裡；認為著眼於分析目的，將此「政治體系的一般架構」應用在「比較經濟」的比較分析裡，具有特別的意義。

二、相關經濟制度與基本經濟模式介紹與比較

比較經濟制度常以大分類以及各分類的基本經濟模式的方法介紹實際存在各國的經濟制度，而在冷戰時期「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是很重要的一組「相對的」經濟制度模式，經由「基本模式」的比較，可以看到它們之間「顯然的」相對性，當然經由歷史與思想理論根源的探索可以發現這種「顯然的相對性」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其來有自，並且這個因素也是造成二戰後所謂「冷戰」全球大格局的重要因素，而今日所出現的美中貿易衝突，在言論領域裡也被思考與冷戰型態相互呼應，是否若隱若現與冷戰時期的這種經濟制度對立的因素相呼應著？在這樣的情況裡，本節的分類介紹首先也如過去冷戰時期此一領域研究常做

⁴⁴ Conn, David (1978). "Economic Theor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A Partial Literature Surve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 pp.355-381.

Koopmans, Tjalling C. and Montias, John Michael (1971).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ed. Eclestei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p.27-78.

Neuberger, Egen and Duffy, Willian J. (1976).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Boston: Allyn & Bacon.

的包括了「自由經濟制度的模式」與「計畫經濟模式」，且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計畫經濟制度」模式的介紹，在討論今日的「中國經濟制度」模式時有著明顯的必要性。並在此架構下，以整合「比較政治」的「政治體系一般架構」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特性組合系統架構」的方法，對相關相對制度加以分析比較。

貳、「標竿型」依循人類天性的「市場經濟」理論特性與其基本模式

一、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基本模式⁴⁵

兼顧本博士論文所需的冷戰時期美蘇或者民主自由與共產陣營制度模式尖銳對比基礎背景，以及美中經濟制度模式比較，本節安排各種制度基本模式介紹次序。首先介紹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模式。其次依據對自由經濟制度基本模式的架構，相對介紹計畫經濟模式。而由於改革的中國經濟制度模式是由計畫經濟模式(以「改革」而非「革命」)發展而來，因此也相對的可以在此一架構裡予以介紹，採取這種方法當然或許可以歸於歷史上這些全球的制度發展的先後及脈絡，但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例如當前影響廣泛的美中貿易衝突雖然未必是美國造成的，但發動的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為什麼這樣做？與其理論思想有何關聯？這正是本博士論文所擬探討的主要議題之一。經由上述的安排比較，正可以聚焦凸顯此一議題相關的因素。另一個焦點則為在此全球大架構下，臺灣由政府有著控制社會、經濟活動能力的威權體制開始，如何在此相對架構裡定位、轉型，也可得到更清晰而豐富的意義探討，並且可見到本節探討的內容，是影響上節理論系統建構，以及本博士論文主題的核心影響因素。

關於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基本模式的介紹，已有太多的著作提供這樣的介紹，但是仍然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涵蓋的內容仍有一些差異，原因在於像自由市場經濟這樣的模式是一套廣泛系統性的模式，如何周延全面描述它，可能並不容易，許多其中的重要因素或性質、特性，可能要在某種思考探索裡才會被凸顯出來。

「社會」基本上必須面對如何運用「稀少」的資源「有效率」的滿足「不斷發展的慾望」的挑戰，「自由經濟」社會承認稀少資源屬社會成員「私有」，並且在此基礎上，社會成員可以「自由」發揮心智身體能量與勞動，從事包括生產、就

⁴⁵ 參考以下文獻：同註5之比較制度相關文獻，以及關於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之文獻；

張漢裕（譯），Smith, A.（原著）（1989）。《國富論（上）（下）》（三版）。

施建生（1984）。《經濟學原理》（八版）。臺北：施建生發行。

陸民仁（1980）。《經濟學》（六版）。臺北：三民書局。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2016）。《經濟學》（五版）。台北：雙葉書廊。

業、消費的經濟活動，在這個「財產私有」及「經濟自由」的基本性質支持下，社會已發展出了「自由交易」的「市場價格機制」，且在此機制裡整合社會的稀少資源從事生產、就業、分配、消費的經濟活動，以「有效率」滿足「不斷發展的慾望」。

學者認為這一套「自由經濟」模式是從人類自然天性裡發展出來的機制，促進了社會複雜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而理論上也發現這套機制運作的規律與性質，這個理論的發展，在歷史過程的經驗裡，也強調社會經濟應依靠「自由市場機制」，不應由「政府主導」，或者「過多干涉市場機制運作」，因為政府主導的效率不如自由市場機制，政府介入自由市場機制也將會扭曲價格機制的運作，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而在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的情況，市場供給與需求將以「競爭」的方式促使效率得以提升，在供給法則與需求法則的作用下，使資源的配置達到有效率的均衡。

市場經濟生產的價值創造，必須透過市場機能提供消費者效用，滿足消費需求，獲得消費者支付的相應貨幣才得以實現，因此展現了「消費者」在經濟活動裡的「主權」。社會成員一方面扮演參與生產的所得獲得者的角色；一方面扮演消費者的角色，將所得花費在消費品的購買上，促使「經濟周流」「循環不息」自我圓滿。市場機制的運作產生「貢獻所得說」所談到的分配效果，社會成員所擁有的生產因素參與市場機制運作，因其因素參與產生市場貢獻，在市場的競爭中可以獲得相應的報酬，這是機制運作的性質，也使得社會成員競爭擁有具有對市場能夠產生更多貢獻的因素，例如勞動素質的提高，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資本，將資本移到更有用的部門、地方等。

二、互相獨立的政經體系

因而「自由競爭市場經濟體系」的「運行機制」，與「自由競爭市場社會的政治體系」「運行機制」是「二套」並存且有著根本差異的「體系」，在這個社會裡，「自由競爭市場的經濟體系」是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個體自由的彼此自願生產、就業與交易以進行經濟活動，而在這個社會裡，個體除了進行自由競爭市場的經濟行動之外，個體也都是這個社會政治體系的一個組成份子，彼此透過強制力整合追求共同目標的達成。而在這個經濟模式的運作裡，希望「政治體系」依強制力運作的範圍儘量減少，使得依自願生產交易的功能得以發揮最大的效能。

依據政治體系⁴⁶架構的界定，自由競爭市場經濟裡社會的個體成員，普遍參與的市場經濟活動，是此一社會政治體系的「環境」，政治體系僅在必要的時候以「共同強制力」制定政策、法律，以達成協助市場經濟的運行的目的。在此可以

⁴⁶ 同註 5(1)。



看到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社會裡，依據個體自由就業與交易進行經濟活動的市場體系，與該社會依據集體強制力追求共同目標的政治體系是截然不同的體系，在此經濟活動經由個體參與政治體系而成為政治體系運作的「環境」。

參、計畫經濟基本模式⁴⁷

「社會」基本必須面對如何運用「稀少」資源有效率滿足「不斷發展的慾望」挑戰；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相對，「計畫經濟模式」社會認為在這種條件裡應採取「稀少資源」「公有」的制度，因此社會成員就沒有據以可「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資源，人類天性發展出來的「市場價格機制」也就不可能在這樣的條件裡產生；反而基於「公有制」一切的經濟活動必須由代理「公有財產」的「政府」所安排管理。當然，今日改革的中國模式是從公有制計畫經濟裡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美國在今日對中國進行貿易談判要求中國需進行結構改革特別值得關注，而當社會成員沒有經濟自由那麼「不斷發展的慾望」是否仍然存在？

計畫經濟社會的經濟活動與自由市場的經濟活動運作截然不同，以層層隸屬、組織龐大的行政建構，經由完整的計畫體系進行；在公有制的基礎條件支持下，政府掌握社會體系內為數眾多企業的所有權，企業的角色在執行政府計畫體系的決策，社會稀少資源的運用包括投資、生產、分配、消費等都是政府在「有計畫」的安排下進行，以求滿足社會需要，而不由企業決定。「計畫—行政」體制由層層建置構成，這層層建構由一個「基本形式」層層堆疊構成；這個「基本型」是由一個核心的「行政—計畫」部門與包括「生產」、「流通」、「科研」、「消費」等部門構成；核心的「行政—計畫」部門「有計畫」對其它部門進行垂直安排，亦即有計畫的決定社會的消費，消費什麼，如何進行等；並因而決定生產，由那個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等；而產品的流通與科研活動的進行亦然，皆由「計畫—行政」部門依計畫安排。

可見「計畫經濟」體系的「行政—計畫」部門的層層建構而成的體系，如何「依計畫」推動社會經濟活動，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制度運作核心；中國過去純粹的計畫經濟制度，計畫的編制採取「二下一上」的編制年度計畫，包括四個階段，「編制前的準備工作」、「頒發控制數字」、「編制和報送計畫草案」、「計畫

⁴⁷ 參考文獻：曾德清、王雲清主編（1987）。《計畫經濟學概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何建章、王積業主編（1984）。《中國計畫管理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震中主編（1985）。《計畫經濟學（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同註5(1)。

的審批和下達」，（何建章、王積業主編，1984：52-55）在「準備階段」各級計畫單位要「分析經濟情勢」確認基礎資料；「頒發控制數字」則由「國家計畫委員會」經由參考自身的調查研究以及蒐集各部門與各地區與基層意見，進行初步的綜合平衡，據以提出對各部門與各地區編制計畫的指示以及計畫控制的數字，並將其報予國務院審批，國務院核准後下達各部門與各地區，作為各部門與各地區編制該部門或地區經濟計畫的依據。

而各部門與地區不能改變經由國務院批准的國家計委的指示與控制數字，並且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將其進一步「具體化」，並且逐級發到下級基層計畫單位，基層單位的管理階層就整合內部與相關資源，討論、執行擬定自身的經濟計畫草案工作。計畫草案確定後，逐級上報，各級也據以進行綜合平衡與上報，國家計委也編製出全國計畫草案，報國務院。全國國民經濟計畫草案初定後，召開全國計畫會議同各部門與各地區反覆協商，確定正式的計畫草案由國務院審定，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成為國家正式計畫，自上而下逐級依照隸屬關係發布。由這個過程就可以看到計畫經濟制度裡各個部門的角色定位。

與「自由市場經濟」相對，自由市場經濟所認為符合人性的社會成員市場自發交易，消費者主權引導的市場經濟活動，在這個計畫經濟裡幾乎完全不見蹤影，而強調的是完全的政府計畫「強制執行」的角色。再如「貢獻所得說」的作用又如何能夠產生作用呢？而經濟周而復始的「經濟周流」，雖然也必須在計畫經濟裡得到呈現，但是完全不像自由市場經濟裡所表現的那樣。由上述介紹可以見到「計畫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比較有著許多明顯的差異，例如「計畫經濟」裡的各個單位明顯存在著以強制力為特徵的「垂直關係」，基層單位沒有自主性，單位之間沒有基於自願交易的「水平關係」。從這個觀點看中國改革政策，就是在「計畫經濟」裡引進「市場經濟」的內容，開始的時候，雖然仍然維持「計畫經濟體系」的運作，但是逐步允許計畫體系裡的單位，可以具有部分的自主性，可以透過自願交易發展單位之間的水平關係，這個鬆綁的措施使得單位的產量提高了許多，並且帶來更多的鬆綁政策，使總產量繼續迅速的擴大。

在「計畫經濟」模式，經濟活動與「政治體系」的關係是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與政治體系的關係完全不同，在計畫經濟所有經濟活動都由「計畫—行政」部門經由指令計畫「強制」各部門、單位執行，因此計畫經濟的經濟活動並不是所屬社會政治體系的環境，而是屬於他們社會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因此這個社會的資源以公有的型態都是屬於政治體系管理、支配的範圍。在介紹計畫經濟時也已介紹經濟活動是依據強制力運行的模式，因此，縱使經濟活動在一個社會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在計畫經濟的社會裡，它是與這個社會的政治體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佔有重要地位的經濟活動它的目標與運行方式與政治體系的目標與運行方式完全結合在一起，而成為「政治體系」的「子體系」。



肆、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基本模式及政經轉型與發展可能關聯

一、政治體系介入經濟社會

依據臺灣政治發展理論所述，「威權體制」時期臺灣政治強調「國家機關對包括經濟社會的社會領域的控制與支配」，因此此一時期臺灣經濟制度不同於前面所述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此「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裡，此一經濟領域是其政治體系的「環境」，政治體系的運行機制與經濟制度運行機制基本上相互「獨立」，而令「威權體制」的臺灣政治體系明顯介入其經濟領域；但此一「威權體制」時期的制度也不同於前面所述「計畫經濟」體系附屬於其政治體系，事實上，「威權體制」時期的臺灣經濟制度，仍有「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空間。

二、比較經濟特性觀之「威權體制」

在所有制，戰後臺灣「威權體制」時期，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仍然尊重私有財產權，但初期曾經以「威權」的方式，實施「土地改革」之「耕者有其田」與「三七五減租」政策，以政治強制力有償轉移既有的田地所有權；並且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接收原屬日本的財產，而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臺灣重要的工業發展多屬日資，因此使得戰後臺灣初期「威權體制」時期，公營與黨營在臺灣追求工業化的經濟領域佔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別明顯包括金融業與能源資源以及基礎工業產業。而之後「出口導向」的美國與日本市場則有大批中小民營企業的參與，並且壯大廣泛競爭的私營部門。

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裡，臺灣「經濟周流」與美日市場關係密切，應不具有完整獨立的「經濟周流」系統，參與其中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有其相對的經濟自由。並且政府對於經濟領域採取明顯介入的態度，依據「威權轉型」之後時期學者的觀點，此種政治力介入的目的包括在強勢的國際已工業化市場裡對仍屬落後的臺灣產業體系的保護，但也包括政治體系裡主導勢力的黨國結構的獨占利益保護。但在此之外的民間民生經濟仍有自我小型「經濟周流」系統，以及相應的經濟自由。

三、知識經濟、能源產業制度與兩岸經貿的比較制度意涵

(一)以知識經濟的角度觀察探討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具有特殊意義，但從臺灣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與全球經濟的特有關聯來看，由於知識經濟與傳統經濟活動可能的明顯差異，因此在比較制度裡恐怕也存有極具關注的價值。此外，本論文強調軍國主義理論討論臺灣政經發展，因而在此制度與政經發展脈絡裡，臺灣知識經濟可能的討論空間將如何？

(二)與「威權體制」相呼應，臺灣油電能源產業採取國營模式似乎並不突兀，但其實能源產業的制度與市場特性，例如大規模效率與低價格彈性需求特性，以

及電力調度輸配實現市場機制的能力，都影響能源制度安排發展。而未來新能源的技術與結構特性與制度安排是否相容，也將影響新能源的發展，因此必須特別關注。



(三)兩岸經貿的發展與制度因素關係極大，值得特別關注。

伍、改革後的中國經濟模式

本節以經濟制度的「基本模式」進行制度的比較討論，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常被描述成具有「私有財產」、「經濟自由」、「決策分散」、「市場機制」；但計畫經濟制度則相對被描述成具有「公有財產」、「官僚主導」、「決策集中」、「計畫運作」；在介紹了「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基本模式與特性之後，現在介紹從「計畫經濟」開始，以「增量改革」置入「自由市場經濟」內涵的「改革後的中國經濟模式」的基本模式與特性。那麼現在中國的經濟「基本模式」呈現何種狀態，與「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計畫經濟」比較有著怎樣的「基本特性」？除了上述的基本模式與特性之外，包括「政府角色」、「消費者主權」、「貢獻所得說」、「經濟周流」等重要觀念的實際狀態又如何？或許可以從幾個方向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是推動改革的官方以及論述如何描述它；其次從改革的過程探索，從這個過程路徑嘗試去認識它現在可能的樣貌；第三從一些調查所公布的情況去了解；第四從邏輯的推演嘗試去了解。

一、中國政府觀點

根據「官方以及論述的描述」⁴⁸，「改革後的中國經濟模式」與「自由市場經濟」不同，也與「計畫經濟」不同；在所有制來講，是這樣定位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並且解釋「是我國（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這樣的定位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也與「計畫經濟」不同；而在前面的討論，也可以看到「私有制」與「公有制」分別搭配「市場」運作機制與「計畫型」的運作機制；前者強調社會成員的積極自利交易行動，淡化「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後者強調「行政—計畫」體系的「強制力」；那麼「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改革後中國經濟模式能不能做到官方文件對中國的市場經濟一再揭櫫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念？

亦即，中國改革後關於所有制構成的特性，只要得到統計數字就可以顯現，

⁴⁸ 中國黨政官方文件對其（如此處所舉）基本特性的描述散見歷次公布文件之中，例如十九大的報告：習近平（2017）。〈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但當討論這樣的所有制構成特性要實現「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念時，在理論上就會產生許多混淆有待釐清，才有可能對其「運行機制」做一較清晰的介紹。相對於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清晰介紹，改革後的中國經濟在「公有制主體」的所有制特性裡，相對應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架構將如何呈現，並且得到確認，不啻為一挑戰。而這個組合及其所衍伸的改革後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本模式與特性是特別值得關注之處。

二、以「過程」考察

再從中國經濟轉型改革的「過程」考察，與蘇聯東歐不同，中國採取的經濟制度改革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開始時是在既有的計畫經濟裡，以「增量改革」的方式（吳敬璉，2005），不再專注於從計畫經濟體系的核心部門「國營企業」，而從邊緣的集體經濟開始，從推動農業生產的家戶承包制開始，當農產家戶承包制獲得成功，並且產生相關的市場交易，進而鼓勵鄉鎮企業、個體經濟發展，以及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這些發展都透過市場經濟模式，同時開放對外經貿，參與國際經貿市場⁴⁹，這種改革發展策略得到良好的成效，成為中國經濟改革前期階段經濟體系裡的重要內涵，當鄉鎮企業、個體經濟與私營企業市場化獲得發展，也帶動了工業部門計畫經濟核心的國營企業的改革。

以工業部門國營企業為核心的計畫經濟，相對的產業發展策略是一種著重重工業，輕忽輕工業的所謂「重重輕輕」的經濟發展策略選擇，而「增量改革」以生活所需的市場取向引導，在當時的中國發展階段，產業選擇自然呈現重視輕工業的現象，也扭轉了這種「重重輕輕」的發展策略選擇，但是國營企業的性質則仍偏重重工業，並且隨著經濟改革帶來的高速發展，也為國營企業偏重的重工業帶來市場需求。改革後的市場化發展並且帶動產業發展策略取向的轉變，也相對應於帶動這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導向的「三駕馬車」「外貿、基礎建設、消費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描述。

也就是說，在從「計畫經濟」以「增量」模式進行漸進改革的過程裡，「計畫經濟」的基本模式與特性，漸漸被「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模式與特性取代，但到了今日真實情況如何？而在這個過程裡，產業結構也由著重重工業，增量改革由基層自主發展與人民生活需求息息相關的農產、輕工業與服務業，而這個基層生活所需相關的經濟活動，自然處在「計畫外」，由基層自主決策、生產與市場交易。而改革開放發展歷程顯示了，從「計畫經濟」走來，「公有制主體」、「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制度建構仍在探索之中，至少「操作型」的定義仍有待探索，今日中國政治體系的意圖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將會如何塑造此一探索的未

⁴⁹ 特別可將國際市場視為自由競爭市場，而轉型的中國經濟活動經營單位與部門，參與了此一國際市場，有助於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轉型。

來進程？⁵⁰

計畫經濟經由市場化改革帶動經濟發展，此一過程使傳統單一的公有制發生轉變，個體、集體、私營、外資以交易導向的方式進行經濟活動，體系裡市場機制也因此產生，並且經濟規模得以大幅擴大⁵¹。隨著此一由增量改革的經濟發展規模擴大，國營中小企業與國營大型企業也加入此一交易導向的經濟發展趨勢裡，並且中小型國有企業與集體經濟也紛紛民營化，使得公有制的規模比重在快速萎縮，但牽涉基礎性與戰略性產業的則仍維持國有的型態。與此改革過程帶來的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的經濟發展相對應，中國經濟被形容是以基礎建設與投資、出口貿易、消費三駕馬車帶動的經濟發展，其中基礎建設與投資有著很強的公部門關聯性，與此相對應的能源、原材料、運輸、交通、航太、機械、金融仍掌握在大型國有企業手中。

而此一計畫經濟的增量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是否也使政治體系弱化？當然在市場化的部分，似乎應該如此，但其實與經濟活動關聯廣泛的龐大政治體系，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仍保持著緊密的關聯，也使這個市場化與發展過程成為一個讓政治（權力）體系獲得利益的過程⁵²。在突破計畫經濟的約束後，政治（權力）體系有更大的空間以所掌握的資源參與經濟活動創造利益，並且在制度嘗試性發展階段，有更多的機會將其部分據為己有。而這也可能影響政治（權力）體系推動進一步改革的意願。甚至是否將對政治體系在計畫經濟之後的運作產生影響？⁵³因此似乎可以看到一個頗複雜的結構存在其中。⁵⁴

三、「調查」方式的認知

關於以「調查」方式了解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其實正如 WTO 將計畫經濟轉型的國家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一般，計畫經濟轉型是否能夠成為市場經

⁵⁰ 周嘉辰（2019）。〈實驗主義與政策試點：中國大陸的公立醫院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1 期，頁 35-65。

劉孟俊、吳佳勳（2022）。〈中國大陸獨角獸與它們的產地：區域特性與資本結構的影響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65 卷，第 1 期，頁 35-70。

⁵¹ 鄒東濤、歐陽日輝（2008）。《中國所有制改革3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⁵² 何清漣、程曉農（2017）。《中國：潰而不崩》。新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梁文傑（譯），婁敏欣（原著）（2017）。《出賣中國》。

⁵³ 徐斯勤（2007）。〈中國大陸中央與各省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力競爭，1993~2004：菁英政治與投資政策的議題聯結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2 期，頁 1-33。

⁵⁴ 陶儀芬（2004）。〈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對話：以中國金融研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頁 41-61。

濟國家必須面對深刻的檢驗。這個議題中國無法說服美國與歐洲已經是市場經濟國家，美國與歐洲本身也做了調查檢驗，也都不承認中國已經是可以被接受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貿易代表署針對中國加入 WTO 每年向國會提出的報告也提出關於中國仍不屬市場經濟的廣泛檢驗結論(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9)⁵⁵；「美中安全與經濟委員會(USCC)」2018 的「年度報告」已彙整羅列更廣泛的導致中國獲得不公平利益的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包括：1.補貼；2.關稅、本地成份要求與監管挑戰；3.投資限制；4.智財權盜竊、技術轉移要求與經濟間諜；5.技術標準；6.資料本地化與跨境資料轉移限制。並且認為對於此類不公平貿易情況的出現，美國過去已經採取了包括單邊、雙邊以及多邊的應對策略，但基本上效果有限，因此導致此次貿易衝突事態的發展。⁵⁶

四、理論「邏輯的推演」探討

再來嘗試從「邏輯的推演」希冀獲得更多的了解，這個「（公有制）計畫經濟改革轉變而來的」「公有制為主體」、「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中國當今經濟模式，已與計畫經濟模式不同，也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模式不同，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最大不同，在於由（公有制）計畫經濟市場化改革而來的現今經濟模式（公有制）計畫經濟裡，扮演主導角色的政治體系在市場化轉變後，仍在市場裡扮演著不可忽視的「市場」「參與者」角色，而這種相對於計畫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的奇特構成，相對應於過去 30 年的經濟發展特有的基建與投資、出口貿易、消費三駕馬車導向構成，是否能夠可長可久則仍是一個缺乏歷史經驗驗證的議題，其中有諸多（對現今中國而言的實質與意識的）傳統因素影響對它討論的走向。

而這種「政府」扮演「市場」「參與者」的架構，由於政府角色的特殊，對於市場機制的運作將產生深刻的影響，並且「政府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政府參與市場運作將會以什麼方式⁵⁷，或者將可能有什麼（創造性的）方式⁵⁸？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⁵⁹，並且正如前已提及，中國「深化改革」的過程，正意味著今天的這種經由對「計畫經濟」進行「漸進」改革而來的運作模式，已經取得了成效，

⁵⁵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9).*2018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⁵⁶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8).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⁵⁷ 周振超（2009）。《當代中國政府“條塊關係”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松森（2006）。《中央與地方國有資產產權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⁵⁸ 潘德斌等（2012）。《中國模式：理想型態及改革路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⁵⁹ 趙永茂、羅又軒（2010）。〈中國農村改革與中共政權正當性之關係：以胡溫之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十一卷，第二期，頁 1-41。

田君美、紀舜傑（2014）。《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發展》，經濟叢書系列之 50，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因此必須肯定改革的經濟。

但另一方面也顯現了當前的模式仍有明顯的缺點，必須進一步改革，關於成效部分，在中國的政策領域，有一說認為這個由計畫經濟漸進改革而來的當前中國經濟模式，從過去 30 年所取得的成果，驗證了是優於「計畫經濟模式」的，甚至也是遠遠優於「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這種觀點想必也影響了政策領域的思維，重點在於，怎麼影響？影響了什麼？由中國仍然宣示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可見政策領域的總結並不認可，當前的模式已是基本穩定、可長可久的模式，而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模式仍是一個必須探索改革前進的模式⁶⁰；亦即，某種意義上的「簡單說」，一種有著「顯著」政府參與其中特性的市場型經濟模式，將會是怎樣的經濟模式？不要忘記，政府本質上又具有「執行公權力」的特性。那麼，中國如果堅持政府顯著參與市場機制的運作，要如何解決此一本質上的矛盾？

這種政府顯著參與市場機制運作型式的出現，與之前的計畫經濟建構成立有著密切關係，而在今日仍然留存著，部分原因可能來自於中國關於「制度實用性」取向，所謂的「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確實過去的中國在「經濟發展階段」，「既有制度現實」與「全球市場情勢」等條件裡，政府顯著參與市場機制運作的型式確實產生了顯然的成效，但不可否認，這種政府顯著參與經濟，包括當前已然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為制度本質屬性情況下的「政府顯著參與市場運作」，是有著更深的根源，那就是，它顯現「（經由公有制主體顯現的）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討論當前中國經濟模式一個有趣的「基本點」，中國的政府顯著參與市場機制運作的型式，一方面是「制度的實用性」支持的，但另一方面卻是一種（經由公有制由政府顯著參與運營的）「中國屬社會主義」的本質特性表徵。那麼問題又再回到了「操作面」，「政府顯著參與的市場機制」真實的操作將會如何⁶¹？現狀如何⁶²？未來將如何⁶³？最基本的問題，政府顯著參與市

⁶⁰ 丁學良（2011）。《辯論“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2003）。〈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⁶¹ 曹海濤（2012）。〈中國大陸的分權改革與地方政府投資行為-財政誘因觀點〉，《中國大陸研究》，第 95 卷，第 2 期，頁 1-42。

⁶² 王信賢（2010）。〈誰統治？論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以《反壟斷法》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頁 35-62。

⁶³ 劉致賢（2015）。〈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議程〉，《臺灣政治學刊》，第 19 卷，第 2 期，頁 41-80；這篇論文提出以「新制度論」的方法研究影響中國制度變動的因素，並且「新制度論」認為既有的制度會對行動者的行為造成結構性的影響。

徐正戎、張峻豪（2004）。〈從新舊制度論看我國雙首長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22 期，

場機制運作如何彰顯中國的社會主義本質？或者在什麼情況終將另有所認知？

在原来的「計畫經濟」模式裡，「政治體系」對「經濟子體系」的作用與影響也是無所不在，這樣的「計畫經濟」所屬於的「政治體系」的「結構」與「文化」，包含了計畫經濟子體系的結構與文化，是以共產黨組織與文化為核心的結構與文化。這個事實是討論計畫經濟的改革轉型過程裡，政治體系的結構與文化如何改革與轉型必然屬於核心關鍵議題的根由，蘇東的轉型與中國的改革轉型都仍在政治體系的轉型，但兩者採取了基本不同的策略，相較之下，蘇東以比較激進的方法進行轉型，但中國則採取漸進式的方法進行，而中國的改革直到今日仍不被歐美承認已在 WTO 裡屬市場經濟國家。並且美國認為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造成美中經貿不公平的關係，進而對美國經濟甚至國家安全造成損害。

那麼實行造成不公平經貿關係的產業政策的中國當前「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之前已談到中國是由計畫經濟漸進改革轉型，到「今日」實質情況已然如何了？在計畫經濟裡經濟活動屬於政治體系裡的一環，但在自由競爭市場裡經濟活動的領域經由每個體系裡的個體而成為政治體系的環境，因而中國的漸進改革在初始的包含計畫經濟子體系的政治體系逐漸放鬆，放開無所不在廣泛涵蓋全社會的強制性指令計畫，容許基層個體較為自主自由的經濟活動，在法律意義所有資源都屬公家所有的情況下，基層個體一方面以比較自由自主的方式完成上級所交付的生產任務，當然這部分的活動，雖然基層個體有了較多的自由自主空間，但仍是政治體系的一環，另外政治體系允許在所有資源法律上，都仍屬於公有的意義裡，基層個體可以自主自由投入勞動增加生產，並且基層個體之間可以就這部分超出計畫的生產進行自主自由的交易。甚至在強調激勵機制與允許相對於舊制度的制度創新⁶⁴。

這部分就是中國改革引入市場成份，並且使市場機制得以成長的發軔，發展至今，包括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進行國際市場貿易，外資進入中國經營企業，提供滿足國際市場以及中國國內市場需求的供應，這部分迅猛發展遠比過去計畫經濟的經濟發展有效率，並且帶動改變原有計畫經濟範圍的運作，而以市場交易導向的方式進行，但在這樣的發展過程歷經 30-40 年之後原來附屬於政治體系的經濟體系，是否已如原來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基本上獨立於政治體系了呢？在這種模式裡市場經濟領域是政治體系的環境了嗎？(其中例如勞動領域或者較屬社會領域的部分，已經充分的轉型了嗎？對經濟制度的運作影響如何？⁶⁵) 甚

頁 139-180；這篇論文介紹了「傳統制度論」與「新制度論」。

⁶⁴ 同上註。運用「新制度論」的方法認知此制度的變動可能空間與實質構成。

⁶⁵ 周嘉辰（2019）。〈第九章中國大陸勞動關係治理〉，徐斯勤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專書：「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與變遷》，頁 276-297。臺北：大陸委員會。

至在涉及與自由競爭市場相關的國際經貿領域將引起如何的考量？⁶⁶

五、政經體系關聯發展

附屬於政治體系的計畫經濟轉型，由於經濟體系在此一政治體系裡有著重要地位，計畫經濟的轉型也意味必將牽動政治體系的轉型，因此分析上產生三個需要關心的「比較性」政治與經濟體系類別，首先是將計畫經濟置於附屬地位的原來的政治體系；其次為計畫經濟轉型後的逐漸出現相對於政治體系更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應至少部份具有市場經濟的特性，但這種獨立性相對於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可能是一種程度上的獨立性；第三種類別就是計畫經濟轉型後的政治體系；這個政治體系不像原來的政治體系完全掌握計畫經濟的經濟體系，但呼應第二項的描述，它是程度上對經濟體系具有支配能力。

陸、「比較制度理論」在分析「戰後臺灣發展環境」與當前全球重大「美中貿易衝突」的應用

「美中貿易衝突」為當前「全球與臺灣政經發展」必須面對的重大議題。從本節的「比較制度」理論思想面向探討此一議題，可以獲得許多助益。因為「美中貿易戰」牽涉認知兩個（政治）經濟體系分別有著（在比較上）的不同「運行模式」與「運行機制」的問題，而雙方在此歧異裡如何互動，對雙方分別產生何種效應則為是否發動貿易戰必須評估的問題。更多的認識兩者之間的經貿「互動」在雙方的「運行模式」「運行機制」裡如何連結並且互動，並從中嘗試解釋既有的經貿互動何以造成衝突是研究當前全球相關情勢必須關注的課題。而且這也將是對未來世局情勢發展預期將有著重大影響的核心因素。雖然目前這類可資運用的理論思想發展已然頗為豐富，但能夠同時關照雙方的嘗試則仍極為貧乏。因此若以「比較經濟制度」的方法嘗試對雙方的制度進行比較應可補此認識上的短缺；並且由於在本節所關心的「比較經濟制度」議題裡，政治機制在比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節也運用「比較政治」的關於「政治體系的一般架構」，就「比較經濟制度」的「政治體系」表現加以比較，如此應已使本節的討論更為清晰。

探討當前美中貿易衝突的實際情勢，關於此一議題的理論需求之一，有必要聚焦在「現在」美中經濟制度的比較，並從此種比較裡探索在此一議題的意涵。回顧「比較經濟制度」理論，冷戰東西陣營自由與共產分立的大格局全球經濟制

施世駿（2019）。〈第八章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社會政策〉，徐斯勤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專書：「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與變遷》，頁 248-275。臺北：大陸委員會。

⁶⁶ 田君美 溫芳宜 鄭至涵 劉珩均（201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台投資之政策研究》，經濟叢書系列之 51，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劉孟俊（2017）。〈中國大陸對外併購、投資策略的發展與影響〉，《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15 卷，第 9 期，頁 59-77。

度「自由」與「計畫」兩大類構成。當然美國的經濟制度就是「自由經濟制度」的代表，而中國當時屬「計畫經濟制度」，但在 80 年代也已開始引入「自由市場經濟的內涵」進行「經濟改革」。而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顯然當時此一學門研究的重點之一就是對此進行比較研究。對此一研究分類架構，就本博士論文目的而言，端視中國今日的經濟「制度」（或「體制」）與原來既有的計畫經濟「制度」（或「體制」）的關係⁶⁷，及接受多少自由市場的內涵而定，而今日部分接受自由市場內涵的中國經濟制度與過去傳統的計畫經濟的比較，也可以以孫歐柏所整理的二種方法以及一般架構的方法進行。因此經由比較經濟制度的方法可以就本博士論文目的所需，對現在美中經濟制度做更詳盡的比較討論。而本節則以整合「比較政治」的「政治體系一般架構」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特性組合系統架構」的方法，對相關相對制度加以分析比較。

在這裡提到了理論上代表美國經濟制度的「自由市場制度」，以及冷戰時期改革之前代表中國的「計畫經濟制度」，與現在「改革後的中國經濟制度」三種制度；當然現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仍可以（或「應」）視為「形塑之中」的制度。其實以本節所提出的「比較制度架構」可以注意一個特別之處，亦即呼應所謂的「冷戰」的雙方，前兩者如果以「基本模式」描繪，可以發現兩者的特性有著「針對性的針鋒相對」的情況，當然這不是偶然的，可以追溯到共產主義的思想觀念源頭。如果以「基本模式」描述自由市場制度，它常被描述成具有「私有財產」、「經濟自由」、「決策分散」、「市場機制」；但計畫經濟制度則相對被描述成具有「公有財產」、「官僚主導」、「決策集中」、「計畫運作」；當然與這些基本性質相關，除此之外，可以引申出許多重要的相對的特性。因此可以將所謂冷戰視為這兩種針鋒相對制度的競賽。而到了 1980 年代中國開始在計畫經濟制度的架構裡引入市場經濟的一些內涵，到了 1990 年代初，蘇東國家將原來的制度徹底捨棄，中國則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將改革後的制度，以不同於美國的自由市場的（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稱呼。

因此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概括，美國屬「自由市場經濟」，而中國由原屬「計畫經濟」，引入「市場內涵」，轉型成為所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是以一種「漸進」改革的方式），並且仍在探索發展之中；「自由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有基本模式上的針對性的歧異；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上仍有多少屬計畫經濟的成分？多少已可屬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分？當然這是「分析上」的思考，另一個問題當然必須注意真實的結構在原有的計畫經濟

⁶⁷ 「制度」（或「體制」），中國區分這兩個詞的意義，「經濟體制改革」只用「體制」改革，不用「制度」改革，在這裡「制度」指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變的，因此不用「制度改革」的說法，但在英文裡，這兩者不做區分。在臺灣會直接引用使用「體制改革」，但不強調具有與「制度改革」的區分。

裡引入市場經濟的內涵，將產生如何的化合效果？甚至已不再適合以單純的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觀察分析其運作效果。因此可以想像現在美國經濟制度與中國經濟制度之間，可能產生遠遠超過兩個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上述討論與第一節所討論的臺灣轉型發展理論有著密切的關聯。甚至可以視之為影響戰後冷戰時期開始的臺灣轉型發展的核心因素。包括臺灣政經發展密切相關的美國的對臺政策，顯然都在這個因素有著關鍵影響的戰略架構裡思考。而包括中國及蘇東的轉型，此一因素的影響依舊，直到今日仍應可見到其顯著存在於與臺灣必須重視的相關的局勢裡。因此也仍然是本博士論文所討論「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議題所必須關注的核心影響因素。或許可以再擴大討論此一核心影響因素的影響範圍，不只是在此時期討論美中貿易衝突的問題上可見到其影響，其他例如由於此種比較制度如前已述及的尖銳特性差異，除造成冷戰時期的相互「隔絕」與「對抗」之外，也造成了不同比較制度的不同發展模式，這種發展差異也成了「計畫經濟制度」何以必須大幅轉型的原因；而且由於發展上的歧異，其實也影響了「轉型」之後相互經貿往來的型態。

第三章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臺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所掌控的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在臺澎金馬實質統治，透過中國國民黨，實施「黨國體制」，黨在國之上，曾經有過三十八年多的戒嚴時期，進行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嚴格控制，秉持著所謂「管制理論」，實施「威權政治」，使得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過去的臺灣發展截然不同。在蔣經國統治臺灣時期，基於國內外政治經濟發展之需求，開始被迫推動臺灣政治經濟自由化，到了李登輝政權時期，更是大力推動臺灣政治民主化。

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在政治發展方面，是由「威權政治」漸漸朝向「民主政治」發展；在經濟發展方面，則是由「管制經濟」朝向「自由化」的「市場經濟」發展。因此戰後臺灣的政黨輪替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00 年，臺灣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在總統、副總統大選中獲勝，首度成為執政黨，國民黨成為在野黨。這是戰後臺灣的首次「政黨輪替」，在臺灣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過去從事國家政策研究在未曾深入探討的情況下，直覺覺得臺灣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後，經濟政策出現巨大轉折；但其實對於國家政策而言，第一次政黨輪替代表國家政策所由產生的政治體系本身出現劇烈變動，而例如第一次政黨輪替事件之得以發生，背景也包含著其他內外環境劇烈變動的觸發。從戰後臺灣的政治經濟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到，外部的政經情勢在此一「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中占有重要角色與地位。

本章筆者參考了政治學及政治經濟學者所建構的臺灣政治發展的理論架構，此一理論架構連結臺灣與外部的政治經濟因素，探討臺灣政治發展；並在此架構下加入軍國主義與福特主義論述解釋臺灣的政治經濟與產業發展，循此脈絡架構外部情勢之中國獨特的經濟（與政治）轉型也對臺灣政經發展產生影響。本博士論文採「科際整合」的國家發展研究途徑，在第二章的「整合理論應用」架構下，進一步深入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第一節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研究之重要論述

關於臺灣戰後政經發展已有許多論述詮釋，首先就「國家政策研究」而言，或許先聚焦在臺灣政治體系的明顯變革，其中包括關於威權體制與威權轉型政治經濟分析的〈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蕭全政，2001），⁶⁸〈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蕭全政，2004），⁶⁹《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吳若予，2007），⁷⁰以及關於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的〈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趙永茂，2007），⁷¹碩士論文〈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楊舒媚，2008），⁷²這些文獻構成與最近發展息息相關的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詮釋脈絡，本章希望延續這些文獻脈絡情況下，參與討論以期增加這個脈絡對話中的一些相關論述的內容，本章筆者寫作內容主要著力在包括臺灣有著鮮明意義的政治發展事件「第一次政黨輪替」，1980年代政經發展的經濟政策意涵，尤其最後探討這些政治經濟內涵如何顯現在「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經濟政策」之中，諸如2002年的六年國家發展計畫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⁷³等經濟政策上。

從戰後到陳水扁當選總統這一段期間，蕭全政所撰〈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這一篇論文以威權體制階段與威權轉型階段，對臺灣歷史發展做政治經濟分析，並以「一個中國」的架構做為分析的核心觀念，內容包括「緒論」、「威權體制及其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之關係」、「東西冷戰下的臺灣威權體制」、「後冷戰潮流中的威權轉型與務實外交」、「綜合討論」。「東西冷戰下的臺灣威權體制」，再分「臺灣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政經本土化與彈性外交」。「後冷戰潮流中的威權轉型與務實外交」，再分「國際孤立與社會動盪」、「威權轉型與務實外交」、「威權轉型與『去內戰化』」。由其內容可以發現雖然此一論文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與論述分析臺灣政經發展，但內容安排有很明顯的時間性、歷史觀，「威權體制」與「威權轉型」階段定性與階段分野，是此一論文詮釋戰後至陳水扁當選期間臺灣政經架構的核心觀點。

「威權體制」包括蔣介石與蔣經國主政時期，「威權轉型」為蔣經國晚年與李登輝主政時期。此文論述臺灣此一期間的歷史發展基本上採取整合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文化層面的方法，並且以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網絡與變遷的「一個中

⁶⁸ 同註 20。

⁶⁹ 同註 22(2)。

⁷⁰ 吳若予（2007）。《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台北：檔案管理局。

⁷¹ 趙永茂（2007）。〈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政治科學論叢》，31期，頁1-38。

⁷² 楊舒媚（2008）。《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臺北：臺大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⁷³ 行政院經建會（2002）。〈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國」原則做為分析論述的核心概念。延續蕭全政所撰論文〈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一文沿用相同的論述分析方法，討論相同期間臺灣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議題，將政治與經濟問題做更密切的整合，但同樣甚少觸及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的討論。關於這段期間臺灣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議題吳若予所撰《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有以國家理論觀點的豐富資料與相關論述，對於認識「臺灣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可有莫大助益。另外有一篇吳若予所撰的論文〈臺灣統籌分配稅款制度的政治性〉⁷⁴，是探討威權轉型期間統籌分配稅制度的根源與政治權力的互動分析。

趙永茂所撰〈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一文，⁷⁵認為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仍然沒有擺脫原來國民黨政府權力統合、權力侍從、利益妥協的窠臼，造成新的政商貪腐結構，但臺灣與臺灣人民主體性卻也有更堅實的建構，對兩岸、區域及全球的戰略發展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另外趙永茂所撰〈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則是探討經由地方公民社會的建構鞏固臺灣民主發展。楊舒媚所撰的碩士論文〈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廣泛回顧相關的理論並蒐集整理大量的相關文獻與資料，並引述文獻嘗試以民主鞏固的觀點發展論述，討論陳水扁執政八年對臺灣民主化發展的影響，其中也將這八年對臺灣民間社會，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予以整理列表顯示。另有許多學者對第一次政黨輪替八年間的政治發展也撰寫論文分析。本章筆者則擬儘可能依循此一討論的脈絡，就此一段期間的產業與經濟政策進行政治經濟探討以參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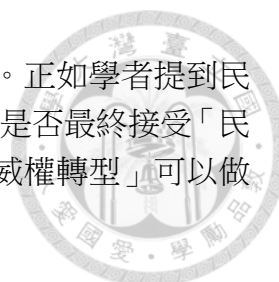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國家發展論與政治經濟學觀點的戰後臺灣政治發展分期問題

壹、傳統結構與政治民主化並存

1980年代後，國際與臺灣政經情勢劇變的經濟政策意涵探討，是筆者對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的詮釋，討論陳水扁當選以後臺灣的發展問題。政治學較常見到關於戰後臺灣歷史分期的名稱有「威權體制」、「威權轉型」以及「民主鞏固」，以政治學的角度這些時期的分割可以明顯的政治事件做為里程碑分割，例如陳水扁當選總統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臺灣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因此學者依據學理認為臺灣已進入民主鞏固時期，但事實上學理是否最終與臺灣實證的

⁷⁴ 吳若予（2004）。〈臺灣統籌分配稅款制度的政治性〉，《臺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131-65。

⁷⁵ 同註 21。



發展一致，歷史尚未繼續發展塵埃落定之前，其實也尚未可知。正如學者提到民主政治可能夭折，因此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的時期，歷史的發展是否最終接受「民主鞏固」這個名稱呢？進一步如果「民主鞏固」失敗，那麼「威權轉型」可以做為「威權體制」之後一個階段的名稱嗎？可能也未可知。

當然如果在尚無定論情況下，暫時以某一事件做為時期分割的標準也不是不可以，但依據學理命名的時期，是否已經具備該一名稱在學理的意涵，其實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以政治經濟的觀點看歷史事件需要注意其內部更多錯綜複雜的軌跡，或許不只是如名稱所顯示的單純。這樣的討論與本章筆者希望達到的目的是相關的，因為本章筆者所期待的就是經由討論增加對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後經濟政策的政治經濟意涵的認識，也希望因此而增進對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認識。而這個討論希望循前述文獻回顧的脈絡進行。

現代國家的內部結構，可分為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二部分；民間社會再分為市民社會、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威權體制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無論最高政治權力由誰控制），威權轉型自然是以威權體制為初始狀態而有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活潑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特定學理意義）的發展（蕭全政，2001），也是國家機關對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民間社會控制與支配鬆解的過程，也是最高權力者透過掌控國家機構普遍控制支配民間社會的鬆解。政黨輪替現象是威權體制民主化過渡的重要指標，但民主不必然永續（威權再現）（趙永茂，2007），政黨輪替現象是進入民主鞏固的表徵，政黨輪替現象成為正常現象標誌民主制度的鞏固。

1980 年代中以來，臺灣進入所謂「威權轉型」的階段，此後臺灣社會經歷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活潑化等諸面向的發展。在此之前，臺灣處於「威權體制」，世界上的威權體制可以分類包括諸如「現代化威權體制」、「官僚威權體制」、「民粹式威權體制」等型態，基本上所謂「威權體制」都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因此處於威權轉型的臺灣意味著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的控制與支配逐漸的放鬆，由於民間社會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因此以威權轉型的觀點看待臺灣 1980 年代中以來的發展，就不是以單一面向的觀點詮釋它的意涵，例如民主化發展，或者經濟自由化發展，或者社會多元化發展，以及其他諸如文化等單一面向詮釋臺灣這個階段國家機關控制與支配的放鬆。⁷⁶（蕭全政，2001：63-67）因此也有不少學者以政治經濟的角度，而不是以單一面向的角度探討臺灣戰後的發

⁷⁶ 同註 20。

展，其中有以所謂「現代化理論」詮釋的，但也有嘗試以國家理論詮釋的。⁷⁷

2000年臺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政黨輪替」的出現被認為是臺灣進入「民主鞏固」期的表徵，「政黨輪替」與「定期改選」、「權責相符」都是防止掌權人濫用權力，發揚憲政基本精神的必要手段。進入民主鞏固時期的臺灣必須持續進行不只是政治，還包括其他各個面向諸如經濟、社會、教育的改革，並且應該鞏固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領導中心。⁷⁸（王業立，2000；李西潭，2001）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結束國民黨政府在臺灣長達50年的連續統治，包括前期的威權統治與後期的威權轉型，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發生時，國民黨執政已推動進行約15年的威權轉型，威權轉型將過去自二戰日本戰敗開始的國民黨在臺灣建構的威權體制，逐步進行鬆解，政黨輪替將國家機器的掌握移交給陳水扁與民進黨，無論過去15年的威權轉型仍剩下多少威權體制殘留，國家機器仍有多少對民間社會的過度控制與支配，基本上國家機器的掌握必須移交給民進黨，國民黨不能再透過國家控制與支配民間社會，如果民間社會仍受到過度的控制與支配，也就是仍有威權體制的殘留，那麼這是屬於民進黨時代的威權體制殘留。

在以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面向探討臺灣發展議題時，面對2000年大選陳水扁當選的事實，雖然從政治面獲得臺灣已經透過定期選舉產生政黨輪替此一具有指標意義的結果，但是此一事件的真實涵義何在？應該怎樣詮釋？仍是有待學界深刻思考探索的，其中包括雖然從學理可以直接認知「政黨輪替」是臺灣政治發展進入「民主鞏固」時期在形式與指標具有代表性的象徵，但對臺灣這個真實案例發展，學理的實證經驗如何，如何詮釋它的意義，則仍需加以更深入思考，也就是從「威權轉型」階段走到經由「政黨輪替」彰顯的「民主鞏固」時期的臺灣，這段期間發展的「真實的」實證經驗為何（嘗試從實證掌握真實也是一大挑戰）？在政治上是否表示一旦政黨輪替，威權體制即已隨著威權轉型的完成而完全解體？也就是在臺灣的經驗，「政黨輪替」意味著涇渭分明的「威權轉型」階段的完成，「民主鞏固」時期開始，或者「政黨輪替」是「威權轉型」階段具指標意義的發展，但仍非「威權轉型」階段的完成，「威權轉型」階段的完成與「民主鞏固」時期的開始，有個轉換的疊合的渾沌期間？

在臺灣具體的發展經驗，至少在陳水扁的第一任總統任期，雖然國家機器在制度理論上已經不屬國民黨掌握，但民進黨人仍然傾向認為在野的國民黨與國家與社會控制支配之間仍有某種關聯，也就是雖然形式上「政黨輪替」可被認定是「民主鞏固」時期的開始，但「威權轉型」階段的完成則未必然，因此「民主」如果不加以「鞏固」，可能將會夭折。如果「威權轉型」的階段，是臺灣社會從

⁷⁷ 同註 21。

⁷⁸ 同註 39。

「威權體制」朝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活潑化等諸面向發展的階段，那麼是否在達到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多元之後「威權轉型」才算完成，否則將一直處於「威權轉型」的階段？但如果民主的實現未必必然具有持續性（趙永茂，2007），那麼面對所稱的「威權轉型」階段以及「民主鞏固」時期，應仍需更多注意其中可能的不確定意義，面對不確定的意涵可能應採取更多的彈性解讀，需要更多面向的思考，單純以政治或經濟的觀點較可能無以掌握真實。

在面對複雜多端的臺灣「威權轉型」過程已有學者除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外，也嘗試以「一個中國」架構做為分析的核心，認為「一個中國」架構是構成臺灣「威權體制」的核心觀念，並且有效論述這段歷史的發展。因此「威權體制」之後的階段發展「威權轉型」、「民主鞏固」，似仍可將「一個中國」原則做為詮釋的核心概念。而「一個中國」架構與臺灣對外關係也有密切關聯，且由於臺灣對外關係包括屬西方陣營的關係以及兩岸關係二大領域，因此對外關係的變動也牽動臺灣外部與臺灣的「國家機關」、「民間社會」的關係變動。在堅守「一個中國」的威權體制下，人民的人權與公民權都受到剝奪，民間與海外關係的發展也受到限制，經濟領域的關係發展或許空間較大，但仍然在包括資金與人員的進出上面受到限制，加以威權時期臺灣人民的經濟能力仍較有限，因此總體而言經濟交流也是有限的。因此總體而言，威權體制下的臺灣民間對外交流是受到限制的。

雖然「一個中國原則」對臺灣「對外關係」以及「威權轉型」存在雙向關聯，但是由於臺灣歸屬「西方陣營」架構並非居於主導位置，因此不能單以臺灣的角度探討「一個中國」原則在此雙向的關聯，事實上強勢的西方陣營主導力量，在「威權體制」以及「轉型中」時期，甚至轉型成為「民主體制」之後，對於建立與（臺灣的「國家機關」相對的）臺灣「民間社會」關係，可能有著濃厚興趣，因為基於臺灣在「西方陣營」的地緣和文化的戰略價值，「西方陣營」希望以更小的代價獲得更大的戰略利益。當這個關係得到建立甚至可以操作之後，他們可以有著更廣泛的運作空間。在這樣的思考下，其實可以發現臺灣的「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可能有著複雜交錯的內外脈絡。而這種關係在「威權轉型」之後的臺灣將越發得到發展。

在整個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威權體制」、「威權轉型」與「民主鞏固」的不同階段，可能可以連結到相應的不同國際局勢特徵，但對臺灣發展而言，國際局勢的發展是臺灣無法掌握的外在變數，本章筆者也希望透過蒐集資料分析國際產業經濟在臺灣不同時期的情況意義，也就是除了政治面向需要思考陳水扁當選在形式上政黨輪替的意義，與實質上威權轉型是否已經完成的問題，另外也需要探討臺灣其他面向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在此一事件中的演變與發展的真

實涵義。是否能以因果的角度認為這些面向與此一事件的關係，在於因為經濟、社會、文化面向已經產生根本的改變，因此促成政治面因為經由選舉產生政黨輪替的結果，或者反方向的思考，政黨輪替將會促發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怎樣的改變？或者將政黨輪替當作一個臺灣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指標其實無法掌握臺灣發展的意涵，只有透過更深入探討政黨輪替時期經濟、社會、文化現象與內涵才能掌握政黨輪替的意義？

貳、構成國家發展影響因素

回到政治面向，臺灣此一段歷史發展不論以「威權轉型」階段詮釋或者以「民主鞏固」時期解讀，歷史的根源都與國民黨的「黨國一體」、「威權體制」階段相關，當然這個階段也與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綑綁一起，而以政治面向做為討論中心，「威權體制」的「黨國一體」是如何在「威權轉型」過程中解構？其中包括思考以下的議題；「政黨輪替」之前，「黨國一體」是否已經完全解構完成？如果不然，與「政黨輪替」的關係如何？而在此一問題之前，必須思考在陳水扁選上總統的當下，「威權轉型」的「黨國一體」解構呈現怎樣的樣態？

長期關係密切的國家機器，在面對曾被視為「三合一」敵人的非中國國民黨政治組織，繼蔣經國時期不經由流血容忍正式承認民主進步黨成為合法政黨之後，很有些意外地必須進一步接受他的領導，這個國家機器如何調適？抵制？輕視？服從？對抗？無所是從？陽奉陰違？能夠恰如其分扮演好民主政治的專業官僚角色嗎？新的領導者又要怎樣面對這個國家機器？既然「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是牽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面向的控制支配體制，「威權轉型」的運動當然牽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面向，不論「政黨輪替」能否意味「威權轉型」的完成，或者是「威權轉型」重要的一個步驟，也將牽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面向。因此如果沒有辦法釐清這個國家發展過程中，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面向的表現，就無法釐清臺灣「威權體制」、「威權轉型」、「政黨輪替」所代表的實證真實意義。

第三節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面對的基本政經情勢

壹、國家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結構挑戰

許多人認為陳水扁當選總統是臺灣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但是很快就發現臺灣經濟的表現，與過去的軌跡比較出現許多不一樣的現象，包括經濟成長率大幅滑落，股市也大幅下跌。面對這樣的表現社會的解讀也有很大的差異，有人直覺認為民主進步黨執政無法維持過去經濟成長的幅度，顯然因為民主進步黨缺乏財

經人才，無能管理臺灣的財經議題。但是民主進步黨的觀點未必同意，不同的意見包括其實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臺灣經濟已經潛伏問題，只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運用刺激手段維持股市與房地產榮景的假象，等到民主進步黨執政這些問題終於暴露出來，以及認為雖然民主進步黨已經執政，但是國會多數仍然掌握在中國國民黨手上，官僚系統也不配合，因此民主進步黨其實無法施展政策實踐理念。事實上民主進步黨執政政策重點也與過去中國國民黨不同，在初期民主進步黨的經濟政策偏向保障弱勢，比較照顧環保團體的訴求以及勞工團體的利益。

但是我們也可從政治經濟更深入的觀點分析民主進步黨執政駛離舊有軌道的現象。2000年3月28日總統當選人陳水扁表示臺灣在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中國國民黨長期威權執政的黨國資本政商勾結以及黑金政治等現象，這些現象是阻礙臺灣經濟繼續發展的障礙，因此剷除這些不利臺灣經濟發展的因素，消弭特權經濟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是民主進步黨政府的首要任務。⁷⁹中國國民黨的黨國資本政商勾結問題，過去一直是黨外或者在野黨抨擊的焦點之一，尤其直接的黨營事業以及國庫通黨庫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更早溯及戰後的大陸以及臺灣的接收日產，當然它的背景需要有一黨威權統治做為支撐，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在抗戰勝利的前夕1945年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六次會議，陳果夫主導的「關於籌措黨費之決議案」是它的濫觴，根據這個決議中國國民黨在大陸以及臺灣開始積極建立黨營事業，包括原有的黨營文化事業以及抗戰勝利後接收日產，國民政府遷臺前，黨營事業的主體在大陸，但國共內戰戰敗黨營事業也大多付諸東流，只有山東齊魯公司得以在臺復業。⁸⁰

但在臺灣實施戒嚴時期，透過政治壟斷的方便，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在臺灣以黨國不分、國庫通黨庫的方式大肆擴張，到1994年底止，國民黨名下有七家控股公司，一百二十一家事業，廣泛橫跨二十種領域。透過黨營事業與公營事業以及威權政府的政策運作，國民黨建構起強固的關係鞏固政權。⁸¹到了解嚴時期反對黨成立，國民黨的黨營與黨資運作必須再次面臨轉變，主要的策略是改變與政府合作為與財團合作，以及稀釋黨資。但是仍在臺灣政治發展的壓力下必須增加透明度，1995年3月國民黨副主席郝柏村在中常會建議公開黨產，使得中國國民黨黨產問題正式浮出檯面。⁸²

⁷⁹ 經濟日報社。〈89年國內經濟大事紀〉。《中華民國經濟年鑑》，頁1382。臺北：聯經出版社。

⁸⁰ 許介麟（1996）。〈國民黨黨產問題二：黨營事業的源起〉，《戰後臺灣史記卷二》，頁45-49。臺北：文英堂。

⁸¹ 同註80。〈國民黨黨產問題三：黨營事業在戒嚴時期的發展〉，《戰後臺灣史記卷二》，頁51-61。臺北：文英堂。

⁸² 同註80。〈國民黨黨產問題四：黨營事業在解嚴以後的發展〉，《戰後臺灣史記卷二》，頁63-68。臺北：文英堂。



陳水扁就任總統國民黨黨營事業馬上面臨銀行抽緊銀根的財務危機，國民黨黨營事業啟聖實業因此乃要求旗下的四家營建子公司不得再承接新案，洽談中的個案也必須停止。過去在政策以及黨資的操作下國民黨對股市的影響力不可小看，陳水扁勝選股市大跌，國民黨黨營事業看空前景，需要現金或者與誓言掃黑金的新政府奮力一搏，也大賣股票，新政府則祭出股市掃黑，與證期會連絡針對不法勢力進入介入市場進行清理。公營行庫包括華南、第一、彰銀、企銀改選董監事公股董監事全面大換血。彰銀前任董事長蔡茂興被移送司法調查。⁸³民進黨政府除了以「除弊」的角度與舊勢力戰鬥之外，也期望發展出與過去迥異的政策路線，但也直到 2002 年才提出「六年國家發展計畫」，在這個計畫裡更偏重軟體建設，硬體建設著墨明顯少於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經濟建設計畫。

貳、政黨輪替與國家政策的調適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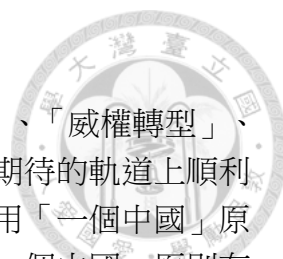
民進黨執政後股市立即做出反應，持續下行，從「黨外」時期就以「反國民黨」為唯一共識的反對陣營，如今已經掌握政權，因此必然以切斷國民黨的政經脈絡勢力做為目標，過去國民黨著重的政策，民進黨不再延續，臺灣經濟發展政策走向出現不確定性，經濟成長率大幅滑落。但仍有外部因素影響民進黨執政的經濟表現，民進黨執政第二年 2001 發生 911 紐約世貿攻擊事件，股市受到影響，臺灣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也受到影響。而這也顯示了長期威權體制強力影響下的臺灣國家發展，在第一次政黨輪替衝擊既有的威權體制後，產生的激烈反應。

威權體制建構政治體系與包括經濟發展的國家發展之間的特有關聯，第一次政黨輪替意味了威權體制的延續，出現了斷裂與破壞，自然也產生相應的在舊有威權體制特有影響部分的，原有國家發展領域的某些斷裂作用；其中包括自然的威權體制斷裂作用效應，以及新的非原有威權體制的政府，面對傳統威權體制的結構及其斷裂，必須採取的相對因應國家政策。而此國家政策顯然從許多面向，都將顯現與原有威權體制時期明顯的差異。除此之外，臺灣經濟發展向來與國際關係密切，而且正當此時期國際政治經濟情勢，也面臨重大轉變，此一情勢結合第一次政黨輪替本身作為國家發展重大變動因素，而產生對國家發展造成加成影響的效應。

第四節 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脈絡分析

壹、冷戰時期臺灣政治經濟發展

⁸³ 同註 79，頁 1390，頁 1392。



一、中華民國來臺灣

目前比較常見對戰後臺灣發展階段的分割包括「威權體制」、「威權轉型」、「民主鞏固」階段，當然期待未來臺灣的歷史發展仍能在學界期待的軌道上順利進行，顯現上述階段分割是適當的。而這些階段的發展可以運用「一個中國」原則的演變做為論述的核心觀念，由「威權體制」階段開始，「一個中國」原則有內外方向的意涵，對內做為「威權體制」「正當性」、「合理化」的工具，對外是加入「西方陣營」維持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席位、代表中國與美國維持外交關係，並且意圖「『自由中國』反攻大陸、反共復國、解救大陸同胞」的基礎。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正處於冷戰國際體系的鬥爭，對於臺灣的認知與策略是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面向的。

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理論之軍事主義(militarism)邏輯論述指出，二次戰後由於核武競賽造成全球形成二大陣營，這是相互威脅人類毀滅的冷戰時期。此時全球二大陣營是二個聯盟架構，這二個全球聯盟體系經由軍事的產業化互相激烈競爭分別追求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已開發資本國家都捲入這二個體系的軍事競賽，國家深受影響。臺灣在這樣的世局之中，受到本身特有條件的限制，與已開發資本國家建立如何的關係，尤其與美國全球體系中有著如何的關係⁸⁴？這種關係與臺灣產業發展的國家政策有什麼關聯？在政治面如前述中華民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國際上唯一的「一個中國」角色，並且體現在對內的政府構成強調由全中國各省構成，形成少數人口比例假借代表全中國之名獨占公權力的組成。

在產業面，正如《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谷蒲孝雄，1995）所描述的，臺灣的產業實際上顯現出扮演國際加工基地的角色，⁸⁵而有許多觀察臺灣產業發展的人喜歡以「國際分工」的角度看臺灣產業發展的特徵，與臺灣從開發中國家致力工業化的政策意圖相關聯，臺灣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與國際加工基地角色，邏輯上似乎不相違背，那麼能夠由此引申出更多的意涵嗎？直到今天對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詮釋，「國際分工」的觀念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當然這個觀念可以追溯到國共內戰國府在大陸失利，美國建構冷戰時期東亞的政治經濟佈局，但在臺灣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新的執政團隊的思考則希望更有所超越。

回顧 1948 年，國共內戰的發展已經由共方取得優勢，中國大陸似即將完全落入共產陣營之手，宇衡情勢美國對臺灣的戰略地位進行評估，認為臺灣關係日本與馬來西亞的航道，可控制菲律賓與琉球間的交通，必須運用一切外交與經濟的手段，使臺灣屬於對美友好的政權，因此採取透過協助臺灣擬定工業發展計畫的策略，幫助臺灣能維持生存並發展自主的經濟以免臺灣掉入中共之手。（林炳炎，

⁸⁴ 同註 36。

⁸⁵ 同註 33。

2004:32-37)⁸⁶美國這樣的策略選擇是在當時時空下的「一個中國」原則相關的策略，美國選擇與在臺灣非共的中華民國建立中美外交關係，由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並且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性部分由少數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各省人士組成政府支撐，包括國會由於無法在中國大陸選舉各省代表，因此由隨政府來台的少數各省人士組成，並且由這些宣稱代表大陸各省的人士選舉總統，因此所謂代表全中國實行民權主義的共和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府公權力由這樣的架構下的少數人壟斷。

對於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主張這樣的實質結構是不合理的，因此國家必須對思想、言論、人權、民權進行控制，否則這樣的政治權力結構無法維持，但當這樣的政府結構能夠穩定運作，威權體制就得以建立運作，也就至少在政治面能夠有能力採取對經濟以及其它領域更嚴格的控制與支配。對於威權體制的政府，一方面代表其有能力更廣泛嚴格控制支配各個其它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而對其它領域的控制也可強化威權體制的力量。但是這些過度的控制支配也將可能產生各種型態的反作用力，而危及威權體制。討論臺灣威權體制階段政府對於經濟領域的干預（或控制），至少可以確認政治威權體制的穩固表示具有干預的力量，但是在臺灣威權體制階段實證上的干預是否過度，並使得這樣的干預成為威權體制過度干預經濟社會的一環，則是另一個需要辨明的。

但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是否過度，除工業社會自由經濟的觀點之外，是否有其他的參照論述？戰後臺灣經濟陷入危機，早期美援成為臺灣經濟能夠恢復並且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經濟建設計畫的方式，並非臺灣原本就準備採取的模式，但初期美援對臺灣的經濟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美援需透過計畫項目的方式推動，因此相對於臺灣當時的投資總量美援構成許多基礎建設與產業項目計畫總合，將這些項目總合匯總就成為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相對於總體經濟規模比例較大的國家產業經濟計畫，在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理論家眼中，可能被視為國家對經濟社會的過度干預。但另一方面美援相關的經濟計畫仍呈現鼓勵民間與外資的影子，這時期的經濟建設計畫內含臺灣主要的產業發展政策項目，並且由此可見臺灣早期的產業政策與美國對臺灣的戰略地位認知有關。

這期間由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以及財經政策可以看到代表國家結合美援介入產業經濟領域的一些特點，一、由投資比重的偏向可見到明顯的「工業化」政策；二、由《獎勵投資條例》顯示鼓勵民間以及外國人投資的政策取向，此一條例包括工業區的設置，工業用地的取得；三、針對特定產業例如紡織產品採取出口退稅的出口導向政策；四、進口替代產業透過替政府代工的方式生產原來需要進口的商品，以及以貸款、管制進口、關稅保護等方式推動進口替代產業發展；五、

⁸⁶ 同註 30。

以建立加工出口區擺脫國內法規限制，鼓勵出口產業投資。（袁穎生，1998：261-273）⁸⁷基於自身戰略需求，美國在國府遷台後，開始援助臺灣經濟，避免中共勢力進一步擴張，使臺灣落入中共之手，美國的策略除希望透過經濟援助使臺灣經濟能夠維持生存，政治能夠穩定，也希望臺灣經濟有自己生存發展的能力，不必一直依靠美援拮注成為負擔，由於臺灣需要面對中共龐大軍事力量的威脅，且因軍力與產業經濟關係密切，因此臺灣經濟與產業的發展也有益於備戰工作，後來可以發現臺灣甚至成為美國海外投資偏愛的地方。

美國對臺灣的政治經濟支持，除了全球冷戰架構的戰略考量，美國本身的經濟發展需求也得到照顧。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軍事主義的論述，包括「（全民與經濟的）全面戰爭(total war)」、「後方前線(home front)」、「管理型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等觀念，這些觀念背後都有工業化的策略支撐，可以單就工業化的角度探討這些觀念的意義，但這些觀念也產生就業與社會、勞動樣貌等不同層面的效果，因此是否就可以從工業化的角度探討就業、社會、勞動樣貌等不同層面的意義何在的問題？也就是說工業化不止具有產業層面的意義，也不僅止於經濟層面具有意義而已。有學者以福特主義論述美國式的產業社會經濟模式，在福特主義的論述中也將它的影響，或者福特主義觀念連結的範圍，擴展到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影響等層面。⁸⁸如以這樣的論述做為參考的分析架構，對臺灣產業政策效應進行分析，那麼產業政策將不只有市場利潤導向，而有著更廣泛的政策意涵。

福特主義與軍事主義的連結，與軍事主義中的工業化問題有關，福特主義在技術面是產業透過技術創新發展大量生產的產業模式。大量生產的產業發展模式是工業化（至少某個階段、某時期）的主要議題，福特主義（至少曾）提供產業發展的強大能量，與技術面的模式結合，福特主義也包含資本主義制度面動員力的創新，制度面的創新也成為催促「管理資本主義」產生的因素之一。如果戰後美國工業的福特主義模式最有代表性，那麼戰後臺灣扮演國際分工基地的工業化發展過程與福特模式是否有著關聯？福特模式的大量生產與純粹的大量生產模式不盡相同，包括強調有利大量生產的技術創新，提供員工更優厚的待遇，因此在追求此一目標的過程中是否也把較不合理想的產業部門移往海外，例如早期的臺灣，提供外商勞力密集產業的投資機會。

美國這個期間對於臺灣在政治經濟的支撐與當時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原則相一致，「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也成為支持威權體制合理化的論述，威權體制階段中華民國政府推動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減租以及耕者有其田，並且透過

⁸⁷ 袁穎生（1998）。《光復前後的臺灣經濟》。臺北：聯經出版社。

⁸⁸ 同註 36。

田賦徵實、肥料換穀，在低估農作物價格的情況下，將農村資金透過隱藏稅從農村大量移出，支援國家運作包括公務員與軍人的糧食需求，以及提供工業發展的資金⁸⁹，但是由於在威權體制下，地主迫於國家威勢將土地轉移農民，農民所得增加，並且這一段時間農業技術包括肥料的引進促進農業生產增加，基本上這個階段在威權體制架構下對經濟社會進行干預，並加上美援等因素使得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情勢獲得風雨飄搖中難得的穩定與發展。1965年6月美援終止，代表美國已經不必直接掛注美元支持臺灣，美國的戰略佈局已經初步建立。

分別從美國國內經濟的福特主義與管理資本主義模式，並以處身全球冷戰格局西方陣營的龍頭地位，在東亞構築西方陣營的前沿，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內戰失利撤退到剛從現代化的殖民帝國接收的臺灣，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核心實行威權體制的架構觀察，可以對臺灣戰後政治經濟局勢有更多的認識，而掌握這個格局的演變也有助於認識此後臺灣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臺灣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仍然可以以一些重大事件代表，也可以發現重大政治事件會影響經濟領域的發展，以國家角色觀察，早期政府角色對臺灣經濟議題有著重要影響，此種結構一直延續，至今政府的角色仍往往會產生明顯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對於凱因斯以後的所謂管理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常態，但臺灣仍被歸類為比管理資本主義有更多政府介入的「發展型國家」。

到了2000年臺灣政治發展出現代表巨大變革的政黨輪替，在這個政治面向的巨大變革之後，臺灣是否仍屬「發展型國家」模式，或者已經是管理資本主義模式，或者仍是三民主義模式？政黨輪替之後，政治面向之外，臺灣經濟也出現一些明顯的衝擊現象，包括經濟成長軌跡的大幅下跌，股票市場的低迷。為何如此？或許政黨輪替剛巧碰上經濟情勢低迷使得經濟表現剛好衰退，但更可能因為政黨輪替顯現臺灣政治經濟的緊密關係，但為何新的執政會造成經濟情勢的劇烈變化，新舊之間有什麼明顯的不同會造成這樣的差異？但除了政黨輪替這樣的事件之外，臺灣在之前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可能產生政治經濟效應，例如退出聯合國、黨外組黨，當然包括兩岸關係的緩和，造成兩岸經貿關係的大幅成長。

二、蔣經國時代

戰後由於國際局勢的發展，中華民國雖然已經棄守中國大陸，但仍維持在聯合國代表全中國的地位，這個架構其實維持不了多久，國際局勢迅速改變，1971年10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就由北京取代。1972年5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開啟蔣經國時代，三年後，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就病逝台北。在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前的1972年2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9月戰後外交為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擺在蔣經國面前

⁸⁹ 李登輝（1972）。《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臺灣研究叢刊第106種。台北：臺灣銀行。

的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新的挑戰情勢，政治上中華民國代表唯一中國的論述，說服力正在迅速萎縮，或許經濟發展才是應該必須補強發揮的空間，此時蔣經國在既有的產業發展情勢下，將國家發展的重心進一步轉向經濟建設。1973年12月提出五年內完成十大建設計畫，繼重點發展輕工業之後，開始大舉涉足重化工業。

雖然此時美援已經停止，但由美援開始建構的臺灣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卻已更加密切，由於美援以及美國政府提供投資風險保證（美華投資保證協定），美國的投資在臺灣扮演重要角色（北村，1992:105）。1982年美國商務部調查在台美商的产品有三成回銷母公司，明顯高於南韓與新加坡美商，也明顯高出日資廠商回銷比重，顯示臺灣產業與美國產業界更為緊密的關係（北村，1992:112-3）。⁹⁰許多臺灣產業包括重化工業的主要技術來源仍為外資技術合作以及專利授權（陳玉璽，1995:114）。⁹¹出口導向的臺灣經濟發展形成以大量擁有基本技術與資本能力的中小企業，運用國際分工的架構，將臺灣的生產因素投入參與美國為主的國際市場機制運作之中（谷蒲孝雄，1992:1-16）⁹²，促進了臺灣具有市場經濟制度性質的快速經濟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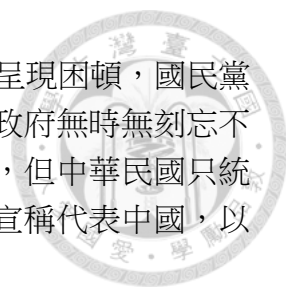
1950年代，國民黨在大陸戰場失利撤退來台，臺灣局勢風雨飄搖，物資缺乏與美援高度相關的產業選擇，除能源與交通等基礎產業外，輕工業所需技術較容易取得，也能夠滿足臺灣需求。1970年初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1973-4年就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將國家發展的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推動十大建設計畫，進一步重點發展鋼鐵、化工等重化工業，這類產業所需技術與資金遠遠超過輕工業，在機械化時代，也比輕工業提供更高水準的物資能力，重化工業對於軍備需求比起輕工業也有著更大的滿足能力，能夠提供更強的傳統軍需製造能力。但基本上臺灣產業雖然發展類別已有提升，但是對於美日經濟仍然維持密切關係，或仍應視為依賴關係。

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臺灣的外交關係仍持續朝弱化方向發展，1979-80再度發生石油危機，臺灣的產業政策再度嘗試提升產業層級，希望臺灣產業朝技術密集且附加價值高的方向發展，包括機械工業的自動化、開發原材料、發展資訊產業。19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啟用，基本上雖然產業升級取得成果，但是臺灣產業國際代工的角色依然沒有改變，而由於產業的升級臺灣產業生產包括資本設備以及軍需的能力也進一步提高。外交關係不利，但產業繼續升級，只是仍然扮演依附美日技術與市場的角色，這時臺灣的政治也漸漸邁向新的里程，

⁹⁰ 同註 33。

⁹¹ 陳玉璽（1995）。《臺灣的依附型發展》，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第5卷。臺北：人間出版社。

⁹² 同註 33。



1970 年代初，蔣經國開始走上檯面接班，但所面對的局勢已經呈現困頓，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之後，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國民黨政府無時無刻忘不了的敵人，開始美國還在國際上支持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定位，但中華民國只統治臺灣，一旦統治中國大陸的政權站穩腳步，中華民國很難再宣稱代表中國，以一個中國支撐的威權體制也必然面臨挑戰。

威權體制立基於對蔣介石個人的神話崇拜，1970 年代初，蔣介石年老體衰仍能將權力交給兒子蔣經國，1980 年代，蔣經國身體狀況也日走下坡，在領袖崇拜的威權體制下，他應該如何安排接班，繼續延襲威權運作，再來一次「父傳子」的戲碼嗎？如果真如此，屬於西方陣營的「自由中國」在西方的價值觀裡真會連共產黨也比不過。情勢的演變包括以中小企業出口導向為主發展的臺灣經濟社會構成發展，使得蔣經國必須重新思考威權體制政治體系面對此經濟與國際環境演變，繼續維持有著初始「一個中國」特性構成與結構化的，既有的結構與文化是否適當，因此最終也替非國民黨力量找到一個發展的缺口。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改革開放政策，1979 年年初台美斷交，年中美國的《臺灣關係法》生效，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雖然造成臺灣黨外勢力外表的挫折，但數年之後，1986 年反對黨民進黨成立，在當局未依據「黨禁」法律執行的情況下，政治上一黨專政不再是必然的情況。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1988 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

此一時期除產業升級之外，臺灣在經濟上也發生一些與過去不同的變化，雖然出口導向的產業特性一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變，但是與出口導向相關的臺灣產業與經濟條件卻有著明顯的變動，甚至政治與國際關係也逐漸產生巨大的變化。雖然經濟仍然是出口導向，但當年因為國際收支赤字才大力發展出口產業的這個因素，至今已經被大量的外匯存底所取代，因此 1984 年在臺灣已經逐漸累積外匯，受到美國雷根政府政策影響下，政府宣布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政策，減少進口管制、大幅降低關稅、放寬外匯管制、放寬外資在臺投資的限制。在美國的要求下，1987-8 年臺幣對美元大幅升值，此次的臺幣升值對臺灣產業造成很大影響，使得外幣計算的臺灣工資成本大幅提高，外銷的商品以及國內資本財價格大漲。

鑑於國際局勢變動與大陸內部採行改革開放政策，1987 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在 1988 年中共公布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臺灣廠商受到台幣升值造成的影響下，臺商開始間接投資大陸，但是投資大陸的臺商此時仍然沒有改變出口的原來市場，許多臺商將原來在臺灣生產出口到美國客戶的產品改為大陸生產，這是很有意思的發展。1950 年代國民黨在大陸戰敗，美國恐怕臺灣落入中共之手，因此透過美援以及經濟支持等策略，建立在當時美國與臺灣需面對的國際體系下的臺美經濟關係，此一關係的持續發展，1979 年在美国需面對新的國際體系情況下，美國與臺灣斷交，與中共建交，但是臺美之間基本上仍在延續當年的

經貿關係，1987 年美國開始壓迫臺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在臺灣開放大陸探親，以及 1988 年中共公布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下，臺商將生產線移到大陸出口產品到原來市場-美國，建構新的國際體系的一環。



貳、「後冷戰」時期臺灣政治經濟發展

一方面臺灣政治發展處在戒嚴轉型時期，另一方面國際局勢步入後冷戰，中國也在探索市場化改革；但如第二章與第三章所介紹，中國的市場化直到今日仍處於「非市場經濟」的狀態，並且引發諸多與國際間的衝突效應，但回溯 1990 年代，在這樣一個與過往不同的新的局勢下，1990 年臺灣提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1991 年行政院院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⁹³，數月之後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2 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暨施行細則開始施行，在兩岸之間嘗試建立一個新的結合政治、經濟、產業、文化與社會的關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如果產生效果可以在過去產業只能生產低成本產品的限制外，開發新的更高附加價值的市場，否則臺灣的傳統產業在臺幣升值，以及大陸對外開放的情況下，只能出走大陸，在大陸已經開始進入國際的勞動密集產業的情況下，將臺灣的產業推上更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產業領域，似乎是希望繼續維持出口導向的臺灣產業不能替代的選擇。此一策略雖然與 1950 年代美援時期有著很大的差異，但仍然有著維持經濟與產業的領先，尋求臺灣非共政治安定的作用。

1991 年行政院院會通過「國家建設六年計畫」(1991-1996)，此一國建六年計畫以「重建經濟社會秩序、謀求全面平衡發展」為總目標，四項政策目標為「提高國民所得」、「厚植產業潛力」、「均衡區域建設」、「提升生活品質」。這個國建計畫的基本思維在序言裡面說的很清楚，面對歷經四十年臺灣經濟的發展，但在 198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蜂起，這個國建計畫的解讀是：「經濟失衡、社會脫序問題的發生，主要是軟、硬體的公共建設投資不足，尤其是交通運輸、文化、教育等建設未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所致。」，「推動完成一系列重大公共建設，突破當前發展瓶頸，並促進經濟、社會公平，確保建設成果為全民所共享，全面提升國民生活品質。」。⁹⁴

冷戰時期全球分成二個體系的架構影響先進資本國家的軍國主義邏輯，1991 年蘇聯解體，全球體系進入「後冷戰」時代格局面臨重整。雖然中共屬共產陣營但與蘇聯之間存在矛盾，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以及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全球劃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逐漸造成衝擊，蘇聯的解體對冷戰的國際體系的影

⁹³ 面對轉變以及未來情勢的不確定性，「國家統一綱領」為一基本策略指導性政策文件，以因應大陸情勢變動，尤其政經制度結構轉型方式採取分階段的開放措施；此一討論或可參考〈大陸政策的長期規劃〉（陳良潮，1990,7）。

⁹⁴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1）。〈第一冊總體經濟發展目標〉，《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響更大，也牽動原在冷戰時期建立的國際產業關係。基本上，以制度與意識形態分野的國際二元體系，已經在中共的改革開放以及蘇聯解體、東歐轉型的情況下，無法繼續維持涇渭分明的態勢，臺灣產業發展一方面部分維持自冷戰時期即有的架構，另一方面也突破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架構，這個階段產業發展政策，一方面「默許」許多沒有登記的大陸投資，也要求並接受願意登記的台商做往大陸投資的登記，但另一方面對於戰略有關的高科技產業也有限制，其中許多限制牽涉美國的技术政策。

在李登輝「兩國論」時期，兩岸之間顯現高度互不信任的態勢，此時李登輝提出範圍廣泛包括產業領域的「戒急用忍」宣示。此後與大陸相關的產業措施走向，一直成為臺灣產業政策辯論的焦點。這類爭論的思考面向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產業政策是不是只需考慮市場利潤，是不是需有戰略以及主權思考在內。當然對這樣的討論將它區別為「市場派」與「主權派」，或許與事實有點接近，但截然劃分的方式，在概念與實務的對照裡是不是理想卻很值得懷疑。不過不能否認這段期間臺資是大陸吸引外資取得成效的重點之一，也使臺灣產業避開如同日歐的長期不景氣衝擊。

回顧這段時間可以發現世局變動非常迅速，每個階段面對未來也都充滿不確定的風險，其中一個主軸是中國大陸本身變動的快速，包括制度的變革以及發展程度的轉變都是非常快速。1992 年中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開始中國大陸內部關於制度基本走向的爭議就減少了，今日中國大陸已經擁有上兆的外匯存底，但有關臺灣產業發展的討論對於情勢的正確掌握似仍然不足。世局的快速變動歷經幾個轉折，1997 年爆發亞洲金融風暴，之前亞洲除了四小龍之外，伴隨中國大陸市場新興，東亞的幾個國家表現也逐漸吸引世界目光，但是金融風暴席捲下，卻紛紛中箭落馬，南韓也不能倖免，不過由於中國大陸金融市場在此時仍然尚未開放，因此得以倖免。相反的東南亞以發展勞動密集產業為主的國家受到金融風暴影響，反而替中國大陸在此一階段的歐美市場取得先機。這個經濟與產業的影響擴及政治領域，也使得美中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產生一些盤整作用。大約在此一時期中國大陸開始必須向海外進口石油，之後進口的幅度迅速成長，基於油路安全的考量，美中在東南亞的戰略對比再度受到世界注意。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是由資訊產業的發展帶來的產業經濟與社會的衝擊影響，1996 年 OECD 發佈了名為「知識經濟(Knowledge based economy)」的報告⁹⁵，指出在過去十年高科技產業在製造業及出口的比重有著明顯的擴大，此一趨勢將深重影響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在 OECD 國家的經濟發展裡扮演的角色。而與此相呼應，在此一段期間，臺灣出口導向經濟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趨勢，及此一國際

⁹⁵ 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is.

產業與經濟升級轉型的趨勢，將傳統出口產業的生產製造往中國移動，而臺灣本身的資訊成品及半導體產業則獲得快速成長。⁹⁶

簡言之，本節筆者一方面討論臺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發展，最明顯的政治發展從「威權體制」，進而「轉型」，經濟發展也在顯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下，由「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而「出走大陸」、「產業升級」；另一方面討論國際局勢由戰後初始形成的「冷戰格局」，且依此格局在臺灣的政治經濟產生影響或進行布局，進而由此推動臺灣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及國際政經轉變再推動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

步入「後冷戰」，相對於臺灣的「威權轉型」「民主化」，中國也在探索市場化改革；但如本博士論文前面章節所介紹，中國的市場化直到今日仍處於「非市場經濟」的狀態，並且引發諸多與國際間的衝突效應。就是在此內外轉型呈現對未來認知處於渾沌的狀態之下，臺灣內部也對可能發展的趨勢與挑戰、機遇的迎接與應對，產生廣泛的論辯。例如制定基本策略指導的「國家統一綱領」，以因應大陸情勢與結構的鉅大變動，產生的未來不確定性，思考根據大陸情勢尤其政經制度結構轉型，採取分階段的開放措施，此一討論架構亦呈現在〈大陸政策的長期規劃〉（陳良潮，1990,7）之中，並且此一思考架構的精神顯現在其後至今的重大策略思考架構之中。

第五節 戰後臺灣政黨輪替後的國家發展

壹、嘗試超越傳統格局的新生政黨經濟策略選擇

回顧戰後臺灣的發展到 1990 年代，可以發現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可分幾個不同的脈絡交互影響發展，包括國際冷戰格局的捲入，以及冷戰格局的發展、緩解，以致於進入後冷戰的時期，臺灣在這個格局之中，包括政治、經濟面向都參與其中。因此國際政治的發展、國際經濟的發展、臺灣政治發展、臺灣經濟發展等不同面向相互影響發展。由前述戰後臺灣各個不同階段發展，可以看到臺灣的政治經濟一直處於劇烈變動之中，而這些劇烈變動許多是外因的，不是臺灣自己能夠決定。因此在這樣的思考裡，2000 年的政黨輪替的意義在於，與威權體制甚至威權轉型時期比較，政黨輪替表示臺灣至少有二組「真實」的國家政策菜單，可供人民選擇，經由總統選舉決定選擇怎樣的國家政策菜單。

經由前述的脈絡解讀政黨輪替的意義，除表示臺灣人民可以有二套國家政策的菜單可供選擇之外，也應思考在這樣的脈絡裡，政黨輪替是如何產生的，進一

⁹⁶ 參考表 3-1，表 3-2。

步細思這二組國家政策菜單分別包含什麼內容。前一個問題在前述的脈絡裡，或許可以簡單解釋，認為因為臺灣一直處於劇烈變動的環境中，以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支撐著的威權體制，已經無法妥善處理情勢挑戰，必須進行威權轉型，威權轉型的過程中，到 2000 年政黨輪替的現象就已發生。但在此希望更多探討後者，尤其聚焦在經濟政策。雖然從 2000 年之後民進黨執政的經濟政策，與之前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有著顯然的差異，但應該以脈絡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不應單以民進黨執政期間的經濟政策直接論斷。在此加上 1990 年代民進黨對執政國民黨的國家建設計畫的批判，並與民進黨執政時的經濟政策比較。

2000 年前後，從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可以說面臨重大轉折，首先 2000 年陳水扁出任總統，這不只是一件臺灣政治發展上的大事，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也因之有不同的思考，姑且不論成敗，政治上新的掌權群體，提出不同於以往因襲下的產業發展觀點。其次，2002 年臺灣成為 WTO 會員，從此臺灣一直奉行的保護國內市場鼓勵出口的產業政策完全撤銷，加入 WTO 也是臺灣唯一參加的世界重要組織。雖然在臺幣升值大量傳統出口臺商將出口生產線轉移中國大陸之後，臺灣仍然維持出口導向的產業發展政策，但是在加入 WTO 後臺灣的產業分工角色更形明顯，因為國內市場洞開，依賴國內市場的傳統產業受到國外產品的競爭無法生存，政策也無法繼續支持更多產業使他們得以在國際市場上生存。

2002 年民進黨政府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做為民進黨的產業與經濟政策，此一政策可視為臺灣經濟超越傳統國際代工角色的努力，在傳統國際代工中，臺灣在國際分工裡扮演代工角色，若對汽車、資訊、IC 以及科技政策在關鍵技術、設計、量產等生產過程的各個項目進行探討，觀察它們在實驗室研發、半成熟技術、成熟技術、夕陽技術等產業技術階段的實際發展情況⁹⁷，並據以思索臺灣產業發展趨勢，那麼由這個生產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到臺灣產業在國際分工的位置，並且可以了解臺灣可能繼續發展的能量。

事實上，相對於「挑戰 2008」其中關於產業經濟政策的藍圖，臺灣由於扮演代工的角色，因此針對各個個別產業中的臺灣產業角色討論，可能會發現臺灣產業其實是消失或隱而不彰的，並且因此將影響臺灣產業進一步升級發展，因此之故此一國建計畫為具有彌補作用的政策。與民進黨首次執政相呼應，〈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與過去產業經濟政策有著明顯的不同，簡單說過去計畫在硬體投資與物質建設佔有極為顯著的地位，但此一國建計畫所揭櫫的核心價值為「以人為本、永續發展」的精神，物質建設至少在字面上已退色不少。由於與傳統模式明顯的差異，也使得此一國建計畫與過去國民黨時期的經建計畫之間似出現斷

⁹⁷ 參考註 35。陳良潮（1994）（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計畫）。本博士論文第一章，第二節之貳、相關理論檢討之四、「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



層現象。。

民進黨執政所推出的六年國建計畫與之前國民黨在 1990 年代推出的六年國建計畫有很大的不同，在 1993 年國民黨執政時期，也是上述國建六年計畫實施時期，民進黨中央黨部出版《政策白皮書（綱領篇）》⁹⁸，裡面有一章〈「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批判綱領〉對此一國建六年計畫提出批判。其中有一節〈國建六年計畫之政治意涵〉首先認為執政的國民黨在民進黨成立不久，採取遠較過去保守政策更為積極的建設計畫，目的是透過龐大資源的動員「振奮黨內、號召民眾、瓦解反對黨的市場」。並且無論成敗這個龐大的國建計畫將透過黨營事業使國民黨得到實際的利益。也將使國建計畫成為外交的工具，但卻忽略中國大陸的因素。因此民進黨的基本立場包括認為政府無需直接插手提高國民所得，而應建立可讓社會公平競爭、自由發揮活力的現代化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反對便利權力集團分贓的六年國建計畫，應採取配合性的重分配政策。

在《政策白皮書（綱領篇）》的另一章，談到民進黨的〈經濟發展政策綱領〉，一開始就指出「在過去四十年來逐漸結構化的不正常政經體制下，臺灣社會形成一重重限制與任意特權許可交織而成的多度空間網，以層層的控制和管制，以及以公營事業、黨營事業、榮民事業為核心的特權壟斷事業，形成臺灣政經之癌，束縛臺灣經濟活力進一步的發揮」，因此民進黨的經濟政策的基本，即在於「認為不正常的政經體制的問題是癥結所在……儘速解除各種管制與控制措施，落實民營化、自由化、國際化」。

1970 年代初，蔣經國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 1970 年代終與美國斷交期間，蔣經國都採取推動經濟建設解決中華民國的正當性挑戰問題，十年之後的李登輝、郝柏村，在民進黨的批判裡也認為採取膨脹性的建設因應民進黨的成立，因此可以合理認為在民進黨的論述之中，改變國民黨執政的經濟走向，是民主化重要的一環，是政黨輪替所包含意義的重要內涵，在之前已經述及，2000 年甫當選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陳水扁，在 3 月 28 日就表示國民黨長期威權執政的黨國資本政商勾結，以及黑金政治等現象，是阻礙臺灣經濟繼續發展的障礙，剷除、消弭特權經濟，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是民進黨政府的首要任務，國民黨黨營事業馬上面臨銀行抽緊銀根的財務危機，國民黨黨營事業啟聖實業因此乃要求旗下的四家營建子公司不得再承接新案。

正是因為民進黨的認知國民黨執政時期大規模建設背後包藏國民黨黨營事業等不正常的政經體制，而且是束縛臺灣發展的限制，因此民進黨的六年國建計畫與國民黨執政時期有著明顯差異。因為不正常體制限制國民黨在國家建設的選

⁹⁸ 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1993）。《政策白皮書（綱領篇）》，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擇，民進黨對於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走向，提出與國民黨不同的主張，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的「十大重點投資計畫」包括，「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產業高值化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數位臺灣計畫」、「營運總部計畫」、「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與「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主要著眼於軟體層次功能性的發揮，以這些計畫字裡行間的精神探索，應可認知這些計畫的推動，必須軟體功能得以作用才相應可能會產生硬體投資需求。而且與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建設計畫相去甚遠。除了考慮民進黨與國民黨對於國際經濟走向認知相去甚遠之外，也不能不承認民進黨的國家政策與國民黨之間有著巨大的斷層，對於國家發展模式觀點也不同。

貳、新局探索

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經濟政策的提出，屬於政黨輪替意涵的一部分，從過去臺灣政經發展脈絡觀察，第一次政黨輪替引發極為明顯的經濟政策選擇效應，其中包括改變政治經濟結構的意圖，也包括對世局情勢認知的重大歧異。對於人民而言，更多國家政策選擇當然有益於進步發展，但是過大的歧異造成無法彌補的斷層也不應成為常態，雖然本章筆者未及論及，但第一次政黨輪替在自由經濟理念的深刻層面-金融領域的自由化追求表現明顯不當也是事實，因此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八年，國民黨再次取得政權，是否在這二次的輪替中已經形成二黨的經濟政策理念與脈絡，可能仍需繼續觀察，當然某些偏向多少是可以發現存在的。

第六節 小結

從政黨輪替與經濟政策的提出來看，臺灣政黨政治連結的國家發展之經濟政策仍處在嘗試與形塑過程之中，以這個角度觀察，如果國家發展之經濟政策深刻牽涉社會發展，那麼經濟政策應對能力不足的政黨政治，仍需更多的民主鞏固努力。這包括政黨政治如何與政府體系連接經濟政策的形成，以及包含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政黨如何有效與人民充分溝通經濟政策。本章筆者仍然未能充分討論戰後臺灣一直到政黨輪替後的政治經濟脈絡，因為觀念仍不足以掌握脈絡綱領，但卻也經由脈絡的梳理多少增進對此一國家發展相關議題的認識。

雖然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被稱為「寧靜革命」，但當從臺灣自身與國際關聯緊密的政經結構與發展脈絡觀察與分析此一過程，可以發現其實內涵牽涉複雜，直到今日此一自身內部與外在的結構與發展趨勢也仍然充滿相互激盪的因素。就此，筆者根據前述討論或者可試作如下歸納：1.在此一政經轉型與

發展過程中「威權轉型」與「民主鞏固」並存，部分傳統「威權結構」與「民主化」之「萌發結構」兩股勢力並存，並對民主化之政治體系之機制造成重要甚至關鍵影響；2.經由美援開始，美日對臺的產業經濟整合形成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參與，其後，面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臺商深刻加入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參與；3. 中國經濟（與政治）制度的轉型，是臺商深刻加入其中與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參與得以產生的關鍵重大因素，本章第四節，尤其後冷戰部分，對此多有所討論；4.由本章可以看到在此一發展理論架構下，臺灣極饒意義的發展結合結構的發展歷程，例如全球格局裡的美援與臺灣「出口導向」國際分工與「威權體制」的結合並存，以及其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遇見中國的改革開放關聯的全球格局變動，臺灣的經濟策略選擇將會如何塑造成型的思考，這也是本博士論文所碰觸的臺灣政經轉型必須面對的國家發展策略知識探索。

表 3-1 臺灣製造業產業別國內名目生產毛額分配比例

單位：%

業別／年度	2003	2011	2018
紡織業	3.20	2.10	1.69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17	0.73	0.58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6.08	3.10	3.05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6.66	6.96	7.80
基本金屬製造業	4.56	5.70	5.59
金屬製品製造業	6.16	6.18	6.25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5.07	29.22	37.36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製品製造業	11.75	14.27	9.35
機械設備製造業	4.40	5.07	5.16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4.04	2.79	2.42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2.15	1.91	1.62
製造業	100	100	100

本表摘自中華民國 108-109 年工業發展年鑑 p.45 表 1-2-4 我國製造業產業別國內名目生產毛額分配比例之部份年份與業別項目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

表 3-2 2017 年臺灣排名全球前三大產品

2017 年臺灣排名全球前三大產品，計 22 項產品(不含海外生產)					
全球排名第一		全球排名第二		全球排名第三	
項目	全球市占率 (%)	項目	全球市占率 (%)	項目	全球市占率 (%)
晶圓代工	69.52	可攜式導航裝置 (PND)	45.00	TFT LCD 面板 ($<10''$)	27.39
IC 封測	48.70	行動輔具(電動 代步車&電 動輪椅)*	25.24	TFT LCD 面板 ($>10''$)	22.86
綠藻	48.35	IC 載板	23.20	丙烯腈-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 (ABS)*	15.95
高階自行車	29.31	銅箔基板(CCL)	18.00	滾珠導螺桿	13.00
機能性布料	24.78	IC 設計	17.42	熱塑性彈性體 (TPE)	8.30
		印刷電路板	11.90	耐隆纖維*	6.00
		矽晶型太陽能電 池	11.20	β -胡蘿蔔素	4.51
				聚酯絲	2.10
				OLED 面板	2.53
				無線區域網路產 品(WLAN)	0.70

資料來源：1. 本表取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出版，（2019），台灣發展歷程與策略，p.6，全球市占率依產值估算，產品依產量估算。

2. 經濟部技術處 IT IS 計畫（2018 年 4 月）

第四章 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



1980 年代後，國際與臺灣政經轉型情勢劇變，帶來了國家發展之經濟政策思考的一些新視野，這部分尤其顯現在臺灣政治體系變動民主化政黨輪替的政策思維裡，而自戰後開始的臺灣政經「發展脈絡」則可能被看到其中存在著顯然的脈絡關聯，在臺灣外部情勢與結構有所更易，內部結構也轉型的情勢裡，探索原有架構之外的脈絡發展，似乎並不突兀。本章〈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討論「第一次政黨輪替之產經政策空間探索」，探討在此內外轉型發展裡其中可能值得或必須思考的部分空間，第一節〈臺灣產業超越傳統的「國際代工」「威權社經結構」角色〉就政策議題的產生討論其意義，之後仍在此一可能空間討論；第二節〈知識經濟時代之技術創新研發策略〉，也是在此一可能空間裡探討知識經濟議題的策略觀念架構；第三節〈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就此一可能空間在臺灣的特有脈絡中列舉一例探討相關因素與理論。

本章運用「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依循政經發展脈絡的繼續推演，討論「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政策選擇。在此脈絡中本章以「超越國際代工」、「超越威權社經結構」之定位，描述此一政策選擇之主軸。以此定位，可以認知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新興執政黨，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對「知識經濟時代」有了更多的強調。「國際代工」的角色，一直在戰後臺灣產業發展有著主導性意義，而「第一次輪替」政黨，尤其基於對威權體制造成社會經濟嚴重結構化的認知，希望透過政策推動進一步改變此種社會經濟體質。在此脈絡下，相對於過去國際分工定位，開始從勞動代工轉型技術代工，國內政治發展已由威權體制，而威權轉型，並且第一次獲得民主輪替之際，自然更願意強調知識經濟時代臺灣的技術創新發展，與屬知識經濟時代新增產業的客家文創產業。

本章就傳統臺灣在「國際分工」角色下的產業生產投入構成特性，與相對的「知識經濟」可能的產業經濟構成特性進行比較，可以看到「知識經濟」在此時「國家發展」政策可能具有的價值與意義。此一政策之代表為其時經建會制定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並且此國家發展政策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以及「新客家運動」其中有「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政策，整合而言具體的可以認為包括「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

「文化發展」屬「國家發展」之一環，尤其在「威權時期」本土語言文化受到壓抑，突破這種壓制自然成為「威權轉型」與「民主化」必要的一環，以圖超

越「威權社經結構」並且結合超越「國際代工」，是其時「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發展政策中得以提出的脈絡意義。



第一節 臺灣產業超越傳統的「國際代工」「威權社經結構」角色⁹⁹

臺灣產業迄今的發展歷程顯現著清晰的「代工」型國際分工特色，這個角色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一些更迭，不過大致說來，「代工」角色一直發揮重要作用。但新世紀來臨臺灣經濟發展似乎面臨超過以往更大的挑戰，行政院基於施政需求，提出「挑戰 2008」的 2002—2007 年的發展重點計畫。應該怎樣以臺灣總體產業發展的角度看這個計畫？或許從過去政府重大經濟建設計畫與這個計畫的方向做比較，可以得到一些啟發。或許從歷來的產業國際角色來檢視，可以使我們有所領會。本文希望能指出這個計畫與過去的國建計畫（尤其產業面）有什麼差異，而當這個差異存在時它到底表達了什麼意涵？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討論這個計畫對社會的期待回應得是否足夠，是否有哪些部分需要進一步探討。

壹、「挑戰 2008」與過去「斷層」？

「挑戰 2008」之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與過去各階段政府提出的國家發展計畫比較，僅憑直覺就可以發現有著明顯的差異，簡單說，過去的發展計畫硬體投資，物質建設佔有極為顯著的地位，但這次的發展計畫正如在「總論」所揭櫫的「核心價值」為「以人為本、永續發展」的精神，物質建設至少在字面上已退色不少。此次提出的「十大重點投資計畫」包括「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產業高值化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數位臺灣計畫」、「營運總部計畫」、「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與「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主要著眼於軟體層次功能性的發揮，以這些計畫字裡行間的精神探索，應可認知這些計畫的推動，須先確認軟體功能的發揮才可能相應帶來硬體的大規模投資。

當然，部分原因在於此次「重點計畫」提出有別於傳統「國家建設」模式的理念，因此使得許多重點建設面對傳統模式，多少具有一些「斷層」現象。這可能導因於「政黨輪替」，也可能部分緣於國際產業的「結構變遷」使政策制定者必須有所因應，而新執政團隊重視全球發展「傳統模式」的生態破壞性，並因而特別強調「綠色永續」發展理念或許也不無關係。其實除了「政黨輪替」此一因

⁹⁹ (1)本節內容已發表於《臺灣綜合展望》；陳良潮（2003）。〈挑戰 2008？台灣經濟應超越國際代工的角色〉。《臺灣綜合展望》No.7。台北：臺灣綜合研究院。(2)參考註 35。本節在此「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中思考，頗有助益。

素之外，因應國際產業的結構變遷與追求綠色永續發展模式，在過去的國家建設計畫中並非絲毫不曾提及，但採取更有魄力的態度，將之放在整個國建計畫的主導地位，應是此一國建計畫的特色。因而或許如何調適產業經濟的發展「斷層」，將是此一計畫是否得以有效發揮功效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以國際產業結構分布變遷的速度觀察，傳統模式早已面臨嚴酷挑戰，積極推動新的發展模式應也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不過縱使國際經濟環境的變遷，已形成政策調整的急迫壓力，也終於迫使政府大幅調整國建主軸，但一些相關議題仍不能不予以檢視，諸如在快速的國際產業「結構與分布」的演變過程裡，這個主導因素有別於傳統的國建計畫是否掌握了正確方向？能否發揮功效？所發揮的效果是否足以因應變遷需求？其實雖然政府已提出此一「挑戰 2008」的國建計畫，但這些問題以今日全球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來看，並不一定必然可以樂觀面對；亦即或許今日全球經濟所面臨的潛在危機是遠超過今日政策制定者認知的。例如過去經濟表現極為搶眼的日本，已有相當長的時間處於低迷的狀態，美國經濟前幾年極為強勢，但令人期待的網路與數位經濟，卻沒有如預期創造奠定穩固的「新經濟」（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卻不得不將大量的精力投注在處理 911 事件後的中東問題）。而一直宣稱「貿易導向」的臺灣經濟，在面對主要貿易夥伴的美日經濟不振的同時，另一方面則滿臉迷惑的注視著中國大陸經濟的「磁吸」現象，並思索著如何遏制失業率的不斷攀高。那麼「挑戰 2008」是否真能解決問題發揮功效？

貳、超越「國際代工」的產業定位

此一計畫方向著重產品設計、研發、行銷與經營，以臺灣產業發展歷程檢視，可看出其中若干脈絡。過去臺灣產業發展國際代工角色在產業經濟活動中佔有相當重要性，不過囿於起始的代工角色藉助勞動密集製造業的競爭力，因而設計與研發能力要求不多，在這段期間設計與研發能力培養不夠。但隨著工資增長與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放，臺灣過去依賴勞力密集的代工產業已逐漸喪失國際的競爭力，其中部分朝向更高級的代工角色發展，部分則外移東南亞與大陸，尤其大陸在語文相通，採取優惠外商的政策情況下，更是形成龐大的流動潮流。這個趨勢歷經十年以上，仍是新世紀臺灣產業政策制定中，所必須討論與面對的一項課題。其中隱含的意義在於雖然歷經十年以上，但臺灣產業基本仍未擺脫國際代工主導發展的型態，這種型態的基本特徵為雖有高度的貿易依存，但卻仍缺乏國際市場的廣泛自有品牌行銷能力，以及相應的結合行銷的產品設計能力。

國際企業的國際產業分工策略，多傾向賦予海外代工者非關鍵技術的加工製造業務，而將最具產業主導角色的技術與加工保留母廠，因而在過去臺灣產業發展過程中，關鍵技術的研發領域一直也是弱點。雖然過去一段時間臺灣產業技術水準也有大幅度的提昇，尤其在高層次的代工產業，以及部分傳統產業的關鍵技

術，但如何促使技術研發領域能夠大幅增進，進而能夠扮演臺灣產業的主導角色，卻也是許多人仍在深切期待的事。新世紀來臨所提出的國建計畫強調研發角色的培養，正顯現出臺灣產業政策在過去國際代工的分工定位基礎上，希望尋求進一步的超越。當然其中「原由」包括中國大陸以低工資成本為主所構成的生產競爭力，使得臺灣生產企業運用成本已經相對提高許多的臺灣勞動力，已經非常困難繼續經營同樣的事業。因而必須轉型往重視產品國際行銷與經營方向發展，並同時提昇產業功能主軸由製造朝設計、研發與經營發展，這也是不得不的選擇。

參、「數位」基礎建設

雖然「數位經濟」的風光已經從三、五年前的光彩炫目顯露退色跡象，但不可否認「數位產業」是繼大規模標準化經濟之後，迄今仍是最具有活力的產業。雖然數位化產品更新換代的的速度，市場獲利能力，似乎也都呈現衰退景況，但它仍是世紀之交企業獲利的主導產業，它的社會經濟功能仍然有待開發，臺灣社會雖然有著漂亮的資訊產業成績單，但社會的數位化程度仍有提昇的空間。此次國建計畫將數位化的基礎建設，擺在重要的位置。包括一般國民數位能力的提昇，以及數位相關科技的開發與設施建設，數位基礎建設的推動，將可降低今後資訊流通的成本，有利於知識發展，可為臺灣經濟超越傳統代工角色，重新塑造國際分工的地位，創造必要的內部條件。

而以過去臺灣產業國際代工主導策略的發展來看，在代工產業層次的提昇方面，近年最成功的領域為資訊產業的代工業務。代工型資訊領域的發展也為臺灣產業累積相當設計與研發實力，但國建「數位計畫」的推動，與代工型產業有著相當差異，它的推動將進一步提供拓寬資訊產業市場領域的機會，尤其應用軟體市場的開拓。軟體產業目前不是臺灣資訊產業的主要部分，數位計畫的推動將會沖淡資訊產業明顯偏向硬體製造業發展的現象。

肆、融合「文化」與「產業」

臺灣在扮演國際代工經濟角色裡，產業發展著重產品製造的效率，以滿足國外的需求。在這個角色的扮演裡，不論傳統文化或現代文化，在企業經營中只提供偏狹的成分，也使得經濟活動在文化創造需求中出現脫節現象。除此之外「威權社經結構」也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發展造成壓抑，在此政黨輪替的政經轉型階段，也可能有著與此相關更開闊的視野。而由國建計畫裡可以看到嘗試將文化發展的因素，再度結合產業深刻融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用心。並希望透過文化因素重新廣泛投入經濟活動，以促使臺灣國際產業分工的角色轉變，以及對威權社經結構的調整。其中「文化」的界定包括現代文化與藝術，也包括傳統的文化與藝術。像這樣強調將「文化」的因素，透過產業經濟設計活動的系統化政府輔導，融入一般的製造業生產成品，是過去所沒有的。



伍、分析：幾個思考點

新世紀來臨全球經濟仍是經濟結構處在繼續大幅調整的階段，這個狀況使經濟未來遠景規劃，必須面對更多不確定因素。「挑戰 2008」一方面根據臺灣產業經濟發展階段的前瞻提出以設計、研發、行銷與經營為重點主軸的發展計畫，另一方面則強調過去 20 年所顯現的世界產業經濟數位化「新經濟」的發展主軸。大致說來這樣的計畫方向選擇是有道理的，但以此刻的臺灣產業經濟發展來看，有些議題應加以進一步討論，以確認是否能夠解決當前所面臨的一些困難，首先必須討論的是臺灣產業發展模式轉換的問題，亦即前文所提到的「斷層」問題，臺灣此前曾以一、二十年的發展成長歷程，崛起而扮演傳統產業的重要國際代工角色，許多產品製造生產成為國際市場著名品牌的主要代工廠商，但在短短十年之間，伴隨中國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傳統產業這個角色早已迅速喪失，在此臺灣經濟面臨人才、資金大量轉往中國大陸，失業率達到歷史新高的困局。

傳統產業之外，循著國際代工模式的提昇，資訊業的發展，也繼傳統產業之後成為國際主要的製造商。但在國際不景氣影響下，資訊業也面臨低迷的處境。就國際經濟而言，以數位化為主軸的新經濟，意圖扮演國際經濟產業「火車頭」的能力正受到嚴格的考驗。因此在新經濟的部分，「挑戰 2008」至少在此所能比較的，也將同樣須面對一些發展的侷限。不過終究不論就拓展臺灣產業在設計、研發、行銷與經營的能力討論，或就新經濟領域的建設而言，這些都是臺灣產業應推動而還沒推動的領域，因而在此後數年裡大力推動這個方向的发展，應可以取得成果。但「斷層」的問題仍然不能忽視，包括是否能夠在一段不太長的期間建立起足夠的設計、研發、行銷與經營能力，並創造相當數量的產值，以解決因傳統產業快速流失，造成的失業率提高以及可能的產值低或負成長問題。

由於改變新的發展模式之後，將面對不同國際競爭環境，或許這種競爭將是更激烈的，加以世紀之交全球經濟基本處於低迷情勢，因此將可能益發激化轉型所帶來的競爭，因此需要更多的策略思考，尤其在市場區隔與佈局的策略運用方面，將可能是個重點。而在人力結構的轉型方面，也是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尤其成熟的勞動力轉型問題，由於「斷層」現象的產生，將導致勞動力素質的培養產生轉向問題，因而將使此後的勞動力結構調整產生更高的成本，這個成本的增加，就政策層面言，是否有充分的輔導能力，以壓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將在此後嚴酷檢驗政策推動的成效。而以政策風險的角度討論，則應該要考慮更清晰的轉型策略，除了進一步保障轉型政策推動的效果，同時也應嘗試開拓一些其他空間，以期更有效解決失業率高與經濟成長的問題。而數位經濟的推動對於轉型將可產生明顯助益，一方面可創造就業促進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可以優化產業的設計、研發、行銷與經營環境。不過數位經濟的推動如何整合硬體資訊業的發展，可能是另一值得探討的議題。

陸、挑戰與嘗試

基本上，經由簡單檢視大致可以了解「挑戰 2008」的推動是必要的，但對於解決新世紀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而言，它確實可能是一個具有相當「挑戰」的議題，主要在於它是過去模式的「超越」，因此不可能經由過去的經營型態解決，但一個新的「模式」的確立，可能需要更多的摸索時間，但以世紀之交國際經濟環境檢視，條件並不一定有利。依據過去的經驗，吸收國際的經驗未嘗不是一個節省時間的做法，但吸收國際經驗卻不應忽視自我發展的潛力，以及不能忽視妥善選擇「目標市場」的重要性，或許策略而言，以開發中的市場做為首選，可能較適合臺灣產業轉型的條件，當然這並不意味，已開發市場以及國內市場不應重視。

事實上，近年全球經濟面臨很大挑戰，因而許多過去的經濟經驗或許都只能提供有限的參考價值。新世紀來臨的前幾年亞洲曾經經歷嚴酷的金融風暴侵襲，日本已有長時間的低迷，美國經濟能不能快速復甦，也仍無法預測，因此在之後數年之間，臺灣經濟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存在，這些不確定的環境變遷，都將投射到臺灣經濟的發展上。大致說來，這個計畫以過去歷程的特性為基礎，考慮了一些重要的方向因素，不過新世紀全球經濟展望的渾沌不明，也是執行此一計畫時不宜忽略的。

第二節 知識經濟時代臺灣的技術創新發展¹⁰⁰

思考知識經濟的意義，或許可從傳統經濟理論開始，傳統經濟理論將經濟活動以投入因素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原料資源）與企業家的精神等分析描述；在這樣的理論架構裡，由於近數十年技術與知識因素的作用日益顯著，因此必須就此特性賦予更多觀念與理論的關注。其實在此傳統經濟理論的因素分析裡，技術因素已與勞動、資本關係密切。例如勞動力所具有的技術能力就是影響勞動生產力的重要素質。當然今日在勞動力的素質構成中，具有專業技術的人力恐怕仍非勞動力的主體，但不可否認卻可能是有著關鍵重要性，起著主導作用的一部份。而代表技術水準的機器設備的無法擁有運用，也是造成資金缺乏的開發中社會與已開發社會的明顯差異的原因，它使開發中社會無法運用進步的生產技術，進行更有效率的生產活動，成為其與已開發社會在整個經濟活動的基本差異所在。

¹⁰⁰ 參考表 4-1，表 4-2。以及參考註 35。本節在此「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中思考「知識經濟」在臺灣的發展議題可開啟更廣闊的探索空間。

或許正是因為技術因素的重要性越來越顯著，促成人們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已然來臨。在勞動投入方面，常以勞動力的「體力」或「腦力」稟賦做為分類的基本標準，尤其「腦力」勞動經常包括技術人員、工程師與專業人員，以相對於依賴「體力」稟賦的非專業人員。並且就實際而言，非專業的勞動力在今日經濟體系裡，仍然提供大量必要的體力操作勞動，維繫並促使經濟體系得以運作，甚至得以擴大規模，而「腦力」勞動促成的經濟發展同樣需依賴此種「體力」勞動的支撐，才得以實現。而「體力」勞動的投入與知識及技術的投入關係較小，較具有「腦力」勞動特質的技術人員與專業人員貢獻給經濟體系的，就被劃歸是屬於知識經濟的範疇。換言之「知識因素」在此分類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技術人員與專業人員的貢獻與知識經濟關係密切，體力操作的勞動貢獻與技術、知識的關係小。當然實際上是無法截然兩分。

因而討論知識經濟此一具有顯著時代特徵的概念時，至少可以嘗試落實到，從討論一般勞動力與技術、專業人員的知識經濟問題開始。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意味著經濟體系中「腦力」勞動在結構中的比重與重要性將會增加，也就是專業人員與技術人員的比重與重要性的成長；當然與此相對，體力勞動的一般勞動力比重與重要性將會逐漸萎縮。而更進一步則應更深入探討，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中，屬於「腦力」勞動，包括技術與其他專業人員，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裡，與傳統的經濟體系比較，將如何提供自身的勞動貢獻？相對於的「資本」因素又將如何發揮作用，與傳統比較將有何改變？

縱使在傳統的經濟體系體力勞動在結構份量上扮演主要角色，但具有「知識」特徵的技術人員與專業人員在其經濟體系裡，也是扮演著有著更專門的知識，或是有著更廣泛的知識的角色，而起著關鍵作用；並且經由此種知識優勢，決定體力勞工如何發揮體力的貢獻，而體力勞工經由貢獻自身的體力勞動，獲得工資的分配，得以消費他們所安排的產品。而在傳統的勞動結構因為知識經濟時代來臨而轉變，使得體力勞工結構比重萎縮，被大量的自動化機器所取代，包括由勞動投入的轉型開始觀察，逐漸擴大到包括資本、企業家精神領域，以及消費與市場機制等等整個經濟體系，將會如何逐步進入討論的範疇？甚至也將超出知識經濟的範疇，而進入知識社會的範疇。

雖然與知識有著較深關聯的結構，已然是傳統經濟體系裡關鍵的部分，但與此有著基本差異的體力勞動，可能仍然是傳統經濟體系裡的主體。那麼知識經濟趨勢的發展帶來的結構轉型，將會對整個經濟體系，甚至社會帶來如何的衝擊？首先與知識關聯較深的勞動所占比重的上升，意味著體力勞動力的減少，在體力勞動佔據傳統經濟體系主體的情況下，經濟活動的明顯型態，就是由體力勞動力實際執行操作生產計畫，勞動薪資也成為產品的需求來源，但體力勞動的貢獻受到身體極限的限制，在一般技術水準的情況下，薪資不可能大幅增長。因此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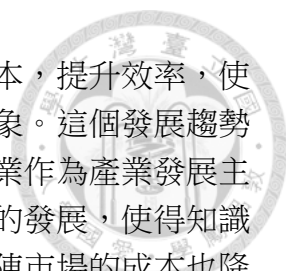
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也受到此一條件的限制。因此當體力勞動的比重萎縮，也影響原由體力勞動構成的市場轉變。並且由於腦力勞動比重的增長，將提供市場需求的產生。

在此種傳統經濟體系，體力勞動在經濟活動中，相對於腦力勞動，仍占有主要的地位。這種結構也影響經濟體系的消費市場構成，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必須考量體力勞動者的消費傾向，這是企業經營必須面對的市場條件。而在知識經濟興起的時代趨勢裡，體力勞動在勞動力的結構裡將會縮小。相對的，腦力勞動的比重將會增加，如果此一結構轉變快速，那麼將會影響消費市場的條件變動，腦力勞動的消費傾向可能會明顯不同於體力勞動的傾向，促使企業經營必須面對此種轉型。這種消費市場轉型可能進一步刺激知識經濟的發展，這是關注此一轉型的一個面向。而另一個面向的問題則是原屬體力勞動的人力在這種轉型裡的就業問題將會如何發展。而知識經濟在這些趨勢動向的發展裡，方向又將如何？

進一步以體力勞動相對於腦力勞動在傳統經濟體系轉型知識經濟的過程觀察，可以見到造成這種轉型，自動化技術的興起是重要原因，人造機器具有某種「知能」可以廣泛取代人類勞動力的操作，也是「知識產業」發展的初步成果。既然「知識產業」的「知識產品」可以取代進行體力操作的「勞動」，可見「知識產品」所能取代的勞動力「功能」並不只是體力操作而已，也包括體力勞動者操作體力勞動的基本「知能」。「知識產品」目前在計算、知識傳遞、教學、保存、整理、等等方面產生很大的功能，不過例如以人工智慧為名的技術與產業發展，則仍然無法取代經過專業訓練的腦力。而此種經過專業訓練的腦力仍然是「知識產業」與「知識經濟」的關鍵發展因素。不過這些知識產品也已經替知識經濟的發展提供遠較過去優越的環境。

至此可見到關於知識經濟發展必須注意的一些議題；首先，自動化技術取代體力勞動，如何創造適合的就業機會填補剩餘的勞動；其次，如何運用知識產品持續發展的優勢，促使知識產業進一步發展；第三，知識產業的發展仍必須依賴合適的人力投入，如何強化產業發展的基礎；第四，知識產業的發展縱使以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觀之，也具有特別的意義，相對於傳統經濟體系的各部門，將可能產生明顯的衝擊，過去產業主軸似可以固定生產過程表現，但今後此種有著較固定生產過程的型態，是否終將改變？而且此種可能新型態的生產過程，將可能以何種方式出現？包括人力結構將會如何恐怕仍須透過摸索調適逐步形成，以及其他領域、其他產業如何與被稱為知識產業的領域產生跨領域、跨產業的關聯？而以政策研究角度來看，或許應該嘗試如何進一步認識可能的情境條件，據以採取策略降低調適成本，強化參與競爭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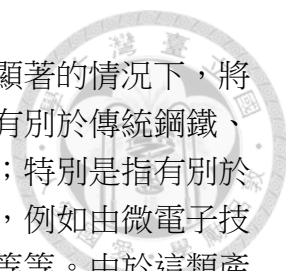
資訊業的發展使產業與科技擴及知識處理領域，並且知識在經濟與社會體系



的累積產生規模經濟，這些因素迅速降低知識的生產與應用成本，提升效率，使得先進國家科技與知識的發展對產業與經濟的貢獻呈現加速現象。這個發展趨勢使已開發國家產業結構與經營觀念產生巨大的變遷，與傳統產業作為產業發展主導時期比較，資訊業的發展，以及同時促進與關聯的人工智慧的發展，使得知識型經濟活動相關的生產成本得以降低，知識轉化成商品以及鋪陳市場的成本也降低，此一發展趨向顯然將會有益於提供更有利於新產品競爭的環境。但另一方面也造成新產品的推出可能需面對嶄新而複雜的市場交易。此一趨勢更表現在跨專業、跨領域的資訊與知識流通，並且誘發更廣泛更有效率以及效益的知識融合與生產。

既然知識經濟時代到來的跡象日益顯著，國際市場較具實力的相關部門自然希冀掌握此一機會，搶奪先機投入相關新領域的拓展。新興社會在具有系統性的關鍵領域跳躍式的參與競爭並非易事，這是當前支撐知識經濟體系發展的重要領域，但由於創新工作存在著高風險，新經濟體系形成過程絕對難以忽略此種挑戰，因此此類領先部門必須建構有效的創新研發工作模式與策略，其中包括有效降低成本以及正確評估目標範圍。而在此類新的市場環境裡，探索新產品的生存策略，是有效掌握新產品研發之外的另一重要面向。必須根據自身優勢能量，應對新的市場環境。在今日此類市場情境，領先的國際企業必然評估尋找基礎的重要領域集中實力，追求突破與奠立基礎，等待一旦時機成熟則全面掌控新、重要而廣闊的市場領域。

與站在全球發展前沿的已開發國家不同，臺灣的現代化發展起點較落後，並且與其地理空間條件、規模以及全球地緣情勢相關，臺灣以獨特的歷程參與全球體系並進行現代化發展，因此討論知識經濟議題在臺灣發展上的意義，有其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的條件必須加以重視。首先，整體而言，經由前述簡略發展起點與歷程定位，或可直接得到臺灣科技與知識經濟領域的發展，可能遠遠落後已開發國家的直接觀點。其次，經由對此一歷程的考察，或可發現其實臺灣在短短的數十年時期中，產業科技與可被劃歸知識經濟領域的元素，確可見到已然獲得迅速發展。第三，雖獲得迅速發展，但可能可以發現，其所呈現之相關結構卻與已開發國家，有著明顯的不同。第四，因此必須同時參酌已開發國家的思考，以及臺灣獨特的歷程與條件，建構台灣屬於自身的思考方式。綜合言之，由於發展起點落後，歷來希冀觸及國際科技產業的核心必然極具挑戰，歷經數十年努力，與國際先進相對水準已然縮小。臺灣此種挑戰與機會可分析性的經由在市場、技術研發規模、資金支持等方面進行評估，或可認為發展至今，已經有半成熟的條件，以知識經濟社會來臨的角度探討，評估思考選擇部分領域突破以及國際合作、等等策略，以期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之際，將臺灣的國際技術創新研發的地位，順應情勢發展予以充分提高。



近數十年來，全球產業與經濟在科技與知識因素作用愈發顯著的情況下，將產業大略分別稱之為新興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其中特別列出有別於傳統鋼鐵、機械、汽車、化工、電氣、紡織、食品等產業之新興科技產業；特別是指有別於傳統產業的產業技術，由應用尖端科技成果獲得的產業化發展，例如由微電子技術支撐的網路資訊業，以及生物技術支持的生物技術產業、等等。由於這類產業是經由新興尖端科技支撐，因此這類產業的體系也仍然在發展之中，有些發展速度很快，也有較緩慢的，各類新產品透過科技的研發、設計、量產等過程不斷產生，因此也有著更頻繁的更新換代週期¹⁰¹，這樣的市場發展型態，使得產業市場的主導力量，基本上必然是知識型的，因此是否能夠參與新興產業的競爭，與企業是否有能力掌握低成本高效益的，相關知識組織與研發工作體系有密切關係，臺灣以代工的角色參與，並未在此領域居於關鍵主導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新興科技核心部門的半導體，它的產業代工，與資訊產品組裝，臺灣此類產業在全球的資訊業中，也能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以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角度思考，在這樣的情境裡，如何有效地思考規劃？對臺灣的前景而言，也是極值得關注的議題。

標準化大量生產的策略是許多傳統產業常選擇的策略，這種策略有其成本與效益的道理，當然新興科技產業也可能必須同樣採取此種策略，但是兩者之間不同之處在於，新興科技產業往往同時擁有更廣闊的不斷技術研發空間，產生技術獨佔的利益，並且因此益形強調產品研發，以獲取更多的利益。傳統產業在原本的市場與產業發展環境裡，有些產品比較難形成明顯技術優勢，並能因之構成技術獨佔利潤，而競相標準化大量生產的結果也造成彼此之間產品競爭激烈，收益相對較少，此類產品除了關鍵零組件生產，與繼續的結合系統技術與符合市場產品設計工作之外，其他部份生產製造工作，必須移往開發中國家以降低勞動成本。戰後臺灣的工業化，首先就是戰後已開發國家，將其傳統產業關鍵與系統性技術之外部門，移往海外的一部分，因此開始進行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時期，產業主力就是經營傳統產業已經成熟技術非關鍵部分的零組件生產，或者產品組裝等的代工生產。

此種代工模式並且不斷升級，而至投入新興科技產業的代工經營。但在傳統產業代工的部門，希望經由知識領域的發展從根本上刺激這類傳統產業轉型的效果比較而言仍不顯著，臺灣以代工方式進行的傳統產業發展，到了 80 年代也因為與美國之間鉅額的貿易順差，致使台幣大幅升值，誘發國內工資與土地成本大幅上漲，並進而影響傳統產業產品出口美國的競爭力，在這種發展模式裡以代工模式出口導向經營傳統產業，在面臨市場挑戰時，卻無法透過技術與知識能力的強化提升品質，維持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因此過去曾經以代工模式蓬勃發展的傳統

¹⁰¹ 同註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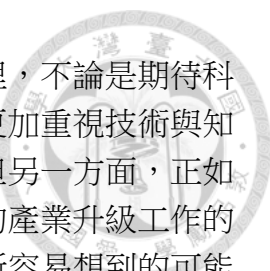
產業，到了此一階段廠商外移或者關廠可說比比皆是。臺灣本地則由代工產業升級為科技產業代工，接續成為經濟發展的產業主力。

經由將產業分別為傳統產業與新興科技產業，可見到臺灣以代工模式，分別參與全球市場的傳統產業與新興科技產業，發展自身的產業與經濟，其中看到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面對挑戰，必須能夠開創適合的發展空間，這個過程使得戰後以來台灣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獲得迅速發展。當然從臺灣屬後發工業化現代化社會，經由代工獲得迅速發展的歷程來看，一定會不斷面對一些發展限制，就目前所面臨的發展限制而言，若以已開發國家強調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業興起的角度思考，其實亦屬必要，且別具意義。但如果希望透過知識產業的發展，一舉突破過去發展的侷限性，則必須避免過於樂觀，因為此種轉變牽涉複雜的過程。

這可從兩方面探索，一方面主要在已開發國家，今日預期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但若就此認定知識產業已然具有蓬勃發展的趨勢，則應仍存在相當不確定性。雖然可以斷言這個趨勢終將來臨，但實際上將以何種方式實現，則仍存在諸多有待實際發展驗證。尤其此種轉型是在市場機制的運作裡進行，這樣的一種範圍廣泛，同時牽涉深刻內涵的調適轉型，不論以政策面思考，或以歷史觀的角度討論，在當下希望達到展現一種明晰未來圖景的程度，則仍存有相當的差距；以歷史觀的角度討論，預期這個知識經濟時代終將到來的確定性，似仍遠遠超過政策面目前所能認定的。而另一方面，則應從臺灣發展的，有別於已開發國家的。獨特歷程與因之形成的特有結構來看，在政策面提出知識經濟的思考，對由此種獨特歷程發展而來的臺灣產業的進一步提升發展，在觀念上可說不啻切中要害，但是否能夠經由觀念層面，落實到可行性的層面，則仍待檢驗。行政體系能否有效而周延應對則顯屬亟待觀察事項。

先跳脫臺灣的情境，回到全球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業的發展的情境，此一強調以知識作為基礎的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意味著人類經濟、產業乃至社會型態的可能或者必然的全面變革，尤其顯然其中應包含知識生產、知識交易與傳遞領域的變革等等，並以其在整個經濟活動扮演重要角色形成的視野，思考此類知識相關領域的興起與變動。目前已然顯現的趨勢，顯現在知識傳遞與處理工具的進步，已經導引知識傳遞的空間與時間成本大幅降低的效果，並有利於知識產業的發展。但更重要的，處理、產生知識的技術發展趨勢，將會如何表現？人類腦力將如何與之結合？以及目前這類技術及其所形成的資本財的發展趨勢，將如何對經濟型態產生衝擊，則必然有待觀察實際發展的驗證。而似可預期此種轉變將引發影響的層面將會極為廣泛，衝擊可能頗為鉅大，並對包括政策與制度面帶來適應調整的挑戰。

再回到相對於已開發國家整體的，具有獨特產業發展的歷程的臺灣發展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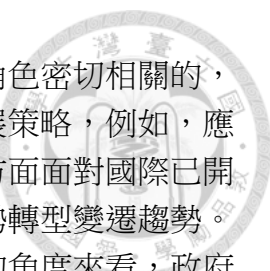


來看，在包含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兩部分的臺灣產業發展議題裡，不論是期待科技產業得以繼續茁壯，或追求傳統產業的切實升級，強調必須更加重視技術與知識能力的提升，應該都屬當前臺灣追求繼續發展的必要認知。但另一方面，正如此處所討論的臺灣有著獨特發展歷程，在進行臺灣目前所需要的產業升級工作的思考時，以基於知識基礎的經濟與產業發展思考此一議題時，所容易想到的可能發展方向，將非常可能與過去的整體策略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議題是，不論就傳統產業或科技產業而言，在過去依循國際分工比較利益的臺灣產業發展，基於市場選擇，因此並未直接切入技術核心領域，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推動臺灣迅速工業化發展，但以今日的發展態勢，是否應該思考這個策略必須有所改變？除此之外，被稱之為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所可能帶來的廣泛意義則是一個更必須關注的方向。

以國際代工的模式推動戰後臺灣的工業化與現代化，致使臺灣科學技術發展不以完整包括科技各部門的模式發展；例如應用此種代工模式發展，所常顯現極具代表性意義的，臺灣當前產業採取的策略導致產業普遍缺乏核心技術領域的參與，那麼繼續過去國際分工邊際模式的臺灣產業技術模式，甚至強調升級發展的期望中，在知識經濟的動力注入後，將出現什麼新景象？當然如果臺灣全面的知識與技術能力有了明顯提升，自然可以擁有更多的科技發展選擇能力，但直到今日，類此的策略方向轉換的問題，似乎仍然未被引入政策討論領域，而且如果仍繼續過去的策略，那麼今日希望在臺灣引入國際趨勢討論知識經濟問題，是否終將可能顯露出某種缺陷？以及必須思考過去的邊際模式是否能有更廣闊的空間，容納知識經濟發展產生的新動力引發的發展需求？當然發展至今是否意味，例如打入國際技術核心領域，與全球大廠在同一層次競合，或者能夠獨自開發新的產品與產業空間，是無法避免的選擇？

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至今，必然必須思考本身發展能量的累積，以及因應國際市場的轉型挑戰，而必須考慮採取調整因應的必要。其中之一就是是否採取異於往昔扮演代工角色的走向，直接切入國際市場的技術核心領域，或者有能力獨自另闢產品產業空間，但如果如此那麼整個策略思考將明顯異於以前做為追隨者、配合者的思考方式，因為他們彼此之間，基本哲學是不同的，扮演國際市場領先企業角色，所面對的風險與收益遠遠高於過去的模式，但相應的需要投入更可觀的資源，是否有足夠的決心與能力推動這個方向的發展，不過這方向目前看來仍不是臺灣的企業已有實績展現的領域，企業之外，與之相互搭配政府政策也仍缺乏經驗。當然是否直接切入國際市場核心技術領域，只是就過去傳統代工模式相對的思考，以凸顯過去傳統代工模式形成的臺灣產業技術與知識特性。

再從發展知識經濟的角度討論，臺灣產業科技已面臨一個新發展階段，知識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日益重要的時候，雖然只是一種比較式的思考討論，實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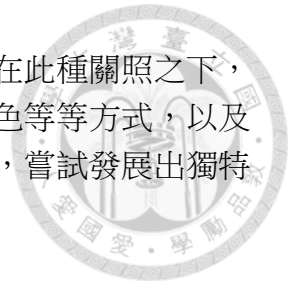
應比完全聚焦這個議題更複雜，因為一方面與知識與科技研發角色密切相關的，需思考在傳統模式發展至此的，進一步深刻轉型升級的科技發展策略，例如，應將切入國際核心科技領域，做為各種策略選擇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面對國際已開發國家，已在關注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的，可能產業與經濟情勢轉型變遷趨勢。對兩者而言，政府角色都值得加以重視討論，以知識經濟時代的角度來看，政府起碼可以致力於改善包括硬體與軟體的知識生產與傳遞的環境，以降低科技創新的成本，雖然臺灣在新階段所需要培養的創新能力，將不只是思考改善環境而已，但縱使如此政府過去在此領域發揮的作用仍然極為有限，社會關注亦不足，例如過去的教育環境可培養大量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力，但也被批判在創新能力方面仍有待強化，在臺灣面對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情境裡，這情況將可能成為根本缺憾。

相較而言，或許推動適於知識經濟發展的硬體建設難度較小，但在此則提出必須重視廣泛軟體環境調適問題，例如語文的問題，環顧臺灣語文使用的環境，可見臺灣的知識庫相當依賴外來語文，尤其英文與日文，對於過去傳統經濟體系具有專業的腦力勞動所占比例仍較小，在知識庫高度依賴不是母語的外來語文似乎情況尚可接受，但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時，所有勞動力都必須使用此一知識庫的情境裡，則可能產生嚴重問題。因此臺灣在建構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庫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如何在兩千萬人口的不算太大的規模上，建立使用繁體中文的完整知識庫。考慮規模因素，或者方便思考是能夠突破與簡體中文之間的各種限制（但簡體中文領域的適應將受包括政治與制度議題的影響，此類挑戰不容輕忽），否則語文使用的限制可能影響知識經濟的推展。當然也有可能思考採取一些調適措施，除強化建立臺灣本身的規模較小的部分完整的知識庫，另一方面再建構一些與其他語文的連接機制。

因此國際已開發國家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結合臺灣代工經濟升級轉型，產生的科技創新發展的階段特性，所可能推想臺灣未來藍圖的新景象，相較於當前的實際情況，可能必須思考其中關涉一些極為根本的轉變，例如，必須思考政府適當角色參與，教育的改革，陳述知識的語文運用問題，產業科技策略的改弦更張、等等。不過縱使此類長期前瞻式議題的繼續發展，可能性或有千百種，但最需考量的是必須評估知識經濟來臨步伐的速度。一方面當前經濟與科技發展有一股強大的力量，破壞長久以來高度依賴體力操作勞動的經濟體系，並且造成大量結構性失業的問題，這樣一個勞動結構明顯轉移的過程，其實牽涉了欲求充分就業，適應此一轉型，必須在深刻領域調整所有勞動力素質構成的議題，不可等閒視之。

但另一方面與此一轉型相對應，國際已朝知識經濟來臨的方向思考，不過建立知識經濟的科技與社會條件則似仍不具備，尤其在市場機制運作引導轉型的情境裡，因此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步伐，快或者慢就難以定論，但是以臺灣的情況，

首先必須重視此一趨勢可能的挑戰與機遇，投入更多的關注，在此種關照之下，或許可以考慮透過包括教育改革，重視政府可能扮演的適當角色等等方式，以及將視野擴及企業家精神可能的關聯，在臺灣特有的條件情境裡，嘗試發展出獨特的知識經濟模式。當然討論才剛開始仍有待特別關注與努力。



第三節 知識經濟時代新增產業舉例：臺灣客家文創產業

壹、背景¹⁰²

1980 年代臺灣政治已進入威權轉型階段，經濟上也推動自由化，以及面對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在這樣的背景裡，過去威權體制控制下的社會出現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意圖突破傳統管制的框架，重建社會活力，而臺灣客家運動在此時出現是其中之一。1987 年邱榮舉¹⁰³以及關心此一議題人士，在臺北創辦發行《客家風雲雜誌》，且在 1988 年擔任雜誌社社長期間，協助籌組「客家權益促進會」，並於年底發動「還我母語運動」。「還我母語運動」雖屬臺灣客家運動，但究其實質，「還我母語運動」的影響範圍，不只是可視之為「客家母語運動」，其實也是「臺灣母語運動」，要求政府調整「國語政策」與《廣播電視法》，也要求學校教育不應獨尊國語。隨著威權轉型與民主化發展，呼應臺灣客家運動的訴求，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都已成立「客家事務專責機關」，大學體系也有「客家」、「客家文化」與「客家文化產業」相關學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設立，並增設客家媒體，在法制面則制定《客家基本法》¹⁰⁴與《國家語言發展法》。

除了威權體制對社會、文化與語言的控制造成影響之外，臺灣特有國際代工迅猛工業化發展，所帶來的快速都市化、現代化轉型發展型態，也是助力傳統語言文化受到破壞的主要因素；這些問題隨著民主化的到來，結合國際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及臺灣產業的不斷升級轉型而進入科技產業的國際代工發展應對要

¹⁰² 黃玟瑄（2021）。《孫中山革命與東亞客家的關聯》。臺北：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邱榮舉、王保鍵（2012）。《臺灣客家運動－客家基本法》。臺北：五南書局。

¹⁰³ 邱榮舉教授長期關注孫中山思想與臺灣憲政基礎之研究，並將之與臺灣客家文化在特有的政治變遷情境的挑戰與因應思考結合，進而參與推動其發展，例如：前註 102 之文獻所示。其他相關著作討論如下：

邱榮舉（1987）。《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析論其中央政制之設計》。臺北：臺大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邱榮舉、謝欣如（2009）。《臺灣憲法與政治研究》。臺北：翰蘆圖書公司。

¹⁰⁴ 同註 102 邱榮舉、王保鍵（2012）著作。



求，整合構成了民主化後的政策的一環。

貳、臺灣產業與族群關係試析—以客家文化為例¹⁰⁵

本節希望探討臺灣經濟產業發展過程中，臺灣傳統的本土（如客家）文化與此一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關係。臺灣為一孤懸海上的島嶼，有傳統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文化，但也有原住民的文化，並曾在甲午戰後受到日本統治達五十年之久，國民政府遷台後，同時湧入大量中國大陸各省人民，而正如眾所周知的，包括中國大陸臺灣在內的東亞地區，近百年來都面臨現代化的挑戰，現代化的問題對傳統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鉅，經濟產業層面是最容易覺知的，但社會制度習俗思想意識層面也同受影響，卻是更不可忽視的。臺灣客家文化受到此種影響，導致極大文化延續的危機，其中難以否認的，經濟產業的層面也產生深刻作用，因而本文希望就所選定的臺灣，探討經濟產業與文化發展關係。

一、文化與經濟、產業發展關係

經濟、產業的發展與文化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但由於此類課題牽涉廣泛複雜，進行探討時想對探討的範圍做個界定，未必容易完全清晰。例如單就文化的界定來講，它的相關範圍就很廣泛，要適當界定就是一個大挑戰。文化的內涵在社會活動中，不只包括一般生活的層面，也包括社會制度習俗的結構，與意識思想的深刻層面。而不論針對那些層面探討，資源配置問題的探討都是必要的。事實上一個社會的人們普遍每天必須投入相當比例的時間與資源，在進行與資源的再取得與運用有關的活動。因此可說文化的發展，事實上有相當部分必然與產業、經濟活動有相當的關連。雖然在一些論著中，甚至將經濟與產業活動視為文化發展的主軸，不過縱使不將它看成唯一有影響的因素，也應將經濟與產業的活動，視為構成或影響文化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過文化的發展與社會活動，不一定只受當前產業與經濟的影響，它也受到過去長時期發展累積的影響。可說文化與產業、經濟的發展兩者間具有互動的發展關係，人在產業、經濟活動中形成的思想與習性，會成為文化中的一部份，縱使產業經濟的持續發展，使新的產業與經濟活動不斷產生，並不斷累積形成新的產業構成，且此種新的產業與經濟型態的構成，所需相適應的思想與習性，與舊的產業下的思想與習性未必能夠完全配合，因此既然有這種可能性，那麼就有討論文化與經濟產業發展關係的必要。如果舊有經濟與產業影響下，包括思想與習俗的文化，能夠在新的產業與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那麼舊的文化就可以比較

¹⁰⁵ 已發表；陳良潮（1997）。〈臺灣產業與族群關係試析—以客家文化為例〉，臺北市民政局委託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辦《客家發展研討會議》，11月20-21日。臺北。其時仍處威權轉型時期，陳水扁擔任第一任臺北經由選舉產生之直轄市市長，此一客家語言文化與產業的議題開始進入政策領域；並重點出現在陳水扁選上總統所提出的國建計畫中。



有利於新的產業的發展。

不過舊的文化與新的產業間，往往有不適應的地方，那麼為求新的產業的發展，就會產生調適的過程，如果舊的文化在進行調適的過程，能夠比較容易做得好，那麼這個舊的文化就更容易促進新產業的發展。此外也可以直接從資源的部分進行探討，由於經濟與產業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是全面的，它會改變整個生活方式以及累積的產業設備與技術，使社會具有選擇產業設備的能力，選擇本身文化朝比較期待的方向發展。

但文化在今日的意義，往往代表非常長期的累積，其中存在一些特定的質素，就經濟、產業的發展而言，最容易讓人列入考慮的，包括例如勤奮、節儉等等質素。而在不同民族間的比較，例如有些民族的習性比較沒有追求經濟發展的動力。這些民族可能在物產較豐裕的天然條件下，只追求能夠三餐飽足即可，此時就一般的看法，會認為此一文化特色較不利現代經濟與產業的發展。雖然資源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一直不可忽視，但在現代國際經濟中，經濟能夠得到良好發展的國家，都必須通過相當的建設過程，才有可能獲致現代化經濟建設的成果。因此以國際比較的觀點來看，若有些文化更善於進行勤奮工作，那麼此種文化就更有機會在比較中得到良好的表現。

而就節儉來講，有些觀點似乎認為消費可以刺激生產，當然此種觀點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是否仍能成立，恐怕仍有相當的討論空間。但縱使避開此種討論，就落後國家言，資金的缺乏，往往也是造成生產力不足、投資不足的主要因素。所以一般可以相信對於落後國家言，如果文化中有明顯的勤奮與節儉的因素，對此一國家的經濟發展會較有利。其實縱使在發達國家，節儉也未必不利。前述有關消費刺激生產的理論，雖有它的道理，但事實上做為經驗科學，或嘗試做為經驗科學的努力，凱因斯在他的一般理論中，並不能以確定的邏輯陳述表達此一理論。

他是以其他相關條件配合下的充分條件的方式表達的，因此在指出當時西方國家條件下，此一情況是會發生的。而在當時缺乏相關具有競爭力的理論，以解決當時急迫的失業問題下，此一理論是被接受，且行之有效的理論。但我認為它並不足以普遍解釋文化的節儉因素，在經濟與產業發展的角色。除了勤奮與節儉的因素外，其他的一些文化因素，要在經濟與產業發展中界定清楚，困難度可能就會更高。但在一些適當的假設下，應也可能針對此類文化因素與經濟、產業的關係進行探討。

二、客家（族群）文化的試界定

針對經濟與產業探討其與文化的關係，存在不容易界定文化意義的問題，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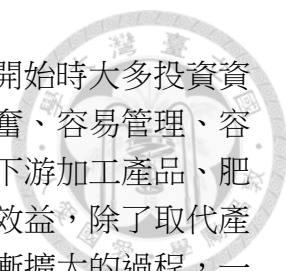
客家文化過去已有一些論述，認為具有勤勞節儉的特色，而且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認為客家文化也具有勇於冒險犯難、重視教育、社會凝聚性較強等特性。有關這些特性的描述，大概都可提出不少的經驗上的證據表現，但有關此類證據，他的普遍性的可信度如何，往往會成為討論的重點。但以另一種觀點來看，事實上一種文化總是會具有多樣的複雜的表現，因此僵硬的將某種特性，固定在某種文化上成為刻板印象，應該也沒有必要，但在探討中只要能夠不至於輕易被否定應也就足夠了。而如人們在描述客家文化的這些特性時，也常常可以客家族群多居多山荒脊之地，因此資源並不充裕來解釋包括勤勞、節儉等特性。

以及另一個常用來解釋的理由是客家人正如名稱所標示顯露的，歷史上曾歷經大規模族群遷徙的經驗，而後面這個理由，又可以為前一個理由作解。亦即正由於歷史上大規模避亂遷徙，因此才會普遍居於多山貧瘠缺乏資源之地。這些理由與前述的文化特性看起來是合理一致的，並且我認為近年來臺灣人民的文化，不論思想觀念或社經制度，都歷經極大的變革，客家文化在其中也不例外，因此如前所述的，將某種刻板印象加諸某種文化，無論此種刻板印象是正面或負面的，都未必對我們看問題有幫助，而在一種可接受的範圍裡，以增加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提供我們對未來規劃思考的空間的態度，來看這些特性應更有意義。而在這種態度下，本節嘗試將以上所述，例如勤勞…節儉重視教育等等特性，做為探討臺灣經濟、產業發展與客家文化關係的內容。

三、臺灣產業發展與國際產業發展

臺灣產業發展受到國際分工的深刻影響，是臺灣產業發展很明顯的特色。而國際分工的產業發展，必須依賴自身優勢的發揮。因此以此一觀點來看問題，必須弄清楚臺灣在國際產業與經濟的定位，例如發展程度，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過去臺灣經濟發展中，勞工敬業而勤奮的特色屢被提及，且由於發展程度低，造成資金不足、工資低廉等因素，構成臺灣在國際分工與已開發國間的優劣勢對比。

因此在國際上發展較先進的國家，本身的產業發展到達某種程度後，亟須將勞動力投入獲利能力較強、地位較重要產業，而勞力密集產業就漸漸被取代。因此乃採取將勞動密集產業外移的策略，而臺灣的產業發展條件，在早期仍以農業為主。經濟建設中農用、民生所需工業產品，仍多依賴進口，且由於戰後農業與醫藥的發展，使人口增加，農村有剩餘勞動力；但自身資金、外匯與技術卻較缺乏，且島內市場有限。因此在此種內部條件、需求與國際情勢下，臺灣一方面希望發展可以提供國內需要進口的工業產品，以替代進口，並且自然樂於接受國外投資，將國外的勞動密集產業引進，或推動以代工的方式，將國外產業中勞動較密集的部分工序或零組件，交由臺灣代工生產。



此類產業的發展，替臺灣農村剩餘勞力提供就業機會，剛開始時大多投資資金需求數量不大、技術層次不高，主要依賴的是工資低廉、勤奮、容易管理、容易訓練的勞動力。在產業的選擇上，大多為紡織、家電、化工下游加工產品、肥料等，此時臺灣產業在國際分工中扮演此一角色，獲得不錯的效益，除了取代產品進口、節省外匯外，也促成非農產業逐漸擴大。此一工業逐漸擴大的過程，一方面提供非農產業的就業機會，使臺灣經濟發展得以獲致進一步的空間，經濟發展與就業的提高，與工業高過農業的獲利能力，促使人民生活水準得以提高。在儲蓄率較高的情況下，也有利於資金的累積。

資金的累積，提供進一步投資進入工業化經濟的能力。與國際產業的接觸，對於現代化的管理與技術的提升也有幫助，並且提供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而以國際分工的觀點探討此一課題，不能忽略國際的繼續發展，此時在國外產業繼續提升的情況下，國際分工的需求與趨勢越來越強。由於國外產業、經濟的繼續發展，他們本國投資技術層次進一步提高，資金量更增，且此時國內的發展，也帶來進一步的提升，自有資金逐漸建立充裕。而當臺灣資金較充裕，並且對國際市場漸次熟悉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外貿導向經濟也逐漸確立。

四、產業發展與文化變遷

在臺灣此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人力條件、資金條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人力方面，勤奮節儉的特質扮演重要的角色，勤奮努力工作的特性，可以提高勞力密集產業，在國際分工的競爭力。節儉的特性，可以有利於提高儲蓄率，強化其後運用民間資金的可能性，而有關這方面的因素，一般認為與文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客家文化常被認為在這方面有明顯的特色，因此以此一角度觀察此一時期的臺灣產業發展，可以認為對臺灣客家族群的經濟發展應屬有利。但其他方面的發展，例如對國際市場的熟悉，以及運用此一勞動密集產業的規劃，與資金的分配運用，可能可以發揮相當的作用，但卻可能未必是臺灣客家族群獲益。

而在此種專業分工的情況下，原來傳統的結構也無法維持而被分割，其中一些勤奮但缺乏創意的部分，與國際市場結合，但本身傳統文化在整個接續中的角色，卻處於弱勢的地位。當然傳統處於弱勢並非完全沒有理由，而最明顯的就是西方現代科技在產業的角色，這一部份是傳統文化所缺乏的。但由於國際分工中，所給予臺灣產業的角色，在協助各先進國主體發展的角色，因此這部份特別受到忽視。但就臺灣本身的發展言，這一部份仍有機會使臺灣得以接觸現代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發展，其中包括例如電子、紡織、化工、機械等現代產業，剛開始可能在此分工中，設備與技術必須依賴進口。

原來的期待，可能只希望臺灣扮演工作中的純粹體力勞動投入的角色，但事

實上不可能在國際間將體力勞動與技術截然兩分，而將純勞動的部分置於臺灣，使臺灣只能純粹的獲得工資。而往往基於時間與空間距離的經濟考量，必須將設備的維修、部份零組件的更換、原物料的補充由本地市場擔任，此時只要維修與零組件等能力，與其他條件優勢的搭配具有競爭力，那麼在國際的分工中自然會將零組件生產置於臺灣。不過這個過程就臺灣發展的經驗而言，與國內的學術界的基礎研究的關係仍然不大。

此外在國際分工中的臺灣經濟與產業，對客家文化的影響還包括都市化、工業化、交通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國際分工的架構相對於傳統的文化、社會結構，具有很明顯的專業分工特色，此一專業分工的特色，也表現在安置產業生產活動的特定區域，如所安排的工業區設置，它將大批年輕人或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集中在交通相對便利的地區，形成新興的城市。此一過程對原來的傳統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使原來社會既有的結構遭受嚴重破壞，這個過程對在不同的條件下，對客家族群的影響未必相同。例如就中壢地區的客家族群而言，由於此一過程所吸納的族群對象，與原有的社會族群相同，因此他所造成的衝擊是被吸納的原有社會的解體，但仍可在他們所熟悉的文化氛圍中產生互動。

但移民的既有社會結構卻不可避免由於產生大規模移民離開原有地理位置，使原有結構中的緊密聯繫產生破壞。而且這個過程中，新的移民進入工業區工作，往往接受的是迥異以往的工作模式，例如工作線的工作方式，就是不同於原來小農耕作的工作模式，工作線的工作模式有著明顯的專業分工目標，勞工與既有社會文化的聯繫，在為達成工作線的效率目標下，被組織機械綑綁而缺乏重新省思的能力。

另一種情況是工業區或衍生的就業區，是不同的文化傳統的區域特，別如總公司所在的商業區，例如臺北也吸收了大批移民，並且移民也衍生許多餐飲、商業等服務業，臺北的移民也包括大量的客家移民，這類的移民模式比前述模式更分散，他們除了離開原有社會的社經結構外，並且離開了原有社會的文化氛圍，因此對原來的傳統社會文化，由於移民無法聚居聯繫，幾乎註定將受到嚴重破壞。但事實上大都市社會文化結構有其特別的一面，它的人脈聚落不同於傳統的城鎮，在此新的移民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些新的移民間彼此聯繫，除了工作聯繫外其他的文化聯繫較弱。

尤其在臺北這種特別的城市，除了現代化過程對臺北有關的文化造成影響外，此一過程也參雜了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仍以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中央政府體制遷臺，加上在二次戰後的二二八事件，這些因素都對臺北市的語言文化產生相當影響，此一影響最顯目的是至今仍為人所熟知的國語政策。由於臺北語言來源相當多元，因此此一國語政策，促使國語成為臺北市最普遍的語言，甚至可說



臺北市的語言文化在此經歷了一個重塑過程。在此種強勢的語言文化過程中，加上前述零散的移民方式，客家族群特有的文化特性，要在臺北市生根面臨極大的困難。

不論是那種模式，在這種觀點下，臺灣國際分工的產業發展角色，對客家傳統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這就是今日我們所見的實際情況。在此除了類似台北市的情況外，包括科學園區與工業區在內的政策角色，也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工業區與科學園區的設定，往往是以更高階層純粹經濟角度的評估為主，考慮的因素包括勞動力工資、交通客貨運輸、水電基本建設，甚至資金來源也不是考慮的範圍，因此工業園區的建設，在地方上所提供的主要在工資所得及引發的消費。

而另一方面由於過去的教育，在受前述相關因素，即追求現代化的主張影響下，對族群的文化基本採取忽略甚至排斥的態度，當時雖然有傳統與現代之爭，但此處的傳統，並不重視地方特有的，以語言特色為明顯特徵的傳統文化。當然現代化包括現代產業的引進，而工業區及國際分工下的產業發展，都屬引進現代產業的一部份，而此種現代化過程，對包括當時屬於傳統與現代論爭，傳統方的非臺灣地方的官式傳統文化（如以論語等論述為代表），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而地方傳統，在包括此種產業發展與教育發展下所受到的影響更大。

事實上在以科技發展為明顯特色的現代化過程裡，全世界的傳統文化都受到產生嚴重影響。尤其科技發展除了在實驗室知識外，在產業、經濟、社會政治結構、意識型態等多方面，也都產生深刻的影響，而科技發展能夠產生那麼大的超越傳統的影響，就在於他與傳統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對西方傳統的政教結構、宗教信仰觀念的影響，而臺灣的地方傳統文化在現代化落後西方相當距離的情況下，對以科技為主的西方現代化的期待自然更迫切，因此在國家政策與民間對現代經濟發展的渴求下，傳統文化就在缺乏省思下受到嚴重破壞。

而在此產業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國際分工獲得政策的配合推動，促使了工業區的設立、都市化的發展、交通、通信、傳播的進一步建設，使得以地理的隔絕為條件，保持相對獨立的族群特色的可能性逐漸縮小。但交通通信的發展，也使得族群聯繫的能力增強，在產業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臺灣傳統文化只能根據國際產業發展的需要，提供貢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此一角色的選擇，是否思考過傳統文化發展的其他選擇可能，則頗令人懷疑。而在此發展過程，目前臺灣客家文化所面對的嚴重挑戰已是客觀的事實，不過在以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時，客家社會在此過程中也累積了一些資金，交通、通信、教育與人力素質也有相當發展，如何瞭解過去發展的缺失，在當前條件下思索文化的意義與價值，予以創造持續發展是最重要的。




五、省思與展望

在這種思考下應瞭解前述例如創作能力、社經結構條件在過去的發展中，是否已有充分的發揮，如果沒有，而且它如果確實也是一項優勢，那麼今日如何進一步以創造性的發揮來發展，是必須思考的問題。就傳統產業的觀點，未來產業發展無法繼續依賴低廉的工資推動，必須提高設計、技術、市場等能力，因此必須將現代科技管理與臺灣客家族群勤奮創造，持之以恆的特性結合。而市場的掌握能力是另一個情況，市場的掌握以華人常被稱為網絡經濟的觀念來講，臺灣客家族群可能的網絡建構，在今日資訊、交通、通信日漸便利的情況下，應有利於市場的建構。但在市場網絡應該也結合其他市場因素的條件，因此如何使此一市場得以發展，須對市場有廣泛的掌握，而以臺灣客家族群的傳統有聯繫的市場網絡而言，要發揮此一市場的特性，則須思考是否能夠有更多的文化建設，足以提供支持此一網絡建構所需的文化儲備。

近年來國際上產業的發展，資訊業扮演重要的角色，臺灣產業的發展剛好以此為強項，而資訊業的發展對文化的發展有相當的關連性，它可以克服空間的距離，也提供文化創造的空間，不過以目前來講，資訊業的發展在文化空間的全面運用上，仍須擔負相當成本。因此恐怕立即全面的應用仍力有所未逮，不過此一領域的發展速度絕不可忽視，在此應重視有關臺灣客家文化發展運用在此一領域的機會。而未來的產業經濟發展也正朝向更大的科技需求，在全球未來社會各層面的結合將更密切，因此有關臺灣客家文化的發展，隨著國際與思想觀念的發展，臺灣客家文化的發展必須也同時向前發展，不可能仍停留在過去的內容。但今日談論此一問題，不應該認為與自身傳統文化的聯繫不重要，而應該透過更深刻的反省發揮特色與價值，而對包括臺灣社會整體以及國際也能提供更多的貢獻。

未來產業的發展特色不在人類以體力勞動加入，而必須有更多的智力投入，因此臺灣客家文化的特色，例如勤儉是否能夠在未來的產業發展中獲得更多的機會，必須以更深刻的思考來探索其內涵，如果能配合像創造力的發揮下討論，它的意義可能就更能夠符合未來展所需。而關於文化有關的更深刻思考，還包括例如勤儉的精神與單純儉樸的生活，在投入未來生產工作所能扮演的角色。目前所知對未來國際產業的發展，可以預測科技產業的特色包括在資訊業、自動化發展，在此類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可預測體力勞動的需要將逐漸降低，因此對臺灣客家文化常受肯定的勤勞特色，在經濟與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將降低，臺灣客家文化此一特色若不能結合其它優良特色的發展，在國際分工的角色將無法發揮比較優勢的作用。

以臺灣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講，過去臺灣產業在國際分工扮演勞動提供的角色，臺灣業界憑藉運用人民勤奮與低工資的特性，在國際市場取得相當競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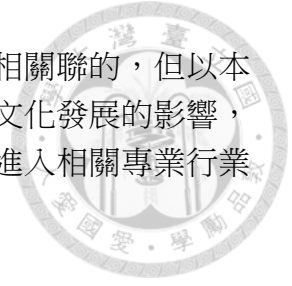
但隨著工資的提升，此種競爭力正急速消退，在已經累積相當資金與產業零組件技術，部分特定產業已有相對完整的體系條件下，臺灣產業面臨提昇技術、變動結構的產業升級需求與挑戰。希望在國際產業發展的分工角色扮演中，臺灣能夠朝向更具開發、生產產業關鍵零組件能力的地位轉移，產業選擇也朝資訊業、服務業等更具利潤創造能力的結構轉變。

由於此類轉變對技術與人才的投入比過去更殷切，在此挑戰中教育理念與產業投入面臨變動的挑戰，而新的產業的發展必須以新的經營理念面對，以臺灣的條件要走上與已開發國競爭的路徑，必須預先心裡有準備，可能面臨嚴格競爭壓力。在此種競爭中資金的需求是重要因素，但人才的需求可能更具關鍵，在此人才的種類除了技術能夠掌握的人才外，還包括能夠結合市場與技術，以及規劃與管理的人才。

由於臺灣客家文化也被認為在重視教育、深刻與抽象思考、勤奮與創新等方面都具有特色，因此應也可能在未來發展上，提供優秀的人力投入。而就目前所熟知的數個臺灣亟欲發展的科技產業，如生物科技、精密機械、通信資訊、航太工業等，也都是與國際產業發展關係密切的產業，而且它們對人類未來的發展也將產生包括文化層面的深刻影響，因而臺灣客家文化在面對未來產業發展的挑戰時，應結合自身文化的特色，並重視未來國際此類專業發展的趨勢，在前述提到深刻文化思考下，以創新文化發展內涵的角度，發揮文化的特色，甚至能夠創造性提出有價值的世界觀、人生觀，能夠對整體社會發揮重大貢獻。

今日我們做為研究對象的文化，它的內涵非常複雜，過去國際經濟與產業的發展，比較著重物質層面的機械性大規模生產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的角色，著重在廉價有紀律體能勞動的投入。在此條件下包括臺灣各族群在內的文化發展，受到嚴重的打擊，各族群內的年輕人脫離本身的傳統文化氛圍，甚至大規模離散式的投入新的生存領域，雖然此一過程創造了所謂經濟奇蹟，但卻造成傳統文化面臨了斷層的危機。而正如在生態領域中，珍視瀕臨絕種生物以保存基因庫的理由般，文化的多元性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存在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而今日國際經濟與產業的發展，又面臨了另一個新的革命性發展階段，在這新的發展階段，過去重視體能勞動的時代正漸漸離去，反而重視人的創造力與智力發展，在這個趨勢下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美國、中國大陸都推動了教育的改革，臺灣也不例外。而經由過去經濟與產業發展的經驗，與此新的情勢要求，我們應瞭解逃避式的忽視經濟與產業發展對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想要完美保持傳統文化靜止不動也是不可能的，但任令任一種文化消失不予理會，那更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損失。因而今日我們最好的作法是能夠深思本身文化內涵，也能瞭解掌握世界發展的趨勢，能夠掌握自身傳統文化的精髓，創造性參與世界新文明的



發展。而此創造性的發展層面應很廣汎，且這些層面之間是互相關聯的，但以本文著重產業與經濟層面的角度來說，今後應掌握經濟與產業對文化發展的影響，在國際此一領域朝著重智力投入的趨勢下，發揮自身的特色，進入相關專業行業領域，選擇有利的發展方向。¹⁰⁶

參、臺灣客家文創產業發展案例

一、臺灣客家文創之樟腦業

古人發現「樟樹枯倒之後，蟲已不侵，幾乎是不腐朽」¹⁰⁷，因此將樟木片蒸餾可得樟腦油，進而將其分餾可得其他成分作為各種用途產品，或可分為工業、香料與醫藥等用途，曾經樟腦油在工業及國防產品製造中用量龐大，但之後工業技術發展使用樟腦的需求被轉移取代。臺灣之樟腦業自 1640 年代即已存在，並延續至清治時期，主要作為藥用，也做為製造木造軍艦之用。約 1890 年之後，由於發明發現可用於電影膠捲隻賽璐珞及無煙火藥的材料，因此產業開始興盛。據說臺灣樟腦產量曾達世界產量之七成¹⁰⁸。但到了日治後期，由於人造合成樟腦的發展取代，而使得臺灣天然樟腦業開始快速萎縮，此一趨勢並且延續至戰後。

臺灣天然樟樹分布在北部標高 1800 公尺等高線，南部標高 2000 公尺等高線以下的山區。而依人口與地形分布，北部客家人聚居地鄰近天然樟樹樹林之所在。因此在臺灣樟腦業興盛時期許多客家人從事樟腦業的生產工作，但產業在戰前即已開始萎縮，尤其戰後臺灣逐步參與國際代工，並進而以國際代工的方式工業化，主導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樟腦業迅速走向沒落，這是當前臺灣樟腦業所面臨的基本情勢，除了經營結構與政策取向之外，戰後臺灣社會工業化發展社會，產業經營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因素。

回顧臺灣樟腦業整個發展歷程的市場，可分為以下諸階段：1.軍艦及藥用的傳統階段；2.賽璐珞及無煙火藥原料外銷市場階段；3.工業合成取代出現，外銷衰退，

¹⁰⁶ 范揚松（1994）。〈客家族群特性與企家性格會通與轉化〉，《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張典婉（1994）。〈客家工商人的文化理念〉，《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梁憲初（1994）。〈客家人的企業經營理念〉，《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彭作奎、彭克仲（1994）。〈新竹客家地區農業經營的理念〉，《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¹⁰⁷ 溫紹炳、葉茂榮（2004）。〈臺灣樟腦業與客家人的地位提昇之研究〉，客委會委託臺南市客家文化協會研究計畫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報告。臺南。

¹⁰⁸ 陳界良（2009）。〈吳騰金古法煉製樟腦業〉，7月13日，自由時報。

內銷產生階段，此一階段經營方式則由國家經營轉型民營；4.面對國際代工工業化社會的新產品開發，探索現代化市場營銷階段。

第 4 階段正是文創產業定位所需面對的市場情勢。而在這個基本市場情勢裡，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文創產業政策的提出，可被視為第 5 階段，其意義在於臺灣國際代工工業化轉型後，產業發展主要是市場取向決定產業是否能夠存續；台灣經濟發展主導產業型態的國際代工型產業，所面對的是國際分工中的國際市場，這樣的發展型態也經由工業化、都市化對臺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造成影響，尤其客家社會、經濟與文化衝擊是非常明顯的，也包括臺灣與客家在參與此一發展型態所能提供的因素特性被偏狹化，希望透過文創產業政策提出，予以應對調整。

因而與國際代工主導的產業經濟的外銷取向不同，文創產業面對的是「可能的」內需市場開發，因此內需市場開發的文創產業與國際代工產業的營銷取向，牽涉的文化意義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正是政策何以強調提出文創產業之意義所在。當然文創產業也期待在立足內需市場建構具有特色的商品之後，此種特色商品能夠進而開拓國際市場。

茲以臺灣苗栗的樟腦業為例，來簡要說明臺灣客家文創產業。東華樟腦廠的第一代吳阿相曾是日治時期取得執照的「腦丁」，從事「焗腦」的工作¹⁰⁹。而在戰前末期以及戰後開始的第 3 階段，其他「腦丁」紛紛在市場轉變的情勢裡放棄傳統天然樟腦「焗腦」工作的趨勢裡，仍然繼續堅持從事傳統天然樟腦的「焗腦」工作，並且依據古老對樟腦需求的可能，在國家退出樟腦業的專營之後，以民營的方式探尋市場的可能性。今日東華樟腦廠仍繼續以傳統方式「焗腦」，並被客委會輔導成為「觀光工廠」，另一方面則為「焗腦」所生產的天然樟腦，開發新產品成立綺緣公司，開拓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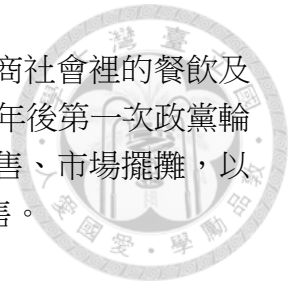
二、臺灣客家文創之米食製品業

米製食品「粿」是傳統客家與臺灣米食（或稱「粿」），尤其在節慶時家家戶戶都會製粿（粿）拜拜以及食用，而早年相對於集中在節慶時期，家家戶戶自製粿食以供拜拜以及自家食用，相對的，可能在人口聚集地方也會出現平時日常都在製作粿食販售的店家。「徐家粿」¹¹⁰的女主人李玉英娘家就是製粿販售的店家，她也自小（1960 年代）就在自家店裡幫忙製粿；而 1981 年與徐世英結婚他們就開始在六堆麟洛開設徐家粿店，經營製作生產粿食品，此時臺灣已進入工商社會，

¹⁰⁹ 賴怡瑾（2010）。〈苗栗樟腦業的鑲嵌與轉型：以東華樟腦廠為例〉。苗栗：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¹¹⁰ 黃靖純（2014）。〈六堆客家米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研究—以麟洛鄉徐家粿客家米食為例〉。中壢：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那麼徐家板店如何經營傳統板食，依據板食品的特性，應對工商社會裡的餐飲及食品業的競爭，進而加入更廣泛的食品市場競爭發展？而在 20 年後第一次政黨輪替才有文創產業的政策。徐家板店目前經營的範圍包括店面自售、市場擺攤，以及進而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擺攤，以及在南部各大百貨公司販售。



而以臺灣客家文創產業政策的設想，此一傳統具有臺灣客家文化特色的產業，面對工業化社會發展，應依據既有產品特性並著重創新以求發展，當然由於傳統特色之不同於現代特性，此一創新可能帶來不同的產業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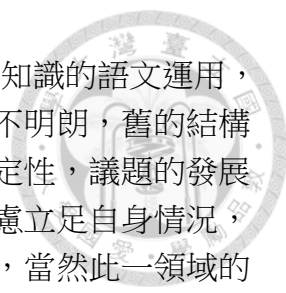
另一個有著不同發展路徑的米製食品商家，經營者並非傳統的板食品經營者，而是有其他工商業經驗的經營者¹¹¹，因緣際會認為此一行業在資金周轉上的優點值得嘗試，因此投身板食品的製作與經營。他曾經依據他在其他行業的經驗嘗試以「量產」的方式，希望降低成本，作為經營此一行業的策略，並且投資數百萬元購置鍋爐設備，以大量生產板食品。當然單位生產成本與以蒸籠小量生產的單位成本比較獲得立即大幅降低，但是此一策略，也馬上必須面對板製食品，依據它的特性，在食品市場的定位限制，而有產品在傳統市場的出路問題。因此他的經營策略挑戰即在於如何為此大量生產的板食品尋找市場出路。

第四節 小結

第一次政黨輪替除了標誌臺灣政治發展脈絡的明顯變動之外，經濟政策策略顯示了明顯的脈絡開創意圖，經由基本而簡單的發展脈絡審視可以看到，包含意圖超越的新政策策略的思維應屬必要，但對於解決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而言，它確實仍是一個具有相當「挑戰性」的議題框架，主要在於既然它是過去模式的「超越」，是一個新的「模式」的探索，因此可能需要更深刻而廣泛的摸索，且此一嘗試與國際經濟環境相關，也必須與劇烈深刻變動的外部情勢與結構有所互動。依據過去的經驗吸收國際的經驗或許是個可嘗試的方向，但更應著重自我發展的潛力，而「目標市場」的選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包括開發中的市場，已開發市場以及國內市場都應分別列入思考，探討此一臺灣產業轉型的可能，不過當今全球經濟展望有其渾沌不明之處卻是不宜忽略的情況。

或許可以知識經濟這個名詞作為觀念聚焦，結合應尋求進入臺灣科技創新發展的階段特性，並以此討論可能的、想像的新景象以與實際情況比較，其中因此

¹¹¹ 莊玉蓉（2013）。〈客家文創產業品牌建立之研究：以臺客藍、臺灣藍、客農知香、阿金姐為例〉。屏東：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需關心一些必須的變更要求，例如政府角色，教育的改革，陳述知識的語文運用，產業科技策略的改弦更張…等等，不過目前此一領域的發展仍不明朗，舊的結構可能將會日漸消解，但新的架構的形成仍步履蹣跚，充滿不確定性，議題的發展有千百種可能性，面對此一新的局勢如前所述臺灣或許可以考慮立足自身情況，透過教改、政府角色等等方式發展出臺灣獨特的知識經濟模式，當然此一領域的討論才剛開始。

在探討相對於過往的臺灣可能新經濟與產業空間時，思考今日國際經濟與產業面臨一個新的革命性發展階段，它顯像出對人的創造力與智力發展的重視，因此或許思考經濟產業發展與文化的互相影響問題將有所助益。在這個趨勢下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美國、中國都推動了教育的改革，臺灣也不例外。今日我們或許亦應更深思本身文化內涵，結合瞭解掌握世界發展的趨勢，探討以自身傳統文化的精髓創造性參與世界新文明的發展，此一領域關聯層面可能很廣泛且其間存在相互的影響，尤其經濟與產業對文化發展的影響，在相對於國際此一領域朝著重智力投入的趨勢，能夠發揮自身的特色進入相關專業行業領域，以選擇有利的發展方向。在臺灣客家文創產業為例的案例中，見到傳統文化中的產業，透過吸收現代化的相關市場營銷與技術知識，使得此類產業與以國際代工為主軸的產業發展中，也能獲得發展的空間。這也在臺灣的政經轉型與國家發展議題面對知識經濟來臨的挑戰提供一些啟發意義。



表4-1 臺灣、OECD及亞太國家知識經濟指數評比

國家或地區	知識經濟指數	創新系統	資訊基礎設施	教育與技能水準	經濟誘因機制
日本	8.28	9.08	8.07	8.43	7.55
臺灣	8.77	9.38	9.06	8.87	7.77
新加坡	8.26	9.49	8.78	5.09	9.66
南韓	7.97	8.80	8.05	9.09	5.93
香港	8.52	9.10	9.04	6.38	9.57
馬來西亞	6.10	6.91	6.61	5.23	5.67
泰國	5.21	5.95	5.55	4.23	5.12
OECD國家平均	8.25	8.49	8.03	8.01	8.46
亞太國家平均	4.39	4.50	4.28	4.66	4.50

本表取自國家發展委員會新聞稿，2014年12月9日。聯絡人：張惠娟、陳晔麗。

資料來源：ADB(2014), *Innovative Asia : Advancing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表4-2 臺灣智慧財產投資概況

單位：億元；%

年 別	名目金額	年增率	占名目GDP比率	占名目固定資本形成比率	智慧財產投資與機器設備投資相對比率
2007	5,086	6.29	3.79	15.87	39.61
2008	5,416	6.47	4.12	17.78	48.75
2009	5,684	4.96	4.39	20.58	58.69
2010	6,165	8.47	4.37	18.48	47.79
2011	6,422	4.16	4.49	19.19	53.01
2012	6,677	3.98	4.55	20.34	59.54
2013	7,016	5.07	4.61	20.81	61.12

本表取自同表4-1。

資料來源：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第五章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的重點領域舉例：能源產業轉型發展



筆者在第三章即已提到在戰後臺灣國家發展之政經轉型的脈絡裡，1984 年政府宣布推動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這是臺灣戰後國家發展脈絡中，在 1980 年代的國內外政經劇變情勢裡，臺灣國家發展過程產生頗值關注，有著顯著轉型意涵的一段。在這個自由化、國際化政策落實推動過程中，臺灣的能源產業作為基礎產業，原來基本上以國營的型態經營，到了此時也成為這個政策推動中受到特別關注的產業之一。由於能源屬基礎產業，加以臺灣初級能源來源基本依賴海外，屬戰略資源，因此必須依賴全球政經格局的支持，因而採取變革的政策必須考慮可能的衝擊影響。

在第三章討論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中，討論了黨國威權體制介入控制經濟領域，行政結合國營企業與黨營事業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而國營企業中能源產業因其特性，因此是不能忽視的一部分。但此種特性與黨國威權體制的關係到底如何？則必須加以探討。因而在臺灣政經轉型發展的脈絡裡，臺灣能源產業的轉型討論有其政策上的重要性，本章就其基本理論及相關議題，在政策探討初期即參與討論。

本章第一節從基本理論著手，思考能源產業自由化在理論層面的意義。除了自由化的議題，溫室議題在經濟發展獲得成果的情況下，在這段期間的政經劇變裡也受到聚焦關注，第二節討論與能源相關的溫室議題，而能源相關的溫室議題，是溫室議題最重要的一部份。在第三章也可以看到其與政治發展議題的結合，且是牽涉全球關注的議題，其實除臺灣之外，當時全球經濟也有更多朝自由化轉型發展的傾向，其中能源此一重要議題也已受到關注。當臺灣能源產業因應國內外情勢演變探索自由化的路徑，另一方面區域國際石油市場的情勢，因諸多可能的鉅變因素似可預見也將發生變動，那麼這個變動趨勢的方向將會如何？第三節也提出相關的探討。第四節則就此一牽涉複雜因素龐大系統基礎產業，在複雜的國際情勢裡提出關於期待對話的有限探討。

正如能源產業自由化理論所討論，必須重視多元能源的技術特性與供需特性，尤其需求低價格彈性的特性，對能源產業自由化議題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也可能進一步投射到未來能源產業相關的重要議題中，例如繼之討論的，當今全球極度關注的能源溫室效應議題；尤其在例如超大規模、屬開發中社會的中國快速

進行工業化的過程，已然導致全球溫室效應的壓力大增的情況下，尋求這個議題的出路就已更形迫切，因而對再生能源大發展的期待已然高度提升，而既然超大規模中國獲得快速工業化發展，是否意味著全球其他開發中社會，獲得快速工業化的時機也已成熟？那麼這個壓力顯然不僅止於今日所能預測的程度而已，因而對可能以再生能源尋找出路的期待必將更形緊迫，但再生能源多元供應與儲存的技術特性，則應結合制度架構的適應才更可能獲得有效發展，若果然如此則本章的討論應可在基礎層面對此領域的思考提供支持效果。

第一節 戰後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¹¹²

1990年代末臺灣正推動能源市場的自由化¹¹³，雖然已實際邁出開放的步伐，但此一過程的進展卻也遭遇了相當多的阻礙，雖然在觀念上一般認為自由化有利促進產業競爭，提昇能源企業的效率，但由於傳統上已有相當時日實行國營獨佔的能源產業制度，因此在推動能源產業自由化之後，各種觀點紛陳，爭論從未止息，但稍加注意，可以看到這些有關能源產業自由化的觀點，內涵多屬政策與策略層面，直接探討較（最）佳作法應如何安排的論述。而從更深刻的理論層面探析能源產業推動自由化有何相關條件？其間關係如何？等課題的相對較少。本節則嘗試從理論層面探討，以補此政策論辯中的缺漏。

由於自由化政策旨在希望發揮市場機制的的作用，本節嘗試以經濟理論的觀點，設定構成市場競爭機制的功能要素為調節的作用；再探析能源產業的特性、條件（如資金、技術…等），對此功能要素的影響；然後就臺灣能源產業發展的特性、條件探討、分析臺灣能源產業推動自由化的問題，以及使特性、條件的發展與自由化的發展能相互調合的條件；以求瞭解推動自由化是否能有效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並探討政府在此自由化過程的角色轉換。由於本節從基本理論結合臺灣實際能源情況進行討論，因此應可有更廣闊空間探討各種可能情境，包括在未來期待再生能源高度發展的設想，應也可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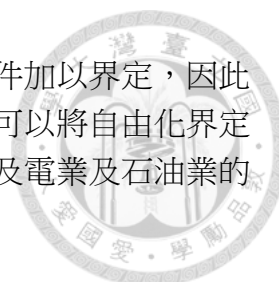
壹、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的界定¹¹⁴

1990年代以來政府即已嘗試推動能源產業自由化的政策，而這也是本節擬探討的主題。雖然從理論的根本內涵來講，自由化的意義應已有較明確的共識。但

¹¹² 已發表於《能源季刊》。陳良潮（1998）。〈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的理論探析〉，《能源季刊》，28卷，1期，頁50-67。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¹¹³ 關於台灣能源產業整體狀況參考本章文末之「表5-1」，「表5-2」。

¹¹⁴ 陳良潮（1996）。〈自由化後進口大陸能源長期策略探討〉，《能源經濟學會論文集》。臺北。



自由化的問題落實在政策層面，必須根據當時的實際環境與條件加以界定，因此實際上各國對自由化的界定未必相同。根據臺灣的實際情況，可以將自由化界定為「傳統由政府管制下中油、台電獨佔國營企業的民營化，以及電業及石油業的開放民間經營」。

由於臺灣能源結構以油與電為主，且在政府管制下以獨佔的國營企業方式經營，因此自由化意謂政府管制與國營獨佔經營的開放，且國營的油與電企業就是中油與台電，因此臺灣的自由化政策大約可分中油與台電的民營化與開放民間經營。

根據這個界定，本節以下首先從經濟理論有關市場運作的相關觀念，例如調節作用，探討影響、構成市場機能的一些條件。並且期望能夠從這些探討中得到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果，以供參考。

貳、理論探討：市場與調節作用

一、市場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在供給與需求架構下，進行自由競爭。競爭產生的來源，必須依賴眾多廠商與消費者獨立自主的決策。而競爭的標的是貨幣或價格。價格的決定必須透過供需相對數量比較的機制，此即為調節作用。一般理論與政策，對市場經濟的期待，在於認為市場具有透過競爭使資源得到最適配置的功能，因而也可得到最大效率。不過市場結構分類不只有完全競爭市場，也包括獨佔市場，但一般認為獨佔市場比較不具競爭性，因此不如完全競爭市場理想。但縱使如此獨佔市場仍能存在，原因在於獨佔市場仍具有交易的功能，透過交易，其中存在供需雙方的「談判」作用，此一談判作用可以具有供需的「調節作用」，經由此一調節作用，也可使供需雙方達到資源的均衡¹¹⁵。

在探討能源產業的自由化時，即設定能源產業由原屬政府管制的公營獨佔，朝競爭市場轉變的性質。而如前述有些市場結構競爭性不強，但不論何種市場條件都有調節機制的作用，因此以調節機制的觀點探討此一議題，對整個轉變的過

¹¹⁵ 一般普通經濟學原理，如施建生，《經濟學原理》。以及包括定價、公共定價與尖峰負載在內之基本經濟理論：

Lancaster, K.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Baumol, W. J., Bradford, D. F. (1970). "Optimal Departures From Marginal Cost Pricing", *AER*.

Bergson, A. (1972). "Optimal Pricing for a Public Enterprise", *QJE*.

Boiteux, M. (1960). "Peak-Load Pricing",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Williamson, O. E. (1966). "Peak-Load Pricing and Optimal Capacity Under Indivisibility Constraints", *AER*.

程所包括的各種可能市場型態都可有探討的空間。也可說調節作用是自由化過程各種可能市場型態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因此以「調節作用」的觀點，探討轉變過程各種市場型態的條件可具有廣泛的涵蓋性。



理論上市場作用的「充份」發揮有賴競爭作用的發揮，不過競爭作用的發揮也必須透過調節機制的作用。競爭包括價格與品質的競爭，但分析上價格競爭的份量遠甚於品質的競爭。根據不同的市場條件可探討調節作用與競爭作用的關係；完全競爭廠商的競爭要依賴調節作用，當價格上昇需求減少，迫使廠商中競爭力弱者退出，以減少供給量。或使廠商降低成本與定價，以增加需求量。

另一方面調節作用，除了產生不同廠商間的競爭作用外，也可產生獨佔廠商的自我競爭作用。因為縱使在獨佔的情況，只要需求彈性大於一，低價可以促使廠商營業額增加，因此雖然廠商不會將價格定在社會福利最大的點上，但並不意謂廠商一定將價格儘量拉高。若廠商為追求最大利潤，也有降低生產成本的動機，因為一旦成本降低，廠商可以在相同利潤率情況下增加營業額，因此也提高利潤總量。而此類獨佔廠商的行為效應，端賴調節機制的作用。亦即在廣義上，調節作用使獨佔廠商不同經營、營運狀態間產生競爭關係，而獨佔廠商為求最大利潤，將受制於調節作用在價格與購買（銷售量）之間的反向作用，必須在不同經營狀態之間做出最佳的選擇，不願將價格任意定高。

不過能源需求的價格彈性係數較低，在此情況下，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表示廠商數目極多，各廠商都是價格的接受者，無力改變價格，由於調節機制的作用，在需求方數量的變動，引起價格變動的效應很不敏感。但在供給方敏感許多，因此價格的變動只能引起需求量的些微調整，但卻在供給方引起劇烈的變動，因此很難得到均衡狀態¹¹⁶。但在獨佔市場廠商有能力決定價格，由於需求的價格變動，只會引來小量的數量變動，因此獨佔者在數量沒有大量變動情況下，可以大幅調高價格，以儘量剝削消費者剩餘。由此可見需求彈性係數低，這個常被一般人提到的能源屬性，是個極值得注意的性質，它所可能產生的問題，不只是存在獨佔市場裡，甚至在完全競爭市場也可能產生問題。

此外包括供需雙方參與的市場機制的作用，是一較大的系統，但此一體系必須依附於各當時的社經條件，例如；其它產業替代性、資金、資源、技術、運輸通路系統、資訊流通等，以上條件愈優越，市場經濟的競爭功能愈能發揮。因此故欠發達社會在資金需求量大、技術、資訊有相當要求的產業，市場競爭與調節較難發揮作用，新產業亦然。不過新產業產生了夾帶新技術的獨佔利益，因此專就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來講未必不利。理論上市場競爭狀態很好的產業，它的協調

¹¹⁶ 蛛網理論。



問題應也不存在，但在產業發展過程，供需機制的發展也有一個由初始逐漸朝成熟發展的過程，以這個觀點來看臺灣能源產業的自由化過程，必須考慮在此過程的社會條件的發展，以目前臺灣能源發展的情況，主要是油電，其次為氣煤。

二、調節機制（調節作用與競爭）

前已述及在不同市場條件下，調節機制與市場間存在不同的關係。「受管制」產業推動自由化政策，目的即在求充份發揮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而市場機能的發揮，直覺上最理所當然的，就是透過擺脫管制的束縛或保護。但各種商品可能具有各自特有的屬性，尤其一些長期經驗中被認為有管制必要的產業，是否能夠透過管制的排除來達到市場化的目的則有待進一步探討。一般認為市場機能的發揮端賴競爭作用的發揮，但獨佔市場仍有其自身機制的效果，可見競爭作用雖然是解釋市場機制極具代表性的功能，但卻未必能代表市場機制的完全功能。另一方面，調節作用是市場競爭得以發揮的必要條件，且在各種市場結構中都存在調節的作用，因此以下首先將調節的作用，進一步更詳細的描述，並進一步以調節作用探討我國受管制的能源產業自由化問題。

市場必須要有調節的作用，調節作用如下： $D > S$ ， p 上升， D 減少， S 增加； $D < S$ ， p 下降， D 增加， S 減少；最終能夠達到 $D = S$ ， p^* 。在完全競爭市場，此調節作用的發揮，依賴分散的生產與消費決策者之間的競爭作用。但在獨佔市場，此一調節作用大體仍可發揮作用，不過生產決策者並非分散，因此在獨佔廠商追求利潤極大的過程中，具有決定價格的自主權，雖然價格與供需差額仍呈反向運作，但價格並非定在 $AC=MC$ 沒有超額利潤之處。因此在此可以瞭解，競爭可以保證調節作用做最好的運作，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但調節作用的發揮，並非一定依賴競爭條件，只要供需間的差額，影響了廠商利潤及消費者效用，就存在調節的動力。但調節的實現必須依賴雙方共同的意願。

與競爭理論相對，自然獨佔理論以包括規模經濟等觀點，分析有些產業存在支持產業獨佔狀態的外在條件。在此，自然獨佔理論表達了一種觀念，亦即「競爭條件的產生，必須有相當社經條件的支持」。規模經濟的概念是可支持自然獨佔的產生，但仍有其它因素可能支持獨佔發生，如技術專有、社會資金缺乏等。而在此種獨佔的狀態，雖然存在調節的作用，但並非一定可以達到最好的狀態，甚至未必能達令人滿意的程度。而追求自由化，除希望儘量擺脫管制，由市場作用決定資源的配置外，進一步也希望消除管制後的市場結構是更理想的自由競爭市場，不過若不可得，是否也應期待更好的市場條件，如管制的調整，調節效果更好的獨佔、寡佔市場。因而在探討自由化問題時，應可嘗試以各種市場結構都存在的調節作用，探討支持自由化的條件。

就調節作用的條件而言，除了市場結構會影響調節作用之外，另一個有關調

節作用更基本的問題，是市場內有沒有進行調節的能力。當然這一問題的重點不在價格降低，供給減少的情況。但若不考慮時間因素，也不考慮資源轉移障礙的情況，當價格上昇需要更多的供給，以反應此一作用的效應時，是否具備提供更多生產的能量，以滿足提高供給的需求，就是一個重要問題。而供給量的增加可以透過釋出更多存貨達成，或者可在原有的生產能量下，以增加生產時間的方式提高產量為之，或運用效率相對較低的閒置生產能量達到；當然也可能在（超越產業內觀點的）原有社會生產能量條件下，自其它產業吸納生產能量以提高產量，滿足提高供給量的要求。因此在本節以「調節作用」為主要分析觀念進行的探討也必須考慮這些支持條件。

以能源產業的觀點，油、電、氣、煤等都屬能源，提供熱值（動力）予社會，因此如果有足夠的相應設備支持，不同能源形式間可有相當替代性或競爭性，因此當某特定形式能源的價格變動，使不同形式的能源相對價格產生變動，其它形式的能源供給量，則應相對產生調整。這也是調節作用的一部份。在此可見探討能源產業調節的作用，仍須將替代性的範圍界定清楚，而此替代性的範圍與設備條件息息相關。前述列出包括存貨、產業內剩餘能量、產業外能量等調節供給量的因素。在探討此能源產業時，自然似乎應該將各種能源形式同時列入，做為能源產業的一部份，但在現實中，能源產業中包括油、電、氣它們之間相關的設備存在相當的差異，因此雖然以需求面的商品特性而言，它們具有相當替代性，但以供給與需求的支撐設備而言，它們間的差異則相當明顯。

因此在探討調節的作用是否應將它們以一類視之，就必須先予以詳細探析。不過以時期長短區分探討，考慮期長則可將能源視為一整類，但若期間雖不長，但各類能源形式都有相當的剩餘或備用能量，那麼也可將它們視為整類。因此探討產業的調節機制，不同的能源形式間具有互相的調節作用，其它產業的調節作用必須看非能源產業的部份。而以存貨而言，電力的儲存一直是大問題，因此電力的調節作用須賴備載容量¹¹⁷。

但調節作用除了由價格引導數量變動的調節作用之外，可期待的調節作用還包括當外在因素產生變動，使供給曲線右移。在相同價格下，廠商願意供給的數量增加，此時若需求曲線不變，調節作用可以引導價格的降低，使社會外在條件的進步，促使生產成本的降低，可以反應在消費者得以更便宜的價格消費此類商品。因此可見影響調節作用的條件甚為廣泛。不過由於此時需求曲線仍維持不變，因此外在條件促使成本的降低，是否必然導至供給曲線的右移，仍必須考慮市場結構是否足以導致此一情況；而在自由競爭市場，成本的降低自然有許多廠商願意在同價情況下，提供更多的產品，以追求利潤的增加，否則會有其它廠商補充

¹¹⁷ 同註 115。



此一可能市場，並使價格因而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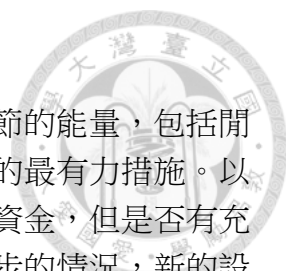
除了供給曲線反應調節的作用外，能源自由化必須面對能源需求的彈性係數低的條件下，市場由國營管制獨佔市場朝自由競爭市場轉變的過程。原來在國營獨佔的調節作用，在價格方面主要考慮的是成本的變動，並依此由政府做價格的管制，因此在政府正常政策考慮下，政府不會將價格提高到可以儘量剝削消費者剩餘的情況。在此情況下特別需考慮的是國營獨佔企業久之可能會導致成本的提高，並迫使提高能源價格。但國營企業是否有效率卻很難估計，因此怎樣的價格才是合理的就難以得知了。故在國營獨佔能源企業條件下，調節作用在需求面由於價格的管制，因此不致被應用於剝削消費者剩餘，在供給面由於國營獨佔條件下，有效率的成本應是多少，也無從得知，因此調節作用的發揮是否能促成競爭效率，也有相當疑問。因此國營獨佔能源市場是否能夠發揮調節作用，以達到市場競爭的效率要求，就常讓人質疑。

但國營能源企業朝自由化轉變，最容易被想像的就是朝完全競爭市場轉變。但正如前述有關需求彈性係數低的情況，如果任由市場機制運作，當價格偏離均衡點，可能在過度調節作用下，無法再回到均衡狀態，因此就會產生持續的供需失衡情況。但如果任由市場機制調節供需，則價格與數量總有偏離均衡點的時候，以求因應變化的環境，因此可說持續失衡狀態的出現是必然的。不過縱使出現持續處於失衡狀態的情況，它的形態也是有差別的，有可能是發散的形態，但也有可能調節幅度不大，可是過程緩慢。如果實際情況是後者，那麼此一調節過程未必容易立即被察覺，並且由於均衡點在那裡，實際上較難知道，因此更難察覺是屬持續失衡的狀態，不過在此情況下調節以促進競爭及效率的作用可能另須察考了。

在此情況下，若實行價格管制，那麼只要供給面條件大致穩定，就不致引起供需調節的大幅變動。但當實行價格管制後，調節作用就無法經由市場的價格與數量互動機制「自動」運作。而必須經由外在機構設定適當價格，而此一適當價格應不低於理論的均衡價格，並應愈趨接近愈好，而若低於均衡價格則會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但若價格高於均衡價格則將供過於求，那麼是否採配額制度或許可制，但若此配額或許可制無法與廠商產品與成本聯結考慮則將喪失競爭的作用，這麼一來基本回到類似國營獨佔的情況了。

三、影響調節作用的因素

市場機制具有供需調節作用，是市場機制與效率重要的一環，但能源是現代社會得以運轉的重要而性質特殊的產業，探討其自由化議題，應從影響調節作用諸因素的深入分析著手，這些因素包括資金、技術、通道、資訊，以及其他產業的關聯等，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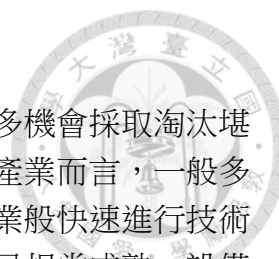
在關於「調節機制」的討論中，可見到調節作用必須有調節的能量，包括閒置設施、其它行業轉移等，而新的投資應是在時間條件許可時的最有力措施。以資金而言，資金愈充裕，調節的能量愈充份，如新的投資需要資金，但是否有充足的閒置設備，與資金的是否充裕也息息相關。在不斷技術進步的情況，新的設備技術不斷更新，舊的設備逐漸被淘汰，但舊設備並非已無法使用，只是使用效率較低，廠商寧願再購置較新的設備。

但此一淘汰過程並非“立即”完成，而是漸進的過程，新設備的數量逐漸增加，舊設備逐漸減少，因此相當一段時間內，舊設備仍同時扮演生產部份產品與新設備共同供應市場所需的角色。以及由於在生產安排上處於較落後的位置，有些舊設備就被置於儲備生產能量的位置，縱使在沒有參與生產時，也仍被妥適保養，以備當供給更形增加既有線上設備無法支撐時，可以投入生產的行列。因此舊設備就扮演了支應市場供給面的調節作用。而淘汰舊設備應用新設備的生產投資決策，除了必須考慮技術層面的發展外，也必須考慮資金數量是否充裕的問題。資金較充裕情況下，廠商更有意願使用新設備取代舊設備，而對淘汰下來的舊設備更有保存做為儲備生產設備的意願。

除了資金的總量，考慮資金條件另需考慮此能源所需資金與社會資金總量的相對量，其他有關能源資金問題還包括能源產業的資金特性，以及此種資金特性與調節作用的關係。就臺灣當前的資金情況置入上述討論，是有關資金問題在此所須思考的內涵。能源產業的資金特性，一般認為技術條件傾向具有規模經濟，因此有效率的投資往往採資金投入規模大的進行方式。當然不同的能源種類電、油、氣的資金需求特性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如電與油在技術上，都有大規模投資的傾向，認為如此才具有效率。電與油資金結構上需大規模的固定資金的建設投資，也須長期合約規範的燃料取得資金，這是相同之處；在不同的特性方面，例如油的勘探投資具風險性，但水電投資風險較少。不過電大部仍需依賴煤與油與氣做為燃料，使得電的投資資金特性也同時具備煤、油、氣的特性。

（二）技術

能源產業的資金特性有相當程度來自目前能源產業的技術特性，例如能源大規模投資比起小規模投資具有明顯的效率，因此出現能源事業偏好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情形。並且因此使能源市場在此條件下，如果處於資金並非十分充裕情形下，調節能力的建立，必須依賴另一個大型投資，或者以較小型但技術上被認為較沒有效率的投資來進行。不過前者似較受限於資金條件，因此可能著重採取後者方法，而如果這種資金及技術傾向愈明顯，則調節作用的建立愈導致整體能源市場的無效率，當需求過剩希望透過增加供給滿足需求則需更大的成本代價。而若此種技術傾向不那麼強則此種技術上的效率落差就未必那麼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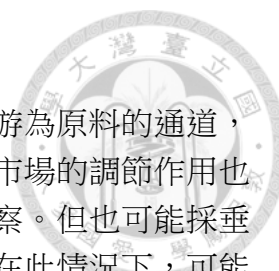
而在資金部分也介紹過如果技術進步速度較快，則會有更多機會採取淘汰堪用舊設備的措施，而舊設備則為儲備產能的來源。以今日能源產業而言，一般多將之歸入傳統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較慢。因此如一般新興產業般快速進行技術更新的汰舊過程的機會較小，不過做為傳統基礎產業，技術也已相當成熟，設備使用期較長。因此如果資金條件充裕則更此種技術條件有益於調整作用的發揮。

再以更細的情況探討技術與調節的關係，電力在技術上儲存仍有相當的困難，這一點以商品供需的角度而言較不利調節作用的發揮，因此使電力的調節作用更依賴備載容量的作用。而備載容量解決調節的問題，則因可以動用的調節數量，受限於設備容量因此成本甚高；亦即固定投資可能需數十年的折舊過程，也就是說每容量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他的折舊應由數十年分攤，但若因為電力無法儲存的緣故，以此容量單位專做為調節之用，則表示此一容量單位只由極短生產調節之用的時段分攤。且若需求的增加未必是一較長期的趨勢，那麼它的成本將極為可觀。因此在這個情況下，由於調整成本的提高將使調節的作用，變得更困難。

（三）輸送（或運輸）通道

由於產業發展的專業化，商品的產地與市場之間往往並非同一地，因此產地與市場的聯繫就依賴輸送通道的連結，一般產品的運輸陸地上多依賴鐵公路的運輸，鐵公路的運輸可由許多其他商品分擔成本，因而最終則由公共投資以基礎建設的方式進行。但能源運輸至少在陸地上，與其他商品共享通道由鐵公路運輸的作法並非聰明的作法，甚至電力運輸根本無法由鐵公路運輸達成，必須經由電力專用的電網傳輸，而天然氣、油及其產品的運輸雖然也可經由鐵公路，但大規模運輸成本更低廉的作法是經由管道的運輸。因此能源產業、企業的经营，輸送通道的建設管理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亦即能源市場的運作有賴輸送通道的建設與管理，因此市場調節機制是否能夠發揮也必須依賴輸送通道的存在與效率，尤其電力商品特性不易儲存更需依賴輸送通道的連結才有可能進行市場交易，以及調節的作用。如果電力公司網路愈廣那麼電力市場調節的能力愈強，這是電力市場的規模經濟中極重要的一部份。在此存在一些有關輸送通道的設想，例如輸送通道應選擇何種歸屬方式？由能源企業擁有或由政府擁有？誰經營？分割或統一？通路專業企業擁有或能源企業兼有？一套通路系統或兩套通路系統？當然如果有兩套以上通路，那麼兩套以上的通路可形成競爭關係，自然最理想。但通路投資所需的金額數目不小，在能源投資中佔有相當的比重，因此建設兩套以上通路的作法未必是最經濟的作法。不過當資金極為充裕的情況下，此種作法未嘗不可考慮。不過以管制下的專業或政府經營的模式應也可以發揮作用。



就一般商品的輸送通道而言，可分上中下游水平分割，上游為原料的通道，中游為躉售的通道，下游為零售的通道，若以此種方式分割，市場的調節作用也可分割成三種市場以觀察，調節所賴的通道也可分成這三種觀察。但也可能採垂直分割，將產業在垂直整合條件下，形成數個集團進行競爭，在此情況下，可能不同集團間有不同的硬體（建設）通道，但也可能硬體通道是相同的。在此情況下調節作用的觀察主要在上游與下游，而中游的作用已被內化在集團的經營問題了。在能源市場同樣可以如此看待，不過基於能源市場的特性，仍有一些差異存在，例如電力的無法儲存，在通道的管理上就造成相當影響。

由於目前臺灣能源企業都屬大規模獨佔經營，因此經營領域較廣，加以能源輸送通道與其他行業的通道分隔，因此中游躉售通道在能源產業，多以集中的方式存在，而此集中的躉售通道，與能源企業的大規模經濟有相當的關連，經由此一通道將廣泛市場的需求，集中在一部份產地大規模生產，並且以此通道將產地與市場連結，而此一通道的建設需要相當的資金投入。因此此一躉售的通道並且也是個極重要的經營組成成分，他的重要一方面來自於需要大量成本的投入，此資金投入佔能源產業投資相當比例，另一方面此一投資也產生大量的大規模經濟效益，這大規模經濟效益與調節作用都有關；在生產方面與調節作用的關係較不直接，但調節作用需要依賴產能以得到調節，但大規模生產的固定思考模式，卻不利調節作用；不過直接經由此一管道所獲得調節作用的經濟效益卻是此一大規模經濟效益的主要來源成分。

但此種集中式的通道自然也衍生出複雜的管理問題。尤其在市場情況複雜，訊息萬變，市場需不斷進行供需間的調節情況下，如何管理通道因應需求，就影響市場行為。在獨佔情況，通道是整個企業系統的一部份，如何分割並不重要，自由化後通道與市場相連，市場的型態與運作必須依賴通道的支持，並受其影響。如果通道掌握在政府手中或掌握在一個私人部門中，市場的型態可能就因此受影響成為管制市場或獨佔市場，但也可能在一個良好的機制運作下，通道提供了自由競爭的環境。或者通道掌握在幾個公私部門中，那麼如何運作又是另一問題。而零售通道與躉售通道不同，零售通道一般管道較細，分枝複雜，獨立單位的投資較小，因此調整的靈活性更高。

在考慮臺灣能源自由化問題時，主要考慮的自然國內市場的通路，但臺灣能源來源並非自有，以油與電來說，油與電的主要原料，都是依賴進口，在過去傳統管制條件下，國內市場的輸送通道仍掌握在兩家國營企業手上，並且在大規模傳輸條件支撐下擴及國際的通道，但若自由化後國內市場由國際分享，那麼國內及國際市場的輸送通道將如何演變則有待觀察，但由於臺灣為一孤懸海疆的島嶼，因此電力的輸送通道是一獨立的體系，不易由外國介入。但油品市場開放國

際經營那麼國內與國際通道有可能都受到國際強有力的石油企業介入。



(四) 資訊與資訊系統

市場的調節必須依賴資訊的傳遞，以臺灣的能源市場而言，主要能源種類是油與電，油產品可以儲存，因此在零售領域的市場資訊問題與一般商品的時效性類似，價格常需反映國際能源價格，因此資訊的傳遞主要在國際資訊，並以其做為進行調節的參考。不過國際能源市場的資訊臺灣與國際大能源企業比較仍屬弱勢，這就影響了臺灣能源企業在掌控長期調節作用的能力。但電力由於無法儲存因此在網路架構上的交易必須有及時的資訊支持，才能進行調節的作用，因此此一交易體系的架構，是一個挑戰，除了制度的建立外，需要資訊系統建設的支持。不過雖然如此，市場進行調節作用所需的市場資訊，主要仍以成本、價格、數量、品質為主。在品質方面，如果品質產生不穩定的現象，整個系統可能都受到影響，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市場的調節最終也無法正常運作，因此在此及時的市場交易體系裡，品質的要求比較受到重視。而在成本方面，由於電力投資是長期投資，在此及時調節的系統裡，是否具有反映成本競爭效率的能力，就是一值得思考的問題。

(五) 不同產業的調節

在市場交易中當需求變動時，特定產業的調節未必只經由產業自身的調節，而且可能經由與其他產業間資源的相互轉移，以變動產量因應需求的變動。當特定產業需求增加，產量的增加可能來自於其他產業轉移生產投入的增加。但當需求減少時，特定產業也將自身資源轉移到其他產業，以減少特定產業的供給量。在此能源產業市場依賴其他產業調節作用的技術條件如何，則有待進一步討論。此一調節作用必須經由資金、設備、人力、管理、技術等因素轉移，當然在人力、資金、管理方面可能有較多的替代性，但設備與技術方面牽涉較多的專業因素，是否能夠替用是一問題。

參、各種調節模式

調節作用是資源配置必要的條件，不論在何種市場結構與政府管制的條件，都必須依賴調節作用使資源配置能夠與不斷變動的環境相配合。因此在探討自由化問題時，檢視比較各種自由化可能狀態相對應的調節作用模式是必要的。以一般經濟學的傳統觀念而言，當然希望能源產業可以在完全競爭的調節作用模式下運作，但完全競爭的模式終究是理論模式，必須與能源產業的特性相結合才有可能。因而應期待何種能源產業的模式就必須加以評估，最後可能是獨佔產業模式或者某種其他模式脫穎而出也不一定。在此探討此一問題，可以假設任一種模式都是政策上的可能，所持的判準為獲得各種模式的成本與效益如何。

而若以調節作用看效益，完全競爭所描述的效益自然最好，但在能源產業的

條件下，特別在臺灣能源條件下，需要支付怎樣的成本才能建立及維持此種模式的運作，則是問題關鍵所在。亦即臺灣能源產業的自由化，所追求的是此一自由化政策可以帶來制度上最大效益，但所需支付的建立及維持制度的成本最小。並且根據以上的假設，有關自由化政策，應為極具調整彈性及靈活性的政策，今天在政策取向已發現自由化的必要因此推動自由化，本節即在此政策認知下，探討如何推動此一自由化政策的理論問題，並從影響各種自由化的可能條件與因素，探討自由化模式的選擇。因此經由此一探討，事實上可提供另一層面的思考空間，包括在何種狀態下將進行管制，或者甚至進行再國營化的必要，且由於前述有關靈活調整的可能性，當有此需要時，再國營化也是可能的政策。

以完全競爭模式來看，如果能夠實現此一模式，那麼產業應具有迅速調整的能力，完全根據供需差額的條件進行調整。最後均衡產量與價格將會處於價格等於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的水準，且當環境變動時此一均衡狀態將會即時調整。在具有此種調節作用的市場模式裡，在資源配置上有許多方面的優點，例如廠商無法不透過產量與價格甚至品質的改進，只經由掌控上述條件來牟取自身的利益。但臺灣能源產業要迅速調整到達均衡點，必須有一些相關條件的支持，而這些條件的創造與維持需支付成本。

如前述市場與調節作用的理論探討所述，包括結合產業技術特色的資金擁有運用條件，以及運輸通道、資訊條件等，都會影響臺灣能源產業調節作用的發揮。就分散決策而言，可從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角度來看，當然不論以那種角度，本文探討的首要在國內消費市場。由於能源產業技術具有大規模經濟的特性，而大規模經濟一方面來自生產設備的大規模，一方面來自不同企業間因應市場需求的互通有無的大規模。而後者與運輸通道就有密切關係。

且臺灣電力能源產業具有孤立性，因此如果為求達到完全競爭、分散決策、迅速調整的效益，勢須放棄大規模經濟效益。但在石油產業，由於國際市場相互連結的特性，情況就不同了，甚至可說是否能夠形成完全競爭市場，決定因素在於國際上是否具備此種條件，以國際市場與臺灣市場比較，兩者大規模經濟的數量標準恐怕仍存在相當差距，因此如果為求國內市場的分散條件，將再分割能源廠商的經濟規模成眾多廠商，那麼以國際市場的觀點來看每個廠商的規模就顯得更小了。

不過如果技術等其他條件的發展，朝向不具技術的大規模經濟條件，那麼為求達到分散決策權的條件，就不必支付大規模經濟的成本了。且事實上，此一條件的產生未必一定源自能源產業內部發展條件的需求，也可能源自其他產業或社會普遍條件，如資金充裕條件下，一般產業或某種新產業的發展提高了對自備能源可以形成安全供給的想法，可能大幅度導致社會對能源產業大規模經濟需求的



降低。當然更直接影響的發展是能源技術的發展朝向沒必要集中大規模發展的模式。但若為求完全競爭的調節模式，而刻意急切發展適合決策分散化的技術條件所需支付的成本恐怕大得驚人。不過也不能忽略因為制度面思考對技術條件的影響。

再就運輸通道來看，集中式的運輸通道扮演大規模經濟的非常重要角色，而在分散式決策的條件，相應的運輸通道可能就是分散式的通道，或者必須思考如何將集中式的通道建立管理模式，以利運作。目前臺灣電力與中油公司已有運輸通道，而且通道的建設佔有不小投資比例，而為求電力與石油朝向完全競爭模式的發展，應如何探討通道的問題，實在很傷腦筋。尤其前面已談到生產部分仍處於存在大規模經濟條件，通道方面也仍是集中式的通道，尤其電力更明顯，電力將生產與零售都透過線路建設連結，不像石油仍可依賴公路運輸零售端的商品。而通道的討論不應與生產部分完全分開，在前述的大規模經濟條件下，不易形成市場的非常多元競爭，因此完全競爭似仍不可能實現。

不過有競爭的寡佔或者不完全競爭是另外值得探討的問題，在這個目標下要探討的是如何透過運輸通道的相應建設管理，以便建成更有競爭與調節作用的模式。例如是否將中游通道仍保持在國營，或者由某個通道專業公司經營，而將上游的生產企業與下游的零售部門完全開放自由化。事實上，符合理論的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世界，未必容易實現，尤其若侷限在臺灣有限市場區域，以及對一些有特殊商品特性的市場，如糧食、能源、具有非常明顯大規模經濟的商品等。因此如果能夠建設運作良好的能源產業不完全競爭市場恐怕也是不錯的選擇了。而若自由化將朝此類市場發展，那麼通道問題如何發展以下試探討，當然可能的方式仍包括公營、專業經營、兩條以上通道等方式。而由前所述通道的問題有可能是影響重大的問題，硬體建設的選擇與管理方式的選擇應能互相搭配，否則為求制度的建立恐怕需支付相當的成本，但如果有具備公平性與效率的管理，一套硬體設備就已足夠了。

而再回顧完全競爭的討論，前面也已提到在能源商品具有低彈性係數條件下，不容易獲得穩定的市場。不過由於規模經濟的因素，現實上恐怕不容易做到能源廠商的自由進出，因此需求彈性係數低的完全競爭條件下，供給條件未必容易實現迅速調節，在這種情況下，或者受到低彈性係數影響導致供給調節過劇的情況，反而不會發生。當然另一個極端，與大規模經濟常相對應的獨佔情況，也是存在很大的缺失，主要的問題，尤其在資金不足與技術條件不適規模較小能源廠商生存情況下，獨佔廠商只根據自身利益調整產銷策略，甚至極度剝削消費者剩餘，使能源供給遠低於邊際效益與需求曲線決定的最適水準，此種情況由於能源在經濟與民生問題扮演的重要角色，將損失巨大的經濟發展與福利。

因此當以此種制度實現時，政府以價格的管制，干預能源產業的調節作用，幾乎是必然的，政府管制常將價格訂在超過平均成本一定比率上。此一價格根據成本變動，與需求量變動關係不直接，需求量的變動透過供給量的變動，可以看到獨佔廠商因應此一產量變動的成本變動，而此一成本的變動則必然受到資金與技術條件的影響。那麼到底多少資金是最適的資金量，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條件下，決定方式不同，不過恐怕都有困難，原因之一在於在受到保障的獨佔廠商裡，效率問題甚難得到公正的評估。因此使得獨佔情況下的調節作用缺乏公信力脫離不了爭執。

肆、政策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見臺灣能源產業的自由化，完全競爭與獨佔的模式恐怕都難以平順運作，政策的選擇應在兩者之間的型態，不過任何型態都必須有包括資金技術運輸通道等因素的搭配，而且這些因素的搭配未必有固定的答案，例如運輸通道到底應有多少，運輸通道的建設除取決於資金多寡的問題外，另一方面也取決於通道的管理方式與能力。一般說來通道的投資數額不小，就社會整體資金的配置而言，如果能夠不必重複投資自然最好，但此一條件被接受的前提，是必須搭配一個具有公平而且效率良好的通道管理，事實上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通道在自由化政策中的內涵，扮演將產地與市場連結的作用。最理想的情況是通道使兩者間的距離消除了，但由於通道的建設成本未必便宜，並且管理具有相當的技術要求，因此通道距離的消除事實上不可能，上面永遠存在成本因素，不只如此還有可能產生市場管理上的公平問題。事實上由於通道的建設可以發揮系統的規模經濟效益，並且需動用大量的資金，及運用管理、工程技術，因此他對能源消費有極大貢獻，應該獲得他應得的報酬。甚至他可以經由通道的掌握，掌握市場的供需調節，一方面面對低價格彈性的需求曲線，一方面面對大規模經濟低成本的供給，只轉手即可獲得暴利。

由於運輸通道在供需之間佔有這麼重要的作用，因此是自由化問題的焦點議題之一。在電力方面，目前台電已有完整的包括發輸配的通道，而且有關自由化的議題有許多也圍繞著這個議題討論，目前由台電經營的網路在台電整體獨佔經營下調度管理，一般而言沒有顯露明顯的調度調節困難，但如果自由化後，是否更多元化的發展導致系統複雜化，進而影響調度調節的困難，尤其在事關利益分配情況下，是否能夠滿足公平的要求也是必須注意的。而目前自由化問題的討論，大致上包括有分割發輸配，或分割區域、不分割發輸配，也就是所謂的綜合電業的方式的思考。

但是問題重點是這些措施，是否能夠提供更好的競爭與調節作用。其實有時候如果通路無法取得公平性的公信力，那麼經由某種程度的重複投資，例如在配

電方面的重複投資，使同一區域有兩家以上的配電公司，經由他們自己較信任的配電系統配電，未嘗不是不可嘗試的方向。不過如果能夠管理好，包括資訊系統等，能夠做好並且保持競爭上的公平性，那麼自然毋須兩套以上的系統。但所謂競爭、調節的產生，應該在同一區域有兩個以上的電力供應來源，在價格提高時有能力並願意提供超出目前需求量的電力才能發揮競爭的作用。而自由化的目的應追求這種情況的實現。

但事實上要達到這個基本的要求未必容易，例如前述發輸配分割與區域分割的綜合電業，未必保證一定做到這點，分別就發輸配可能阻礙此一狀態實現的因素來看，在發電端可能仍掌握在為數不多的大規模電廠手中，其他供應廠商不容易進入。在運輸通道同樣由一家獨佔，以市場經濟廠商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在零售部分面對價格彈性係數小的需求曲線。因此當完全自由化，一切由市場決定時，廠商為求極大利潤可能採取的策略是搶佔通道，大幅提高零售價格，並儘可能壓低大規模生產的成本，賺取交易利益。但如果通道廠商的角色只是代輸的功能，只能賺取比較固定的運輸費、調度費那麼情況就不致如此。市場的功能才有可能發揮。

不過由於在發電端與零售端仍存在那些特性，因此市場是否穩定仍有待探討，如果由一些散佈各地的大規模電廠，透過網路調度調節各地的電力供需，那麼競爭與調節作用只能透過這些大規模電廠產生，如果供大於求的情況越顯著，雖然供給間的競爭愈顯著，對消費者愈有利，不過由於廠商都是大規模的，那麼如何使廠商能夠在這種競爭過程保持生存與競爭，卻不會因競爭過程的倒閉，而導致供給不足，亦即要維持競爭中的最佳均衡狀態未必容易，產生失衡狀態的機率較大。而若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態產生，在零售端的低價格需求彈性係數就可能導致價格飛漲。因此發電與零售兩端的特性，對市場可能的傷害絲毫不能輕忽。

能源產業自由化的目的，在求產生更多能夠提供低廉且供應充裕的能源廠商加入市場，透過競爭與調節作用，使市場維持價格低廉供應充裕的穩定狀態，但由於能源商品的需求、生產特性與外在條件的限制，要達到這個目的，自由化政策的挑戰非常大。不過如果國內的其他產業部門普遍規模不太小，能源相關設備的價格相對低廉，資金充裕，資金成本低廉，並且普遍能夠認知能源安全穩定供給的基本關鍵性，那麼國內將有可能透過儲備容量、燃料、氣電共生、新能源等，提供大量的能源調節能力，因而有可能產生極具競爭性的能源供應市場。

而專就石油來講，國外廠商的進入一方面可能提供廣泛的供給市場的競爭與調節作用，但同樣的石油也具有大規模經濟等特性，因此有關傾銷的法令應予完備。如果能做到這點那麼可以解決自由化的許多困難。而在零售端，如果供給充裕且競爭性存在，那麼問題較小，否則如何面對甚至是自由化成敗的關鍵。在供

給面競爭性無法解決前零售價格因置於管制之下，但管制的方式很多可選擇較適當的作法。否則若導致自由化的失敗甚至不如不推動自由化。

由此可見政府角色，在過程中應避免上游的外國傾銷，並鼓勵、創造有利於儲備競爭的環境，在通道上要確保通道的有效與公平提供供需交易競爭的環境，在整體制度的運作與零售價格方面應密切注意，在儘量尊重市場機能前提下，不排除採取價格管制的手段，當然採取的管制措施應選擇適當的作法。而甚至不能排除管制與國營再度大幅介入的可能性。

各種不同的市場型態都須以調節功能為必要條件，但不同市場型態，調節作用發揮的方式不同，可以認為他們間的差別是程度的，而不是有無的。就商品特性言，能源產業目前的特性，有一些極不利市場功能發揮之處，但也未必絕無法克服。本文以影響市場調節作用的因素，從理論上探討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的問題，將相關的問題做系統化的剖析，而獲得一些結果。希望此一略具系統關連的分析架構，也能提供後續持續討論的參考。

第二節 因應京都議定書之臺灣能源產業轉型¹¹⁸

溫室效應是今日全球關注的議題，不只能源產業，包括石化、鋼鐵、等產業也受到波及。事實上如果廣泛追溯它的影響，可以發現此一事件，將深刻影響人類的生活，甚至生存的問題。不過不可否認能源產業，仍是今日討論此一議題的關鍵。但由於探討此一議題政策可能性時，仍存在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相當程度的知識不完整問題，因此如何釐清問題，思考對策實為必要的工作。尤其臺灣在此一全球議題的定位，確實也具有相當的複雜性。而一般經濟、產業與能源產業在目前的發展，也已面臨新的階段。因此除了消極認為溫室效應問題，是艱鉅而困難的挑戰，無奈的因應之外，掌握新趨勢發展的契機，正確分析可能的應變空間，可能是更合理的態度。

本節首先就一些相關的基本認知加以釐清。包括目前面對溫室議題時，過去

¹¹⁸已發表於《能源季刊》；陳良潮（1998）。〈因應京都議定書的臺灣能源產業政策探討〉，《能源季刊》，28卷，3期，頁32-46。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習以為常的「能源低彈性係數」假設，是否合理，並且是否掩蓋了部分解決問題的空間；以及溫室效應嚴重性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目前仍須探明嚴重「程度」如何，以及此一程度問題在政策考慮上的意義。然後界定能源產業與性質，在此性質的界定下，提供根據溫室效應議題嚴重程度，可以獲得的政策思考空間。之後，則探討在當前臺灣經濟、產業新情勢下，能源產業面臨新的轉捩點，應如何在因應溫室效應的挑戰、衝擊下，以能源產業政策輔導、發展能源產業；其中也特別考慮資訊不確定下的決策，以及相關科技政策的配合問題。

壹、基本認知

一、溫室效應中的能源問題

能源問題是解決人為溫室氣體排放議題中極關重要的問題，因此反過來說，溫室效應議題將對能源產業造成極大衝擊。能源問題與溫室問題的關連，來自於二氧化碳的排放，是當前造成溫室效應的主要因素；而二氧化碳的產生，源於石化燃料的燃燒，因此能源是構成溫室效應最需要注意的元凶。而除了能源是溫室氣體主要的產生因素這個理由外，由於能源與經濟、社會關係的密切，以及現代經濟、社會對化石能源依賴之重，也使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工作變得益形困難。因此也造成能源問題，變成解決溫室效應問題時更須重視的因素。

二、能源與經濟發展

在希望解決能源的溫室氣體排放中，應瞭解能源與現代經濟的關係，才能瞭解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複雜與困難程度。事實上能源與現代經濟發展的關係，可用「密不可分」四字形容，經濟活動中包括生產、運輸、消費等幾乎所有經濟過程，都必須有能源的投入。而今日能源的投入，雖然有許多過程是以電力投入，但基本上初級能源是以化石燃料為主，其中低碳的天然氣在目前仍屬小部分。因此有關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問題，所影響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問題，而且也是能源問題，更是經濟與社會各個層面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三、能源低價格彈性是一迷思嗎？

由於能源與經濟的關係密不可分，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減量問題，對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使得大家覺得這個問題既複雜又困難。但另一個對能源習以為常的認知，在不自覺中發生影響，也是造成大家對這個問題頭痛的原因。長久以來，能源在經濟中的角色，與糧食相同，總被視為基本需求。因此政策上，一方面認為它的價格應予管制，否則一旦成為市場上的壟斷商品，則可能被利用於奪取暴利，控制社會的利器，並且造成國計民生重大傷害。而另一方面，則認為必須在盡可能低廉的價格下，滿足對能源的所有需求。但在經濟持續發展的情況下，今日能源的需求，在能源（技術）效率沒有大幅變動情況下，已經並且仍將大幅成長，那麼它在經濟與社會中的角色，是否仍然都屬於基本需求？而有著低彈性係



數，可能就必須進一步探討了。

當然不論能源需求的規模如何擴大，其中必然仍存在部分的比例，屬基本需求所需。並且雖然這一部份的比例可能縮小（也可能未必），但它的絕對量恐怕仍是擴大的。不過除了基本需求的變動情況外，屬於非基本需求部分的能源需求，也可能已經大幅增長；除了總量上的增長外，甚至對某些社會言，它的比重可能也已超過基本需求部分了。那麼是不是表示能源大量需求中，有相當數量的部分需求，已不再維持低彈性係數的特性，而具有價格需求彈性係數高的特性。且由於在考慮溫室問題時，大家思考的最重要焦點，就是在於如何限制化石能源使用量的緊縮，而價格政策可能是個很重要的政策工具，因此能源的價格彈性是否很低就成為重要問題了。

四、問題的嚴重性（什麼時候？多大數量？）

今天全球經濟仍在持續快速發展，並且仍缺乏可以大量取代化石燃料的低廉能源。但要透過限制化石能源的限制，達到控制溫室氣體的目的並不容易；而發展可替代的能源，則仍須相當的時間與資源推動。並且人為排放導致溫室效應的科學資訊，目前仍不絕對完全確立。因此在今日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複雜政經條件下，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如何認定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就變得重要了。而此一嚴重性程度問題，包括數量多少？什麼時候？等問題的考量。而這個數量多少？什麼時候？的問題，將會影響有關二氧化碳應縮減多少？如何達到此一目標？的政策選擇問題。

因此也就牽涉了應向什麼行業、領域？在什麼時候？達到限制多少既有能源使用？甚至多少特定領域、行業發展限制的政策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情況不嚴重的話，那麼為什麼要因為溫室氣體排放的理由，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可以等到沒有環境問題的新能源產生，再自然以它取代化石能源的使用。但如果問題很嚴重的話，那麼如前面所探討的，許多非基本需求的能源使用，都應予限制使用，否則溫室效應甚至將威脅人類的生存。因而可見這個「嚴重程度」的問題在實質政策思考下，實是一具關鍵重要性的問題，因此它的判定問題就更形重要了，但事實上此一問題卻是個仍具相當不確定性的問題。

貳、能源產業的界定與性質

一、能源產業的界定

有關能源產業的界定，由於不同能源種類的產銷過程結構不同，因此在討論能源整體的產業範圍界定時，必須顧及它們間的差異；例如包括系統通路等問題對不同的能源種類，就有不同的重要性。以化石能源的生產來說，大規模的燃料與設備是重要的，而電力的設備，目前也依賴大規模設備的效率。此外大部分電力也要依賴化石燃料的投入。而當電力是以大規模容量發電時，輸配電系統的角色

色，也變得重要了。其實能源輸送通路，是傳統大規模生產的能源產業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石油與天然亦然。此外化石能源也必須進行勘探過程，須投入這類設備才可能取得。而再生能源目前看來主要在設備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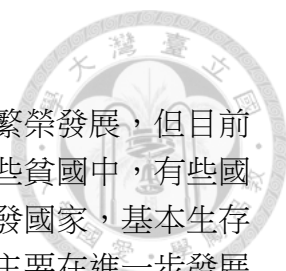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能源設備，包括能源的生產、輸送、儲存與使用的設備，不同能源種類的經營投資重點不同，但投資經營中，燃料取得、設備、通路等項目，一般是共同都需要的項目。但三者的投資經營構成比重往往是不同的，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的言，天然氣發展是重要的選擇，但由於天然氣的發展較晚，投資的重點在須新建勘探設施、一般設備、通路、港口、儲槽。因此取代既有的石油與煤炭的使用時，須重新進行這些項目的投資，導致成本的上升。新的再生能源燃料方面問題比較單純，而新能源大部分目前仍存在技術上的問題，當前發展的關鍵主要在設備。因此就能源產業經營投資的範圍界定，結合有關溫室氣體因素的考慮，包括天然氣的探勘、通路、儲存技術與設備等，以及新發展的再生能源的設備與經營，都是應重視的項目領域。

二、能源產業的性質

就能源產業的性質來看，現代社會能源實在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過去甚至將其視為國家基礎建設。今日似乎有將其視為一般商品的走向，未來社會將會如何看待能源，則是饒負趣味的事情。但以今日來說，能源在社會的角色，除了屬於與社會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基礎建設角色外，有些能源的消費只在滿足一般消費，與一般商品無異。當然也有部分做為資本財消耗，因此可見能源的特性，其實相當歧異，未必適於一視同仁。因此有關能源的消費彈性係數如何？是否仍界定在很小，須重新檢驗。而在供給面的特性，具有包括大規模經濟、投資金額大、成本低、系統化、上下游通路關連、以化石能源為主流、替代能源仍未實現等特性。

參、溫室效應的全球能源問題

能源問題牽涉的不只是能源產業本身，而且與整體經濟，以及國家社會各領域的建設息息相關。近年來，社會一般的與能源的開發、應用科技水準，產生巨大進步、變遷；此類變遷，同時引起能源供給與需求層面的變革。在供給層面，全球少數地區化石燃料的廣大開發能力，已足以支應目前經濟與人口規模大量擴張所需，這是在效益面；亦即供給化石材料的效益，除了在能源領域的影響外，也促進了同樣源於石油、天然氣的石化工業發展，影響了材料、紡織、肥料、製藥等領域的發展。並且由於這些工業領域大規模生產的進展，推動了經濟的大規模繁榮發展，滿足了大量基本生存的需求。但另外，在成本面，除了資金與人力的投入外，環境威脅與破壞是目前所需面對的另一極重大問題。但前述化石材料供給的效益，卻是沒有將使用化石能源的環境成本列入的情況，今日已發現若將環境成本列入，甚至可說將產生很大的問題。



雖說化石材料的大規模開發、供給，提供全球經濟相當的繁榮發展，但目前全球發展仍存在相當差異，同時包括南北的貧國與富國。在一些貧國中，有些國家人民連吃飯等基本生存條件的滿足，都有問題。但一些已開發國家，基本生存的消費則已不是經濟活動的重點，這些已開發國家所追求的，主要在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其中包括如何過得更舒適、更便利，但其中可能也會有許多浪費。當然就效率角度來看，已開發國的浪費未必高過發展中物質較缺乏的國家。因此就全球經濟發展言，生存需求的滿足仍有問題。所以不論就已開發國的實力及期待，或就許多開發中國家滿足基本需求的需要言，未來全球經濟社會預計將進一步發展，甚至可能產生能源供應不足的情況。尤其再加上全球持續擴大化石能源使用所需支付的環境成本，化石能源的供給是存在相當的挑戰的。

這個情況也點出了全球化石能源在需求面的一些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需求也將變得日益複雜多元化。過去能源供給的建設，被視為基礎建設，關係國計民生。但所謂國計民生，在目前當然其中仍包含相當比重的生存與投資生產所需，但也已有相當比例的需求，其實已是屬於與其它商品無異的消費所需了。因此過去將能源需求，一律視為國計民生的必要物質，採取供給保證、價格保障的政策，在目前由於其中包括相當部分的一般消費需求，並且可能受到嚴重溫室效應威脅的情況下，恐怕就不妥了。

亦即在考慮受到溫室效應影響的情況下，今日化石能源的使用，如果再繼續採取過去的能源政策，保障低價供應，使得其中相當部分的低廉化石能源供給，只被用於滿足一般消費需求，而這類的化石能源的消費，卻造成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最後這些數量龐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嚴重的溫室效應，進而威脅全球人類的生存，則此政策顯而易見的是大有問題了。換句話說，過去習以為常的能源市場，總假設能源需求市場是同質的。而不論此類需求是用於維繫社會的基本生存條件，或用於社會發展，以及甚至僅供一般消費者效用的消費，一視同仁的將能源市場當作是用於滿足基本需求的低需求彈性商品市場。那麼在今日溫室氣體排放，可能已嚴重影響全人類生存的情況下，這種對能源市場的認定方式，將產生很大的不適應問題。

肆、可能政策空間 — 價格、效率與定價

如前述目前全球經濟地區發展程度的結構歧異很大，其中已開發國家大部分能源需求，可能已不只是用於維繫生存，而大部分用於發展以及一般商品的消費。但仍有佔人口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將能源用於維繫基本生存所需。並且全球經濟規模仍在持續擴張中。因此在因應溫室效應情況下，如何歧視不同需求的能源市場，對於能源的二氧化碳減量，應可提供相當的政策思考空間。而此一政策的實施，在觀念上也將可釐清能源投入產業中的產業結構調整問題，而且將能源配

比依此條件列入，越與生存發展有關的部門，越值得投入便宜而骯髒的能源。但用於一般消費的能源，就應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越低，但可能更昂貴的能源。

在這種認知下，可將能源使用的性質分離，採取不同的政策對待，以取得因應溫室氣體的政策空間；例如由於有不少能源投入的最終產品用於一般消費財，並且此類消費財，與生存及社會發展沒有密切關係。那麼政策上，如果需要將社會成本灌入這類能源消費的成本中，自然不必特別加以猶疑，因此如何建立差別價格，應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而當差別價格建立後，它也將促進能源使用，在不同的性質領域的不同效率要求。在一般消費的領域，由於價格較高，反而可能發展出更有效率的能源使用技術。但在投入基本生存所需的能源，由於價格受到控制，因此可能缺乏推進能源效率的機制，因此應有政府相對應的政策機制，推動能源效率在此類性質產品的提升工作。而除了能源效率提昇作用外，差別價格的作用，也應體現在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促使與生存無關一般消費用的能源使用，朝向使用縱使效率未必較高，但較清潔、較昂貴的能源。而新能源也可以考慮應用於不同性質能源的情況，採取不同的鼓勵措施。以及根據不同性質的能源使用，考慮相應的不同能源運作機制。在一般消費使用的能源，可以更將它視為與一般商品無益的市場，採更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並且將希望達到的政策目的，透過一般商品的自由市場中的政策手段，如租稅、財政、價格等正負誘因措施，達到導引、鼓勵、壓抑等目的。

例如化石能源中，天然氣對溫室效應的政策因應最有利，但由於使用規模的關係，目前天然氣使用的成本與價格仍遠高於石油與煤炭。而天然氣的成本結構，包括市場供需因素，資源因素，設備因素，規模因素等。其中規模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如能擴大規模，包括資源、設備等因素都更能規劃解決。而規模因素與市場價格及需求關係密切。因此如果能將能源使用的市場妥善分類，充分運用一般消費市場，包括火電廠應用、運輸應用，以及一般消費品工業的燃氣替代重油等，開拓天然氣使用的市場，則可能進一步擴大天然氣規模，降低成本。因此在此一策略下，不論最後是否導致因天然氣使用規模的擴大，而使天然氣的成本與價格降低，都可以找到擴大天然氣使用的空間。

而新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等的使用，目前由於技術上成本仍難以壓低，因此也可以應用此一市場歧視的原理，要求一些高消費、高利潤的行業，使用較高電費的太陽能、風能發電，否則不給予營業許可。事實上產品研發的商品化過程，往往需要在萌芽階段，有一段高單價、高利潤的時期。但太陽能與風能發電所提供的商品特性，在今日電力與能源市場機能中，並不具市場高價誘因，因此無法導引此一商品的研發，進入產品研發商品化的過程，從高價格、高利潤的階段過

程中，吸取進一步研發所需的資金。因此透過政策的導引，引導進入高消費市場，將對太陽能等新能源產品的發展有利，並可直接減排二氧化碳。

不過由於天然氣與新能源如太陽能與風能的發展，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天然氣是在希望獲得大規模推廣使用的條件下發展，而新能源的太陽能、風能仍處於降低成本商品化研發的階段。因此相對於能源市場的性質分類，天然氣可以選擇更廣的領域，以政策推動，而太陽能等新能源的領域則仍較狹窄。不過此類較乾淨、價格較高的能源，在政策推動過程中，並不一定僅限於需求彈性較高的領域，有些公共建設領域，也可以提供這些能源供應市場。例如路燈就有人的意見認為可以做為鼓勵太陽能領域之用。

而另一個值得思考的空間在因應溫室氣體排放的產業結構問題，在前述不同能源市場性質的考慮下，傳統的行業分類思考溫室能源的產業政策，就存在分類不清的問題，例如石化、鋼鐵行業的生產，不能光從表面判定屬基本需求或高消費商品需求，因此針對粗糙行業分類的產業結構思考，面對不確定嚴重程度的溫室效應衝擊，存在無法分辨問題的窘境。

伍、溫室問題下我國能源產業發展走向

一、推動自由化的臺灣能源產業

現代全球能源的消費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很大，而全球化石能源的分佈並不均衡，集中在少部分地區，例如石油集中在中東。因此全球許多國家的能源需求，必須依賴國外進口。而支持國際能源產業的能源企業，主要掌握在少數有能源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進步，資金、技術實力雄厚的國家手上。過去臺灣能源產業，由於缺乏自有能源，能源依賴進口，並且社會經濟發展處身於開發中國家階段，資金、技術極端缺乏，因此基本能源體系由國家獨佔，從國外進口初級能源採取管制經營。但近年隨著國際經濟發展，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企業，資金、技術能力有所增長，這種資金與技術發展的情況，使得有更多的國家具有海外探勘，投資石油開發的能力，此一趨勢將如何影響能源市場結構，是一值得思考之處。

而此同時臺灣經濟也獲得長足的發展，由一般開發中國家脫穎而出，歸入國際慣稱的新興工業國。而在能源產業方面，則推動能源產業的自由化工作，開放民間企業參與能源產業的投資經營。因此在今日與未來，我國能源產業隨著市場的自由化進程，社會將有更多資金與企業資源，有機會投入能源產業的經營。因此面對此一發展，應在「國際」眼光下，充分估計可能投入能源產業的資金、技術、經營等相關因素，思考臺灣國際化的能源產業策略。一般而言，我國近年資金已有大量增長，但過去由於一般產業科技政策，並未注意此類可能的相關科技發展，民間資金也無緣進入能源產業。而今能源產業已漸打破過去國家獨佔管制經營的局面，因此今後我國能源產業的發展，趁此一態勢，考慮是否或如何走上



國際市場，是必須加以探討的課題。

尤其在面對國際能源產業發展趨勢，考慮臺灣能源的穩定供給，與溫室氣體排放的因應等數種因素，臺灣能源產業若能參與國際市場的運作，規模不必特別大，建立一些國際能源產業經營能力，對上述問題的解決將提供更多選擇的空間。而經營此類國際能源產業領域，更應選擇適當的海外合作對象，例如日本、大陸、美國都各具特色，根據不同的條件都具備合作的可能性。由於能源產業一般言，具有著重系統通路，存在高度上中下游相關，有大規模經濟，技術、管理因素重要的特性，因此在力所能及情況下，適當參與國際水準的能源企業經營，應是臺灣能源產業可以追求的目標。事實上，臺灣能源市場自由化後，國際能源產品將跨足臺灣能源市場，面對國際競爭可能是臺灣能源產業不能免的情況，因此臺灣能源企業想要與國際企業競爭，恐怕自己也須國際化，才更能居於相當的競爭地位。

二、臺灣一般產業國際化發展經驗借鑑

其實除了能源產業外，我國產業發展的經驗，包括電子、石化、機械等一般傳統產業，都是依靠國際分工，以關鍵技術與設備的引進，進行進口替代，或透過國際貿易輸出裝配或代工成品。尤其在近幾年，雖然產業發展也獲得相當升級成果，包括半導體與資訊產業等科技產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基本上，模式仍與過去的傳統產業相類似。不過這些科技產品所需要投入的生產要素，已經與過去傳統產業，尤其家電、紡織業的投入有了明顯不同。不止需要較大量的科技人力投入，同時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此一特性在石化業上中游的發展中，則有部分相似之處。而一個較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臺灣此一產業發展時機，與此一產業的世界上整體發展成熟度比較，顯得較早，這也是與其它傳統產業有相當差異的地方。

但此一模式並未出現在臺灣能源產業的發展過程。今後隨著國內與國際能源市場條件的變動，我國能源產業是否可能走向相類似的過程，是一頗值思考的地方。探討構成此一過程模式的因素，基本包括選擇我國有利的因素投入「組成」，及以國際貿易構成的國際分工，做為發展的基本架構。但因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可以選擇的因素投入「組成」也就不同，例如過去低廉勤奮勞動力是主要的要素選擇。之後有部分的資金與商品設計能力，成為主要投入要素。然後和設計、製程、商品發展能力有關的科技人力與資金，是資訊與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主要要素投入。而產業介入的發展時機，所面對該產業全球發展程度的不同，也是影響產業國際分工模式的因素。因此探討今日臺灣能源產業發展，面對國內外變動的挑戰，考慮是否可以運用類似的模式，發展新的以及傳統的能源產業，應將上述因素充分列入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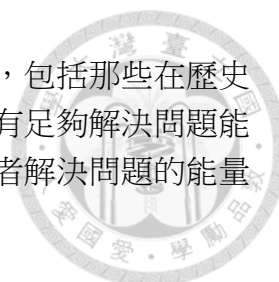
根據能源產業的界定，目前能源產業的領域，包括新能源與傳統能源的設備、燃料、通路等部分。而在考慮國內外競爭的情況下，傳統能源競爭的是先天性資源稟賦、資金以及技術。而天然氣資源稟賦、資金仍是重要因素。但新能源可預見未來競爭首要突破的是技術。甚至傳統能源由於技術與資金的發展，資源稟賦的作用已形弱化。因此在此一情況下，可能提供了沒有自產能源，但資金與技術已有初步發展的臺灣，參與經營國際能源市場的機會。另一方面，就需求面而言，由於能源作用的擴大，廣泛進入了包括消費領域，因此過去因考慮需求彈性小的需求面作用，在國際上普遍採取的國營獨佔市場經營模式，也面臨了許多推動改變的力量。

目前臺灣能源市場的改變，也已是政策的一部份了。因此考慮能源產業因應溫室效應問題，同時考慮需求面的這個改變因素，所引起的國內外市場變化，結合上述能源產業領域，可能的、最有利的國際分工選擇，由政府根據臺灣的有利因素，選擇可能優勢項目進行輔導，嘗試以國際分工模式，在國際能源市場中，促進臺灣能源產業發展，並經由臺灣能源產業，在國際能源市場經營能力的增強，強化因應溫室效應能源政策的調配能力，應是當前臺灣能源產業發展可思考的方向。當然正如過去一般產業，在此種模式的發展中，政府都有扮演相當的輔導角色一般，今日能源產業若也嘗試此一發展模式，政府能源主管部門似也應負起輔導的角色。尤其此時能源產業發展，必須同時面對溫室效應問題的挑戰，而此一問題今後仍將充滿相當不確定的因素，且能源產業的投資，國際各大國都密切注意，因此臺灣若要在國際分工下，發展此一產業，政府的輔導角色勢不可免。

而政府輔導的重要領域，應包括資訊提供等基本需求的滿足。由於因應溫室問題資訊需求廣泛，因此須政府強化整合資訊提供能力。而此一溫室效應影響下的能源產業市場，產業切入項目政府亦應分析研判提供參考，並進行先期的準備輔導。且針對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等不同領域，採取適當的輔導策略，有些著重技術優勢，有些著重資金、管理以及上中下游整合優勢，選擇採取輔導策略。這些策略應包括天然氣、石油、、等能源的大型上中下游整合策略，以爭取產業的整合利益。而在發展各類能源的整合過程中，可採行產官學研共同研議擬定輔導策略的機制。並且包括新能源產業發展，與上中下游傳統能源整合經營工作，政府都必須重視扮演科技支援的輔導工作。

三、資訊不確定的決策

臺灣能源產業面對溫室氣體的全球發展議題時，整個大環境確實存在資訊不確定的因素。此類不確定因素，部分來自於科學認知問題，也有部分來自於國際社會因素。使臺灣在不論科技發展能力，或國際定位問題都存在差距情況下，決策過程必須面對資訊不完全的不確定條件。因此包括政府部門在內，如何面對不確定環境，提出最優的決策體制與過程，就成為一重要工作了。由於溫室效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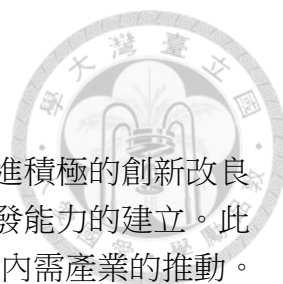
預防是全球共同的課題，而對此一課題有「重大影響的國家」，包括那些在歷史上、現在以及未來可能的，有龐大溫室氣體排放規模，或者具有足夠解決問題能量的國家。但對這個議題的發展，臺灣不論在排放量上面，或者解決問題的能量方面，都沒有重大影響。

因此就臺灣言，面對這個議題的發展，所能取得的決策資訊是存在不確定性的。這些不確定性來自包括主要國家本身，對以上資訊的不確定問題；也包括我國與主要國家間的落差問題。因此如何面對此種不確定性，以建立我國的因應策略，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亦即我們要有一個能夠處理不確定因素的策略，而如何縮小不確定性，是這個策略中很重要的要求。因此也就凸顯了資訊因素的重要性。幸而由於前述臺灣以非主要國家的角色，可以扮演被領導（追隨者）的角色。因此對於先前已有龐大排放量的國家來講，它們必須率先發展因應溫室問題的策略與能力，臺灣可有一段時間的落差，來蒐集資訊並學習與準備如何因應溫室排放問題。

並且由於例如科技發展以及國際產業的發展，臺灣或已具有相當選擇能力，但並未具有主導的能力。因此如何透過取得領導國資訊，以因應溫室氣體排放議題的發展，就成為重要因素了。其次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必須面對許多不確定、多變的因素，因此彈性架構也就成為另一個重要要求。而為求取得預先因應的優勢，如何建構將資訊作最大運用的資訊處理架構，也是另一個重要要求。此一資訊處理架構，應要能不斷以合乎邏輯的最大可能，使用有限的資訊，並做出合乎嚴謹要求的最大範圍預測。而當此一資訊架構能夠成為具公信力的機構，就可具備凝聚共識的能力，避免國內因此一問題產生嚴重爭端紛擾。並且此一資訊系統也必須考慮不同策略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考慮國內能量培養，與此一資訊處理系統間的互動關係。

四、科技政策

科技因素將會是未來全球徹底解決溫室問題的根本能力來源。而此類科技能力的構成範圍很廣，包括基礎研究與應用、發展等，領域上也包括各種專業的可能性。臺灣科技發展目前走到一個新的階段，注重採整合策略，將包括基礎研究的能量，也納入整合型科技研發計畫。在因應溫室氣體的全球議題上，應也可將此類相關的科技項目列入國家整合型計畫，持續有效推動一些先期研究，這將對未來臺灣產業科技提供相當的幫助。事實上，以今日此一議題的國際發展情況來看，將產生相當廣泛領域的影響，在科技領域應著手推動的工作也很多，應可探討、過濾選擇一些適當的項目推動發展。事實上科技研發在此一議題上是很重要的工作，而推動此一工作必須考慮自行研發，與瞭解、配合國際技術發展與引進的因素，例如國際大型重要能源科技的發展趨勢，考慮我國是否可能介入參與？如何介入參與？其它一些再生能源、能源節約，以及其它種類既有的國際能源成



品，在國際層面也有可能廣泛投入科技的研發與引進。

除了像前述此類集中火力的科技研發外，同時也應重視漸進積極的創新改良作用。這一部份應同時結合生活層面的設計，培養國內設計研發能力的建立。此一工作若能深化，將可能導引產業結構的變動，包括具本土特色內需產業的推動。

五、漸進積極發展策略

如前所述，因應溫室氣體的能源政策，國際上仍存在相當不確定性，甚至有關於此一議題的嚴重程度如何？都仍有待認定。加以臺灣若希望扮演國際上解決此一問題的領導國角色，能力上條件確實不具備。不過此一議題已廣泛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對人類的生活與生存確也可能造成相當威脅。且以今日的科技條件來講，緩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應仍有相當的空間。因此應以積極但漸進的方式，點點滴滴廣泛推動做為發展策略。並結合前述有關生活設計、研發的觀念，推動此一工作。

六、中央地方輔導政策整合

而當採取包括生活層面點點滴滴改進的策略，就應結合各種社團，甚至廠商的力量推動，而基層地方政府的力量更不可忽視。亦即就目前來講，推動符合溫室要求的新能源、再生能源政策，要落實到生活的層面，基層地方政府亦應扮演配合輔導的角色。

七、兩岸能源產業交流

兩岸能源產業交流在此一議題中，也應有一些政策探討的空間。美國與大陸都是國際因應溫室問題的主要國家，目前雙方也對此一領域的合作、交流抱有相當大的興趣。就大陸的條件而言，人均國民所得仍低，經濟仍高速發展，但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已排名世界前列，因此今後可以改善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與產業市場商機，必然值得注意。臺灣在一些重要的技術研發工作上，常受限於市場規模，因此面對未來此一國際產業發展趨勢的衝擊，大陸市場是一值得注意的領域。

有關溫室議題對臺灣能源產業的衝擊，基本上資訊不確定是一必須面對的重要因素。而這個不確定因素，包括溫室效應對全球衝擊程度的不確定，與國際對臺灣因應減量政策的期待的不確定。亦即全球如何認定溫室效應的影響程度，對選擇採取何種適當的因應政策，有著關鍵的重要性。且由於溫室氣體排放中，能源佔有非常重要的比例，以及由於能源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既深入又廣泛，導致目前對能源性質的認定，仍存在能源屬彈性係數小的必需品的看法。加以目前可見的各種替代能源，要徹底解決問題似仍有待相當努力。

因此面對能源溫室氣體減量的挑戰，引起各方面意見相當分歧的討論，似乎

有不得不進行，但又不知如何下手之慨。因而本節目的即在嘗試掌握問題的根本，釐清能源需求的性質，主張根據溫室效應嚴重程度的認定，針對相應的各種不同能源市場性質，採取不同能源使用，支付不同成本的政策。導引各種資源在考慮溫室效應的環境成本下，達到最適的配置要求。例如要求高消費使用較高成本的再生能源，以提供鼓勵新的再生能源研發的市場；或將部分原屬高消費的利潤，透過能源使用的稅收政策，導向新能源開發投資。

另外正由於能源的溫室議題仍有相當的不確定，因應的技術、制度面仍有相當可能空間有待開拓，加上政策面推動能源自由化，因此政府能源主管部門應妥思能源產業發展政策，並根據既有的經濟、產業條件，考慮在國際分工的發展模式下，推動能源產業的輔導工作。尤其加強在資訊、制度、科技研發與引進、海外市場合作與開拓、生活設計與基層地方政府參與方面。

第三節 從亞洲石油市場¹¹⁹型態探討¹²⁰臺灣石油產業國際化¹²¹

壹、前言

亞洲能源市場在包括經濟發展等政經因素催動下，可能面臨新的市場擴大、結構調整等等變革趨勢，其中石油市場除目前已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外，也可能成為亞洲國際能源市場變革中，最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能源產業變革指標。本節根據亞洲各國的能源與石油統計資料，予以分類歸納，初步將各國在 21 世紀初始，亞洲能源與石油國際市場的關係，加以界定。大致而言，不論那種能源消費型態的（非中東）亞洲國家，基本上各國之間，包括原油市場與成品油市場貿易互動並不密切，目前亞洲主要的石油市場各國多仍相當依賴中東原油或自產原油，成

¹¹⁹ 本文亞洲石油市場主要探討非中東部分的亞洲石油市場，由於中東為世界重要的原油供應地區，市場特性具世界性，故予以排除在亞洲市場的討論之外。不過澳洲由於地緣關係，也將它列入亞洲的範圍內。

¹²⁰ 本節資料來源取自：a.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編印（1998）。《國際能源統計》。台北。b. U.N.。《Energy Statistics Yearbook》。c. 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d. O.G.J.。《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ncyclopedia》。e. 中國統計局（1998）。《中國統計年鑑》。北京。

¹²¹ 已發表於《能源季刊》；陳良潮（2000）。〈從亞洲石油市場型態探討臺灣石油產業國際化〉。《能源季刊》30 卷 4 期，頁 49-64。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品油供應也多不依賴進口，出口導向的成品油國家也不多（以世紀之交時期資料來看，只有新加坡淨出口量約 2,000 萬公噸）。

有關亞洲的石油市場，整體來講，有著比較明顯國際間特性的，仍應屬遠在亞西中東的原油市場，而比較接近消費地的東亞、南亞，國際間成品油市場則仍有相當大的侷限。新加坡成品油市場一方面接近東南亞成品油市場，一方面接近中東原油之賜，比較有國際油品市場的味道，不過距離最大消費地的日本、大陸、南韓、臺灣市場較遠；貿易數量其時進出口分別為 2,000 與 4,000 萬公噸，在亞洲石油消費比例仍不算大。面對此一情況，此後在東南亞較靠南的部分，新加坡市場可能仍然有它的優勢。不過如果國際市場條件進一步開放，此後的亞洲石油市場中心將朝更接近石油市場主力的北方移動。臺灣石油產業在台塑加入國內市場之後，整個規劃的市場產能已經超過市場需求相當比例，此後如果能夠考慮國際市場的發展，對於亞洲形成國際間更密切的石油市場的可能發展型態應予以關注。

本節首先就能源消費的角度探討亞洲（中東除外）的能源消費分佈，以及各國能源消費的型態，且經由這一領域的討論，瞭解亞洲石油市場在整體能源市場中已佔有相當顯著的地位，此後以及長遠未來在包括目前以煤為主國家的能源結構轉變，經濟成長，以及石油資源的開發等等因素的推動下，可能進一步擴大區域石油市場的重要性。其次根據此一區域以及區域內各國的原油以及油品市場的情況，探討這兩個市場的國際間互動關係，瞭解亞洲石油市場各國之間的關連其實仍然顯得薄弱，不過各種能源使用型態國家，可能的優劣勢以及角色，卻能相當明確的顯現出來，因而，最後則就臺灣的發展策略作一簡單探討。

貳、亞洲各國的能源經濟---由初級能源消費分佈與型態探討

1997 年世界各國初級能源消費量 8,509 百萬公噸油當量中，不包括中東的亞洲和大洋洲合計 2,376 百萬公噸油當量，佔世界的 27.9%；其中大陸 905 百萬公噸油當量，日本 506 百萬公噸油當量，兩者合計 1,411 百萬公噸油當量，約佔亞洲與大洋洲合計的 60%。這也就是說中東除外的亞洲地區，以能源消費的市場來講，主要就在大陸與日本。而且這兩個國家的能源消費市場個別也有相當規模。不過這兩個國家能源經濟發展條件確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大陸人口多經濟發展快，不過仍是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費以自產煤炭為主，在此後經濟繼續發展情況下，仍有許多包括結構等須調整的事項。日本則為已開發國家，人口與經濟也有相當規模，不過能源資源稀缺，仰賴自中東大量進口石油。因而在此後的亞洲能源以及石油市場中，兩者將分別扮演重要但截然不同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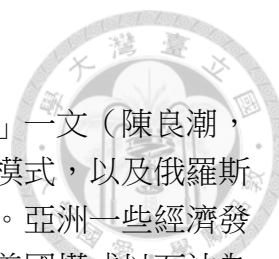
其次，比較重要的消費市場包括印度 260 百萬公噸油當量，南韓 175 百萬公噸油當量，澳洲 103 百萬公噸油當量，印尼 83 百萬公噸油當量，臺灣 74 百萬公噸油

當量，泰國 60 百萬公噸油當量，馬來西亞 39 百萬公噸油當量，巴基斯坦 35 百萬公噸油當量，新加坡 30 百萬公噸油當量，菲律賓 21 百萬公噸油當量，紐西蘭 14 百萬公噸油當量。其中包括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較高的經濟體，例如澳洲、臺灣、南韓、新加坡等。也包括國家規模龐大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印尼，以及一些經濟開始比較快速發展的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等。由上述情況可以看到，亞洲的能源消費市場其實呈現相當多樣化的樣貌，想對這個市場多做瞭解，應注意資訊的重要性，以便深入掌握其特性。

不過以此一時期的數據來看，可以把大陸當作一種重要型態，這個型態以煤炭為主，佔能源消費中的七成以上。不過由於經濟發展，石油、天然氣消費日受重視，這個型態佔有 38% 的亞洲能源消費市場；印度也可以看成類似大陸的一個型態，煤炭消費量也佔能源消費量的六、七成，只是他的經濟發展情況與其後展望仍然不如大陸，估計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增長，仍不那麼急迫。因此在亞洲這種以自產煤炭消費為主，土地廣闊，人口數目大的型態在亞洲能源市場的角色，此後以及長遠未來發展趨向與對亞洲能源市場的影響，從市場份額的角度，是值得注意探討的。尤其國際能源與石油市場的發展，牽涉廣面向的因素，這兩個規模龐大的國家，都比較有一些機會充分發揮影響力，尤其大陸，縱使在石油政治經濟的戰略層面也已顯現相當的發展潛力。

另將日本、南韓、臺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的模式當作一種型態。日本的石油消費佔能源消費的約一半，南韓約五、六成，臺灣也將近一半，新加坡則大部分都是石油消費，這個型態大略性質為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能源資源稀缺，明顯依賴中東石油，這個型態能源消費的總量有 785 百萬公噸油當量，佔亞洲能源消費的 33%。由於這種型態的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在其他亞洲國家進一步經濟發展後的能源消費模式中，可能將產生一些典範的作用，加以這些國家資金較充裕，可能有機會在整個區域扮演對外投資的角色，影響能源市場，特別是石油市場的發展，值得注意。

其他包括澳洲、印尼等等國家，也都各有特色，雖然規模相對不大，但也仍應予以個別觀察，才能對亞洲能源市場有個較全貌的瞭解。澳洲煤炭佔 47%，石油佔 36%，天然氣 15%；印尼石油佔 53%，天然氣佔 32%；馬來西亞石油佔一半，天然氣佔 41%，與印尼在結構上有一些類似，不過人口規模，經濟發展兩者仍有一些差異；泰國則石油消費佔 63%，其他的煤炭、天然氣比重約略相當；巴基斯坦石油、天然氣佔比約略相當各佔約 40%；菲律賓也以石油為主，約佔 65%。而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相對上，（除澳洲外）仍低於上一種型態的國家，能源消費量也較少，並且也有一些自產的石油、天然氣可以提供本國所需。因而這些國家此後以及長遠未來能源經濟的發展方向，應同時注意包括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自身能源生產可能供應多少國內市場所需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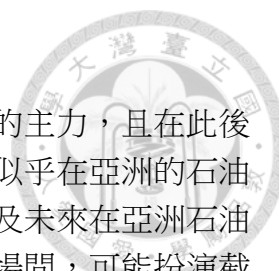
根據「國際石油市場走向及其對臺灣石油產業發展的影響」一文（陳良潮，能源季刊，三十卷第一期）舉例指出，美國以石油消費為主的模式，以及俄羅斯以天然氣消費為主的模式是當前世界能源消費的兩個主要模式。亞洲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國家，包括日本、新興工業國的型態都比較接近美國模式以石油為主的型態。不過這些國家在石油使用中，仍與美國主要消耗在公路運輸的情況略有不同。而大陸令人興起極大的興趣想觀察他到底將往那個方向發展，印度似乎經濟發展的速度較慢。而其他的亞洲國家雖然許多經濟發展仍然較慢，包括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等等，但卻在能源消費型態上，顯現出非石油即天然氣的能源使用型態，尤其石油更顯然比重較大。

因此探討亞洲能源市場，應可分別以這三種型態分類，針對他們的特性探討之。而由上述討論各種型態中所顯現的石油在能源市場的角色，是否意味著所有亞洲地區的這些國家，在此後以及長遠未來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能源需求的擴張都將主要依賴石油的使用？這是我們探討未來亞洲石油市場的背景中，必須注意到的徵候。不過，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則另一方面的考量，特別值得注意，例如目前亞洲地區（中東除外）的石油蘊藏量，顯現出的情況，在世界分佈中，仍然極為不足。

參、亞洲石油初級能源消費市場分佈

前面以「能源」的角度討論亞洲市場後，這裡進一步探討亞洲「石油」市場，而根據前面所述，已足以瞭解石油消費仍是亞洲與大洋洲當前以及此後以及較長遠之未來的初級能源消費中，極具重要性的能源種類。BP 資料 1997 年亞洲與大洋洲初級能源中的石油以日本消費量最大，達 266 百萬公噸油當量，大陸 186 百萬公噸油當量，南韓 105 百萬公噸油當量，這三個國家消費量超過亞洲與大洋洲消費量的六成。其他印度 83 百萬公噸油當量，印尼 46 百萬公噸油當量，泰國 39 百萬公噸油當量，臺灣、澳洲各 37 百萬公噸油當量，新加坡 29 百萬公噸油當量，馬來西亞 20 百萬公噸油當量，菲律賓 18 百萬公噸油當量，巴基斯坦 17 百萬公噸油當量。

因此可見亞洲石油市場目前仍以第二種型態的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為主，外加大陸這個第一種型態快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而第三種型態國家石油市場在此後以及較長遠未來的角色，仍須依賴這些國家此後經濟發展條件來觀察，這些國家中仍有不同類型的表現，例如泰國、馬來西亞或可歸為一類，印尼一類等等。第一種型態的未來趨勢包括經濟發展過程中開發中國家工業化過程對石油需求的增長，以及能源結構轉變，主要是煤炭消費可能轉變為石油消費，成為石油需求的增長。這類國家在工業化過程，公路運輸的增長將可能增加對汽油、柴油需求的增長。另一方面工業增長對能源需求的增長存在煤炭與石油類的柴油、燃料油的替代關係。



第二類型態國家的石油需求，目前仍是亞洲石油消費市場的主力，且在此後以及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除了考慮到第一種型態的大陸以外，似乎在亞洲的石油消費市場仍將佔有重要的位置。不過這個型態的市場，此後以及未來在亞洲石油與能源市場的角色，在今日的角度來看，與其他幾種類型的市場間，可能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甚至是未來角色變化最大的一種型態。而這個型態市場未來的需求，不同能源替代關係的考量將更為凸顯。在今日的能源技術朝向多元發展，能源環境問題日漸興起之際，這類國家替代能源的選擇變得更加歧異。石油的需求，可能被天然氣取代，但石油的需求也可能進一步取代煤炭的需求。因而與第一種類型的能源替代考量不同，這類型能源替代考量，在一方增，另一方減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帶來本身比重不變的效果。

第三種類型的國家經濟一般多屬開發中的國家，隨著經濟發展當然對能源需求的增長將會隨著擴張，不過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這個型態的許多國家，都受到嚴重影響，使得一般對於這些國家，繼四小龍後成為新興經濟的期待受到挑戰。因此相對來講，對這個型態的國家未來能源與石油市場展望的評估，經濟發展展望這個因素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主要導因於一方面經濟發展一直是影響能源與石油市場需求多寡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因為這個因素的不確定性已大幅上昇，因此評估須有更大的心力投注。

除了經濟發展的因素外，這個型態的國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原油生產對這個型態國家未來在亞洲能源石油市場的可能影響，目前這個型態國家中，印尼已是 OPEC 國家，馬來西亞、澳洲也有原油生產以及輸出，未來在這些國家經濟能力進一步發展，或者區域內石油市場進一步發展，是不是將會刺激原油生產的大幅發展，而如果這個發展方向出現，這類型態國家在亞洲石油市場角色將得到深化。

肆、（非中東）亞洲原油市場

亞洲（中東除外）的原油市場包括本身的生產提供自用或供應貿易以及主要由中東進口的原油貿易。在原油生產方面：亞洲及大洋洲（不含中東）1996 年原油生產量 7,079 千桶/日(OGJ)，世界原油生產量總計 63,375 千桶/日，佔世界總量的 11.2%，其中以大陸的產量最大，有 3,127 千桶/日，佔亞洲與大洋洲產量的 44.2%，世界總產量的約 5%。其次為印尼 1,516 千桶/日，佔亞洲與大洋洲的 21.4%。因此此一區域的原油生產主要在這兩個國家。其他的國家還有馬來西亞 650 千桶/日，印度 643 千桶/日，澳洲 535 千桶/日，越南 171 千桶/日，汶萊 150 千桶/日，巴布亞紐幾內亞 107 千桶/日，泰國 59 千桶/日，巴基斯坦 54 千桶/日，紐西蘭 34 千桶/日，緬甸 15 千桶/日，日本 14 千桶/日等等。

除了原油生產的現況以外，與「未來」原油生產有關的蘊藏量與可供開採年限也應予以介紹以供參考。其實就蘊藏量來說，前述討論，指出未來石油市場在亞洲能源市場中可能扮演要角，但相對上，扣除中東國家之外的亞洲與大洋洲地區的石油蘊藏在世界的比重卻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不過這個區域內的印尼屬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一員，1995 年有四千萬噸的出口量。根據統計資料 1997 年世界原油蘊藏量總計為 1,018,849 百萬桶，亞洲及大洋洲（不含中東）42,299 百萬桶，只佔世界 4% 左右。

不含中東的亞洲與大洋洲公佈的蘊藏量，大陸最多 24,000 百萬桶，其次各國則明顯減少，包括印尼約 5,000 百萬桶，印度 4,333 百萬桶，馬來西亞 4,000 百萬桶，澳洲 1,800 百萬桶，汶萊 1,350 百萬桶，泰國 295 百萬桶，菲律賓 213 百萬桶，巴基斯坦 208 百萬桶，紐西蘭 135 百萬桶，日本、緬甸、臺灣各有 4、5 百萬桶。整個看起來，亞洲地區的原油蘊藏量，在世界來講，數量有限，雖然有些國家有一些原油蘊藏，但個別相對於世界整體的蘊藏以及本身人口規模與未來可能經濟發展所帶動的需求，恐怕都難以自給自足。

例如前述數字中大陸是（中東除外的）亞洲及大洋洲原油蘊藏最豐富的國家，但相對於大陸超過十億的人口，快速的經濟發展，更早時期自產石油已呈供不應求的趨勢，雖然政策上仍希望能加速探勘開發的工作，以及壓縮潛在需求，但進口數量仍不斷呈成長趨勢。另兩個人口大國的印度與印尼蘊藏量比起大陸更是只有 1/5 的量，相對來講，馬來西亞、澳洲、汶萊可能反而人均蘊藏量較高，至於經濟發展比較好石油消費量較大的日本、南韓、臺灣、新加坡更是少油的國家。

在可採年限方面，根據聯合國的資料，1995 年各國原油可採年限仍以中東以及非洲、南美的石油輸出國較長，其中科威特 130 年，阿聯 112 年，利比亞 86 年，沙烏地阿拉伯 85 年，伊朗 69 年，委內瑞拉 65 年。其他一些重要的產油國採油年限較長的國家，有智利 70 年，烏克蘭 59 年，墨西哥 45 年。亞洲與大洋洲的年限則有菲律賓 110 年，印度 24 年，大陸與汶萊 22 年，馬來西亞 17 年，日本 14 年，印尼 8 年，泰國 9 年，紐西蘭 9 年，澳洲 8 年，印尼 8 年。因此中東除外的亞洲與大洋洲未來原油生產趨勢，其時所顯現的仍以大陸的情況較穩定，一方面，大陸的原油生產已有相當數量，另一方面仍然可以有 20 年以上的蘊藏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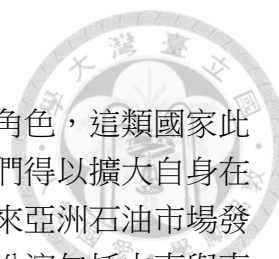
至於其他國家例如菲律賓似乎號稱有 100 多年的蘊藏量，但終究蘊藏的絕對量不大，產量更小。印尼產量比大多數的非中東產油國亞洲國家多，但相對的蘊藏量有限，可能只有幾年的可採年限。總體而言，亞洲與大洋洲面對未來隨著經濟發展而來，可能的大量石油需求總體來看，蘊藏量顯得極為不足，很可能在原油方面，必須依賴中東石油的輸出。

在原油的貿易方面，非中東亞洲基本屬原油淨進口市場，進口原油高達 5 億噸，但出口量較大的國家印尼與馬來西亞出口合計約 6 千萬噸。因此必須大量依賴從中東進口。聯合國資料 1995 年進口部分亞洲（包括中東）546,074 千公噸，佔全世界合計 1,675,545 千公噸的 32.6%，其中以日本的量最大，224,264 千公噸，佔亞洲的 41%，全世界的 13.4%；其次南韓 85,375 千公噸，新加坡 51,159 千公噸，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的原油進口量就佔了聯合國資料中亞洲進口量的 66%。

而臺灣原油進口量並未被記入此一資料來源，臺灣 1995 年原油進口量為 33,543 千公秉油當量（油當量熱值為 9,000kcal/liter，依 BP 1 公斤油當量=10,000 kcal 換算，約折合 30,200 千公噸油當量。）其他印度進口量為 30,000 千公噸，泰國進口量為 22,851 千公噸，菲律賓 15,945 千公噸，印尼 9,320 千公噸，巴基斯坦 3,868 千公噸，馬來西亞 1,270 千公噸。大洋洲中澳洲 13,415 千公噸。不過已有一段時期大陸的進口量呈增加態勢。

出口部分亞洲由於包括中東地區的原油輸出，因此在世界上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地位，1995 年亞洲地區原油出口 789,130 千公噸，佔世界合計 1,635,632 千公噸的約一半，但事實上主要的亞洲出口國基本都集中在中東，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的 313,556 千公噸，伊朗 130,790 千公噸，阿聯的 92,494 千公噸等等。而中東地區之外的亞洲國家，原油出口量則明顯較低，甚至在亞洲的進口量中，顯得極為微不足道。其中最多的是印尼，印尼也是 OPEC 成員之一，出口量為 40,588 千公噸，其次馬來西亞 19,164 千公噸，大陸 17,100 千公噸，汶萊 8,700 千公噸，不過近年隨著本身對石油需求的增長，出口量可能不易再成長，甚至將進一步萎縮。這個現象可能也會出現在其他非中東的亞洲有原油出口的國家上。如果根據目前的這些資料來看，亞洲的石油需求必然需要依賴包括中東等一些富有石油地區的原油輸出，亞洲這些用油的主要地區雖然顯現依賴石油的傾向，但區內恐怕難以滿足，除非有更進一步足以改變現狀的巨大發現。

整體來講，亞洲各種型態的能源使用國家，根據本身條件特性，未來可能在亞洲（中東除外）的原油市場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種型態國家，國家規模龐大，容易發展出國際上的政經影響力，本身廣大的國土裡，也有相當的機會，取得原油生產的資源，大陸目前每年已有大量的原油生產，雖然目前看來自產的部分未必能夠滿足此後以及未來可能的大量需要，不過根據技術、市場、資源以及其他相關的國際政經關係能力，推測這個型態的國家，此後以及未來在亞洲的原油市場將佔有相當影響力，未必毫無根據。第二種型態的國家在原油市場基本扮演需求者的角色，而且也是亞洲市場上的主要消費者，這些國家大多與美國關係比較密切，在原油的需求上，油源多來自中東，常與歐美系的國際石油公司進行業務來往。未來隨著亞洲石油市場更形多元化、自由化，這些國家可能憑藉本身的資金與管理能力，進一步參與亞洲原油市場。



第三種型態國家，目前有一些扮演亞洲原油市場的供應者角色，這類國家此後以及未來原油生產本身的原油資源是否足夠充分提供，讓他們得以擴大自身在原油市場的供應角色，仍屬頗值探討關注的議題，不過這是未來亞洲石油市場發展應注意的一個方向。此外這些國家在整個亞洲原油貿易中也扮演包括中東與東亞間的通道，以及本身在原油生產不敷未來經濟發展所需情況下，中東原油消費者的雙重角色。並且由於未來中東石油在整個東亞的角色恐怕仍難以弱化，因此如果這些第三型態國家，原油供應能力大幅擴大，同時也導因於自身石油需求的大幅增長，使自身已形擴大的原油供應能力，仍不敷需求，須透過進口相當數量的中東原油，那麼這個位處中間的地理環境，可能促使這個型態國家，在原油貿易角色與地位的轉變。不過這些國家在國際角色的實力，也將對這個走向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這個趨勢如果產生將以何種方式表現，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伍、亞洲石油產品市場

除了原油市場之外，由過去以迄其時，中東地區以外的亞洲石油市場，主要為油品消費市場，根據聯合國資料 1995 年亞洲油品消費量 848,773 千公噸，佔世界總量的 29%，其中以日本和大陸的消費量最大，分別為 195,213 以及 123,082 千公噸，其次南韓 70,679 千公噸，新加坡雖小，也有 19,917 千公噸，在亞洲各國中消費量也不低，以上各國合計 408,891 千公噸，佔了亞洲消費量的一半。其他消費量相對較大的國家，印度 58,637 千公噸，伊朗 49,207 千公噸，沙烏地阿拉伯 40,692 千公噸，印尼 39,123 千公噸，泰國 31,969 千公噸，土耳其 25,057 千公噸，伊拉克 22,330 千公噸，馬來西亞 16,955 千公噸，巴基斯坦和菲律賓分別有 13,977 和 13,122 千公噸，敘利亞 10,196 千公噸，越南 4,461 千公噸，北韓 4,299 千公噸，香港 3,387 千公噸，汶萊 870 千公噸。臺灣根據統計資料 1995 年油品消費 36,787 千公乘油當量（依 BP 1 公斤油當量=10,000 kcal 換算），約合 33,108 千公噸油當量。

在石油產品的貿易方面，進口部分亞洲 1995 年進口量為 180,167 千公噸，佔世界 539,810 千公噸的 33.4%，不過相對來看，油品進口的分佈，比起原油進口分佈，或油品消費分佈，都明顯集中度較小，亞洲國家中進口油品數量較大的有日本 25,158 千公噸，新加坡 22,373 千公噸，香港、大陸、南韓分別有 15,964，15,780，15,767 千公噸，印度 14,934 千公噸，泰國 9,129 千公噸，巴基斯坦 8,748 千公噸，馬來西亞 7,399 千公噸，印尼 6,974 千公噸，越南 4,435 千公噸，土耳其 3,056 千公噸，菲律賓 2,491 千公噸。

出口部分包括中東在內的亞洲 1995 年共出口 196,073 千公噸，佔世界 586,041 千公噸的 33%，並且出口集中在新加坡以及兩個主要的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新加坡出口 40,292 千公噸，沙烏地阿拉伯 36,088 千公噸，科威特 30,799 千公噸，這三個國家合計 107,179 千公噸，佔亞洲出口量的 55%，另外南韓的出口量

為 12,988 千公噸，印尼 10,764 千公噸，巴林 10,152 千公噸，日本 7,656 千公噸，大陸 4,189 千公噸，馬來西亞與伊朗分別為 3,760 與 3,570 千公噸，泰國 1,063 千公噸，菲律賓 180 千公噸。

在油品的消費市場中，兩個最大的油品需求國，第一型態的大陸與第二型態的日本，雖然石油市場條件有相當大的差異，不過都扮演內需市場的角色，這兩個國家除了是亞洲油品消費的大國外，同時也是油品的淨進口國。南韓是第三大油品市場，南韓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雖然他是淨進口國，不過他的進出口值，分別相對於市場消費量，都不小，進口達 22%，出口達 18%，可見雖然南韓油品市場應也屬內需導向，但卻在煉製生產以及供需上，大力採行國際調節。

新加坡就很明顯的表現出貿易出口的型態，新加坡市場本身的消費只有 19,917 千公噸，但進口量也高達 22,373 千公噸，是本身市場消費量的 112%，出口量更達 40,292 千公噸，本身市場消費量的 180%，加以進出口數量都大，顯然扮演貿易市場調節的角色極為明顯。印尼油品市場基本上主要在滿足內需市場，不過也扮演幾百萬噸的淨出口的角色，而且淨出口數量可達本身消費量的 10% 左右。馬來西亞雖然有原油出口，與南韓不同，不過馬來西亞在油品的型態上與南韓類似，屬淨進口內需導向，進口量達到本身消費量的 44%，出口量有 22%，顯然也大量運用國際市場的調節作用，而淨進口量佔本身消費量的比達到 21%，對進口的依賴超過 1/5。泰國基本上也是內需導向，有 1/4 的進口依賴。菲律賓有接近 1/5 的進口依賴。

根據前述包括原油與油品市場的討論，可以瞭解就亞洲的能源市場來講，過去以石油為主要能源消費的國家，自身都不是原油的生產國，石油蘊藏極為缺乏，因此必須依賴國外的石油供給，這些國家在亞洲的各國中，經濟發展一般較優，雖然這些國家（特別日本）的資金與貿易，在一般經濟領域，在亞洲各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除了新加坡（在油品貿易領域）以外，這些國家其實對於亞洲石油市場的經濟影響極為有限。除了這些本身油藏資源極為貧乏的石油主要消費國外，一些過去石油消費量較少，但可能擁有或多或少石油資源的國家，目前正加緊本身石油資源的開發，這類國家除了像印尼、馬來西亞有一些原油出口，以及一些成品油的進出口外，大抵說來過去在亞洲石油市場的互動仍不算密切。

不過這些國家可能透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成為亞洲石油市場大幅成長的主力，並且擴大在自身石油資源的勘探開發，使自己在亞洲石油市場上佔有更大的角色，這種發展趨勢目前以大陸表現最為明顯。因而，整體而言，過去亞洲石油市場各個國家雖然可分幾種型態，不過不論這些國家屬那種型態，基本上各國間的石油市場互動並不強烈，這是過去亞洲石油市場所顯現的一種特性；不過目前有一些因素可能促使亞洲石油市場的變革，在這些變革中，石油市場中的各國，



可能根據各種條件大致分成的上述型態，在未來可能新亞洲石油市場結構中，選擇不同的發展策略模式。

陸、影響亞洲石油市場的幾個明顯因素及其影響

一、影響因素介紹

(一) 政經形勢的轉變

1980 年以前亞洲石油市場在過去國際政經格局影響下，有很明顯的區域分隔，主要表現在中東原油往東到以日本、南韓、臺灣、東南亞各國，大陸的能源消費除了自產的煤炭外，就是少量自產的原油。其實不止石油市場有著明顯的分隔，其他貿易也有這種親西方的國家與共產國家間的明顯區隔。但到了 1980 年以後，石油市場這種格局逐漸模糊，由於國際局勢緩解，大陸推動開放政策，因此經濟上，大陸的國際貿易與投資開始大幅增長，過去壁壘分明的市場區隔漸漸消失，石油市場雖然較不顯著，但也出現同樣的變化。到了九十年代末，大陸由於經濟發展，開始思考自海外進口石油，因此使得此一區域的石油市場出現了可能促動變化的因子。

(二) 經濟發展

經濟成長是帶動能源與石油市場成長的主要動力，由橫斷面，在世界上可以看到能源與石油主要的消費國，都是經濟發展較早的國家，亞洲地區也同樣顯現出來經濟發展較早的日本是很重要的消費國，並且除了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開發的日本外，一般都不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消費國，這個情況也顯現在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上，近年亞洲區域顯現了較明顯的經濟發展形勢，首先是四小龍，其次大陸到了 2000 年，也有 20 年的快速增長經驗，此後他的發展展望仍是開發中國家較受看好的。四小龍的發展使得他們能源與石油消費超過一些人口與領土規模遠勝於他們的國家，而居於亞洲能源與石油市場的重要位置。

大陸到了 2000 年，過去二十年 GDP 成長六倍，能源消費成長為原來的兩倍多，石油消費成長約為原來的兩倍，這個數字也清楚顯示了一般經濟的發展，將會帶動能源與石油需求的快速成長的現象。而亞洲經濟發展的動力，未必只在已有一些發展成果的國家，其他如東南亞國家，也有一段時間被認為將繼四小龍後，經歷一段快速發展經濟的過程，不過在金融風暴時受到明顯挫折。但金融風暴過後，可能仍將繼續過去的發展情況，尤其馬來西亞與泰國，情況也顯得較穩健，而經濟的發展則將帶來油品需求的增長，因此將衝擊亞洲石油市場。

(三) 環境保護問題

環境保護是今日全球廣受重視的重大課題，包括聯合國與各國都設置了有關環境保護的專責部門，環境保護也已是國際間的一個重要議題，環境保護議題已廣泛的涉入各類經濟開發、國際貿易以及其他社會、政治等專業領域中，其中能

源的開發、使用與環境保護之間，就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亞洲國家許多都是人口數目眾多，人口相對稠密的國家，因此環境的人口負擔本來就比較重，所以更有環境保護的壓力。在能源使用方面的環保問題同樣也受到這些條件的影響，甚至由於亞洲國家許多屬開發中國家，能源使用的資金未必很足夠，因此一般認為能源中比較便宜的煤炭，可能會在未來能源需求大幅增長情況下，被大量使用，不過鑑於環境保護的需要，也可能放棄煤炭的使用，以石油取代。這樣的情況下，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正面影響，將益形集中在石油的需求上。

（四）能源資源開發

在一般市場認知裡，非中東的亞洲地區一直都不屬於擁有能源資源的主要地區，不過部分特定地區早也已有石油的產出，例如印尼、汶萊。近年來，大陸在本身需求的推動下，也開發並持續發現許多大量的石油資源，目前除了大陸陸地石油資源的勘探、開發工作持續進行外，由北而南沿著渤海、東海、南海的海域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工作也不斷進行，而由南海再南下，包括汶萊、印尼、馬來西亞的勘探開發，可以說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工作，已逐漸成為亞洲地區的廣泛工作。因而這個領域的績效如何，在未來將對亞洲石油市場的供給面產生重要的影響。

（五）油品市場的自由化

過去中東除外的亞洲各國間石油市場，直接大量的分工合作並不顯著，不過近年一直有人認為（例如 APEC），亞洲石油市場應推動自由化，當然這個方向在各方努力下，將可能有些進展，但基本上，仍應注意進展的時序。

二、對亞洲油市的影響

上述提到可能影響亞洲油市的幾個因素，其中經濟發展的因素將可能使亞洲油市趨向繁榮，甚至在供應產生問題時，在各國國內以及國際間，產生緊張關係。因此關係到供應面的資源開發問題，以及影響供需秩序的既有市場結構變革，如石油市場的自由化，政經格局的變化等等，都將變得更形重要。而環境保護的問題，也會對供給與需求面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就上述幾個因素的考量，或可認為未來亞洲石油市場將有很大的機會進一步蓬勃發展，並且促使區域內各國更熱心投入能源資源的開發，這個方向將可能促使區域內原油市場的活絡發展，而在油品市場方面，在短時間內，各國都仍將盡可能維持自給自足的架構，不過進一步在幅度上，擴大開放國際進出口調節，應該也是符合趨勢的預測，加以總量規模的擴大，因此，國際間進出口市場也將擴大。

柒、臺灣石油產業國際化發展探討

雖然亞洲油品市場國際間貿易過去並不算蓬勃，但今日許多徵像顯示，亞洲石油市場正面臨一些新的影響因素，促使此一區域的石油市場更形擴大，也有可

能逐漸演化出更具有活力的市場架構。臺灣石油產業在地緣上處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處，與目前最主要的油品消費市場空間相距不遠，且在發展時機上，近年正面臨轉型的壓力，台塑石油生產，建廠已到完成階段，國內產能將超過市場胃納。因此將來如何進一步推動產業的國際化，一直是業者關心的課題。而國際化問題，當然應仍就近以亞洲市場為目標。而以臺灣石油產業的現況來看，首先當以油品市場為重，但漸漸也應擴及原油市場。

而根據本節探討，亞洲油品市場的基本架構，包括不論那種型態國家，內需市場的八成以上都不依賴進口，這就顯現出亞洲油品市場的基本模式，一方面各國都固守本身的市場，但另一方面，也保留部分的幅度由國際貿易調節，這幅度各國仍有大小差別，有些進口量可達 1/5。臺灣石油市場一方面仍應固守本身大部分的市場，以求穩定，但另一方面也應針對國際調節的特性，拓展部分空間，由於臺灣規模不大，若能有一些貿易調節的市場份額，相對上就有相當數量了。

而以競爭的觀點來看，大陸與日本除本身市場規模大之外，也都將可能扮演亞洲的油品貿易市場上的重要角色，但這些較大規模的國家市場，目前顯現的都以內需市場為優先考量，未必會以拓展國際市場為目標。反而像新加坡、臺灣除滿足本身的油品需求外，並且可以將超出本身需求的規模，提供周邊市場做為補充。或者採行南韓以較大幅度進行國際調節，但不同於南韓，一方面有相當幅度進口，但另一方面確有更大幅度的出口，以安排在最適規模下的生產。

其實大陸此後規模繼續擴大，有可能採行部分國際進出口調節的機能，一方面有些地區或品種的油品出口，但另一方面卻也有些地區或品種的油品進口，若大陸在市場規模持續擴大下，採行此一策略以強化石油產業的經營經濟與靈活性，那麼可能提供的國際貿易市場仍然極為可觀，而若包括菲律賓的東南亞市場進一步發展，那麼以臺灣的地緣位置做為一個類似新加坡的石油調節市場，甚至或者可與新加坡比擬。

除了油品市場外，在亞洲石油市場進一步發展，以及臺灣石油相關產業能量擴大情況下，臺灣石油市場的經營希望能夠有更廣泛的經營範疇，包括原油相關業務。並且以亞洲市場的角度，根據不同類型國家採取不同的合作方式，而由於亞洲各種類型的國家，各有不同的優劣勢，因此可供選擇的機會就會更多，適合臺灣需要的條件可能性也較大，這是值得思考的。

捌、展望分析

臺灣處身亞洲石油市場，地理位置未必不佳，雖然市場規模不算太大，但在亞洲石油市場各國條件多樣，且多面臨起飛發展時期，因此更應重視本身發展的機會。當然石油市場對各國來講，都是重要不可或缺的產業，不過根據經濟的要

求，有部分的國際市場調節，可以發揮更大的經營效率。因此根據臺灣的條件，發揮本身經營優勢，以國際經營補本身條件的不足，是一個極為值得探討與努力的方向。尤其以地緣周邊來講，大陸與日本都是很大的市場，尤其大陸目前正顯現巨大的發展空間，而且距離臺灣又近，更值得關注。此外地理上的另一端，東南亞諸國，擁有各種的石油市場條件，與臺灣相距也近，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領域。

因此臺灣石油產業應提振競爭力，一方面確保國內市場的大部分份額，另一方面重視各國運用國際市場調節的條件，補充國內市場範圍狹窄的缺陷，以健全臺灣石油產業的發展，穩定國內石油市場的供應，甚至開拓過去在國內受到忽視的國際石油產業經營。不過開拓國際石油產業經營，必須更充分瞭解亞洲的國際石油市場發展趨勢，根據時勢發展做適當的策略調整，才不致舉措失據，嚴重影響國內市場的穩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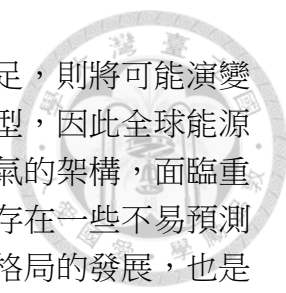
第四節 臺灣透過對話因應當前國際能源安全的挑戰

一、一個能源巨變時代的來臨？

能源供應是經濟發展不能忽視的一個必要因素，這個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程度，使他成為安全議題必須予以考慮的一個因素。除了有時國際油價出現了巨幅震盪，並且持續一段時間的原油價格達到每桶 30~40 美元的水準外；已有相當一段時間，在國際高科技產業與全球經濟持續顯露榮景裡，能源供給的問題，似乎漸漸讓人覺得放心，而可以予以忽視了。

但與此同時，另有些發展勢頭卻逐漸萌芽，尤其在全球經濟發展的果實逐步擴大，包括大陸與東亞許多開發中國家，出現了高速成長的過程。能源供給的問題可能再度成為全球必須加以高度關注的問題。其實由於能源問題在（包括經濟、科技、政治、國際關係、溫室效應等等）廣泛層面有高度社會關連性，且因為各種與能源發展息息相關的因素，在今天都處於急速轉變的時代，使得我們或許真應該問一下：是不是一個全球能源格局巨變的時代已經逐漸顯現？

當前影響全球能源未來發展有幾個比較受到重視因素。首先全球經濟發展正逐步擴大，這個趨勢將會導致國際能源需求呈現快速增長，尤其對能源主力的石



油天然氣的供給，可能形成強大的壓力，如果因此產生供應不足，則將可能演變成政治與安全的問題。而同時全球政經格局近年也呈現明顯轉型，因此全球能源需求擴大的走向，伴隨政經格局轉型，呈現既有國際石油天然氣的架構，面臨重整的局面。到底這個新格局將會如何建構發展，當然事前仍將存在一些不易預測的不確定因素。以臺灣在區域安全佈局的角色，對於這個新的格局的發展，也是理應予以多加重視的。

二、包括大陸的東亞能源市場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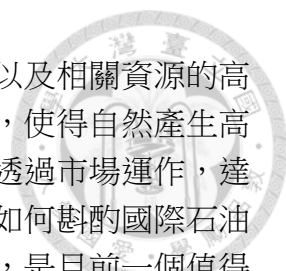
其實全球經濟增長，除了美國具有代表性的新經濟發展外，最受到重視的莫過於東亞經濟的加速發展，尤其中國大陸由於規模龐大，發展快速，受到更多的矚目。雖然對於包括大陸在內的東亞，因經濟發展誘發能源需求的增長，尤其石油天然氣需求增長部分，將領先世界增長幅度，一般看法並無不同。但由於受到分析方法與大陸政府政策走向宣示的影響，對於大陸具有代表性的，東亞石油天然氣需求增長幅度，則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資料顯示，這個數字並不特別高，但有一些石油業者，則懷疑這個數字將會相當可觀。

或許決策者更應注意這個未來將會巨幅成長的看法，理由來自歷史經驗，西方已開發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日本等等國家，都曾經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歷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模式，朝向以石油為主的模式發展歷程。但到了 2000 年中國大陸在歷經 20 年高速經濟發展後，石油消費仍然非常有限。我相信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將觸發大陸能源消費由煤炭轉向石油天然氣發展的機紐。加以由於大陸本身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發極可能遠不能滿足需求，因此也將（事實上已經開始發生了）啟動大陸自中東等海外大量進口石油天然氣的引擎。由於一些保守的機構受限於分析方法所需考量的經驗數據，因此他們很難得出大陸石油天然氣大幅增長的答案。

當大陸與東亞其他國家，受到本身經濟發展驅使，需要大量進口海外石油天然氣以滿足所需時，目前的國際石油天然氣格局，勢須重新加以調整。以目前來看，由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帶動的石油需求，實際表現出來的仍然比較有限，使這個調整的壓力仍沒有充分顯現。不過一些預測與安排的動作已漸漸出現，包括大陸的國營石油公司紛紛尋求海外股票上市，國際大石油公司一方面積極相互合併強化競爭力，推動多元化。一方面也採取積極的動作，著眼於參與大陸的石油市場，尋求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機會。在這個過程裡，如何促進確保安全的互動架構，也是重點之一。

三、建構市場秩序攸關未來能源安全

以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如何架構一個有效的市場秩序有它的重要性，將來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的石油市場，對石油天然氣的國際供需將會有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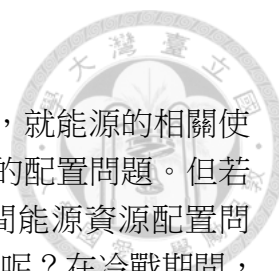
大的幫助。但由於能源產業在社會整體運作中具有的重要性，以及相關資源的高度國家集中現象，還有主要產地與消費國之間的空間距離問題，使得自然產生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相當不可能。因而希望石油天然氣市場完全透過市場運作，達到滿足資源配置作用的期待，恐怕在實際上不容易出現。因此如何斟酌國際石油天然氣市場的秩序，政治安排的層次與價格機能如何有效運作，是目前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以免各國在複雜的政治運作中，為了平衡石油天然氣供需壓力，進而導致政治影響力發揮層面的惡性競爭，並危及國際上的安全議題。

在時機上，雖然目前國際石油天然氣的供需仍沒有出現大幅擴大的現象，不過未來更多隸屬不同國家，競爭力強大的石油公司，加入國際石油天然氣市場，幾乎已是必然的趨勢。因此現在就應積極討論如何促進石油天然氣市場的合理發展，尋求各方都願意尊重的架構。由於目前國際上主要的以及潛在的石油天然氣相關國家，彼此之間仍然存在許多重要的歧異，包括相互間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的態度與角色，都仍然有不同的地方。

這些歧異甚至可能造成互不信任的情勢，因此如何建構大家都能夠尊重的市場架構，應是當前關心國際能源安全所需重視的一環。而為求大家能更一致期待市場機制運作的貢獻，或許需要大家對未來的風險，與採取風險控制措施的重要性，能夠預先尋求共識。唯有各方瞭解到缺乏共同認可的機制，所可能導致集體風險發生後果，是大家都不樂見的，大家才能進一步起而積極推動架構合理的市場秩序。

有了共識之後，則需要透過各種協商取得一些默契與協議，並經由各國政策制訂與執行，使全球未來的能源使用有秩序，不至於發生因為資源短缺造成爭奪與衝突。在今日或許可以預先看到全球的石油天然氣佈局將會產生變化。事實上直到今日全球主要的石油天然氣消費國，除了日本與俄羅斯以外，幾乎都屬歐美國家。尤其石油的消費更是佔據全球能源消費的 40%，而且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而這種狀態下國際石油資源，有時已經呈現吃緊的情況。

如果在這種條件為前提討論，那麼當大陸以開發中國家，並有著龐大人口規模的角色，開始大量進口石油，那麼國際石油資源是不是會不夠？是否開發天然氣在資源考量下是個極關重要的議題？所以在既有的國際石油資源的使用中，大陸成為龐大的新加入者，將導致國際能源市場需要開發新的大量天然氣資源補充。而這個過程必然進一步產生石油天然氣既有分配格局的轉換，那麼如何建構新的資源分配佈局？由於石油市場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國際是否需要一些協議與默契？類似的問題如果能夠以經濟與市場的方式解決最好，但若經濟與市場的運作並不順暢，因此導致供應資源不足的問題，那麼補充的協商手段應屬必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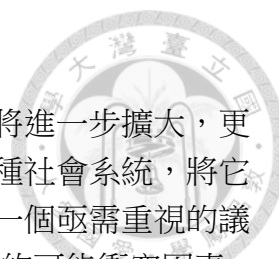
市場的運作解決問題意味著不必有個足以影響全局的力量，就能源的相關使用方式，與各種科技因素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以決定能源供需的配置問題。但若無法使用市場的手段解決問題，目前所預先關心的未來國際間能源資源配置問題，明顯的不同於冷戰期間的架構，那麼將導致如何複雜的情況呢？在冷戰期間，以及延續到前幾年，讓大家關心大陸進口石油的國際議題以前，大陸並沒有參加國際石油天然氣的配置，國際石油天然氣的配置一個相當突出的格局為以美國核心的中東石油向西行到達歐洲，並進一步遠達美國本土提供美國極重要的運輸燃料所需。

另一個明顯的方向為自中東東行到達日本、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國家，因此可以說以國際戰略安全的觀點，這個國際最重要的石油能源佈局，是以美國為唯一主要核心的架構。並且大致說來，石油的供應雖然有與政治演變關係密切的價格與供應問題（能源危機），但卻沒有資源不足導致的供應問題。因而在美國主導的，包括美國本土、歐洲、東亞的石油市場的旨在圍堵共產主義的經濟繁榮政策，在需求面上基本上戰略目標是一元的、無歧異的。

四、資源問題與政經歧異是最大威脅

但今天因（包括大陸的）東亞經濟發展而產生重大變化的國際石油市場，可能必須面對兩個與過去格局不同的因素。一個因素為是否可能產生供應資源不足的問題。另一個則為在這個國際供應系統裡會不會出現兩元的主導力量，以及兩元的戰略目標。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如何能夠經協商或者結合市場運作，而使資源的配置進入穩定的狀態，將會是一個極重要的工作。今天由於冷戰的結束，大陸進行改革與開放的政策，使大陸與美國等國家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上，不再如同冷戰期間，有那麼嚴酷的歧異與衝突。甚至假以時日許多人對於前景抱持很大的樂觀態度。

諸如何林頓政府意圖建立「戰略伙伴關係」（雖然其後的美國政府未必採取相同的立場與戰略相同，但不可否認在決策認知上，存在兩國消除發展戰略基本歧異的可能性），因而其中尤以第一個因素影響更大。縱使沒有戰略上的衝突，但若總體資源量不足，需要透過緊縮滿足供不應求的狀態，以能源在經濟活動中的必要性，將有很困難的環境。因而對於全球能源供應的安全問題，除了加速開發在技術上仍須強調的各種新的替代能源之外，天然氣的探勘開發以及使用將會優先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這個天然氣產業的發展必須結合區域以及全球的眼光，以及石油產業發展的觀點，加以協調促進。這個方向的成功發展將可能替未來數十年，全球能源安全問題提供一個無可替代的基礎條件。在包括大陸的東亞經濟發展，引發能源需求高度成長情況下，沒有這個資源量的保障，國際能源安全問題可能產生難以阻擋的困境。



顯然，在東亞經濟成長條件促動下，國際能源流動的範圍將進一步擴大，更多元的社會系統將被捲入這個流動的潮流中，因此如何避免各種社會系統，將它們不同的戰略衝突表現在更廣泛的國際能源流通系統內，是另一個亟需重視的議題。大陸的經濟改革為這個趨勢提供正面的效應，但是還有更多的可能衝突因素，需要加以解決，簡單舉例，例如以阿的衝突造成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能源危機問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東局勢的相對穩定，也使能源市場較為平穩。

在大陸的情況方面，今日大陸的經濟改革使大陸與國際市場能夠更便於交流，如果仍然維持計畫經濟的模式，那麼除了在面對能源資源的國際配置與流通問題時，可能出現嚴重的分配問題，甚至在與國際的經濟交流方面，也將更形格格不入。那麼與國際市場為主的各類經濟系統，將更無法進行經濟發展的策略對話，雙方希望透過經濟交流互蒙其利，並實現自身的發展策略目標，會變得很困難，並可能將會因而產生嚴重的策略衝突；並且由於能源的特性與國際性，極可能導致將此種衝突投射到能源流通系統裡，使運作產生障礙。

五、展望

國際能源安全今日可能面臨巨大變革來到的時期，雖然大陸乃至東亞能源需求的增長，對國際能源供應未必很快就會造成嚴重衝擊，但由於能源一般投資時間都比較長，因此現在就應予以重視。並且由於極可能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與多種複雜的競爭力量橫互其間，因此應儘早多做溝通，採取各種可能的方式交換意見。唯有累積更多的共識，建立包括政經、科技與安全等多層面，更優越的國際能源秩序，才有可能維持穩定的國際能源市場供應。

亦即除了建構能源安全直接相關的架構外，由於影響能源供需穩定的因素，也包括整個國際政經大環境的優劣，因而依據事實條件，由於國際能源環境具體而微的反應了國際政經條件，因此在目前國際可能已經出現要求建構穩固能源秩序，以滿足未來需求的徵候時，除非能夠努力建構穩固的國際政經環境，否則是不可能營造穩定能源秩序的。或許這是吾人不能不考慮的事實要求。

第五節 小結

能源為一牽涉複雜因素龐大系統的基礎產業，它的關聯領域不只限於臺灣，基本上臺灣初級能源並非來自自產，而是幾乎完全依賴進口，而在後冷戰複雜的國際情勢裡，原本（包括冷戰時期）臺灣的石油、電力是國營型態政府管制經營，而在 1980 年代之後臺灣經歷政經轉型中，也探討推動能源產業自由化的進程，由



於能源的技術面與國際政治關聯的特殊性質，使能源產業與型態轉型，成為政經轉型與國家發展中，特殊且必須重視的探討議題，例如雖然威權時期國營型態能源產業的效率是個重要議題，那麼民主化的能源產業如仍維持國營那麼管理管制應如何轉型？

而正如臺灣已經在嘗試探索推動能源產業由國營為初始狀態的自由化轉型，那麼高度關聯國際資源複雜而基礎且具獨特資源與技術特性的臺灣能源應如何認識其市場機制的適用性以及可能的功能效益，本章第一節對此進行了基礎研究，基本上當前的能源產業特性，與市場功能的發揮存在必須特別關注的所在，在尋求自由化的目標時需要特別注意，而在產業的繼續發展過程裡，此一基本理論的關注仍不宜輕忽。而這個基本理論的參照是牽涉國際能源發展相關環境的，這一點在其後各節也都可以看到。

與能源產業高度相關的溫室議題正在國際上受到高度重視，但此一議題仍存在高度資訊不確定的問題，包括溫室效應對全球衝擊程度的不確定，與國際對臺灣因應減量政策的期待的不確定，尤其此一議題在能源產業的關聯裡，如何確認相關影響與衝擊，以及在政經轉型架構下可能採行的應對方案的知識，更是應該著力的所在。就政策討論而言，面對能源溫室氣體減量的挑戰各方意見仍多分歧。本章第二節目的即在嘗試掌握問題的根本，釐清能源需求的性質，提供一個思考架構。其中也據以提出一些政策方向觀點，如依據溫室效應嚴重程度的認定，針對相應的各種不同能源市場性質，採取不同能源使用，支付不同成本的政策，以導引各種資源在考慮溫室效應的環境成本下，達到最適的配置要求。

進一步引申應根據臺灣產業發展的實際經驗，要求高消費使用較高成本的再生能源，以提供鼓勵新的再生能源研發的市場；或將部分原屬高消費的利潤，透過能源使用的稅收政策，導向新能源開發投資。另外以更廣泛的視角，思考能源的溫室議題仍有相當的不確定，因應的技術、制度面仍有相當可能空間有待開拓，結合能源自由化政策的探索，考慮在國際分工的發展模式下，推動能源產業的輔導工作。尤其加強在資訊、制度、科技研發與引進、海外市場合作與開拓、生活設計與基層地方政府參與方面。

第三節討論值此面臨劇烈變動的情勢，以國際石油市場的角度探討臺灣石油產業的挑戰與可能應對的問題。基本上亞洲石油市場各國條件多樣，且多面臨起飛發展時期，且石油市場對各國來講，都是重要不可或缺的產業，不過根據經濟的要求，有部分的國際市場調節，可以發揮更大的經營效率。不過開拓國際石油產業經營，其實充滿挑戰，必須更充分瞭解亞洲的國際油市發展趨勢，據以做適當的策略調整，才不至舉措失據，甚至嚴重影響國內市場的穩定性。第四節討論國際能源安全面臨巨大變革來到的時期，且極可能其中仍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存

在，加以能源一般投資時間比較長因此應予重視，目前國際可能已經出現要求建構穩固能源秩序，以滿足未來需求的徵候時，本節討論除非能夠努力建構穩固的國際政經環境，否則是不可能營造穩定能源秩序的。



表 5-1 能源供需平衡表(原始單位) (一)



民國 109 年

能源種類	單位	自產	進口	出口	國際海運	國際航空	存貨變動	初級能源 總供給	產品間轉 換(轉出)	損耗及統計差異
煤及煤產品	千公秉油當量		41,544.5	92.0			931.2	40,521.2		-758.6
煙煤-煉焦煤	千公噸		6,569.7				-226.4	6,796.2		892.4
煙煤-燃料煤	"		44,696.3				778.0	43,918.3		-2,479.7
無煙煤	"		338.8	1.4			-7.0	344.4		33.1
亞煙煤	"		11,658.1				961.6	10,696.5		-199.7
焦炭	"		248.2	116.8			137.0	-5.6		145.8
焦爐氣	百萬立方公尺									0.1
高爐氣	"									187.0
轉爐氣	"									17.8
原油及石油口品	千公秉油當量	81.8	61,090.3	14,419.4	1,328.4	2,074.3	736.0	42,614.0	4,117.9	-217.4
原油	千公秉	2.2	42,915.9				714.7	42,203.4		-13.5
煉油廠進料	千公秉油當量	79.7					0.5	79.2		0.0
煉油氣	百萬立方公尺									
液化石油氣	千公秉		2,676.1	50.6			-0.6	2,626.1	261.7	-6.1
石油腦	"		14,561.2	215.4			237.1	14,108.6	3,036.0	59.6
車用汽油	"		245.2	2,324.9			16.0	-2,095.6	60.6	-68.8
航空汽油	"									
航空燃油	"		92.3	989.1		2,333.5	-6.4	-3,224.0	179.3	326.7
煤油	"						-0.4	0.4	0.0	0.1
柴油	"			7,817.0	166.3		-199.9	-7,783.3	108.6	-79.4
燃料油	"		578.3	1,660.0	1,099.8		49.3	-2,230.8	916.3	-382.3
潤滑油	"		316.3	577.0	0.0		17.5	-278.3	0.4	
柏油	"		110.4	239.4			-7.4	-121.6		
溶劑油	"		1,867.7	76.8			-5.7	1,796.6	1.5	
石油焦	千公噸		35.6	609.2			-67.2	-506.3		
其他 ²	千公秉油當量		455.3	727.4			-1.9	-270.1	1.4	
天然氣	千公噸	70.9	17,939.8				37.6	17,973.1	19,368.9	-52.7
(自口)天然氣	百萬立方公尺	105.3					170.4	-65.1		0.7
(進口)液化天然氣	"		23,680.6				-101.8	23,782.4	25,566.9	-70.2
生質能及廢棄物	千公秉油當量	1,672.0	4.4				0.0	1,676.4	0.0	
核能	百萬度		31,440.2					31,440.2		
水力	"	3,019.2						3,019.2		

(未完)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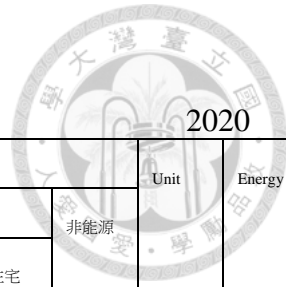
能源種類	單位	自產	進口	出口	國際海運	國際航空	存貨變動	初級能源 總供給	產品間轉 換(轉出)	損耗及統計差異
地熱	'	1.9						1.9		
太陽光電	'	6,095.3						6,095.3		
風力	'	2,433.1						2,433.1		
電力	'									8,892.8
太陽熱能	千公秉油當量	104.4						104.4		
熱能	千公噸									

註：1.航空燃油包含汽油型及煤油型

2.其他包含添加劑含氧化合物、天然汽油、白精油、石蠟、其他石油產品

資料來源：本表取自經濟部能源局網站《能源統計年報》／綜合能源／能源供需平衡表(原始單位)，110.06.30。格式略作調整。

表 5-1 能源供需平衡表(原始單位) (二)



轉變投入				轉變 產出 合計	國內能源消費									Unit	Energy Source	
合計	煉焦 及煤氣	石油煉 製	發 電		合計	能源部 門 自用	能源消費						非能源			
							小計	工業	運輸	農業	服務	住宅				
42,396.4	11,200.0		31,196.4	8,138.2	7,021.6	1,254.7	5,453.4	5,453.4						313.5	10 ³ KLOE	Coal & Coal Products
5,903.8	5,903.8														10 ³ tonne	Bituminous Coal-Coking Coal
40,907.7	3,687.8		37,219.9		5,490.3		5,490.3	5,490.3							"	Bituminous Coal-Steam Coal
					311.2	269.8	269.8							41.4	"	Anthracite
10,896.2			10,896.2												"	Sub-Bituminous
4,889.5	4,889.5			5,954.8	913.9		552.8	552.8						361.1	"	Coke
719.0			719.0	3,001.4	2,282.4	582.7	1,699.7	1,699.7							10 ⁶ m ³	Coke Oven Gas
7,566.5			7,566.5	21,197.5	13,444.0	10,558.7	2,885.2	2,885.2							"	Blast Furnace Gas
682.7			682.7	1,328.7	628.2	342.8	285.4	285.4							"	Oxygen Steel Furnace Gas
43,851.8		42,552.4	1,299.4	49,429.2	44,290.8	2,858.7	17,316.1	1,345.3	13,366.1	471.3	925.0	1,208.4	24,116.0	10 ³ KLOE	Crude Oil & Petroleum Products	
42,216.9		42,216.9													10 ³ K.L	Crude Oil
79.2		79.2													10 ³ KLOE	Refinery Feedstock
311.8			311.8	3,420.7	3,108.9	2,222.3	886.7	886.7							10 ⁶ m ³	Refinery Gas
1.1			1.1	1,692.1	4,061.5	182.1	2,222.4	397.2	20.4		165.6	1,639.2	1,657.0	10 ³ K.L	L.P.G	
				10,854.8	21,867.8								21,867.8	"		Naphthas
				12,258.0	10,170.5	4.0	10,166.5	5.8	10,105.9	11.8	43.0				"	Motor Gasoline
															"	Aviation Gasoline
				4,036.2	306.3		306.3	0.7	89.6		216.0				"	Jet Fuel ¹
				5.1	5.4	0.0	5.4				5.4				"	Kerosene
67.1			67.1	13,711.4	5,831.8	38.0	5,793.9	123.2	4,793.4	466.9	410.3				"	Diesel Oil
857.9			857.9	4,673.5	1,050.9	68.2	982.7	748.2	36.6	23.7	174.1				"	Fuel Oil
				806.9	528.2								528.2	"		Lubricants
				575.5	453.9								453.9	"		Asphalts
				41.3	1,836.5								1,836.5	"		Solvents
				958.8	452.5	387.9							64.6	10 ³ tonne		Petroleum Coke
275.6		256.4	19.2	1,720.4	1,173.2	38.5	12.8	12.8					1,122.0	10 ³ KLOE		Other ²

(續)



轉變投入				轉變 產出 合計	國內能源消費								Unit	Energy Source
合計	煉焦 及煤氣	石油 煉製	發 電		合計	能源部 門 自用	能源消費			非能 源				
14,300.7		43.6	14,257.2	19,533.9	3,890.2	404.7	3,485.5	2,514.1		3.0	347.6	620.7	10 ³ tonne	Natural Gas
1.7			1.7	2,007.6	1,940.0	22.4	1,917.6	697.6			373.7	846.3	10 ⁶ m ³	(Indigenous) Natural Gas
18,875.4		57.5	18,817.9	24,000.3	3,410.6	514.3	2,896.3	2,698.5		4.0	126.6	67.1	"	(Imported) L.N.G.
1,247.2			1,247.2		429.1		429.1	429.1	0.0				10 ³ KLOE	Biomass and Waste
31,440.2			31,440.2										GWh	Nuclear
6,178.1			6,178.1	3,158.9									"	Hydro
1.9			1.9										"	Geothermal
6,095.3			6,095.3										"	Solar PV
2,433.1			2,433.1										"	Wind
				280,139.9	271,247.1	19,306.0	251,941.1	150,742.3	1,481.0	3,273.3	46,237.4	50,207.1	"	Electricity
					104.4		104.4				3.1	101.3	10 ³ KLOE	Solar Thermal
				29,840.3	29,840.3	6,830.0	23,010.4	22,997.6			12.8		10 ³ tonne	Heat

註：1.航空燃油包含汽油型及煤油型

2.其他包含添加劑含氧化合物、天然汽油、白精油、石蠟、其他石油產品

表 5-2 發電裝置容量統計表(一)

單位：千瓩

項 目	民 國 94 年 2005	民 國 95 年 2006	民 國 96 年 2007	民 國 97 年 2008	民 國 98 年 2009	民 國 99 年 2010	民 國 100 年 2011	民 國 101 年 2012
台電	28,893.9	30,093.7	30,792.5	31,263.5	32,311.0	32,944.2	32,758.4	32,205.0
水力	4,501.0	4,501.0	4,501.0	4,501.0	4,500.0	4,540.5	4,603.8	4,644.4
慣常 ¹	1,899.0	1,899.0	1,899.0	1,899.0	1,898.0	1,938.5	2,001.8	2,042.4
抽蓄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火力	19,231.1	20,400.9	21,015.7	21,486.7	22,487.2	23,010.0	22,717.7	22,119.7
燃煤	8,650.0	9,200.0	8,800.0	8,800.0	8,800.0	8,800.0	8,800.0	8,200.0
燃油	3,608.7	3,609.7	3,609.7	3,609.7	3,610.2	3,625.6	3,324.6	3,326.6
燃氣	6,972.4	7,591.2	8,606.0	9,077.0	10,077.0	10,584.4	10,593.1	10,593.1
核能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地熱								
太陽光電						0.5	6.1	10.1
風力	17.8	47.8	131.8	131.8	179.8	249.2	286.8	286.8
民營電廠	7,230.7	7,280.5	7,292.1	7,373.2	7,939.1	7,971.3	7,980.5	8,028.9
慣常水力	10.7	10.7	22.3	39.0	39.0	39.0	39.0	39.1
火力	7,220.0	7,220.0	7,220.0	7,220.0	7,710.0	7,710.0	7,710.0	7,710.0
太陽光電								
風力		49.8	49.8	114.2	190.1	222.3	231.5	279.8
自用發電設備	7,012.7	7,646.2	7,764.0	7,688.0	7,670.9	7,928.1	8,014.3	8,145.4
火力	6,332.3	6,942.8	7,047.9	6,968.8	6,947.8	7,180.4	7,180.4	7,209.4
慣常水力								
地熱								
太陽光電	1.0	1.4	2.4	5.6	9.5	34.1	123.8	221.2
風力	6.1	4.4	4.4	4.4	4.4	4.4	4.4	4.4
生質能	89.5	88.1	86.8	86.8	86.8	86.8	81.3	81.3
廢棄物	583.8	609.5	622.5	622.5	622.5	622.5	624.4	629.1
合計²	43,137.4	45,020.5	45,848.6	46,324.6	47,921.0	48,843.5	48,753.2	48,379.3
抽蓄水力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核能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火力	32,783.4	34,563.7	35,283.6	35,675.5	37,145.0	37,900.4	37,608.1	37,039.1
再生能源 ³	2,608.0	2,710.7	2,818.9	2,903.2	3,030.0	3,197.1	3,399.1	3,594.2

註：1.台電慣常水力含自設及託營機組。2.本表合計為全國總裝置容量，包含民營與汽電共生自用發電設備裝置容量，與台電系統裝置容量不同。3.本表之再生能源為地熱、太陽光電、風力、生質能及廢棄物。

表 5-2 發電裝置容量統計表(二)

單位：千瓩

項 目	民 國 102 年 2013	民 國 103 年 2014	民 國 104 年 2015	民 國 105 年 2016	民 國 106 年 2017	民 國 107 年 2018	民 國 108 年 2019	民 國 109 年 2020
台電	32,218.2	31,651.2	31,669.1	32,466.8	31,750.0	33,414.8	35,386.0	35,455.8
水力	4,644.4	4,644.4	4,652.4	4,652.4	4,652.4	4,652.4	4,652.4	4,652.4
慣常 ¹	2,042.4	2,042.4	2,050.4	2,050.4	2,050.4	2,050.4	2,050.4	2,050.4
抽蓄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火力	22,132.5	21,560.5	21,560.5	22,358.2	21,641.4	23,933.0	26,425.6	26,341.6
燃煤	8,200.0	7,600.0	7,600.0	8,400.0	9,200.0	10,000.0	11,600.0	11,600.0
燃油	3,325.4	3,325.4	3,325.4	3,323.1	2,570.1	2,569.1	2,569.1	1,592.5
燃氣	10,607.1	10,635.1	10,635.1	10,635.1	9,871.3	11,363.9	12,256.5	13,149.1
核能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4,508.0	3,872.0	3,872.0
地熱								
太陽光電	10.5	15.5	18.2	18.2	18.2	18.2	123.6	277.4
風力	286.8	286.8	294.0	294.0	294.0	303.2	312.4	312.4
民營電廠	8,081.3	8,110.5	8,119.2	8,162.8	8,196.4	8,729.6	8,895.6	9,110.9
慣常水力	39.1	39.1	39.1	39.1	39.1	41.3	42.3	42.3
火力	7,710.0	7,710.0	7,710.0	7,710.0	7,710.0	8,216.3	8,216.3	8,216.3
太陽光電	9.2	15.5	21.8	30.1	53.3	66.6	109.2	317.4
風力	323.0	346.0	348.3	383.7	394.0	405.5	527.8	535.0
自用發電設備	8,499.5	8,651.3	8,877.	8,949.9	9,339.7	10,521.6	11,857.1	13,171.6
火力	7,394.5	7,331.5	7,319.6	7,039.6	6,930.0	7,151.2	7,224.2	7,224.2
慣常水力								0.7
地熱						0.0	0.3	0.3
太陽光電	390.2	605.0	844.2	1,196.7	1,696.2	2,653.3	3,916.7	5,222.5
風力	4.4	4.4	4.4	4.4	4.4	4.5	5.0	6.3
生質能	81.3	81.3	80.0	80.0	80.0	80.0	79.0	85.7
廢棄物	629.1	629.1	629.1	629.1	629.1	631.9	631.9	631.9
合計²	48,799.0	48,413.0	48,665.7	49,579.6	49,286.1	52,666.0	56,138.7	57,738.3
抽蓄水力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2,602.0
核能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5,144.0	4,508.0	3,872.0	3,872.0
火力	37,237.0	36,602.0	36,590.1	37,107.8	36,281.4	39,300.5	41,866.1	41,782.1
再生能源 ³	3,816.1	4,065.1	4,329.6	4,725.8	5,258.7	6,255.6	7,798.6	9,482.2

資料來源：本表取自經濟部能源局網站《能源統計年報》／個別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統計表，110.06.30。格式略作調整。





第六章戰後臺灣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舉例：兩岸經貿發展

本博士論文採「整合理論應用」架構，運用「國家發展論」，進一步更深入探討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脈絡」。這個「發展脈絡」內含外部強烈影響因素，例如牽涉國際與其他內外範圍因素的「一個中國」議題，並且也探討 1980 年代後國際與內部政經情勢劇變下的臺灣經濟政策的意涵。而從那時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以及臺灣對中國的人員交流與經貿交流的開放，也啟動了「兩岸經貿」的發展，並且在短短的四十年間，「兩岸經貿」的規模已經極為龐大。

但不應忽略「兩岸經貿」是在全球供應鏈裡（尤其與美國市場有著密切關聯）的一部份。由此可見「兩岸經貿」此一議題牽涉廣泛的情勢與結構的脈絡，可以如第三章從關聯全球格局與結構的歷史脈絡討論，而其中也應用了軍事主義的觀點；亦可能如第二章第二節先聚焦於比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角度探討。本章嘗試以軍事主義理論對此做一學理結合探索，希望能夠提供對此一重要議題的某些貢獻。第一節對此理論做一簡單介紹；第二節討論「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臺灣的兩岸經貿發展」；第三節在前述脈絡裡繼續介紹「後冷戰美中與兩岸經貿發展」；第四節兩岸經貿的重建其實有著東西冷戰隔離的背景，這種情勢「產業軍事主義」似可適用作為解釋之論述。本章嘗試以「產業軍事主義論述探析兩岸經貿」。

第一節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與產業軍事主義

一般自由經濟理論多以市場供需與競爭解釋產業發展，事實上市場力量也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本章所探討的兩岸經貿涉及與中國的經貿，中國的經濟運作卻是由原計畫經濟轉型而來，今天仍不被承認為已屬完整充分的市場經濟，這是本章的討論必須特別注意之處。而臺灣自身的經濟運作過去也受到政治威權體制的影響，而在進入威權轉型與民主化階段，結合致力於加入國際貿易組織，也同時對經濟運作採行自由化、國際化與民營化的措施。此外在現代社會由於產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發展，使得產業所提供的能量甚至超過單純依靠勞力的能量千百倍，因此產業的發展也產生深刻影響軍事能量發揮的效應，故而現代以國家組織、管理的軍事活動也介入產業的發展，目的即希望不只從一般產業中獲致軍用的能量，甚至從所介入產業的發展中獲得特定的軍用能量，軍事活動介入產業發展，甚至因此深刻影響產業發展的方向與速度。

一些軍事主義論述也已注意到軍事相關活動在現代社會的廣泛影響¹²²，包括產業面的影響。因此經由軍事主義的討論或許可以提供產業發展一些自由經濟關注不足的觀點，尤其軍事主義的討論在現實世界中與冷戰的全球二元體系，以及後冷戰的變革做了聯結。而由於兩岸經貿曾經受到兩岸與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經歷極端的轉折歷程，其中冷戰時期全球二元體系的架構，以及後冷戰的戲劇發展，都產生重大效應；加以軍事主義論述似也在兩岸各自的產業發展歷程中顯現跡證；所以將軍事主義論述的基本觀點，與兩岸經貿發展聯結，或許可以獲得一些未曾有的啟發，本章主旨即在從事此一嘗試。

壹、比較制度理論的討論

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已建構整合比較政治之政治體系一般架構，與自由競爭市場特性構成架構之比較制度分析架構，並以之作各種制度的比較。回顧此第二章關於「自由競爭市場經濟」、「計畫經濟」、「計畫經濟漸進改革的今日中國經濟」的基本特性比較，可以看到「政府」或「政治體系」在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體系」裡的角色，是一個觀察比較不同「體系」的重要變項，在「計畫經濟」裡，「經濟體系」是「政治體系」的「子體系」；而「自由競爭市場經濟體系」與「政治體系」是「政治體系」的「環境」；那麼「計畫經濟漸進改革的今日中國經濟體系」只是「政治體系」的「環境」了嗎？或者仍是「政治體系」的「子體系」？從美國「貿易代表署」與「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對於中國的是否仍屬「非市場經濟」的報告裡，可以看到美國所持有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系」仍廣泛而深刻的介入經濟活動之中，並且認為這成為其他「自由競爭市場經濟」貿易國的成本。

在對「計畫經濟」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做基本特性比較時，可以發現兩者特性呈現尖銳對比，且各自的特性組合裡的特性之間具有相互搭配的關聯性，而「現在中國經濟」是一種有著龐大規模的經濟體，由原本的「計畫經濟」以增量改革的漸進方式在不長的期間裡，快速引進市場的內涵轉型而來，並且原來的「計畫經濟」體系其實是「政治體系」的「子體系」，因此推動轉型的動力來自「政治體系」，但轉型過程其實也充滿阻滯力量，這個阻滯力量其實也來自「政治體系」，就是支持轉型的動力超過阻滯動力，「政治體系」就推動轉型。改革到了今天，「中國現在經濟」模式仍某種程度的保留著源自「計畫經濟」雖有變

¹²² 「軍事主義」為英文“Militarism”之翻譯。本章討論之「軍事主義」（或稱「軍國主義」）主要是本章文獻回顧、第二章理論論述以及第三章中所討論的 Militarism。尤其以 McGrew 所稱「軍事主義邏輯」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國家形成的主軸，這樣的觀點看待「軍事主義」。並且，也回到 Mann 關於“Militarism”的論述，認為此一邏輯並不只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適用，而更具有一般性，包括社會主義的蘇聯。本文則就臺灣與中國大陸產業發展中的軍事主義關聯進行探討，並進而以之討論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參考文獻同註 36。

形，但與「自由競爭市場」呈現強烈對比的基本特性，那麼「中國現在經濟」模式何去何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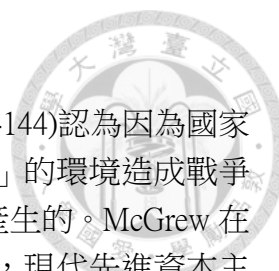
首先中國經濟現在模式已是一個自我滿足、可長可久的模式了嗎？其次這種模式在與主要的經貿對手國往來互相間能夠彼此滿意嗎？如果答案並非肯定，那麼的第三個問題是：應如何調適？這些問題並非想像而已，這是實際的問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將何去何從？問題都不是簡單的問題，「中國現在的經濟」模式所想要包含的一組基本特性，與「計畫經濟」、「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分別有的一組互相尖銳對立的基本特性，並不相同，而是一組介於兩組基本特性之間的組合，那麼行得通嗎？與明顯歸類於「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經濟模式之間能協調嗎？事實上本章討論的，這部分具有關鍵性意義，也已見到他們彼此之間已有激烈衝突問題。

綜而言之，冷戰時期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為名的計畫經濟，美國與西方則實行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臺灣此時處在對經濟領域存在控制能力的威權體制，但因規模較小，產業與經濟發展階段仍然處於較落後階段，而且在憲政層次仍追求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因此與美國與西方發展出了密切的經濟與政治關係。之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臺灣及美國西方的經貿關係開始萌芽，並逐漸轉變，進而迅速升溫，而在臺灣也在此一階段推動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轉型。因而就比較制度而言，當今是美國、西方與臺灣採行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制度，與此相對，中國則採行由計畫經濟而來，但已非完整計畫經濟，漸進引入市場經濟，但仍不被美國與西方承認為市場經濟，政治則仍堅持共產黨領導的轉型制度安排。

貳、軍事主義的論述介紹¹²³

McGrew(1992: 65-126)所談到的軍事主義邏輯，是以 Mann 多國體系中軍事主義做為「基礎」的「產業」軍事主義邏輯。亦即 McGrew 是在接受 Mann 有關軍事主義論述的基礎上，特別著重產業部份的軍事主義意涵，而進一步衍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Mann(1988: 124)認為「軍事主義」指的是社會的一種態度並有一組機構視「戰爭」與「準備戰爭」為正常且想要的社會活動。Mann 是以「社會」對「戰爭」與「備戰」的「態度」界定「軍事主義」，且由於社會對「戰爭」與「備戰」抱持渴望的「態度」，因此該社會包含著廣泛的對「戰爭」與「備戰」的「常態性」活動，亦即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戰爭」與「備戰」並非戰時的「非常時」的社會活動，而應為恆常的社會活動主軸之一。而 McGrew 在討論此一軍事主義時更聚焦在「產業」的軍事主義，亦即專注在與戰爭、備戰有關做為常態性的社會產業活動。並因此認為與戰爭、備戰攸關的產業活動是任何時期社會活動的主軸之一。

¹²³ 參見註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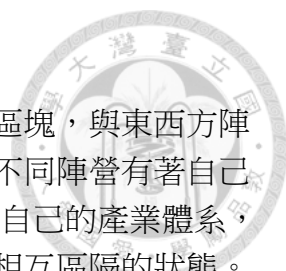


「戰爭」與「備戰」會成為社會活動主軸，Mann(1988: 139-144)認為因為國家歷來往往處於「多國體系」的環境，而也正是此種「多國體系」的環境造成戰爭成為正常且經常是理性的元素。所以軍事主義是應國家的需要產生的。McGrew 在回顧產業的軍事主義時指出現代的備戰不再只是招募軍人而已，現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備戰活動為求贏得戰爭，必須發展複雜的武器系統，需要的是高度資本密集的，必須透過複雜整合產業與科技基礎建設才能發揮作用的備戰工作，也是備戰的「產業化」過程，因此備戰成為一個社會不間斷的連續活動，不可能再全然清晰劃分「民間」與「軍事」部門，而且也沒有辦法截然劃分「平時」與「戰時」。

但這種的軍事主義不再是過去曾經出現的以軍事部門領導全社會的模式，而是民間產業、科技能力參與備戰做為備戰重要部門的一種模式，並且使得備戰工作透過產業化過程深刻影響社會。McGrew 引用 Thee(1986:101-126)關於「軍工官技複合體(MIBT military-industrial-bureaucratic-techono-complex)」的觀念介紹備戰工作在社會產業活動中的影響，而此一 MIBT 的觀念卻被許多論述做了不同方向的引申，其中 Mann(1988: 183)則將他放在全球脈絡中討論。

Mann(1988: 180-183)認為軍事主義有三種型態，第一種是「嚇阻科學」軍事主義，由東西方陣營的菁英所奉行；第二種是「軍事化社會主義」，支配著蘇聯人民；第三種是「旁觀者運動」的軍事主義，支配西方市民。因為地緣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差異蘇聯人民與該國的軍事活動關係遠較西方國家密切，東西方對抗的中心在中歐就在蘇聯的邊境，但卻較遠離西方人民，國內政治經濟制度的差異也是重要因素，蘇聯社會主義的中央計畫經濟制度其實脫胎於戰時管制經濟，此一經濟制度有著由上而下的指令關係，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人民則有紀律的要求。因此軍事所需的產業活動只要能在政治上得到認可，自然就可以安排進入計畫之中。Mann 在冷戰二元對抗體系之中討論軍國主義，軍事化社會主義支配的是蘇聯人民，或許 1949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也可以劃入軍事化社會主義的範疇，但 1960 年代中蘇交惡之後，尤其 1970 年代美國聯中制蘇之後，中國大陸不一定屬於蘇聯陣營，中國大陸的情況或許應該有一些額外的討論才對。

第二節 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臺灣的兩岸經貿發展



壹、兩岸經貿的重建¹²⁴

產業發展與軍備有著密切關係，冷戰時期世界劃分不同的區塊，與東西方陣營分處不同區塊相呼應，產業與軍備有著區域上明顯的區隔。不同陣營有著自己的軍備體系自不待言，與軍備體系的區隔相呼應，不同體系也有自己的產業體系，因此不論軍備體系或者產業體系，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也呈現相互區隔的狀態。但自 198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的市場越來越向國際開放，尤其到了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後冷戰時期來臨，1993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也明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93）¹²⁵，原西方陣營的資金與設備大量湧進中國大陸，且隨著時間流逝經貿交流的趨勢越趨廣泛深化，兩個陣營的區隔就越來越混淆，雖然產業的交流越來越密切，但是軍備的交流相對則意願不那麼高，因此使得軍事主義邏輯所論述的產業與軍備的關聯，隨著情勢發展也變得益形複雜。其中臺海兩岸經貿發展與軍備之間的關聯也出現明顯的對比，或許在探討兩岸經貿發展問題值得特別加以關注。

戰後「西方」與「共產」兩個陣營構成的全球冷戰體系儼然成形，1949 年國府退守臺灣，隔海與中共政權對峙，美國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與之建交，對臺進行軍經援助，將臺灣吸納進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臺灣蔣介石實行包括思想控制的反共威權統治，中共文革則清算臺灣關係，兩岸包括文化、經貿、社會等各方面盡皆隔絕。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發佈〈會議公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¹²⁶，1979 年人大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¹²⁷，此後中國大陸即不禁止臺商赴中做生意、投資，但臺灣方面採取的是禁止的態度。

1979 年初臺美斷交，年中美國的〈臺灣關係法〉¹²⁸生效，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雖然造成臺灣黨外勢力外表的挫折，但數年之後，1986 年反對黨民進黨成立，在當局未依據「黨禁」法律執行的情況下，政治上一黨專政不再是必然的情

¹²⁴ 所謂「重建」指的是約略 1949-80 年兩岸曾經出現嚴重的分離，包括「兩岸經貿」往來呈現的是靜止與隔絕，因而今日兩岸經貿繁盛的往來在時間座標上有著「重建」的意義。兩岸的分離或許也應將 1895-1945 年日本統治臺灣時期計入，至於更之前的歷史兩岸之間大多並非分隔狀態，但清初也曾經「遷地 30 里」以防明鄭。

¹²⁵ 中共中央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93）。〈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¹²⁶ 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78）。〈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¹²⁷ 全國人大常委會（1979）。〈告臺灣同胞書〉。中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10733.htm>。

¹²⁸ 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況。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且在美國的要求下，1987-8年臺幣對美元大幅升值，此次臺幣升值對臺灣產業造成明顯衝擊，使得外幣計算的臺灣工資成本大幅提高，外銷的商品以及國內資本財價格大漲。1988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同年中共國務院公布〈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1988）¹²⁹，臺灣廠商面對兩岸關係緩解，國內政治威權轉型，以及產品成本驟升的壓力等因素影響，開始間接投資中國大陸。

此後兩岸經貿關係迅即升溫，但是兩岸的軍事交流則處於冰凍狀態，此一狀態一直延續迄今，不止兩岸軍事交流關係與經貿交流不能比較，就是美中的軍事交流也遠落經貿之後。而當軍事交流仍然阻滯的時候，經貿交流卻發展成為彼此經濟與產業中重要一環的狀態，對於「產業軍國主義」的論述將造成如何的沖激？雖然兩岸之間的軍事交流發展不多，但是臺灣產業與經貿卻迅速建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甚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國家的商人採取更謹慎的評估態度時，臺商感受到的不安卻明顯較少，尤其1990年臺灣提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1991年初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院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¹³⁰，數月之後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¹³¹並於同年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

除建構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機制外，在內政方面也終止〈懲治叛亂條例〉。¹³²1992年〈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開始施行，在兩岸之間嘗試建立一個新的結合政治、經濟、產業、文化與社會的關係，使得此一趨勢在兩岸經濟推拉力量以及臺灣逐漸排除政治阻力下愈趨明顯。但此一趨勢並不包括軍事領域的交流，且在經貿領域也仍有著明顯的方向性，即投資為臺灣向大陸的投資，貿易則臺灣出口中國大陸遠多於自中國大陸進口量。並且可以發現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與臺商中國大陸投資有密切關係，而投資中國大陸的臺商此時仍然沒有改變出口的原來市場，他們將原來在臺灣生產出口到美國客戶的產品改為中國大陸生產。亦即隨著內外政治經濟情勢的轉變，兩岸開始建構並發展經貿往來的狀態，但是此一新發展的狀態卻仍隱含著臺商過去的經營脈絡，而臺商此一脈絡卻是在處身冷戰西方陣營建立起來的，此一產業脈絡與軍備有著一致性。¹³³

臺商海外投資是臺灣產業發展過程中很醒目的一個里程碑，而臺商的海外投資基本大幅集中在中國大陸。縱使在農業時代臺灣產業歷史中與海外的關聯並不稀奇，尤其與中國大陸的關聯，這個歷史事實甚至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荷蘭據臺

¹²⁹ 國務院（1988）。〈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

¹³⁰ 國家統一委員會（1991）。〈國家統一綱領〉。

¹³¹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二一二三號令廢止。

¹³²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總統令發布廢止。

¹³³ 請參考本博士論文第三章之第四節關於冷戰時期臺灣產業發展之介紹。

時期，這些不同歷史階段的海外關聯模式，當然與各個階段的產業或商業利益架構有關，不過也可以明顯看到各個階段的政治架構的影響，荷蘭時期的荷人轉口貿易興趣，明清交替的鄭芝龍家族勢力更是以一種「商盜」的姿態出現，亦即鄭家武力與商業的績業難以劃分，清朝的漢人分工貿易，日本人的內地與殖民地工農分工貿易，殖民後期的臺灣產業政策明顯與戰爭有關（戴寶村，2006；張宗漢，1980）¹³⁴，戰後與美日構成的國際分工貿易則支撐臺灣的軍備，而在美中建交，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十年，臺商因應此一戰後全球冷戰體系下形成的國際分工狀態下的貿易條件的劇烈變動，開始大舉投資中國大陸發展兩岸經貿關係，但背後的政治經濟環境又是如何呢？¹³⁵

冷戰時期全球分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以及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二個體系的架構。中共雖屬共產陣營，但與蘇聯之間存在矛盾，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以及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西方世界在全球二元意識形態的觀念下，基於對本身制度優點的信心，認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必將朝向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轉變，因此也對中共融入西方體系充滿期待。尤其 1991 年蘇聯解體，全球體系進入「後冷戰」時代，整體格局面臨重整。基本上以制度與意識形態分野的國際二元體系已經在中共的改革開放以及蘇聯解體、東歐轉型的情況下無法繼續維持涇渭分明的態勢。中共的改革開放逐漸揚棄過去共產主義國家的計畫經濟體制，採行物質誘因的市場交易制度，對全球劃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逐漸造成衝擊，蘇聯的解體對冷戰的國際體系的影響更大，更加強化西方國家對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自信（Lake, 1993；林茂昌〔譯〕，2007：353）。¹³⁶

「後冷戰」時代全球格局的重整混淆過去意識形態的分隔作用，也牽動原在冷戰時期建立的國際產業關係。中國大陸未充分開發的土地與資源、廉價勞動力，中共官員旺盛的發展經濟企圖，對資金、設備殷切的需求，使中國大陸的投資與貿易機會提供可能的豐厚的商業營利空間，也吸引外商絡繹於途，其中包括大量臺商，臺商除商業因素之外，也是中共政府基於追求兩岸的和平統一政策積極拉攏的對象（全國人大常委會，1979；國務院，1988）。自 1978 年中共推動體制改革，內部對於制度走向即充滿爭議，直到 1992 年中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後其內部關於制度基本走向的爭議才減少，但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

¹³⁴ 戴寶村（2006）。《臺灣政治史》，國立編譯館主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張宗漢（1980）。《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¹³⁵ 同註 133。

¹³⁶ Lake, Anthony (1993).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eptember 21.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lakedoc.html>

濟」的實質內容則有待實踐才能顯現（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93）。

事實上，希望融合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創造「第三條路」，在實際的操作上是充滿挑戰的。因此就軍事主義的論述而言，這裡出現二個必須思考的問題，首先在中共進行改革開放無法立即採行與西方相同的價值與制度的過程中，雙方的軍事領域將如何相互對待？第二，縱使雙方在價值與制度已能摸索出相容之道，軍事領域又應如何相處？

雖然仍在演化過程中，但當前雙方基本制度不同，且中共在國際上採行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以追求兩岸的統一，這個基本態勢使得臺灣的兩岸經貿政策制定者對與對岸的經貿發展仍產生戒心，但是中國大陸卻提供大量的商業機會，使得兩岸經貿發展迅速成長，包括李登輝與陳水扁都試圖抑制或者引導兩岸經貿發展，當然他們主要關注的仍是兩岸相對的主權關係。關心兩岸主權關係的不只是兩岸，中共在國際上採行堅定的立場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所有與中共交往的國家都必須謹慎面對這個議題，而恰好西方世界的龍頭美國與臺灣即有著密切的政治經濟關係，這個雙方的密切關係在國共內戰時期即已醞釀。

在兩岸經貿關係重新建立的時期，中國大陸的一般產業的發展水準遠遠落後於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也落後於臺灣的水準，外商與臺商到大陸投資生產的產品大多為勞動密集的民生用品，這類產業對於當代尖端軍備所需要的高技術與資本密集是有些差距，因此在兩岸經貿重建的初期臺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所關聯的產業技術與資金較少，在軍事應用的意義也較不顯著。但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不斷升溫，中國大陸產業也不斷升級，就軍國主義的論述而言，兩岸經貿的發展與重建初期的情勢將會變得更為複雜，也就是軍國主義的論述在兩岸經貿的繼續發展中，因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敵對而難有交流。

貳、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中的臺灣產業

大約在 1980-90 年代開始，由於外部與臺灣內部政經局勢的轉變，兩岸經貿關係得以「重建」，在此「重建」的意義，表示兩岸經貿之前有一段長時期處於「完全隔離」的狀態，因而其時兩岸經貿從此完全隔離的狀態，以「重建」的方式開啟一段極為獨特的路徑發展過程，希望對其有更深刻的認識，不能不思考在絕對隔離的情境得以發生的情況裡的兩岸「個別」的狀態及其構成，唯有在此狀態相對的情況裡才能更深刻的認識兩岸經貿此種獨特的發展過程路徑的內涵，並且對其必須被關注的影響因素能夠有所掌握，而臺灣此一影響狀態的發展過程已在第三章之第四節有所介紹。

參、中國大陸計畫經濟時期產業發展¹³⁷與改革開放¹³⁸

共產國家的軍國主義表現型態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Mann(1988: 180-183)討論軍事主義，認為冷戰時期蘇聯人民受到「軍事化社會主義」支配，此類型態的軍事主義有著中央計畫的特徵，Mann 認為蘇聯適用「軍事化社會主義」，但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沒有特別的討論。中國大陸與蘇聯未必完全相同，因此未必能夠將蘇聯的論述直接套用在中國大陸。不過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實行的也是計畫經濟，與蘇聯相同計畫經濟可以集全國之力著重軍備發展。而在實際的實踐上，中共也特別著重戰略軍備的發展（毛澤東，1956）¹³⁹，中共在 1950 年代接受蘇聯的科技援助，範圍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所需的科技，但 1960 年中共的原子科技即已取得重大進展，且與蘇聯斷絕科技合作關係，1964 年中共原子彈即已試爆成功（張應吾，1989，轉引自陳良潮，1993：3-8）。

Mann(1988: 177-187)關於軍事主義的型態分成三種，第一種是由東西方陣營菁英分享的「嚇阻科學」軍國主義，第二種是支配蘇聯人民的「軍事化社會主義」，因此由此看來中共似乎與蘇聯的軍國主義型態也有近似性，一方面中共的菁英與東西方陣營的菁英們相同，也有著「嚇阻科學」軍國主義，而人民則也可以透過計畫經濟被「軍事化社會主義」支配。但是中國大陸冷戰時期一般產業的科技程度則遠不如蘇聯，運用產業支撐軍事的能力遠不如蘇聯。事實上中共在不同領域表現不同，在戰略軍備的發展是最出色的，在不太長的時期就從無到有獲得長足發展，雖然與美國、蘇聯仍有不小差距。但在一般產業的發展情況就顯得很不穩定，甚至在政策上出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全部成為中共的統治領域，基本上與臺灣類似，甚至比臺灣更迫切，面臨工業化的挑戰，但是兩岸卻走了不同的工業化道路，臺灣的國際分工的工業化模式，與中國大陸在 1949 年之後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正如前述臺灣在冷戰的西方陣營中進行工業化，但中國大陸由中共統治，屬於共產陣營，嘗試建立的是共產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一般所謂的共產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實行的往往是計畫經濟模式，並以計畫經濟模式與西方陣營的市場經濟模式相對。但是在 1980、1990 年代，雖然中共政權仍然屹立，走的仍是共產主義，卻漸漸否定共產主義必然應該實行計畫經濟的一般觀點，於 1992 年確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自 1978 年推動「改革開

¹³⁷ 陳良潮（1993）。《大陸科技發展研究》。經濟專論（147）。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¹³⁸ 此處所討論的「計畫經濟」時期產業發展與改革開放，約略指的是與前述「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中的臺灣產業」相仿的時期，而就大陸的實際應指的是 1992 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的時期，當然實際而言，目前所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屬改革開放時期。

¹³⁹ 毛澤東（1956）。〈論十大關係〉。



放」即開始嘗試不同於「計畫經濟」的模式。¹⁴⁰

回顧中共取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之後，1949-52 年是戰爭剛結束政權甫定的時期，中國大陸經濟處於恢復時期，並且此時依據社會主義經濟的特性著重在改變過去中國的所有權制度，積極建立國營與集體的工商企業，並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唯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行符合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制度，之後實行以五年為期的計畫經濟。但中共政策卻無法適切穩定推展，不時受到激進政策衝擊，例如「一五」時期較為穩定並致力建立工業體系（周恩來，1956）¹⁴¹，但 1958-60 年卻採行「大躍進」政策，1966-76 年則發動十年的「文化大革命」¹⁴²。

因此與臺灣比較，中共產業政策的選擇以及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顯然較臺灣不穩定，因此雖然兩岸的基本條件有不小差異，未必適宜直接進行對比，但以普遍的工業化程度比較，到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的 1970 年代末，臺灣的發展顯然超越中國大陸甚多，尤其臺灣以國際分工的模式發展獲得的成果並非只適合臺灣內部市場，因此或許兩岸之間的發展階段歧異值得中共產業政策的運用。中共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策目標為積極推動「四個現代化」（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78）。

兩岸基本條件有著明顯差異，直接而顯然大陸的人口與土地規模是臺灣的數十倍，而受此基本條件差異的影響，同樣處於發展中的社會，引導出的目的與策略可能極為不同，就中國大陸而言，大規模的土地人口，可能蘊含種類多樣且絕對數量也極為豐富的資源，並有可能培養數量龐大的人才，因此較易偏向思考產業與科技發展政策追求各種門類，以及上中下游（基礎、應用、發展與生產）齊全的自主發展走向，但由於人口負擔沉重卻容易導致人均資源的貧乏，所得分配基數過大人均所得低的問題。但以臺灣的規模與資源條件，在初始時期也為開發中社會，在今日世界產業與科技競爭條件下，希望以自主的方式發展完整的產業與科技體系就顯得較不切實際，在這樣的對比條件下。基本條件的差異使兩岸採取不同的發展模式，也使兩岸的產業與科技發展承擔了不同的成本與結果，甚至也影響軍備發展的模式。

¹⁴⁰ 中共自 1978 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但卻並非有個整體制度的改革藍圖，因此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推動改革，直到 1992 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是由許多小步的改革步驟不斷累積，期間這些過渡中的改革也歷經十多年的「計畫經濟」、「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關係的質疑與辯論，關於其間體制政策一段段變革可以參考改革開放後到 1992 年之前，出版關於中國大陸體制的著作。例如《中國十年改革概覽》等。

¹⁴¹ 周恩來（1956）。〈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的報告〉。

¹⁴² 中共中央（1966）。〈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兩岸的制度是另一個重要差異所在，尤其 1980 年代以前，大陸選擇社會主義制度採行計畫經濟體制。與臺灣屬西方陣營相對，在 1960 年代與蘇聯交惡以前，當然屬於全球冷戰體系中的共產陣營，學習蘇聯的計畫經濟模式。但與蘇聯交惡之後，1970 年代美國採行聯中制蘇的政策，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解，並支持其進入聯合國，使得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中的全中國代表權，挑戰臺灣蔣介石政權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蕭全政，2001：63-88）。¹⁴³臺灣戰後早期公營事業與政府投資也曾扮演重要角色，也實施經濟計畫，但從不曾實行類似大陸的嚴格行政計畫的經濟政策，自始至終市場活躍，且大多時候與國際市場密切連接。中共取得大陸統治權初始，現代化發展仍然極為落後，產業與科技發展有賴國際來源，由於歸屬共產陣營，不只是學習蘇聯的經濟制度，科技輸入最可能的來源也是做為陣營龍頭的蘇聯。

事實上，初始時期也推動此一工作，1955 年召開與蘇聯的科技合作委員會議，此一會議討論相互交流科技成就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間交流技術經驗的問題。並且決議互相提供圖紙、技術資料。此時中共科技發展規劃的重點即已包括原子能和平利用。到 1960 年中國大陸的科技發展即已面臨重大轉折，包括第一次原子彈爆轟試驗獲得成功，以及與蘇聯科技合作關係產生嚴重變化，同年 7 月蘇聯撤走全部 1000 多名專家，專家撤出同時也攜走所有相關的重要資料，並且停止供應重要設備，此一關係的生變影響中國大陸產業發展，造成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困難。而在不到五年的 1964 年 10 月中國大陸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12 月基於備戰的思想，將 2 萬多一線研究機構人員調到三線地區。到 1970 年 4 月中國大陸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張應吾，1989，轉引自陳良潮，1993：3-8）。似乎中共核子武力的基礎已經得到確立，此時中共的國際地位也大幅提升，1971 年 10 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隨後 1972 年初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¹⁴⁴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理論有著軍事主義邏輯的論述，此一論述將軍事部門的需要與產業與民間部門的發展連結，軍事主義是受到市民社會支持的，但軍事部門的直接管理與推動發展是國家的工作，此一論述的發展也可分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取向，雖然連結為一體但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與社會是兩個可以分別觀察的取向。但共產主義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卻將全國社會產業與經濟活動置於國家行政計畫之中，使得國家政策全面且深刻的影響全社會，這樣的體制使得國家可能集中全力發展某些重點，但也可能使受到忽視或者承受政策錯誤的領域招

¹⁴³ 而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合理化 1949 年前後大陸各省來臺人士，組成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會主體統治臺灣的合法性；亦即大陸各省來臺人士，分別代表大陸各省的名額，組成政府與國會，非各省來臺之原生臺灣人士只能代表臺灣省。

¹⁴⁴ 同註 137。

受嚴重傷害，回顧中國大陸至 1970 年代末的發展，國家特別重視戰略武力的發展，使得核武與衛星的發展得到驚人的成果，但在民生產業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 1966 年中共中央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中共中央，1966）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對中國大陸各領域的發展造成嚴重衝擊，但似乎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軍事科技的發展則有受到特別關照，但經濟活動與民間生活卻造成極大困苦，就是一例（張應吾，1989）。基於國家優先重視戰備的思想，在 1970 年代以前大陸產業與科技發展著重重工業，輕忽輕工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¹⁴⁵，1960 年蘇聯的科技合作即已中斷，因此自主的發展政策一直是科技政策規劃不得不的重要內涵。

1980 年代西方陣營的民生與軍備產業的發展已經獲得長足進步，1970 年代以後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對民生與軍備產業產生深刻影響，臺灣也在此一體系架構的國際分工角色裡，經由著重民生產業發展，轉型重化工業取得成效後，逐漸深化發展資訊半導體產業，並取得國際體系中的一席之地。中國大陸則在中共從意識型態到強力的國家管理制度下發展產業、科技與經濟，並且形成產業技術的「二元結構」，一方面一般的產業技術水準遠遠落後於當時國際一般產業技術水準之後，但另一方面仍有重要的基礎與戰略科技，在集中全力發展下獲得不容忽視的成果（陳良潮，1995）。¹⁴⁶就是在這樣的民生與軍備產業發展背景，結合冷戰時期二維國際體系的局部轉移，伴隨中蘇交惡、中美關係和解的中國大陸，在國際體系中的移動下，推動異於過去的，內部捨計畫就市場，外向則推動面向西方世界的開放的改革開放政策，並且對臺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策。

在戰後冷戰格局中，雖然中國原屬蘇聯共產陣營，並且實行計畫經濟制度模式的經濟發展，但之後蘇中交惡，美國採行「聯中制蘇」政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更使原來隔絕的美中經貿與臺海兩岸經貿關係得以重建，但此一經貿關係的發展卻必然受到原來冷戰格局裡雙方經濟貿易制度與發展模式背景因素與條件的影響，尤其中國的改革開放除了採行增量漸進改革政策外，實際而言，也不可能一夕之間完全翻轉，那麼冷戰格局下的制度與發展環境因素與條件的作用，更值得加以重視，其中包括有利的因素，但諸多不利的因素恐怕更是難以忽略，初期有利因素迅速發揮作用，促進經貿快速發展，但之後隨著發展超乎預期的快速，不利因素也將複雜顯現，這些情勢將在下一節循著本節的脈絡繼續討論介紹，本節則介紹討論此一重建景象的出現，以及對重建景象背後的雙方冷戰格局裡的制度與發展形塑成的因素、條件進行脈絡式的介紹。

¹⁴⁵ 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¹⁴⁶ 陳良潮（1995）。〈大陸科技實力剖析〉，《經濟前瞻》，5 月 5 日，頁 45-48。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三節 後冷戰時期美中與兩岸經貿發展¹⁴⁷



壹、美中貿易發展趨向¹⁴⁸

一、整體貿易不平衡¹⁴⁹

2019年美國進口中國的貨物約4,500億美元，出口約1,000億美元，逆差約3,500億美元；但其中應有些關稅政策效應影響，在2018年美國進口中國貨物已達5,400億美元，出口1,200美元，逆差約4,200億美元；綜觀自中國改革開放不久的1985年迄今，約3-40年間，兩國貿易發展的總趨勢可說極為明晰；1.貿易總規模逐步迅速擴大；2.尤其美國自中國進口的規模在其結構中更為明顯；3.也帶動了逆差規模同步迅速擴大；4.相對的，中國對美進口規模明顯較小，成長幅度也較小。回顧改革開放不久的1985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的貨物不到40億美元，出口到中國的也不到40億美元，逆差不到6百萬美元。

到了1989年進口就迅速達到了百億美元，但相較下，出口則明顯成長速度滯後；1992年中共第十四屆全會通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1993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即超過300億美元，但對中國的出口只有不到90億美元，逆差已達200多億美元；而在中國加入WTO的前夕，2000年美國自中國進口貨物已達千億美元，而出口僅為百多億美元，逆差達8百多億美元；到了西方發生「次貸危機」的2008年美國自中國進口貨物已達3千多億美元，但出口僅有約700億美元，逆差已達2千7百億美元；而2011年開始出口也躍升超過千億美元，但此時進口也已接近4千億美元，使逆差接近3千億美元；2017年進口則已達5千億美元，出

¹⁴⁷ 部分內容發表於「第十二屆發展研究年會」。陳良潮（2020）。〈從「中國模式」的特性分析探討美中貿易衝突〉，第十二屆發展研究年會。11月，7-8日，台北：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

¹⁴⁸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2020）。*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Bart Carfagno, Michelle Ker, July 2018, Trends in Trade: U.S.-China Goods Trade 2012–2017, Staff Research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oseph Casey, "Patterns in U.S.-China Trade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201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US-China_TradePatternsSinceChinasAccessiontotheWTO.pdf.

¹⁴⁹ 美國對中國歷年貨物貿易統計參見表 6-1-1，表 6-1-2。



口約 1 千 3 百億美元，逆差約 3 千 8 百億美元；明顯可見「2012-2017 年」期間與甫入 WTO 的「2002-2011 年」的前段期間比較，貿易不平衡的情況顯然加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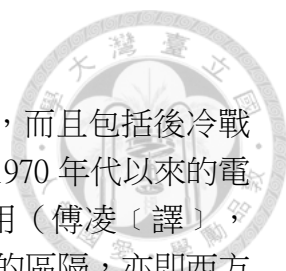
二、貿易產品結構

當前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產品結構以電腦與電子為最大宗，自 2011 年以來這個品類就美國自中國進口額的 3-4 成，但也自 2011 年以來這個品類所佔的比重並無擴大的跡象，維持大致穩定的比重；除了電子產品，美國進口品類中家電產品、機械、傢俱、成衣、雜貨的所占比重大，雖然最大宗的電腦電子成長已經趨緩，但其他品類隨著進口規模的擴大也仍呈持續擴大的態勢；將 2017 年與 2011 年比較，機械產品進口增長 70%，傢俱與室內裝置成長 55%，家電產品成長 50%；與自加入 WTO 後的約 10 年相比，那段期間服裝手提袋鞋子仍呈成長態勢，但近幾年它們呈現負成長。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與剛加入 WTO 時期比較，近幾年的成長出現弱化的趨勢，運輸器材、電腦電子、化學產品以及農產、機械五種品類的產品，佔美國對中國的大約 7 成，其中運輸器材、電腦與電子以及化學產品的出口成長明顯，但農產品與機械產品則呈負成長。

三、總觀

由以上介紹首先可以看到最顯著的是進出口失衡，如 2019 年美國進口中國貨物高達 4,500 億美元，但出口只有約 1,000 億美元，進口額高達出口額的 4.5 倍，或許這種顯著的現象是國際分工造成的，美國產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的領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則依賴自勞動力價格較便宜的國家生產，但其中也不無因為中國政府執行市場保護政策限制了美國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造成這個後果，但美國最關注的其實是中國促進該國產業升級的政策，這種政策限制了美國廠商對中國市場的開發，甚至可能在美國市場裡搶奪高附加價值產品市場。

正如臺灣過往的經驗，以中國過去的勞動條件，「國際分工」可以解釋美國進口大量的「勞動密集」產品，例如紡織、汽車零組件、家電。但美國的研究仍然認為中國政府透過補貼增強這些產業的競爭力，而美國更在乎的是政府補貼如今正朝著下一個世代的產業投入，如果任令這種情況繼續，正如迄今的貿易資料所顯示，雙方貿易失衡的規模極為龐大，而且整體趨勢顯示失衡規模仍在「持續擴大」，且這種失衡所牽涉的產業已經逐漸由全球供應鏈的低附加價值產品逐漸升級為美國產業所處身的高附加價值領域；這種趨勢發展至今已開始對美國的就業與工資造成負面影響，而由於這個趨勢的發展並非全然的市場運作的結果，其中包含著中國政府「產業政策」的作用，尤其中國仍非市場經濟國家，因此如果美國政府不加以干預，那麼這個趨勢將會繼續發展，並且逐漸擴及美國勞工在原有國際分工體系中參與經濟的領域，對美國經濟產生極為嚴重的影響，這是促使此次美國政府針對與中國的貿易採取措施的背景。



貳、在冷戰格局制度與發展差異影響下的後冷戰經貿迅速發展

資本主義軍事主義邏輯的論述不只是以冷戰時期做為對象，而且包括後冷戰時期，事實上在後冷戰時期發生在中東的大型戰爭，更凸顯自 1970 年代以來的電子光電資訊通信產業發展，在造成戰場實力差距上的明顯作用（傅凌〔譯〕，1993：82-106）¹⁵⁰。但是在冷戰時期產業與軍備有著區域上明顯的區隔，亦即西方陣營的國際產業與軍備體系，與共產陣營的軍備與產業國際體系，有著區域上的明顯區隔，但在後冷戰時期尤其在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大陸開放市場，進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之後，大量從原西方陣營來的資金與設備湧進中國大陸，隨著時間推移這個趨勢越趨廣泛深化，原來壁壘分明的兩個陣營的區隔越來越混淆不明顯，因此軍事主義邏輯的產業與軍備的關聯也變得更為複雜。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產業與軍備之間的關聯，冷戰時期也有著明顯的區隔，但在兩岸的經貿快速發展之後，隨著中國大陸產業的迅速發展情況也變的更為複雜。中國大陸的這個發展不只是發生在兩岸經貿的影響，更發生在中美經貿關係上，為此美國國會投注特別的關注。¹⁵¹

後冷戰柯林頓政府揭櫫「擴展（Enlargement）」戰略，意思就是在世界上擴展市場與民主的價值與制度。當然從冷戰到後冷戰的轉折，有著柯林頓政府此種主張的道理，冷戰時期是西方與共產二極對抗的世界冷戰體系，美蘇二個超級強權分別帶領一群國家陣營，其中共產陣營龍頭的蘇聯崩潰，顯示共產制度與價值是經不起考驗的，因此另一龍頭美國就成為全球僅剩的唯一超強，而西方陣營所實行的制度與價值也因而得到彰顯，因此順理成章美國希望將此一制度與價值擴展到世界所有可能的地方（Lake, 1993；林茂昌〔譯〕，2007：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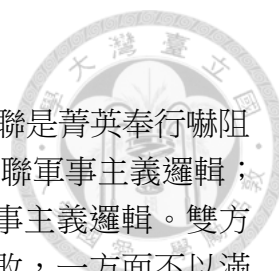
柯林頓政府此一擴展戰略與冷戰後與中國大陸對外經貿快速成長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也符合美國以及冷戰時期屬西方陣營國家擴大對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趨勢的期望。而正如前述此一發展趨勢也使得過去兩大陣營的戰備與產業分別有內部的關聯，並在陣營間有明顯區隔的情況產生變化。尤其在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也逐漸獲得發展的時候，此一變化將會更顯著（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 43-46;¹⁵²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8：70-77¹⁵³）。

¹⁵⁰ 傅凌（譯），Toffler, Alvin and Heidi（原著）（1993）。《新戰爭論》。臺北：時報文化。

¹⁵¹ 美國根據 2000 年的 Public Law 106-398 成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會議（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每年需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

¹⁵²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7-2009 annually).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2011 annually).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n(1988: 180-183)關於軍事主義的三種型態的論述中，蘇聯是菁英奉行嚇阻科學軍事主義，人民受到軍事化社會主義支配，兩者結合成了蘇聯軍事主義邏輯；美國則是菁英奉行嚇阻軍事主義結合旁觀者運動軍事主義的軍事主義邏輯。雙方進行經濟與軍備競賽，蘇聯的崩潰象徵蘇聯軍事主義邏輯的潰敗，一方面不以滿足自我的經濟誘因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缺乏效率以及活力、創意，難以促進經濟在規模以及品質繼續發展擴大以及成長，終致使得軍備競賽以及維繫國際陣營的支出成為不可承受的沉重負擔，並拖垮了蘇聯（牛可等〔譯〕，2011：259-268）¹⁵⁴。

蘇聯此一國家形成的邏輯於 1970-80 年代即已顯露致命缺失，中共發展歷程與蘇聯並不相同，但蘇聯的弊病與中共自身的發展經驗應能相互印證，使中共於 1978 年鄧小平復出後即決意進行改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1978），改革的成效很快就顯露，雖然另種的弊病也同時逐漸顯現，但奉行改革的中共不止國營企業希望擁有改革帶來的活力，軍事工業體系也很早就下海參與分享改革的果實，軍事主義邏輯在中國大陸也追求能夠得到「軍民」融合的調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 43-46）。¹⁵⁵

後冷戰在柯林頓擴展戰略的指引下，中國大陸快速加入世界的經濟體系，在 1990 年代有經濟學家以「雁行」描述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的位置，其中日本與歐美是頭部，領導國際產業的發展，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是四小龍緊隨在歐美日本之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新興國家則是位在尾巴。就當時國際分工的部分而言，這個描述非常傳神，雖然也仍不能完全表現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的完整角色，例如中國大陸代國外客戶發射衛星的業務，¹⁵⁶以及在美國引起議論的武器輸出，就不是「雁行」尾巴國家應該能夠執行的業務。其實由前述對於中國大陸在冷戰時期的產業發展的解析，也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在戰略領域的注重以及成果是其來有自的。但是中國大陸經濟也不是國際分工所能夠完全描述，例如衛星的發展與武器生產基本上都在滿足自身需要，屬於基礎產業的能源產業廣泛包括煤炭、石油、電力各部門直到目前也仍以國內市場為主體。

事實上，從 1970 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參與國際分工並在其後快速發展的，首先是中共「輕輕重重」中較受到忽視的輕工業，透過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而

¹⁵³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2, 2004-2010 annually).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¹⁵⁴ 牛可等（譯），LaFeber, W.（原著）（2011）。《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第 10 版）》。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¹⁵⁵ 「國民經濟動員建設」旨在追求基礎建設兼顧國防需求，重要產品與技術軍民兼容等。

¹⁵⁶ 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網站，<http://cn.cgwic.com/>。

加工貿易的意思就是這個貿易活動生產的不是國內需求的產品，透過加工貿易出口國賺取外匯，換取所需產品，包括可能的原材料、設備，或者產生外匯盈餘。而這個過程也使中國大陸的產業水準不斷提高，並且產業水準的提高也產生溢出效果，不只是外貿部門的產業水準獲得提升，也包括內需市場的產業水準的提升，至少內需市場的消費由於外貿的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也受到刺激而更為活躍，並且帶動內需市場的發展，外貿的發展也使得金融體系與政府財政部門的資金更為充裕，可以支撐內需產業的投資需求，內需產業投資需求與模仿作用，也帶動內需產業技術水準的提升。因而外貿產業的發展可以帶動中國大陸經濟總體的發展，也使得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產業技術獲得提升（蘇桂富，2006a：60-73；蘇桂富，2006b：77）。¹⁵⁷

中國大陸比較明顯的參與國際分工是在 1990 年代，天安門事件之後數年，冷戰結束，中共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 1990 年代，此一趨勢愈來愈明顯。這段時間美國由柯林頓總統主政，擴張戰略的首要重點應是前蘇聯區域的獨聯體，由於天安門事件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一直是美國國內關注的重點，而柯林頓政府的政策與擴張戰略一致，傾向經由投資與貿易促使擴展戰略在中國大陸發生效果（林添貴〔譯〕，1999：271-323 405-465）¹⁵⁸，此一時期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的角色仍然處於產業鏈的末梢，而由美國 1990 年代初伊拉克戰爭的武器裝備發展來看，1990 年代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的角色與軍事主義所關心的議題關聯較小，屬於資訊半導體領域的產品較少。

而 21 世紀開始的 10 年，在開始淨進口石油，加入世貿組織，美國遭受 911 攻擊之後，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則更是快速發展，而有成為「世界工廠」之勢，在全球貿易不平衡的議題中，成為有大量順差的一方，而在國際分工的產業鏈位置也有明顯的提升(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4:38-40 151-153)，因此 2000 年美國國會就授權成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會議」，追蹤美中經濟與安全發展情勢。

有石油商背景的小布希總統於 2000 年上任，這一階段的美國政府被認為有「單邊主義」的傾向，但就任不久美國遭逢 911 攻擊，一般而言，911 的發動者有中東脈絡，與中國大陸成為石油淨進口國相互呼應，石油問題成為世界經濟與安全的焦點議題，包括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在中國大陸經貿角色一天天擴大的過程中，國內產業發展也不斷升級，對中東石油的需求逐漸增加，小布希關注的焦

¹⁵⁷ 蘇桂富（2006a）。胡軍（編），《全球生產網絡與加工貿易升級》，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第三章中國加工貿易發展軌跡與現狀〉，頁 51-75。〈第四章中國加工貿易升級總體狀況〉，
頁 76-111。

¹⁵⁸ 林添貴（譯），Pillsbury, Michael（原著）（2015）。《百年馬拉松》。臺北：麥田出版社。



點非常集中在中東與中亞，以軍力推翻海珊政權，在阿富汗追索恐怖組織（牛可等〔譯〕，2011：309-350），中共則聯合俄羅斯與中亞國家建構「上海合作組織」。¹⁵⁹今日世界已經不像冷戰時期涇渭分明，雖然世界似乎只剩下美國一個超級強權，但是變得更複雜（牛可等〔譯〕，2011：290）。

中國大陸順差不斷擴大，累積持有大量的外匯，國內產業也不斷升級，除反映在總體經濟，也反映在兩岸經貿，臺商當年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大受歡迎，因為臺商與中國大陸一般的廠商比較，雙方有著明顯的技術差距，但今日這種技術差距正在逐漸消失之中（蘇桂富，2006b：81-95；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9: 70-75），過去臺商在臺灣接單，大陸生產，仍需仰賴臺灣的產業出口零組件支撐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生產，但今日漸漸已經可以交由中國大陸的廠商生產（蘇桂富，2006a：73），因此臺商投資大陸過去會帶動臺灣產品出口，但這個效果逐漸消失，因此臺商投資大陸，留在臺灣的廠商如果沒有開發新的出口優勢，出口帶動的就業機會就會減少，對於戰後以來出口導向的臺灣產業與經濟就會造成影響。尤其在歐美市場出現不景氣影響臺灣生產廠商出口歐美市場，以及臺商接單在大陸出口並從臺灣進口所需材料零組件，臺灣的產業就會受到影響，而中國大陸雖然人口規模大，經濟持續成長使得經濟規模也迅速擴大，但最終消費的內需市場則仍然無法扮演國際經濟火車頭的角色。

參、美中貿易衝突的發展趨勢¹⁶⁰

一、貿易衝突發展趨勢

2016年6月川普競選總統期間對美中經貿表達了他的看法，認為美中經貿關係是「不公平」的關係，「中國加入WTO是歷史上最大規模對就業機會的竊盜」，認為應依貿易法第201條與301條對中國課徵關稅，而追溯川普的美國對外經貿關

¹⁵⁹ 2001年6月15日上海通過成立，2002年6月7日聖彼得堡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請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2003.5.29 莫斯科。

¹⁶⁰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2020）。〈美國對中國301措施大事記〉。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15&pid=636907&fbclid=IwAR2elj2zMyffL1nALKHVpvUK5o_u-cfQujks-jsXJaOryZagpMAQn8II2i4

中央社（2019）。〈美中關稅戰大事記〉。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010040.aspx?fbclid=IwAR0Wjr3ZTerpece2NK5YOXGso0J_zT4YA-l6SZA2c9P8V3GqMNM3PQXKsZY

BBC（2019）。〈中美貿易戰時間軸：一場逐漸升溫的持久戰〉。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986037?fbclid=IwAR0Wjr3ZTerpece2NK5YOXGso0J_zT4YA-l6SZA2c9P8V3GqMNM3PQXKsZY

新華網（2018）。〈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5/20/c_1122857981.htm

係的思想脈絡，發現在 1980 年代就認為美國遭受貿易對手的剝削，美國應實施關稅政策以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促進國內製造業。2017 年 1 月川普就任美國總統，3 天後他簽署了上任後的第一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但 TPP 其實是美國發起，有學者指出其目的在圍堵中國，但國內市場的進一步對盟友開放對美國勞工是不利的，因此受到勞工反對，並且認為這個架構意圖圍堵中國不會有效果。

對於美國這次總統選舉的政見表現，政治學者分析認為川普獲得勞工民意的支持，解釋了過去美國的不平衡貿易發展，尤其對中國的貿易不平衡，造成了美國勞工處於不利的局面。美國對貿易規則的認知是基於「市場經濟」的原則，並且關切貿易可能帶來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並制定了《貿易擴張法》與《貿易法》等法律，而與中國的貿易在中國加入 WTO 後獲得大發展，但卻是一種不平衡的發展，而中國加入 WTO 是以計畫經濟轉型的「非市場經濟」以及「發展中國家」地位加入，意即中國是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條件裡通過《議定書》的簽訂加入 WTO，之後美國也成立機制，每年檢討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否改善更接近市場經濟，而美國認為是否屬市場經濟考慮六項基本條件，依據《議定書》中國應在 2016 年滿足市場經濟的條件，但美國在 2017 年的每年檢討報告全面調查認為中國遠遠無法滿足這些條件；除了行政部門每年的檢討，美國國會也成立了「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關注美中「經濟與安全」議題的發展。

2017 年 4 月，川普總統簽署總統備忘錄，要求商務部長優先啟動鋼鐵進口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的《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的調查。2018 年 1 月，調查報告傳送總統。2018 年 3 月川普總統發布公告，依據調查報告以及商務部長的建議，以及相關法律，調整美國的鋼鐵進口。關於針對中國的調查則是於 2017 年 8 月，川普總統下令依據《貿易法》301 條調查中國是否侵犯美國的智慧財產權。2018 年 3 月，美國總統依據此一調查的結果，發布備忘錄，認定中國有違反公平貿易精神的事實，採取對中國貿易「提高關稅」、「上訴 WTO」以及「與中國談判」等措施；其中包括要求中國「改善結構」等應對行動¹⁶¹。

2018 年 3 月，美國循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中國智慧財產權措施提出諮商要求。2018 年 4 月，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告對中國課稅建議清單，包括航太、資訊及通訊科技、機器人及機械產品等 1,333 項產品加徵 25%額外關稅，估計 2018 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將達約 500 億美元。中國商務部及外交部對美國的行動表達嚴重抗議，認為美國的作為嚴重違反 WTO 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中國擬立即對美國訴諸

¹⁶¹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2018）。〈有關美國 301 條款調查行動的總統備忘錄〉。

<https://hk.usconsulate.gov/zhhk/n-2018032201-zh/>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並準備對自美國進口產品採取同等力度規模的對應措施。立即，中國也就他所宣示的對抗訴諸行動，包括，也宣布將徵收美國大豆、玉米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及飛機等加徵 25% 關稅，自美國進口金額也約 500 億美元。

關於這段過程的意義在於：在中國仍為非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雙方存在嚴重的貿易失衡問題，美國行政部門從啟動 301 條款調查開始取得採取調整行動的法律授權；而 301 條款調查著重智慧財產權，此一調查在美國正式過程裡確認中國有違反市場規則的事實，美國採取 WTO 程序及關稅及與中國談判的行動，而中國認為美國此舉不合規則因此採取對等的反制措施，並且雙方啟動談判過程。2018 年 5 月，美國 301 條款的過程，包括聽證會仍在國內繼續進行，月初美國財政部長赴中國與副總理劉鶴進行雙邊經貿議題的磋商。月中，劉鶴赴美，繼續磋商。之後，雙方發布「美中關於貿易諮商的聯合聲明」，同意採取有效措施減少美國對中國貨品貿易逆差，也就是中國將增加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擴大自美進口，而就產業發展情況，雙方同意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的出口，就擴大製造業的產品和服務貿易進行討論，牽涉技術領域部分，雙方也同意應加強合作保護智慧財產權，在談判中仍論及鼓勵雙向投資，但實際上其中是存在嚴重歧異的，以及繼續保持高層溝通等。可以見到此一談判已將雙方如何尋求平衡變得最重要，而且以中國增加自美進口做為平衡措施，談判內容也及於智財權，與雙方投資議題。

但此一過程與雙方經貿失衡比較仍顯得低估實際情勢，月底白宮官網就「保護國內科技及智慧財產免於中國歧視性及繁重貿易措施之步驟」發表聲明，顯示了關切反制中國的投資限制，強化技術管制，非貨幣障礙，關稅以及稅賦互惠（反制市場保護與進行技術保護）的態度。2018 年 7 月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對中國加徵額外 10% 關稅之清單，清單所列商品貿易值約 2,000 億美元，針對失衡實施大規模關稅政策。9 月公布第 3 波課稅清單，涉及進口值約 2,000 億美元，自 9 月 24 日起原產地中國之清單產品加徵 10% 關稅；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加徵關稅由 10% 調升至 25%。2018 年 12 月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阿根廷會晤，就美中經貿議題交換意見；原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加徵關稅調升至 25% 一事暫停，中國將擴大進口以及雙方就經貿議題啟動協商。

2019 年 4 月中美經貿高層協商已進行到第 9 輪。雙方已在討論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保護、非關稅措施、服務業、農業、貿易平衡、實施機制等協定文本，但仍有重要問題尚未取得共識。5 月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對 2,000 億美元之中國產品關稅加徵部分調升至 25%。隨後公告就約 3,000 億美元產品加徵 25% 關稅徵求公眾意見。6 月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批評美國立場反覆。月底，日本主辦 G20 會議期間川普與習近平再度會晤，達成共識將重啟貿易談判，美國則暫時不對 3,000 億美元產品加徵收關稅，中國將擴大進口美國農產品。2019 年 10 月第 13 輪美中經貿高層協商，雙方原則達成第 1 階段協議。

2020年1月15日美國川普總統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美國華府簽署第一階段經濟貿易協議。¹⁶²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第一階段經濟貿易協議得來不易，但仍然沒有解決雙方的根本歧異的問題，折衝過程中所牽動的關稅加徵規模也達到了3000億美元，其實這個規模正好反映出雙方存在著根本的歧異，而這個根本歧異其中之一關鍵的就是雙方經濟與相關的政治制度的歧異。這也是本論文以比較制度的角度討論此類議題根源所在。當然雙方的根本歧異不止如此，還包括發展過程與發展階段的不同，這部分也是極具探討價值的部分。

歸納貿易衝突發展過程可以得到以下觀察結果的陳述：1.美國經濟情勢、美國對外經貿情勢（其中尤其應注意美中經貿情勢）、川普總統意志以及美國民意表現是此一貿易衝突發生的原因；2.貿易衝突的對象是「全球性」的；3.對全球貿易的衝突裡突出「美中貿易衝突」；中國因為牽涉中國經濟規模與貿易順差規模龐大，以及仍屬「非市場經濟」的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的問題，使得美中貿易衝突特別受到關注，而美中貿易衝突聚焦在1.貿易失衡；2.國家間的互信與安全；3.市場規則議題。

而由過程中可以發現雙方的態度其實是複雜而微妙的，首先「貿易高度失衡」是無法否認事實，中國也表現出願意致力於改善此一問題，但如何改善，多大程度，多快速度則可能並非容易獲得的解答，其次美國認為此一議題已然或極可能將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中國則認為以中國的立場，當然也應追求自身的國家安全的更深刻的確保，在此因而雙方在意識上的「互信」問題就必然尖銳浮出，其中中國的可能制度認知，對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態度仍然是混沌不清的，例如並不否認應有對「市場規則」的尊重，但卻實際上認為政府的高度重視「產業政策」並無問題。

進一步分析可得如下論述：1.美國方面認為大規模不平衡貿易關係對總體經濟造成明顯影響，例如勞工就業問題以及工資水準下降，並且影響市場機制運行造成失靈。2.牽涉安全的供應鏈外移，使得某些必需品的國內市場供應依賴外國，尤其例如中國是意識上存在競賽甚至鬥爭意圖的國家，甚且這種外移牽涉了中國政府嚴重涉入自由市場運行的產業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可能源自國家間的競賽意

¹⁶² USTR (2020).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phase%20one%20agreement/Economic_And_Trade_Agreement_Between_The_United_States_And_China_Text.pdf

識，但有些卻源自傳統計畫經濟轉型改革過程；意思是雖然今天中國歷經 3-40 年改革轉型已遠非僵固的傳統計畫經濟體制，而有了明顯的市場經濟運作的成分，並且肯定「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原則，但中國仍非被接受的市場經濟國家，仍有許多源自計畫經濟傳統的政府介入，雖然它們有些變形並非完全如計畫經濟的方式，但政府介入仍實際存在中國的經濟資源配置過程中，並且也仍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3. 國家間或市場裡，產業發展的新興、前瞻、尖端領域的競爭不只影響一國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表現，同時也往往影響一國在國際間安全戰略的競爭能力，美國與西方國家在這個領域有著廣泛的優勢，而中國有著龐大的規模但顯然過去在這個領域並不具備廣泛的競爭力，但今日中國在過去 2-30 年快速深入參與國際分工的情境裡，扮演的是全球供應鏈的較低端的供應者角色，這個角色除了傳統產業之外，也已經涉入新興科技產業的較低端領域，並且在其特有的仍未被認定為市場經濟的制度條件裡，以政府的產業政策準備積極涉入此一尖端領先領域。

4. 美國仍然認定中國屬非市場經濟國家，而且在這個貿易衝突與協調的過程中，仍然看不到經過此一過程，將可使中國基本轉變為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縱使雙方得到階段性協議，也不意味雙方將會同處於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因此這個協調恐怕仍非以達成轉變中國成為美國所認知的市場經濟國家為主要目標，那麼未來如果雙方仍能維持大規模的經貿往來，是否美國政府相關以觀察中國市場制度發展以及經濟與安全作為職能的部門，仍將持續維持這方面的努力，那麼美中經貿往來將處於何種狀態？或者這種性質的議題將會嚴重限縮彼此經貿往來的規模？不可否認中國仍然追求「深化改革」，但是在當前的內外情勢裡，能否取得實質進展？改革的方向將會如何選擇？這些問題以及它們所具有的不確定性，恐怕仍是思考未來情勢所難以避免的因素。

二、制度結構因素探討

在 WTO 的架構「計畫經濟」轉型國家屬「非市場經濟國家」，轉型國家脫離原來完整的計畫經濟模式，引入市場經濟成份；本論文所採取的比較經濟制度的方法，可以看到兩種經濟模式所具有特性的尖銳對比，因此計畫經濟轉型國家轉型初始應屬「非市場經濟」殆無疑義，但轉型國家在進行改革轉型 20-30 年後，是否已經成為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國家，在反傾銷與反補貼的對應措施裡，這個條件將會發生重要作用，美國目前並不承認從計畫經濟改革轉型的中國在 WTO 已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的條件，此外，中國也是有著「開發中國家」地位的國家。

關於美中貿易衝突何以發生，在「美中貿易發展趨向」、「美中貿易衝突的發展趨勢」的介紹之中可以看到，實際情勢裡美中貿易已然嚴重失衡的情況下，

這個「貿易衝突」是由美國發起的調整過程，而美國的認知認為，由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構成的國際貿易是由眾多分散的市場參與個體以分散的決策模式構成，參與貿易國家的政府介入市場，將扭曲市場機能，造成不公平貿易的事實。並且這些分散的個體追求個體企業的利潤，基本上不應也難以承載以該國國家戰略作為取向的目標，在以企業為單位的國際貿易市場裡作為。但中國計畫經濟轉型而來的帶有政府影響的企業，卻可能不以短期利潤為已足，而將國家資源投入在企業的國際市場經營裡，以追求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例如以國家資源挹注追求具有戰略領先意義的產業中的技術領先地位。

「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是美國一個對中國結合經濟與安全議題的機構，從其結合經濟與安全的架構可見美國的高階決策裡，至少在思想上，對中國的關係是將經濟與安全結合的，而由前面的陳述可以看到此一概念上對中國採取結合經濟與安全的理由，此一機構由國會任命，在中國即將加入 WTO 的 2000 年 10 月成立。成立的宗旨是監看、調查並向國會報告美中雙邊經貿發展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正如美國質疑中國運用產業政策造成對美國不公平的經貿關係，並且與歐洲一樣仍不願承認中國已不屬（WTO 意義下對計畫經濟轉型國家認定為）非市場經濟一般，美國今日對中國經貿關係不調和的觀點，恐怕仍基於此一對於中國市場經濟是否（已如美國等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一樣）能夠基本獨立於政治體系的懷疑，而如果中國的市場經濟不能夠基本獨立於政治體系，那麼政治體系將會如何對中國經濟體系產生影響？並且影響對美國的經貿公平性。但另一方面，與在這個「貿易衝突」裡美國採取的基本認知相對，中國目前仍不以市場經濟應清晰的獨立於政治體系作為自己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基本認知，雖然改革政策堅定表示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但也仍堅定表示以公有制為主體，那麼（在計畫經濟裡附屬於政治體系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如何能夠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

改革至今的這個經濟體系已做到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了嗎？很有可能這個問題正是今日美中貿易衝突的核心議題，尤其在面對外國企業與中國這個未必獨立於政治體系之外的企業競爭時，政治體系的角色如何？而目前以及未來美國與中國將分別如何看待這個議題？並且特別需要強調，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有基本的歧異；美國是以一種明確的態度看這個問題，中國則仍在探索一種可能有異於美國的（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個過去迄今以及將會延伸未來的探索過程，其中包括思想認知的因素，也包括實際情境與政策選擇互動的因素。但在這種情勢裡，當前很清楚的一個基本態勢，就是美國許多不同部門的調查，已經羅列中國政治體系對市場運作造成損害的各種議題。

但是中國不論從思想上或者制度改革實踐歷程，將政治體系與市場基本明確

分立開來仍不是實際的情況，反而中國還在嘗試探索有政治體系在其中的，卻更優於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這是仍在探索中的景況。那麼雙方將如何互動？從這個觀點回頭看前面所介紹的實際情勢，「美中貿易發展趨向」、「美中貿易衝突的發展趨勢」表現的實際情勢，應可以更清楚了解其中可能的意義。也可以想像美國面對中國這種特殊的情況，必須特別思考以如何的，有別於傳統的態度應對。而中國的知識與政策領域也有許多的思考如何建構中國這種特別的市場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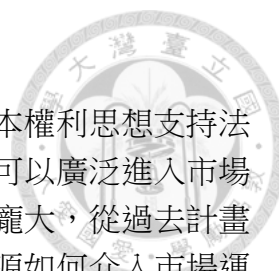
以「政治體系的架構」觀點分析解釋今日美中貿易議題裡的現象，如果原來政治體系對經濟活動的作用仍明顯存在，那麼原來政治體系裡的文化問題，也將繼續影響改革後的經濟，例如「百年國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在今日中國對外政策的表現也被解讀投射在今日政治體系的產業政策裡，著重在產業的快速追趕超越，這些關於原來政治體系的文化思考，也被視為會滲入對中國大規模參與的全球供應鏈架構的思考裡¹⁶³，而在疫情影響下在思想上也凸顯醫療器材產業包含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對美國而言具有極大風險，而成為美中貿易議題裡的重點。而為了應對美國自由競爭市場經濟面臨中國經濟體系在政治體系仍可能有顯著影響的狀態，（並且此一政治體系的文化仍延續毛澤東時期的文化觀點）美國國會兩黨也尋求制定美國的產業政策。¹⁶⁴

除了美國認為中國經濟制度仍屬「非市場經濟」，並且對中國的「開發中國家」地位有所質疑，當然正如之前所述，往往聚焦於中國的「政治體系」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認為這些定位經由中國的「政治體系」的廣泛而積極的作為，造成彼此之間的不公平經貿關係，而過去的應對策略無法發揮作用之外，仍在「深化改革」的中國經濟制度定位的發展，則是另一個觀察分析探討的重要層面，直到今天關於「改革後的經濟模式」的特性描述，應包括以下更詳細的各項，如此才能更清晰了解這個仍在「發展中」的「經濟模式」：1.中國是一個人口規模龐大的國家，初始經濟發展仍低，2.由「計畫經濟轉型」的「公有制為主體」「市場決定資源配置」，3.«政府經濟角色»的定位，4.（增量）漸進改革繼續進行的「深化改革」，5.«改革»與«開放»與«發展»三變項的互相影響（發展是硬道理），6.«摸著石頭過河»「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的「實用性»相對於「社會主義»的「本質性»。

¹⁶³ 林添貴（譯），Pillsbury, Michael（原著）（2015）。《百年馬拉松》。臺北：麥田出版社。

¹⁶⁴ 莫雨（2020）。〈應對中國威脅 共和黨人重新思考自由放任的經濟主張〉。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to-counter-china-republicans-rethink-free-market-orthodoxy-20220917/5587308.html?fbclid=IwAR2YVQsSO7ysKDPNeMyFmk1YRvAJUX0a_VZSwqPbuRq0DxkloJMpCTXmaMk。200/10/18 檢索。



中國依法而治的制度建構仍未實現，甚至缺乏民主自由基本權利思想支持法治觀，加上包括土地的資源的公有制特性，使政治體系的權力可以廣泛進入市場運作機制裡，並且中國人口規模龐大，相對的政府體系也規模龐大，從過去計畫經濟轉型過來，政府體系裡的各地方各部門依賴權力及公有資源如何介入市場運作，恐怕並不容易描述清楚，這樣將限縮市場經濟裡個體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空間，消費者主權的作用也受到扭曲，在出口、投資（基建是重點）、消費並列國民經濟主要構成的情況裡，經濟周流的型態也與成熟大規模經濟體有所不同，與此相應，政府官員也有著 GDP 考績的說法，並且延續自計畫經濟制度，在市場化的情況裡，各級政府仍編列名稱、意義及運行機制有所差異的中長期經濟規畫或計畫，其中「中國製造 2025」在這次美中貿易衝突中就屢被提及。

三、美國貿易調查裡的中國科技因素

（一）美國貿易代表「關於中國加入 WTO 協議遵守」的國會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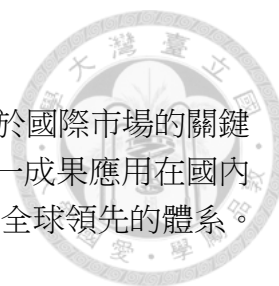
1.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2020 年關於中國加入 WTO 協議遵守」的報告，除了檢討中國「非市場經濟」的定位裡，中國「市場化」過程的進程之外，在其關鍵關切（Key Concerns）議題的第一項就是討論中國的「產業計畫」，並且特別關注「2025 中國製造」；關切的第二項是「智財權」問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也是關切之一項。

2.此一報告顯示美國對雙方貿易或者國際貿易體系，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與繼續發展，是以其屬「基本性」議題的態度，而予以期待與關切。

3.由此報告內容可見美國仍不認為中國已屬「市場經濟」國家，在雙方經貿以及國際貿易體系中，符合美國對此的「基本性」期待與關切；其中中國實施的「產業計畫」是關鍵關切的第一項，此「產業計畫」的實施，深切牽涉經濟中的「技術」因素，並且「產業計畫」的「技術」因素是以國家決策的方式推動，不以市場導向的方式發展。

4.中國「非市場經濟」模式的「產業計畫」的執行，將會損害其他市場經濟的企業及其勞工的利益，進而傷害相關的市場經濟體系的運作。而另一方面「產業計畫」之得以廣泛執行，正好印證了中國經濟制度仍屬「非市場經濟」的屬性。

5.由於中國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國家投資企業，因此國家決策的「產業計畫」，將透過此類企業以及相關的公有資源推動執行，但其實縱使非屬國有或國家投資企業，國家決策對其仍然可以發揮作用。中國政策上仍強調「公有」的主體性，對此過去中國曾經承諾國有與國家投資企業應依據市場導向行為，但由此可見並未實現。



6.中國國家「產業計畫」的第一步目標，是建立今日仍落後於國際市場的關鍵新興產業的「獨立自主創新」技術能力；第二步目標，是將此一成果應用在國內市場，以及進入國際市場；第三步目標，是將此一成果推廣成為全球領先的體系。

（二）「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對國會的報告

1.正如其名屬國會授權體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關心的是美中經濟，而且認為美中經濟議題是結合著安全議題的。此一「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的成立源自同意中國加入 WTO，以及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認為中國屬原「計畫經濟」漸進改革的「轉型經濟」，必須對其可能產生的「經濟與安全」議題給予特別觀察與審視，並且每年向國會進行報告。因此每年提出的報告架構是同時包括、強調「經濟與安全」的；例如報告的前面內容往往以經貿議題開始，尤其強調與安全較具明顯相關的經貿領域的發展，例如能源議題、技術因素、制度性因素、策略性產業以及國家相關策略等等；再來的內容包括各種安全領域的議題，尤其與經貿領域相關的安全議題，往往會受到強調。

2.自 2002 年後，「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2003 年除外），2005 年的報告共分四章，第一章美中貿易與經濟關係；包括貿易與投資對美國的衝擊，評估與促使中國的 WTO 協議遵守，中國全球資本市場的策略與目標，全球化中中國的角色與美國的應對；第二章中國高科技發展及其對美國國防產業基礎的意涵；第三章中國軍力與美國國家利益；尤其在中國致力主導亞太可能對美國造成的衝擊以及兩岸政經關係；第四章中國全球與區域行動及其地緣戰略發展；內容包括中國的區域行動，經濟與安全衝擊，中國能量的快速增長，北韓核議題介入，中國能源等。

可以看到這四章構成一個關於「美中經濟與安全」的基本架構，特別在於各個因素之間的系統化脈絡推衍。在「非市場經濟」的制度下，中國政府採取政策措施強化中國的科技發展，並且在國際經貿關係領域逐漸吸引科技企業以投資的方式向中國市場轉移，使中國產業科技水準獲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則造成美國科技產業的逐漸空洞化，而美國私營科技產業卻是美國國防科技的基礎，另一方則快速增強中國的能量，包括軍力的支撐條件以及意圖，投射在亞太區域甚至全球領域，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衝擊。

肆、分析展望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開始就一直吸引企業家的眼光，在加入 WTO 前夕，也仍然被認為，將會是潛在的龐大消費市場(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0:42-43)，但是中國大陸呈現的發展模式卻是以投資帶動成長，並非以消費帶動，因此國際上對中國大陸成為國際主要消費市場的期待一直無法實現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07:26-28)。在中國大陸累積龐大的貿易盈餘，歐美許多國家卻出現貿易赤字的情況下，尤其當歐美市場出現不景氣時，希望中國大陸成為國際主要消費市場的期待就更形升高，包括受到歐美不景氣影響的臺灣，由於與中國大陸在地緣、語言甚至政治上有諸多關聯，內心可能也非常期待中國大陸市場的內需，以及在國際上的發展潛力能夠創造臺灣的機會，臺灣對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期待基本上與臺灣屬於國際經濟體系一環的情況相一致，與國際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期待相似。

正因為臺灣與美國的經濟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強固化了臺灣與美國的政治關係。堅持尋求臺灣統一的中共卻與臺灣缺乏此種經濟關係，戰後因為政治造成隔離因此經濟的來往也斷絕，開始互相來往的時候，雙方相對的經濟條件無法造成類似臺灣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但卻形成另一種兩岸經貿關係。中共政治與經濟上都有理由期待擴大與臺灣的經濟關係，但是包括政治、經濟、技術的各種條件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的建立，建立如臺灣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係的可能性與兩岸間各種條件不合，雖然臺灣規模較小，中國大陸與美國相似規模大，但兩岸間的經濟關係恐怕難與臺美經濟關係相類似，兩岸經貿關係的未來將會以如何的走向發展，成為兩岸甚至更廣泛的國際許多人士關心的議題，關心的角度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有鼓勵的，有戒慎的。

後冷戰世界情勢變得更加複雜，如何看待這個議題觀點也變得多樣。而中國大陸產業技術的不斷升級，也漸漸使得與中國大陸的國際貿易對於國際主要國家的軍事主義產生影響，「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會議」所關心的問題不只是美國軍事主義相關的問題，也包括其他經濟安全的問題，但是這類議題是重點之一。美國對於此一議題的關心帶有軍事主義論述的思考方式，認為中國大陸產業升級與經濟力量的壯大，將會支持中共軍力的提升，雖然表示期待繁榮的中國大陸能夠負起穩定國際環境的責任，但是也隨時審查中國大陸的產業與軍備發展是否縮小與美國軍備的差距，日益縮小的美中軍備水準將會使中共有能力影響美軍傳統運作(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7: I;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0: 73-74)。以傳統臺美在軍事與產業的緊密關係而言，美國所關心的中共產業軍事主義發展也是臺灣所關心的，但中美經貿與兩岸經貿已經高度發展，在此產業新的局面，產業軍事主義將會有如何的新的發展可能？

第四節 戰後臺灣受產業軍事主義影響下的兩岸經貿

後冷戰美中與兩岸經貿發展迅速，顯得繁榮興旺¹⁶⁵，但是隱含其中的各種影響力道卻可能帶來諸多不同的效應，軍事主義論述所關心的社會活動邏輯也是其中之一。市場與國家的角色在各種可能效應的考量下，交互發揮影響力。美國期待繼續維持軍備明顯優勢，並且維護市場力量發揮互惠的作用。中共當然希望市場的作用使得中國大陸經濟繼續快速成長，並使自身軍備的發展能夠抵銷美國的传统優勢。在這個大潮流沖激裡臺灣的外向型經濟與軍備應如何自處？201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此一〈協議〉基本牽涉兩岸間的「貿易」、「投資」與「經濟合作」的關係。

其中「貿易」包括「貨品貿易」與「服務貿易」，並且〈協議〉中也分別就「貨品貿易」與「服務貿易」設置「早期收穫」機制。¹⁶⁶因此此一〈協議〉的部分機制已經剋期開始運作，而〈協議〉所關涉的領域，將經由繼續的磋商逐漸擴大，雙方為此並設置「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以期架構兩岸間包括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的廣泛關係，此類關係領域所列各種合作項目往往都以「包括但不限於」的精神表現〈協議〉具有可能創意的開放性。

在市場力量牽引下，短短 2-30 年間，兩岸甚至「中國大陸與國際」的經貿關係，已從幾乎沉寂到達今日的繁盛狀態，但與中國大陸高度的經貿往來關係，卻在政治面向產生高度爭議，例如臺灣藍綠陣營對此一議題到目前為止的無休辯論，包括李登輝「國統綱領」時期的憧憬，訪美之後的「戒急用忍」，陳水扁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到馬英九此一〈協議〉的簽訂，以及美國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最惠國待遇爭議，和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會議」之設置，國防部向國會每年提交「中國軍力報告」。

市場力量與政治與戰略糾葛也體現在〈協議〉的「序言」，透過檢視「當前」兩岸「經貿」關係，回顧「戰後」「兩岸關係」發展，可以發現〈協議〉之「序言」所稱兩會遵循「平等互惠、循序漸進」的原則，在推動兩岸經貿發展的政策形成中有著特殊的意涵，¹⁶⁷尤其突顯「戰後」兩岸經貿與廣泛的兩岸關係相呼應所有著的曲折發展過程。3-40 年前兩岸之間仍然堅壁清野，一片肅殺的嚴重敵對分

¹⁶⁵ 相關統計請參見表 6-2，表 6-3。

¹⁶⁶ 依據「協議」2011 年初「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應即生效實施。

¹⁶⁷ 「國統綱領」是臺灣重啟兩岸交流的指導性綱領文件，要求兩岸關係政策應「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但已於 2006 年民進黨執政時廢止。面對轉變以及未來情勢的不確定性，「國家統一綱領」為一基本策略指導性政策文件，以因應大陸情勢變動，尤其政經制度結構轉型方式採取分階段的開放措施；此一討論或可參考〈大陸政策的長期規劃〉（陳良潮，1990,7）。

隔狀態，以及一大一小規模懸殊，還有制度與發展程度的差異，使得相互間開始的往來成為一種社會與觀念的巨大震撼，對於此一新狀態的發展，政策上如何因應的問題在社會上造成廣泛的沖激震盪，為了避免政策的躁進失據，因此「平等互惠、循序漸進」的原則成為兩岸重新建構交流往來關係的重要原則。但另一方面經貿往來產生了方向歧異的不平衡情況。

因此雖然此一〈協議〉基本上是屬經貿領域的〈協議〉，但是「平等互惠、循序漸進」卻是蘊含基本政治狀態考量的原則。而今日兩岸經貿來往狀態的呈現，背後隱含著兩岸政治與經濟基本狀態時間過程性質的影響。因此以「平等互惠、循序漸進」為原則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應在此一時間過程性質的政治經濟背景環境中簽訂以期發揮作用。並且期待具有創意開放性的〈協議〉精神，能在演化中的未來政治經濟環境發展中發揮作用，其中包括國際相對軍備條件的考量。

但顯然對於未來政治經濟情勢的不確定感，也構成〈協議〉的限制，因此必須在雙方相對的政治經濟態度上需要強調「平等互惠」，在事態的控制與發展上需要遵循「循序漸進」。而支撐此一〈協議〉生存的觀念理論，正如之前已經介紹臺灣產業與軍事在全球體系中發展，中國大陸雖改革開放政策前後有所不同，但產業與軍事也與其在全球體系中的特殊定位，有著密切關聯。因此雖然討論的是「兩岸」經貿，但也仍思考包括軍備相對條件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的環境背景。如此，除「兩岸」之外，美國的角色也至關重要。

綜而言之，中美與兩岸經貿重建初期，其產業與貿易內涵遠不足以影響中美軍備的優劣差距，反而在經濟上對美國與臺灣有利，政治上促進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戰略上則更強大穩定的中共可以協助牽制蘇聯。對中國大陸而言，今日中國大陸與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發展與國際地位比較，則已說明一切。但當此一趨勢日益繁盛，美國國會則採取了警戒審視的態度，目的之一即希望在發展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得到市場利益的同時，能夠維持美國軍力傳統的運作，或者導引中共朝向共利互惠的區域甚至全球運營(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I)，臺灣的政策也歷經轉折。

美國國會對中國大陸會有警戒審視的態度，主要源於美國認為中國大陸的發展一直受惠於美國，但美國希望中共會開放國內市場，並且預期中共有這方面的意願將改革經濟制度，進而改革政治，但是否能夠成真則未得而知。到了2004年中國大陸的經濟與軍事發展已漸取得成果，但市場的開放與政治經濟的改革則引起美國的疑慮(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4: 1-2)。

這一情況顯示美國與中國大陸交往發展的狀態未必符合美國原先的預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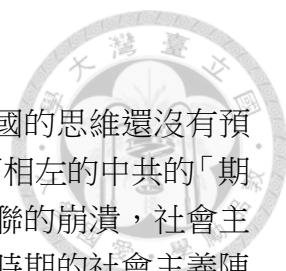
理上或許可以如此解釋，美國與中國大陸的交往，促使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經由軍事主義論述所認知的邏輯，也促使中共軍力得以更快速發展，經濟的發展似乎也與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在論理上有關聯，但中共在開放其國內市場，進行經濟與政治改革方面的進展則未如預期，因此一個立即的問題在於經濟與軍事得到發展的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制度卻缺乏改革動力的中共，將會如何與美國在世界上爭鋒？亦即美國對於正在迅速擴大發展的中國大陸經濟與軍力，會在世界上扮演如何的角色是沒有把握的。美國期待中共扮演在區域與世界上重要但理性的角色，雖如此仍可以合理假設，美國應該也希望自身繼續保持產業與軍事上的優勢。雖然事實上，在當下世界產業的地位與軍事力量，美國仍然保持一段時間的領先，但是美國製造業的外移卻可能造成軍備優勢的嚴重後果(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7: 62)。

今日中國大陸的軍事與產業技術水準一般仍然與世界領先水準有一段差距，除這點之外，另有幾個特性值得注意，亦即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改革與對外開放，促使產業貿易與經濟獲得迅速發展，首先這個差距已經大幅縮小，其次差距縮短的速度極快，第三中國大陸產業與軍事技術的發展，近年大幅得益於自海外取得的資源，第四已致力於自主研發，第五已有部份達到世界領先水準的領域出現，第六與世界領先水準的差別中的素質能力，與快速發展的能力可能在本質上仍有部分不同。

很明顯上述特點將會影響關於美國期待保持優勢的判斷，但事實上另有一些相關的特性與美國保持優勢的期待的判斷有關，但未必那麼直接，可能的情况是這些特性屬於更本質性，因此影響更深遠，但卻未必在預測時被那麼直接引用考慮。例如中國大陸的產業與經濟運作模式與初期比較變得更彈性、更市場化，但卻仍有較深的政府干預而不夠市場化。中共對西方的態度也與初期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主導的模式有著深刻的差別，雖然西方國家三不五時仍會產生「中國威脅」的疑慮。¹⁶⁸

中共在思想制度與意識型態的轉變，提供美國除了「優勢觀」之外，其他可能的政策目標，而這類的政策早已是美國與中共發展關係的期待，事實上相對優勢之是否實現依賴實際發展表現，無法隨人想像設定，如果美國已經缺乏手段抑制中國大陸產業自主發展，而中國大陸自主發展的能力得以持續，或者美國意圖管制投入中國大陸的技術與資本需要耗費的成本過於龐大，終致無法實施，並且中國大陸仍能保持快速提升發展的步調，那麼終究美國將無法長期保持優勢，那也將成為一種現實。

¹⁶⁸ 正如「美中安全與經濟審查會議」與國防部每年向國會提交關於中國大陸的報告常常提到的觀點。



由於中共的軍備今日與美國仍有一段差距，報告顯現的美國的思維還沒有預設中共軍備超越的情況，但卻已經提出軍備強大但與美國利益不相左的中共的「期待」。冷戰的經驗，兩大陣營是帶著意識型態進行對抗的，蘇聯的崩潰，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紛紛轉型，中共雖實行社會主義，但相對於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共有其獨特性。蘇聯崩潰中共仍然不放棄社會主義的招牌。中共確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似乎是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但也可能是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如果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講的話應是如此。但也可能是社會主義的變體。但未來實際可行的有著明顯社會主義特徵的市場經濟會是如何的樣貌（趙紫陽，1987¹⁶⁹；中共十四屆三中全，1993）？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對於本身制度與價值有著高度的信心，蘇聯解體是一明白的證例，中共改革確立市場經濟並且經濟發展遠遠超過過往，又是另一個證例。雖然中共的市場經濟仍然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但可能只是務實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的一個策略現象，終究中國人將會發現只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才是正解。當中國大陸走上市場經濟，走上民主，帶著意識型態對抗的冷戰經驗將會一去不返。那時的中國大陸至少不會因為意識型態與美國對抗。也就是雖然中國大陸獲得快速成長的果實，但是卻仍然還沒有得到西方國家在產業與軍備發展中，制度與價值的精髓，當需要自主發展的時候可能正如當年蘇聯一般將會遇到自身制度上的問題。亦即中國大陸如果不繼續改革，那麼也可能只在吸收模仿的過程中讓人驚艷，無法自主發展引領世界，也可能像當年蘇聯一樣，被自身的制度所困，崩潰於一夕。

關於前述中國大陸的產業技術水準仍然落後美國一段，可以如下做進一步描述；目前全球產業發展的整體景象，包括主要的旗艦企業仍為西方國家企業，但是許多西方國家卻面臨嚴重的貿易赤字問題，旗艦企業掌握產品市場與關鍵技術研發能力，這種能力對於軍事產業要求尖端領先更加契合。臺灣產業配合旗艦企業具有技術研發的能力，但旗艦企業的角色臺灣從發展歷程與親近的國內市場規模等因素仍不具備。中國大陸的企業發展很快，但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比臺灣企業處於更低階位置（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譯〕，2004：86-88）。¹⁷⁰

但可見中國大陸的企業，一直致力於從國外吸收高科技，且曾經執行市場換

¹⁶⁹ 趙紫陽（1987）。〈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¹⁷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譯），Ernst, Dieter（原著）（2004）。〈東亞地區電子產業中的全球生產網絡及其在馬來西亞的升級前景展望〉，Yusuf, Shahid & Altaf, M. Anjum & Nabeshima, Kaoru（eds.），《全球生產網絡與技術變革》，頁 82-146。《世界銀行東亞系列研究叢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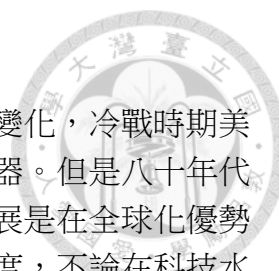
技術的政策。而美國也有管制敏感技術輸入中國的機制。今日中國的軍事裝備中許多關鍵的零組件依然依賴進口，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軍事發展仍然覺得透明度不夠，中共一直有發展戰略與武器裝備的機制。運用民生經濟的科技是解放軍的策略，包括商用造船業與資訊產業都對解放軍進步提供貢獻，如中國大陸資訊科技企業華為等，與解放軍就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高速電腦、軟體、積體電路/微處理器，這些關鍵科技解放軍在中國大陸民用企業中就仍然找不到合作夥伴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42)。

本章前面各節的探討，可以見到產業軍事主義論述可以引申到兩岸個別以及之間的產業與經貿發展，而且也與中美之間臺美之間的經貿發展有所關涉。亦即這種論述可以顯現上述產業與經貿發展中的某種「邏輯」或某種「效應的繼續發展」。這種關係最粗略簡單的說法，就是產業發展提供軍備發展的物質基礎。這點尤其將臺灣戰後初期的物質缺乏階段，與之後臺灣經濟發展已經有某種績效的時候相互比較，或者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與當前的階段相互比較，可以看到這種粗略的論述的意義。但如果希望依據軍事主義論述做更細緻的掌握，那麼可以發現有許多更細緻的特性可資探討此種論述的內涵。後冷戰全球化已經使得情況變得極為複雜，這些更細緻的論述也只是比較而言，在已經掌握的更細緻的論述對於複雜的情況的了解顯然是有所助益，但可能仍然不充分。因為可能市場會以其邏輯產生更巨大的連鎖效應，正如人們所認為的科技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

關於兩岸經貿架構〈協議〉臺灣已經有許多意見顯現，其中有些強調此一〈協議〉可能帶來的互惠效應，但也有不少特別指明其中潛藏的不利影響。追溯戰後包括冷戰全球體系時期以及後冷戰時期兩岸產業發展的軍事主義意涵，可以提供評估這些爭議的一個分析面向。這些爭議討論的項目其實不少，例如兩岸共創國際品牌企業，共同開發中國內需市場，對臺灣勞動市場的衝擊，成為臺灣建立區域經濟的敲門磚，可能侵蝕臺灣在主權的主張（劉大年等，2011：121-130¹⁷¹；童振源，2011：44-46¹⁷²）等。但由本論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經由過去迄今的發展脈絡，今日兩岸經貿確實已經顯現某種產業發展關係與備戰發展關係的背離現象，雖然從爭論中可以看到許多更廣泛面向的關心，但以軍事主義論述討論此類爭議，此一爭議其實正可以做為此一背離現象的例證。由於中國大陸在世界範圍的影響日增，加上臺灣在世界的定位也有一些作用，因此可以認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在全球化中有特定的代表意義，當然再加上美國的關係。因此此一背離現象也可做為全球化的一個需要關注的焦點。

¹⁷¹ 劉大年等（2011）。〈ECFA 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契機〉，「ECFA 簽署週年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103-13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6 月 11 日。

¹⁷² 童振源（2011）。〈ECFA 的爭議與成效〉，「ECFA 簽署週年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37-5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6 月 11 日。



在產業的全球化裡，各國政府對軍備需求的思考，也產生變化，冷戰時期美國軍備供應基本依賴國內軍事工業。有時會與盟國共同生產武器。但是八十年代以來，尤其後冷戰全球化加速，產業科技的發展迅速，此一發展是在全球化優勢之下推動的進步，並且超過封閉的軍事工業體系的技術發展幅度，不論在科技水準或者在成本控制，今日美國軍事裝備都要依賴全球化的產業生產。由於將中共視為戰略對手，美國禁止軍用零組件購買中國大陸產品。但是在全球化越來越深刻的情況下，有時候追蹤零組件的原產地變得很困難，而且在全球化浪潮驅使下美國國防部的主要合約供應商也有轉型成為產品整合廠商，本身不再製造任何零組件，而從亞洲尤其包括中國大陸購買零組件。而更大的風險則為當中共或其他零組件來源，與美國本身的戰略關係有歧異時，當有變故發生而需求大增時，供應商可能出於自身的意圖或者被當地的政府影響反而突然中斷供應，美國國防部尤其關切微電子零組件的來源(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7: 48-53)。

中共軍事工業系統原由軍事工業企業組成，在市場化發展衝擊之下，透過〈武器裝備科研究生產許可管理條例〉與〈武器裝備科研究生產許可實施辦法〉，吸納大批原屬民用產品生產企業進入軍工系統¹⁷³，使民用企業佔軍工系統的三分之二，軍事工業企業則擴大觸角依據〈國防科技工業社會投資領域指導目錄〉，將投資領域擴大到民用領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0）¹⁷⁴。正如七十年代開始美國民用資訊產業勃興，蘇聯卻仍然停留在軍事部門，造成蘇聯產業發展的落後，此一趨勢繼續發展使得民間企業產業技術能力遠遠高出封閉的軍事企業系統，也造成美國的裝備製造高度依賴民間企業的後果，中共推動民用企業進入軍事工業體系，以及軍事企業進入社會領域。

唯有採取這樣的策略，才能應對正如軍事主義論述所注意到的當前軍備在時間上，難以劃分「平時」、「戰時」的特性。只依賴完全仰賴國防訂單血統純正的軍工系統，若不是「平時」花費鉅額財政支出，每年生產大量軍品而無用武之地；就是「平時」縮減國防支出，「戰時」沒有足夠的軍工系統獲得先進與大量軍備。各國軍備為了能夠在國與國之間保持競爭能力，不能不有著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平時軍事需求與產業發展要有某種的連結。

後冷戰全球化發展使此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更推進一步，尤其與一方面大膽改革開放引進原西方陣營外資，卻遲遲不願（如前蘇與東歐）放棄共產主義招牌的中共的產業交流與經貿往來，使得此一產業的軍事主義論述必須進入更為複雜

¹⁷³ 國務院、中央軍委（2008）。〈武器裝備科研究生產許可管理條例〉。

¹⁷⁴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8-2011 每 2 年度）。《中國的國防》。

的境地。但可能正如 Mann 的軍事主義論述指出的其實更多的原因是在多國體系。〈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可能將會是很好的例證。從兩岸以及美國當前處身的全球化情境，可以發現不論產業與經貿，或者軍備戰略，兩岸與美國事實上處於一種快速發展變遷但卻停留在冷戰遺留的架構的情境之下。〈協議〉就是在這種情境下的產物。因此才會提出「具有可能創意的開放性」，又有「循序漸進」步步為營的考量。

從軍事主義論述觀點，兩岸經貿的此一特性，未必只是如當前較常見到的論證，屬於「市場互惠」與「主權立場」二方的討論。事實上其中有著隱隱約約關於「戰略對手」之間的軍事主義邏輯思考。其中包括一些比較明顯的考量，例如與尖端軍備關係比較密切的產業部門，是否將為我所用，或為對手所用。所建立的軍備有關的產業鏈上的關係廠商，是否有變故發生平時轉變為戰時的時，仍能戮力增產的信賴問題。

中國大陸為計畫經濟轉型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是否如蘇聯被人認為為一全國軍工複合體（Holloway, 1980: 86 轉引自 Thee, 1986: 117）¹⁷⁵？今日顯然中共國家角色仍能對中國大陸的企業有著遠超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干預空間，雖然艾森豪也對西方的軍工複合體膨脹的影響發出警告（Eisenhower, 1961）¹⁷⁶，中共在其體制下的軍事投入隱藏在一般的支出中，遠遠超過公佈的數字。當然中國大陸近年經濟發展很大一部分依賴出口美日等國市場，這類的經濟活動當然不能以「全國軍工複合體」的角度觀之。但是在國家佔有很大影響力的情況下，產業軍事主義論述所關心的產業與軍備的關係，如何在中國大陸對外經貿關係中體現？在彼此軍事領域仍存在對抗情勢下，這個問題將會引起關注。

第五節 小結

科技與產業的發展在軍備中的角色已經變得舉足輕重，甚至使得國家只依靠純粹的軍工系統，無法在國際軍備競爭中維持優勢，因此關於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的論述益發顯得值得重視，尤其此一論述以冷戰時期全球架構為背景，介紹美蘇的軍國主義邏輯。但其實雖然情況未必完全適合兩岸的中國大陸與臺灣，特別在中蘇交惡與美國大打「中國牌」之後，兩岸未必處在東西陣營壁壘分明的體系

¹⁷⁵ Holloway, David (1980). "War, Militar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Alternatives* (6)1: 86.

¹⁷⁶ Eisenhower, Dwight D. (1961).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Speech"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eisenhower001.asp

之中，以及或者兩岸在冷戰架構裡都不算是最焦點，所以不在軍事主義論述最關心的範圍，但其實可以發現兩岸的產業發展都可以運用關於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進行探討¹⁷⁷。並且可以分別看到兩岸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表現的型態，例如國際分工的臺灣產業發展，與其在西方陣營軍事主義邏輯中的衍伸意涵，以及中國大陸在計畫經濟下的「重重輕輕」產業政策與核武發展的軍國主義邏輯。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兩岸與東西方陣營產業與軍備都是壁壘分明的，但在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產業結合軍備壁壘分明的情況開始產生變化，尤其進到後冷戰時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情況變得益形複雜。基本上軍備交流戒慎的思維變動較慢，但產業互惠交流的趨勢發展很快，因此產業軍事主義的邏輯如何適應情勢發展？美國與中共的軍備模式都有各自的演變，以求適應。與 1980 年代初期比較，美國與中共的產業與軍備都獲得長足發展提升，但與當時仍極為落後的產業比較，中國大陸產業發展與軍備進步的幅度，卻更吸引世人的關注，在產業全球化趨勢似乎難以阻擋的情況下，許多軍事主義論述關心的議題湧現，但是真實世界未來將如何演變仍充滿不確定。而臺灣相關的議題基本仍維持傳統與美國保持關係，未來的不確定也將影響臺灣。

到底是市場邏輯完全主導投資與貿易發展，或者軍備的考量將使國家插手貿易且產生影響，美國國會關注中美經貿情勢的發展；兩岸經貿的發展要迅速掌握可能利基大開大闢，或者戒懼謹慎，臺灣內部也爭議不休。從軍事主義的論述邏輯可以看到仍有必須重視的議題橫亙其中，就此論述關心的議題而言，迎接兩岸的經貿完全開放，並且緊密攜手共進的時代，只要做好思想與心理準備即可，或者需要某種安排？終究從戰後即已逐漸建立的傳統產業與軍備模式，雖然在 80 年代後，產業的發展漸漸突出既有的範圍，但卻不像今後可能需要面對的情勢，亦即以軍事主義論述的觀點，在軍事關係仍然更多拘泥於冷戰架構情況下，產業關係則迅猛發展，確實應審視此一情況可能的矛盾，但是或者市場發展的力量將會提供其他的機會，發展出新的模式。全球化產業模式，也可能帶來新的軍備模式。當然除了在中國源自計畫經濟時期的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影響仍明顯的情況下，聚焦軍事主義論述的分析觀點，必然會受到重視，但這也不意味著在此之外，美中與兩岸經貿主題缺乏其他廣泛的空間。

從冷戰時期美中與兩岸在制度、政治、軍備安全以及貿易與經濟發展的基本思維的深重對抗性本質，到後冷戰的開始緩和調整發展，直到今日已有廣泛而深刻的交會，但仍存在本質的對抗性來看，希冀對今日的美中與兩岸議題所牽涉的因素能有更清晰的掌握，不啻仍屬過去知識理論領域少見的挑戰，但對此領域知識與理論深刻清晰的認識，卻是國家發展策略與政策面難以迴避的課題。由於戰

¹⁷⁷ 加上「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的思考分析，如註 35、註 97、註 99、註 100、註 101。

後臺灣國家發展議題自始即與此一領域的構成與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此一議題也必將投射在其他各章的討論，例如臺灣基礎產業能源的轉型發展，與政治體系的發展及對相關經濟政策與發展的影響等議題之中。



**表 6-1-1 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U.S.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2001-2021)**

NOTE: All figures are in millions of U.S. dollars on a nominal basis, not seasonally adjust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etails may not equal totals due to rounding. Table reflects only those months for which there was trade

年度	出口	進口	貿易餘額
2021	151,065.2	506,366.9	-355,301.7
2020	124,485.4	434,749.0	-310,263.5
2019	106,448.4	450,760.4	-344,312.0
2018	120,281.2	538,514.2	-418,232.9
2017	129,997.2	505,165.1	-375,167.9
2016	115,594.8	462,420.0	-346,825.2
2015	115,873.4	483,201.7	-367,328.3
2014	123,657.2	468,474.9	-344,817.7
2013	121,746.2	440,430.0	-318,683.8
2012	110,516.6	425,619.1	-315,102.5
2011	104,121.5	399,371.2	-295,249.7
2010	91,911.1	364,952.6	-273,041.6
2009	69,496.7	296,373.9	-226,877.2
2008	69,732.8	337,772.6	-268,039.8
2007	62,936.9	321,442.9	-258,506.0
2006	53,673.0	287,774.4	-234,101.3
2005	41,192.0	243,470.1	-202,278.1
2004	34,427.8	196,682.0	-162,254.3
2003	28,367.9	152,436.1	-124,068.2
2002	22,127.7	125,192.6	-103,064.9
2001	19,182.3	102,278.4	-83,096.1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Country and Product Trade Data/ U.S. Trade in Goods by Country, March 2022) .Foreign Trade - U.S. Trade with China (census.gov)

註：單位為名目百萬美元；統計數字可能因時間推移再做修正；資料來源為美國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

表 6-1-2 U.S. 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U.S.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1985-2000)

NOTE: All figures are in millions of U.S. dollars on a nominal basis, not seasonally adjust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etails may not equal totals due to rounding. Table reflects only those months for which there was trade

年度	出口	進口	貿易餘額
2000	16,185.2	100,018.2	-83,833.0
1999	13,111.1	81,788.2	-68,677.1
1998	14,241.2	71,168.6	-56,927.4
1997	12,862.2	62,557.7	-49,695.5
1996	11,992.6	51,512.8	-39,520.2
1995	11,753.7	45,543.2	-33,789.5
1994	9,281.7	38,786.8	-29,505.1
1993	8,762.9	31,539.9	-22,777.0
1992	7,418.5	25,727.5	-18,309.0
1991	6,278.2	18,969.2	-12,691.0
1990	4,806.4	15,237.4	-10,431.0
1989	5,755.4	11,989.7	-6,234.3
1988	5,021.6	8,510.9	-3,489.3
1987	3,497.3	6,293.6	-2,796.3
1986	3,106.3	4,771.0	-1,664.7
1985	3,855.7	3,861.7	-6.0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Country and Product Trade Data/ U.S. Trade in Goods by Country, March 2022) .Foreign Trade - U.S. Trade with China (census.gov)

註：單位為名目百萬美元；統計數字可能因時間推移再做修正；資料來源為美國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

表 6-2 臺灣對外與對中國大陸投資

單位：億美元；%

年度	對外投資	成長率	對中國大陸	成長率
2000	50.77	55.31	26.07	108.11
2001	43.92	-13.50	27.84	6.79
2002	33.70	-23.26	67.23	141.48
2003	39.69	17.76	76.99	14.51
2004	33.82	-14.78	69.41	-9.85
2005	24.47	-27.63	60.07	-13.45
2006	43.15	76.32	76.42	27.22
2007	64.70	49.93	99.71	30.46
2008	44.66	-30.97	106.91	7.23
2009	30.06	-32.71	71.43	-33.19
2010	28.23	-6.06	146.18	104.66
2011	36.97	30.93	143.77	-1.65
2012	80.99	119.07	127.92	-11.02
2013	52.32	-35.39	91.90	-28.16
2014	72.94	39.40	102.77	11.82
2015	107.45	47.32	109.65	6.70
2016	121.23	12.83	96.71	-0.12
2017	115.73	-4.54	92.49	-0.04
2018	142.95	23.51	84.98	-0.08
2019	68.51	-52.07	41.79	-50.89

本表取自中華民國 108-109 年工業發展年鑑 p.29 表 1-1-9 我國對外與對中國大陸投資

資料來源：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對大陸間接投資統計年報。

表 6-3 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

按美元計算(千美元)

年度	出口	進口	貿易餘額
80		293,248	
81	1,051	747,073	-746,022
82	16,227	1,015,504	-999,277
83	131,634	1,858,713	-1,727,079
84	376,614	3,091,306	-2,714,692
85	623,379	3,059,852	-2,436,473
86	626,480	3,915,312	-3,288,832
87	914,872	4,113,882	-3,199,010
88	2,602,091	4,528,891	-1,926,800
89	4,391,494	6,229,334	-1,837,840
90	5,020,729	5,970,374	-949,646
91	10,690,015	8,041,252	2,648,763
92	23,209,786	11,095,670	12,114,116
93	36,722,825	16,891,452	19,831,373
94	44,056,256	20,161,610	23,894,645
95	52,377,134	24,908,965	27,468,169
96	62,928,415	28,221,209	34,707,205
97	67,480,900	31,569,648	35,911,252
98	54,767,030	24,554,421	30,212,610
99	77,886,868	36,255,159	41,631,709
100	85,122,327	44,094,821	41,027,506
101	82,592,334	41,431,372	41,160,962
102	84,122,247	43,345,498	40,776,749
103	84,709,050	49,253,561	35,455,489
104	73,270,118	45,264,650	28,005,468
105	73,732,229	43,990,846	29,741,383
106	88,745,404	50,037,1321	38,708,272
107	96,497,850	53,789,774	42,708,076
108	91,789,357	57,394,384	34,394,973
109	102,446,179	63,587,815	38,858,364
110	125,903,424	82,471,661	43,431,763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第七章 結論



戰後臺灣歷經顯著的政經轉型發展過程，這個複雜的轉型發展過程，應有一個系統化脈絡化合適的「國家發展」相關學理加以描繪，甚且可期待經此相關學理架構支撐進行進一步有效的探討預期分析。此處之轉型，尤其針對政經轉型而言，有著「發展轉型」與「制度轉型」的不同意義，雖然如此，但兩者間往往仍有著重要的緊密關聯。而在此「國家發展」的相關學理的思想架構裡則將其同時涵括，並且探討其中之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以及發展與轉型之間的「互鑠」。「國家發展」相關學理除直接討論臺灣內部轉型發展議題之外，也思考國際已然先行現代化發展的體系對臺灣轉型發展之影響，尤其臺灣在全球格局中可能的獨特定位條件的因素影響，也予以探討。並且也可將此「國家發展」相關學理涵蓋到「國家發展」內涵之相關領域、因素，探討諸如知識經濟、基礎產業能源，美中與兩岸經貿等。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創見

本博士論文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主要討論兩個研究問題：一、如何具體化臺灣國家發展論，並且運用在解析戰後臺灣的政經發展？二、如何採用上述具體化國家發展論，解析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之知識經濟、能源產業轉型發展與兩岸經貿發展？筆者在博士論文本文已就此作深入探討解析。

就具體化臺灣國家發展論，並且運用在解析戰後臺灣的政經發展之建構而言，鑒於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雖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效，尤其相對於例如中北美洲開發中國家，所表現出來的某些明顯不完美現象特徵，更顯得表現傑出，並且目前也已經有許多關於臺灣政治發展，以及臺灣經濟發展的論述，描述台灣的發展情況，但以「國家發展」學理角度討論，內容包含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的戰後臺灣發展議題，則相對遠為不足。因此對此一從「國家發展的相關學理」的角度探討、討論包括政經發展脈絡的臺灣發展議題，可在既有關於臺灣發展的論述之外，增益關於臺灣重要政經發展議題的討論。對戰後臺灣國家發展相關議題的認識提供助益，並且可與既有的依據學術分工定義其討論範疇與重點的，臺灣政治發展與臺灣經濟發展論述產生互相補充，增進認知的效果。當然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與臺灣經濟發展論述，提供了作為此一臺灣國家發展學理的基礎支持角

色，使臺灣國家發展的相關學理的探討，得以更為堅實、廣泛以及深入。並且可以在此一國家發展相關學理討論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的脈絡裡，進一步深入討論關於解析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之知識經濟、能源產業轉型發展與兩岸經貿發展。

因此本博士論文的架構也首先就第一個研究問題，討論如何具體化臺灣國家發展論，並且運用在解析戰後臺灣的政經發展；首先探討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的架構構成（國家發展學理思想架構），並且嘗試將之與既有的臺灣發展相關論述學理做脈絡化聯結。在此脈絡化聯結中引入既有臺灣政治發展論述，將其轉型發展階段及意義作為一個軸線，並且再與既有的臺灣經濟發展論述聯結，具體在全球現代化發展整體態勢，以及在此全球整體態勢之戰後冷戰格局中，臺灣處於獨特定位的情境，運用軍事主義論以及福特主義論，探討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之政經發展脈絡。在此第二章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其中第一節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第二節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第三章則應用於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之討論。之後進一步及於第二個研究問題之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述之重點領域與關鍵因素；第四章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第五章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的重點領域舉例：能源產業轉型發展；第六章戰後臺灣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舉例：兩岸經貿發展；第六章之探討也涉及美中貿易關係之兩岸經貿發展。而在此一國家發展論的探討中，本論博士文在第二章之第二節，也整合比較政治學之政治體系一般架構，與比較經濟制度中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特性架構，成為一個比較制度的標準架構，並且將之運用在此一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論中，以之分析探討各相關領域議題。

本博士論文探討「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已然論述具體化建構相關的臺灣國家發展論理，並且將此學理運用在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與相關國家發展領域的討論，經由此探討論述可以看到至少有如下八點主要發現：

一、以臺灣國家發展論的架構內涵論述，明顯增益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與既有的臺灣經濟發展論述

臺灣國家發展論理重視戰後全球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的整體態勢，以及此一整體態勢展現在冷戰格局的環境裡，而此格局顯現了臺灣的特有定位，進而可以看到戰後臺灣國家發展在此一格局架構裡表現的意義，並且與一般關於臺灣政治發展以及臺灣經濟發展的論述，是在明顯分領域界定的學術分工傳統裡進行的論述不同，在國家發展論中進行的關於臺灣政治與臺灣經濟的論述，顯著表現了在此全球架構裡政經互鑠的意義。此外與既有的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不同，國家發展論在此全球格局中之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也相對於傳統似乎可以自然設定在市場架構裡描述的臺灣經濟發展，需要強化探討制度轉型的議題，而且可將重視此一制度轉型議題，認為是國家發展學理中自然具有的屬性。

二、歐洲現代國家發展的軍事主義論結合福特主義論，對描述臺灣政經發展脈絡頗有助益

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之冷戰格局之臺灣定位，顯著影響臺灣政經發展，在臺灣國家發展學理重視此一定位的架構下，運用研究歐洲現代化之軍事主義論，另外結合福特主義論，可以有助於解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的演變，並且可以看到此因素對臺灣政經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事實上可以認識到，直到今日此影響因素，仍是臺灣持續發展中不容忽視的因素。甚至在此認識裡，應該也可合理的很容易認為其影響，仍將投射到未來的發展趨勢中。

三、臺灣生產因素加入及運用美國市場機制是臺灣市場經濟發展的特有型態

在此全球格局的臺灣定位條件裡，且如同歐洲現代化理論強調自由競爭市場在其中的重要角色一般，臺灣生產因素在前述軍事主義論與福特主義論的思考脈絡解釋下，以國際分工出口導向的模式，參與及運用美國成熟的市場機制，產生此一思考脈絡所能期待的效益效果，可說是戰後臺灣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由傳統社會在與美國等已開發現代化國家，有著緊密連結的結構裡，讓市場因素得以發揮作用的重要型式。也是在全球現代化整體態勢的冷戰格局臺灣定位的條件裡，臺灣由傳統社會快速現代化過程中，市場機制得以生成與發展的一種特有型態。尤其運用「技術與產業發展過程分析架構」結合科技發展因素，更可增益此一觀點。

四、臺灣威權體制之「結構化」及其必須調適與「抗結構化」發展是影響臺灣政經發展的重要因素

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中的傳統非現代化社會，加上由「一個中國」因素支撐的「威權體制」形成，是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的初始期狀態，而其「結構化」與因之產生的「抗結構化」因素，是對其後政經發展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值得特別關注。

(一)首先「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以「一個中國」因素解釋「威權體制」的形成，及之後的演變。但其實在其中更應關注由此「一個中國」因素，支撐形成的「威權體制」的政治體系「結構化」問題。因為此「結構化」問題，與前述（與全球現代化發展整體態勢有著緊密關聯的）臺灣政經發展趨勢，存在可能的嚴重不適應與不合理的問題，因此必須經由「威權轉型」及「民主化」的政治發展，因應政治體系環境的轉變。此一「國家發展論」之「臺灣政治發展論述」，與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的「一個中國」影響論述比較，顯示出更廣泛的思考架構，因此更容易表現滿足對其具體化的要求。亦即強調因「一個中國」因素在國際情勢轉變影響下失去合理性，促使推動「政治轉型」之外，更應關注政治體系的「一個中國式」的「結構化」無法適應緊密關聯全球現代化發展整體態勢發展的臺灣國家發展，在軍事主義福特主義國際分工出口導向的需要，使此種

「結構化」必須轉型以求政治體系的合理化。而此「結構化」及「抗結構化」，一直延續著存在臺灣政治發展過程中。

(二)由於「威權體制」「結構化」對臺灣政治發展有著明顯影響，因此「民主化」的過程裡新興的政治結構或力量甚為重視，必須進行「威權體制」的「去結構化」。因此可以很明顯看到在此臺灣政經發展脈絡裡，「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政府如何意圖實現「去威權體制結構化」，並將之作為政策制定的指導因素，呈現在「挑戰 2008」之「國家發展計畫」中。

(三)也由此凸顯「臺灣國家發展論」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對「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之增益作用。

(四)延續「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中的「結構化」討論，本博士論文參與「結構化」的討論，並且本博士論文提出面對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的「分期」，仍可能存在分期具有不確定性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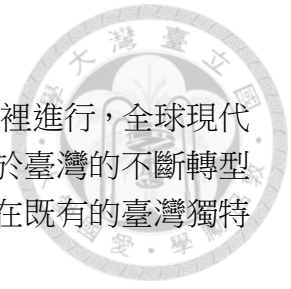
五、本博士論文嘗試整合建構之比較政經制度分析架構，對戰後至今的全球格局及臺灣政經轉型的描述頗有助益

在戰後全球現代化發展整體態勢及冷戰格局影響下的臺灣國家發展論，必須強化制度比較與轉型的議題，本博士論文以比較政治之政治體系一般架構，結合自由競爭市場的特性架構的比較政治經濟分析架構，對在此臺灣國家發展論所牽涉的制度比較及制度轉型議題頗有助益，尤其自由主義制度相對於計畫經濟，以及由計畫經濟漸進引入市場機制的中國改革後制度的討論，對冷戰及後冷戰格局的制度討論甚有幫助。

事實上以此一整合架構可以做更清晰的制度比較，及由此比較看出不同國家之間的可能交流，在彼此制度性質與功能的衝突性，凸顯冷戰與後冷戰格局制度面可能的影響因素，並且可以以之探討傳統社會威權體制的戰後臺灣初始制度架構狀態，以及之後其與政治經濟發展的關係；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模式與美國及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的可能的制度因素解釋。例如，此一政治經濟制度比較分析架構，以經濟制度的角度提供政治體系是否以及如何介入經濟活動的討論架構。

六、探討知識經濟在臺灣政經發展脈絡中的發展有其特殊意義

在全球現代化發展整體態勢裡，知識經濟的提出正好出現在臺灣政經轉型的一個節點，包括政治轉型與勞動生產因素價格低廉競爭優勢不再時。臺灣政經發展脈絡如何應對此一全球趨勢觀念，頗值關心討論。可思考在臺灣國家發展關聯全球現代化發展的定位裡討論，其中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推動亦然。



(一)臺灣國家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發展是在不斷轉型發展的過程裡進行，全球現代化發展整體態勢中的知識經濟觀點、思想、戰略的提出，相對於臺灣的不斷轉型發展並與全球關聯明顯，因此此一議題在臺灣的討論，應反映在既有的臺灣獨特發展架構中。

(二)文化創意產業的提出亦應在知識經濟的臺灣國家發展定位裡提出以及思考推動。由歷史脈絡過程相關領域的表現看來，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有其具有開創性質的意義在。本博士論文就此進行討論，包括傳統文化因素在國際分工，臺灣生產因素參與美國及國際市場之架構中，並未有機會凸顯，甚至處於被忽略的情狀之中，而在國際分工型態的發展提升台灣產業能力之後，傳統文化因素重新嘗試與創新產業能力結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將可能具有特別的國家發展意義。

七、臺灣能源產業「市場化」議題曾是政策關注焦點而由於能源產業有其特殊性必須特別關注，此一議題仍將可能深重影響臺灣能源發展相關議題的發展

作為基礎產業的全球能源產業在全球現代化發展的態勢趨勢中，面臨多面向嚴峻挑戰，並使臺灣深受影響。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冷戰格局中，臺灣能源議題必須面對與全球能源議題關聯的挑戰，包括，能源「市場自由化」的思考討論，以及「溫室效應」的應對策略及其可能的廣泛影響，而油氣地緣政治的影響也無所遁形。

能源供應充足是支持臺灣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的必要條件，傳統能源產業技術上的大規模經濟性質，臺灣又屬一個與其他陸地孤立的島嶼，加上戰後初始以來油電採取個別單一國營企業經營的體制，因此在臺灣政治開始威權轉型，經濟開始「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的時期，也試圖對油電國營的方式採取開放「自由化」的政策，並對此進行討論，事實上可以發現從能源產業產品的技術面來看，或從臺灣特別的條件，或者能源消費特性來看，能源產業的制度議題，例如「市場制度」議題，確實是一種極為特別的議題，因此也必須有特別的法律支撐其運作與選擇。因此此一議題必然也深刻關聯能源產業未來的發展，包括「溫室效應」可能對能源產業造成嚴重衝擊效應，甚至產品與技術造成全面革命性影響，因此諸多（全球性及）臺灣自身條件的變因的綜合影響將對臺灣能源產業造成重大效應。

八、對外經貿議題是臺灣國家發展重要構成影響因素，未來依然如此，其中「比較制度」與「軍事主義」思維影響重大

臺灣現代化發展在經濟發展是以「出口導向」主導，亦即以臺灣的生產因素參與美國市場為主的國際市場，推動經濟升級發展，也帶動市場機制的發展，而且促進臺灣政治威權體制朝向民主化轉型發展，兩者的互鑠發展構成臺灣國家發

展重要而關鍵的一環。在此過程中臺灣的經濟制度自由化的效果也愈趨明顯，逐漸減少威權體制之政治體系對經濟活動之直接干預，而這個發展趨向也符合軍國主義理論之經濟發展工業化產業發展，對軍事能量產生支持效果的觀點，也符合美國冷戰以來對臺灣全球角色的觀點。但不只如此，此一議題解析的思想架構，也延伸到全球格局之中的美中貿易，並且成為影響美中與兩岸經貿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甚至難以忽視其影響在時間軸上仍將繼續投射到未來可能的發展。

綜和本博士論文之探討以及前述各項「主要發現」討論，可以認為至少具有以下九項創見。

一、運用「國家發展論」「具體化」、「脈絡化」成為「臺灣國家發展論」

可將本博士論文相關學理稱之為：「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並且此一「國家發展論」由「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與「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理論兩部分構成。關於「國家發展論」在臺灣已有學者就此進行討論，並且提出關於此一學理建構的主張，其主張並非嘗試全新建構此一學理，而是主張運用既有的理論，例如特別提到「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發展理論」的應用，但是此一主張仍甚少就臺灣應有如何的具體論述探討。本論文之「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可視為經由理論與既有論述之「脈絡化」，就此國家發展論予以「具體化」論述建構之嘗試。

(一)描述國家發展論的基本架構，並以之應用在臺灣國家發展

關於此一「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的嘗試建構，首先，本博士論文在「國家發展論」以整合理論典範，聚焦「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互鑠」影響「發展」的思考架構下，探討臺灣的發展議題，並將既有的關於「臺灣發展」、「臺灣政治發展」、「臺灣經濟發展」與「臺灣政經發展」的諸多論述在此架構下予以「脈絡化」；這些學理與論述牽涉各種理論典範，而這些理論典範是相對於全球格局環境的理論典範。因此本博士論文此一「脈絡化」的工作，使得原本仍缺乏「具體」關於臺灣發展內涵的「國家發展」學理論述，得到與既有臺灣發展的諸多論述的脈絡化連結。

也使得原有分立的關於「臺灣政治發展」與「臺灣經濟發展」的論述，得到在「國家發展」的架構下的連結。並且此一既有論述在「國家發展」架構下的脈絡化工作，產生了此類論述在此架構的相對定位比較，使得既有論述得到更清晰、廣闊的繼續發展論證視野。例如本博士論文經由此脈絡化而著重探討在臺灣政經發展裡（全球格局中）的美國布局，與對臺灣相關發展議題的影響。並且運用在「國家發展」常著重的歐洲現代化理論之軍事主義與自由競爭市場因素，解釋戰後臺灣在此全球格局中的發展，有益於相關議題在此脈絡中的持續觀察。

(二)以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之階段為軸，結合既有臺灣經濟發展論述

並且本博士論文選擇具體引用臺灣學界研究所得之戰後「臺灣政治發展」學理論述作為軸線；在此軸線中，學界已將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置於一個受到經濟發展影響，受到外部國際與兩岸環境影響之理論架構下。且將此戰後「臺灣政治發展」過程劃分為「威權體制」，以及相對於「威權體制」的「威權轉型」與「民主鞏固」三個時期，做為戰後臺灣政治的發展時間軸線分期；因此其初始期「威權體制」時期的狀態，是其後循序發展的原態，其後有著由此原態轉型的「威權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的發展。而此一作為戰後臺灣政治發展初始期狀態的「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就是依賴在其時的全球格局中有著代表「全中國」的責任而獲得合理性的。

這些轉型發展在此學界建構理論中，如前所述，是在一些相關因素共存的發展架構裡產生的發展態。因此首先必須界定此原態，以及掌握相關的因素架構變遷發展，才能認知此一整體發展過程與相對的狀態。並且此一戰後臺灣政治發展學理論述將此「威權體制」界定為一「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的體制，由此界定，使得本論文選擇以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理論，在「國家發展理論」的思考架構下，作為「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的軸線，所牽涉的就不只是政治發展，而及於經濟、社會等諸領域。並且是一種國家機關控制支配包括經濟與政治社會的狀態。因此其後的「威權轉型」過程也就是國家機關對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民間社會控制與支配鬆解以及重建構的過程。

由於「國家發展理論」強調聚焦「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互鑠影響之「發展」，並且可以發現臺灣學界研究所得之戰後「臺灣政治發展」論述，已有臺灣「經濟發展」影響「政治發展」之論述，但相反方向的臺灣「政治發展」影響「經濟發展」的討論則仍闕如，因此本論文亦將此做為重點，探討「政黨輪替」的「臺灣政治發展」，在經濟政策的選擇與建構產生如何的顯著影響。並且由於「威權體制」為此一「臺灣政治發展」歷程之「原態」，因此此一影響的範圍將甚為廣泛，並不只是「純粹經濟」的經濟（例如包括文化創造產業）政策，就此本論文亦有部分之引申討論。

(三)運用歐洲現代國家發展之軍事主義論，在臺灣特有之全球格局定位條件解析臺灣國家發展

在以上「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軸線裡，依據其架構，本博士論文亦將與其密切相關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理論加以整合連結，而得到「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的論述架構，並且由於此一論述架構與國際局勢密切相關，本論文進一步將「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理論引入此一論述架構中，其中「軍事主義」理論將戰備與產業在國際局勢中不同的社會與國家做了聯結，對例如戰後臺灣與國際

局勢有著密切關聯的政經發展的認知可能頗有助益，也提供了與其他論述不同角度與討論空間的關於「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嘗試。在到此為止的論述架構裡，戰後臺灣從「威權體制」的原態，在跨政經社文化諸領域，以及內外因素架構變遷發展影響下，朝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發展，並且產生相關的論述，本論博士文亦將其與上述的論述架構聯結，掌握其特性，以資進一步探討分析相關的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

因此本博士論文歸納在「國家發展理論」架構下脈絡化的「臺灣經濟發展」宜注意以下因素的影響：1.全球現代化文明發展的基本態勢；2.全球格局之美國布局及臺灣之格局定位；3.變遷的臺灣政治體系，包括「發展型國家」的政府角色，以及政黨輪替的去結構化政策思考；4.傳統社會威權體制現代化市場機制的缺乏，與軍事主義、福特主義導引臺灣生產因素國際分工出口導向，參與美國市場，並帶動的現代化市場化發展；5.臺灣歷史文化對變遷政治體系運作及現代化之市場化的影響。

二、比較制度分析架構的整合建構

前述臺灣政治發展理論，認為初始之「威權體制」是在戰後國際情勢的參與建構才得以產生，並且在其發展影響下，朝向「自由民主」的制度轉型。而在國際局勢方面，則呈現「自由民主」制度陣營相對於「計畫經濟極權」共產陣營，構成戰後的冷戰格局。因此不論就戰後臺灣不同時期來看，或臺灣所處關係緊密的國際局勢，都有著存在不同制度，並且因此制度歧異因素產生效應作用的事實。故建構一個有效的比較制度架構，以更深刻認知制度的機制與作用，將大有助益，因此本博士論文亦就此一「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根據需要，創新設計提出一個比較的架構，作為分析認識問題發展理論之用。

亦即將「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視為具有「發展軸線與相關因素架構」的系統，那麼在其中已可見到相對不同「制度構成」在此一系統中常常扮演重要角色，包括臺灣的不同時期，以及臺灣與之密切關聯的國際局勢，因此本博士論文亦嘗試將「比較政治」的一般架構，與基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特性構成「比較經濟制度」架構整合，而以之討論包括戰後臺灣政治經濟制度狀態的各種不同制度，以及民主與共產，還有共產轉型的不同制度之間。經由此討論可以看到不同制度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運作機制，不同制度之間可能產生彼此運行機制的互動效應，而對戰後臺灣與國際局勢的政治經濟與國家發展產生影響；例如不同的機制結合軍事主義就會產生不同的行為。而此一架構之運用在討論美中與兩岸經貿議題時更見助益。

三、以臺灣國家發展論架構，強調結構化影響解釋臺灣的政經發展

如前所述，運用本博士論文延續既有「國家發展理論」之理論討論，嘗試落

實具體「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以探討「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首先，戰後臺灣從「威權體制」，朝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發展，而「政治民主化」相關的論述之中，注意到了「威權體制」的「結構化」問題，此種結構化問題，在「威權轉型」，甚至「民主鞏固」時期都仍然必須面對，在此一「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發展脈絡」的探討裡，本論文也參與了討論，指出認為既然在「威權轉型」，甚至「民主鞏固」時期都存在「威權體制」的「結構化」問題，那麼理論上，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分期問題，就可能存在不確定性，有可能「威權轉型」，甚至「民主鞏固」後的「威權體制」再現的可能。其次，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來到時，本博士論文介紹了由於受到「威權體制」「政經結構化」的影響，出現了臺灣政經領域的混亂挑戰，此一現象也明顯地影響了「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觀，影響了「國家發展政策」選擇。

此外，本博士論文也運用前述的「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尤其加入「軍事主義」與「福特主義」理論，探討「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脈絡」，此一探討描述冷戰格局中臺灣生產因素以國際分工出口導向的模式，參與美國及國際已開發國家的市場，改變既有臺灣政治體系的环境，賦予戰後臺灣政經發展面對舊結構進行轉型調適的新觀點。達到整合描述包括「戰後臺灣政治發展」、「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和與其相對且有密切影響的「戰後全球格局變動」的「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脈絡」的目的；在對此之研究領域中，提供一個相關可資參考的整合架構。並且了解「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政策選擇應也可置於此一政經發展脈絡之中討論；而也會在「兩岸經貿」議題裡產生影響。

本博士論文也運用前述的「戰後臺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認識「第一次輪替」政黨的「國家發展」強調抗結構化影響的政策選擇。並且循此脈絡本論文以「超越國際代工」、「超越威權社經結構」之定位，描述此一政策選擇之主軸。並且可以看到本論文採取這樣的定位，可以更明顯的認知此一政策主軸與前述脈絡之關聯性與其深刻內涵，在這樣的脈絡以及本論文採取的觀察定位裡，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新興執政黨對「知識經濟時代」有了更多的強調。本博士論文認為這是在其基於政治認知，擬追求臺灣產業超越傳統的「國際代工」角色與「威權社經結構」情況裡產生的。「國際代工」的角色，一直在戰後臺灣產業發展有著主導性意義，而「第一次輪替」政黨希望能夠推動明顯的轉變。在此脈絡下，自然更願意強調知識經濟時代臺灣的技術創新發展與屬知識經濟時代新增產業的客家文創產業。本博士論文就其在此脈絡下就可能的發展性意義加以探討。

四、以「技術與產業發展分析架構」探討「出口導向」的產業升級轉型發展模式

戰後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以「國際代工」的型態參與「國際分工」，此一模式在戰後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本博士論文應用「技術與產業發

展過程分析架構」，分析關於國際分工之戰後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此一分析架構將產業之產品研發生產過程作為一個軸線，而以產品的生命週期做為另一軸線，再將兩者結合，形成產業與經濟發展在國際分工架構裡的分析架構。此一分析架構從產品技術發展的角度，對臺灣在有著明顯國際分工特徵的國際經貿導向裡，促成戰後臺灣產生有著顯著產業升級轉型效果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分析架構。

五、以基本經濟學理論之生產因素構成結合國際代工模式分析臺灣知識經濟發展

全球現代化整體發展態勢的發展，在中國改革開放加入國際分工體系，臺灣政經轉型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夕，已開發國家提出知識經濟來臨的觀點，並成為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執政黨國家發展政策的內容；本博士論文以經濟學基本理論之生產因素構成，應用在臺灣政經發展產生的臺灣生產因素參與國際分工經濟發展，探討臺灣知識經濟可能的發展議題。臺灣生產因素參與國際分工，當然顯現了在國際市場中臺灣各種生產因素的競爭力比較，而在已開發國家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中提出知識經濟的環境裡，知識經濟觀點與臺灣各種生產因素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如何結合分析，產生臺灣知識經濟發展的意義，是本博士論文以此方法處理臺灣知識經濟發展可以期待的效果。

六、臺灣經濟發展的特性分析臺灣知識經濟之文創產業發展

本博士論文就傳統「國際代工」的「分工」角色以及產業經濟構成特性，與「知識經濟」所代表的可能產業經濟構成特性進行比較，可以看到上述脈絡與定位所可能具有的意涵。可以更清晰看到第一次政黨輪替經建會制定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所具有的發展意義；其中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以及「新客家運動」其中有「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政策，此一屬於國家發展計畫內涵之一的政策，具體的可以認為包括「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文化發展」屬「國家發展」之一環，尤其在「威權時期」本土語言文化受到壓抑，突破這種壓制自然成為「威權轉型」與「民主化」必要的一環，以圖超越「威權社經結構」並且結合超越「國際代工」。本論文除了論述此一「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國家發展」政策之脈絡意涵之外，並且相對於傳統脈絡中臺灣產業的明顯「國際代工」以及廣泛的各領域受「威權體制」結構化影響，進一步以「生產因素」構成探討「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之意義，以及以「文化與產業」共生相互促進的角度探索推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發展的意義。

七、以能源特性解析臺灣能源產業市場機制可能運作情況

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能源由於其非常不同的特性，因此「自然」成為重點領域，但也正因為其非常不同的特性也很「自然」在進行「自由化」的轉型中充滿挑戰。或許在不同的情境裡，能源的諸多特性裡其中有些會有所不同，但在許多的情境裡，能源屬「基礎產業」，相對的，與其他商品比較，它的價格彈性比較

低，也就是，由於在現代社會裡，許多事情如果沒有能源的充裕供應滿足需求，不管社會的這些事情能源之外的條件多優越，這些事情都不可能獲得進行，因此如果社會要將事情進行下去，在使其它優越條件發揮作用之前，必須先處理妥善能源供應滿足需求，因此縱使能源供應提高價格，如果還想使需求能源的這些事情得以進行下去，都必須購買足夠的能源，不會因價格調高，任意減少需求。以另外一種詞彙描述能源此種特性，就是「能源產業問題屬國家發展的安全議題」。除此之外，能源的生產與使用的技術也往往極具特色，例如電力的供需與電網的調度息息相關，那麼如何進行市場化，自由化？由於需要技術背景以了解能源供需的運作，因此戰後臺灣的能源產業多為工程背景的人員，本博士論文作者有機會接觸並且學習認識此類技術之性質，因此有機會思考與探討戰後臺灣能源自由化問題，有幸成為此一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下能源重點領域參與討論的耕作者。

相對於臺灣能源自由化其他討論多屬單純策略與政策論述，本博士論文則採取在臺灣既有的國營台電公司與中油公司獨占經營電力與石油市場情況下，運用基礎的市場「調節機制」討論臺灣能源市場自由化問題。並且分別就「資金」、「技術」、「運輸通道」、「資訊系統」與「產業間調節」等影響「調節機制」的因素探討能源自由化問題。這些因素在臺灣既有的由台電與中油國營獨佔的市場裡能有著怎樣的特性，是思考臺灣能源市場自由化必須關注的問題，例如電力市場的通道問題的討論就極具意義。

八、能源低價格彈性需求特性解釋溫室效應

除了能源在國家發展與戰後臺灣政經轉型中有著非常不同的特性之外，其實今日能源其實還牽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氣候暖化」的議題，造成氣候暖化的人類活動來源就是做為基礎產業，現代社會缺它不行，屬於安全議題的能源。本博士論文也趁著對能源知識與理論有些基礎之便，也參與因應京都議定書之臺灣能源產業轉型討論，提供認識議題的架構。當然這個議題雖然屬氣候暖化的議題，但基本上必須掌握大略的能源發展趨勢技術知識背景，以及政經轉型制度面的認知，亦屬能源轉型議題。而在本論文的架構中，也提出能源產品是否屬低彈性係數產品的討論，尤其在考慮能源溫室效應議題時，或許這將可成為此一議題策略討論之關鍵。

九、比較制度架構結合軍國主義論分析美中與兩岸經貿

討論戰後臺灣的國家發展之關鍵因素，尤其在 1990 年代之後，兩岸經貿發展關係重大，如前面已介紹，本博士論文的相關學理為：「戰後台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其中可分為「戰後台灣威權體制及其政經轉型發展論」與「比較政治與比較經濟制度」兩部分；當然本博士論文特別嘗試建構的「戰後台灣政經轉型的國家發展論」的整體架構仍然是討論此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架構，並且其中也特別著重軍事主義理論與比較制度理論結合的討論。從歷史發展脈絡觀察，可以

發現制度因素、發展因素、全球因素都是探討兩岸經貿發展必須思考的因素；因此兩岸經貿議題當然是經濟議題，但是也明顯牽涉政治思考。相對於其他的相類議題討論，本博士論文應用了此一獨特的分析論述架構。

在本博士論文所設定運用的比較制度架構，可以看到美中關於「市場經濟」的觀念與實際構成，存在著基本歧異，此種歧異獨立與結合軍事主義理論，影響著「美中經貿」發展，且此一議題同樣反映在「兩岸經貿」發展的基本考慮裡；再從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脈絡」來看，此「發展脈絡」內含外部強烈影響因素，影響 1980 年代後國際與內部政經情勢劇變下的臺灣國家發展。而從那時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以及臺灣對中國大陸的人員交流與經貿交流的開放，也啟動了「兩岸經貿」的發展，並且在短短的四十年間，「兩岸經貿」的規模已經極為龐大。但不應忽略「兩岸經貿」是在全球供應鏈裡（尤其與美國市場有著密切關聯）的一部份。

運用前述理論關於兩岸經貿的討論，指出科技與產業的發展在軍備中的角色已經變得舉足輕重，甚至使得國家只依靠純粹的軍工系統，無法在國際軍備競爭中維持優勢，因此關於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的論述益發顯得值得重視，尤其此一論述以冷戰時期全球架構為背景，介紹美蘇的軍事主義邏輯。但其實雖然情況未必完全適合兩岸的雙方，特別在中蘇交惡與美國大打「中國牌」之後，兩岸未必處在東西陣營壁壘分明的體系之中，以及或者兩岸在冷戰架構裡都不算是最焦點，所以不在軍事主義論述最關心的範圍，但其實可以發現兩岸的產業發展都可以運用關於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進行探討。並且可以分別看到兩岸產業的軍事主義邏輯表現的型態，例如國際分工的臺灣產業發展，與其在西方陣營軍事主義邏輯中的衍伸意涵，以及中國大陸在計畫經濟下的「重重輕輕」產業政策與核武發展的軍事主義邏輯。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兩岸與東西方陣營產業與軍備都是壁壘分明的，但在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產業結合軍備壁壘分明的情況開始產生變化，尤其進到後冷戰時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情況變得益形複雜。基本上軍備交流戒慎的思維變動較慢，但產業互惠交流的趨勢發展很快，因此產業軍事主義的邏輯如何適應情勢發展？美國與中共的軍備模式都有各自的演變，以求適應。與 1980 年代初期比較，美國與中共的產業與軍備都獲得長足發展提升，但與當時仍極為落後的產業比較，中國大陸產業發展與軍備進步的幅度，卻更吸引世人的關注，在產業全球化趨勢似乎難以阻擋的情況下，許多軍事主義論述關心的議題湧現，但是真實世界未來將如何演變仍充滿不確定。而臺灣相關的議題基本仍維持傳統與美國保持關係，未來的不確定也將影響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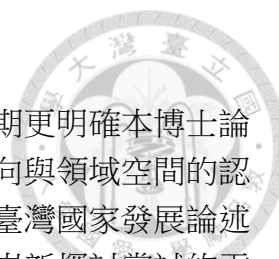
到底是市場邏輯完全主導投資與貿易發展，或者軍備的考量將使國家插手貿

易且產生影響，美國國會關注中美經貿情勢的發展；兩岸經貿的發展要迅速掌握可能利基大開大闢，或者戒懼謹慎，臺灣內部也爭議不休。從軍事主義的論述邏輯可以看到仍有必須重視的議題橫亙其中，就此論述關心的議題而言，迎接兩岸的經貿完全開放，並且緊密攜手共進的時代，只要做好思想與心理準備即可，或者需要某種安排。終究從戰後即已逐漸建立的傳統產業與軍備模式，雖然在 1980 年代後，產業的發展漸漸突出既有的範圍，但卻不像今後可能需要面對的情勢，亦即以軍事主義論述的觀點，在軍事關係仍然更多拘泥於冷戰架構情況下，產業關係則迅猛發展，確實應審視此一情況可能的矛盾，但是或者市場發展的力量將會提供其他的機會，發展出新的模式。全球化產業模式，也可能帶來新的軍備模式。

從冷戰時期美中與兩岸在制度、政治、軍備安全以及貿易與經濟發展的基本思維的深重對抗性本質，到後冷戰的開始緩和調整發展，直到今日已有廣泛而深刻的交會，但仍存在本質的對抗性來看，希冀對今日的美中與兩岸議題所牽涉的因素能有更清晰的掌握，不啻仍屬過去知識理論領域少見的挑戰，但對此領域知識與理論深刻清晰的認識，卻是國家發展策略與政策面難以迴避的課題。由於戰後臺灣國家發展議題自始即與此一領域的構成與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此一議題也必將投射在其他各章的討論，例如臺灣基礎產業能源的轉型發展，與政治體系的發展及對相關經濟政策與發展的影響等議題之中。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本博士論文嘗試將「國家發展學理」與既有的「臺灣政治發展」論述及「臺灣經濟發展」論述，予以脈絡化與具體化，成為「臺灣國家發展論」；「國家發展學理」的內涵包括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必須面對既存的全球已開發國家領先現代化發展的態勢，這個態勢戰後包括冷戰格局，而臺灣正好處於這個格局中的一個特有關鍵定位。這個定位條件應用歐洲現代國家發展理論的軍事主義論，以及描述美國經濟產業的福特主義論，解釋臺灣政經發展脈絡的臺灣生產因素，參與美國及國際市場的國際分工出口導向式的臺灣經濟發展型態，其中也包含以「技術與產業發展分析架構」，探討「出口導向」產業升級轉型發展模式的效果。臺灣生產因素加入美國及國際市場機制運作，促進臺灣經濟發展，以及臺灣市場經濟發展，進而帶動臺灣政治轉型發展。也結合全球現代化發展轉型發展的條件，綜合促動知識經濟、能源產業及兩岸經貿的思考與發展。而在此不論台灣內部發展以及外部格局的推展，制度轉型因素都居於重要關鍵地位，因此在此「臺灣國家發展論」的討論之中，也引入本博士論文關於比較制度的試整合建構。



綜合本博士論文此前的探討，在此提出以下檢討意見，以期更明確本博士論文所進行知識探討之定位，希冀有助於對進一步的知識探索方向與領域空間的認識。本博士論文此一「國家發展學理」脈絡化與具體化，得到臺灣國家發展論述的努力，是一個關於臺灣發展領域，基於「國家發展學理」的嶄新探討嘗試的貢獻。其一，此一探討證明「國家發展學理」應仍有許多其他相對的探討嘗試空間可以被嘗試探討。這是就「國家發展學理」所可能涵蓋的思考架構與本論文之努力範圍對照而言。其次，在本博士論文嘗試的脈絡裡，也仍有進一步做堅實與細緻的探討空間可以進行，並對臺灣國家發展論述的發展有所助益。第三，例如本博士論文嘗試整合的比較制度架構，在描述中國由計畫經濟體制演變而來的政經制度，相對於美國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政經制度，以及兩者之間可能的交流運作的制度影響評估，能夠凸顯其關鍵性因素作用的價值，且對臺灣國家發展論述將有關鍵重要影響，應予進一步深入討論。

再來，就全球之現代化發展，溫室效應的影響顯然不應忽視，而傳統能源產業市場機制之運作，顯然受制於傳統能源技術特性，那麼涉及新技術有益於解決溫室效應的新能源產業，如何能尋找獲得合適的市場機制建構而得到有效的發展空間，這是本博士論文之探討嘗試，就此一議題應提出的檢討，此為檢討之第四。第五，知識經濟在此全球現代化發展態勢也有其重要意義，就臺灣的開發中國家特有轉型型式而言，應如何採取適當的策略促進有效發展，是在本博士論文就此一議題的探討努力之後，必須繼續努力探索的議題。第六，「國家發展學理」具有發展整合的意義，以之脈絡化具體化之臺灣國家發展論述，可以助益臺灣政治與經濟發展之認知。

經由以上的檢討提出建議如后；以「國家發展學理」脈絡化具體化的臺灣國家發展論述，相對於既有的臺灣發展相關論述，可提供有意義的補充與助益，有助於知識界在關於臺灣發展的思考基礎與架構獲得更廣泛的思考空間。建議知識界在進行關於臺灣發展的思考，以及研究工作，應重視臺灣國家發展論述的可能空間。建議延續在整合比較政治制度與比較經濟制度的架構下，探討制度轉型議題，可以更深刻認識臺灣內外的制度議題。建議在臺灣能源市場之理論架構下，探討發展新能源以因應碳的淨零排放議題。建議在臺灣經濟發展之生產因素運用分析結合知識經濟之生產因素分析，探討臺灣知識經濟發展議題。建議繼續在包含科技發展之比較制度與軍國主義論裡，進一步深入探討臺灣之經貿環境與議題；而此一議題其實與全球之美國與西方，相對於轉型制度與發展之中國，認識彼此相互關係所需的深刻本質性研究關係密切。

參考文獻




壹、中文

- 丁學良（2011）。《辯論“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丁樹範（2005）。〈市場因素與一九九零年代以後的中國裝備體系的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頁 29-52。
- 丁樹範（2006）。〈全球化下的中國國防工業〉，《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頁 1-22。
- 于宗先（總主編），歐陽勳 黃仁德（本集主編）（1994）。《臺灣經濟發展總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 于國欽（2014）。〈美援會的那些事兒〉，《工商時報》，1月19日。
- 中央社（2019）。〈美中關稅戰大事記〉。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010040.aspx?fbclid=IwAR0Wjr3ZTerpece2NK5YOXGso0J_zT4YA-l6SzA2c9P8V3GqMNM3PQXKsZY
- 中油公司。《石油通訊》。台北。
- 中國統計局（1997）。《中國統計年鑑》。
- 中國全國人大。〈九五計畫與二〇一〇年遠景規劃〉。
- 中國能源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課題組（2004）。《中國能源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
- 中國全國人大（200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 中國石化出版社。《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年鑑》。北京。
- 中國統計局（1998）。《中國統計年鑑》。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譯），Ernst, Dieter（原著）（2004）。〈東亞地區電子產業中的全球生產網絡及其在馬來西亞的升級前景展望〉，Yusuf, Shahid & Altaf, M. Anjum & Nabeshima, Kaoru（eds.），《全球生產網絡與技術變革》，頁 82-146。
《世界銀行東亞系列研究叢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 王佳煌（1998）。《國家發展》。臺北：臺灣書店。
- 王信賢（2010）。〈誰統治？論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以《反壟斷法》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頁 35-62。
- 王昭明（1994）。〈溯行經濟奇蹟-誰決定財經大計？〉，《遠見雜誌》，7 月號。
- 王業立（2000）。〈政黨輪替實現 民主鞏固期來臨〉，《中國時報》，3 月 20 日，第 15 版。
- 牛可等（譯），LaFeber, W.（原著）（2011）。《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第 10 版）》。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田君美 紀舜傑（2014）。《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發展》，經濟叢書系列之 50。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 田君美 溫芳宜 鄭至涵 劉珩均（201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台投資之政策




- 研究》，經濟叢書系列之 51。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 石油工業出版社。《中國石油天然氣工業年鑑》。北京。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1）。〈第一冊總體經濟發展目標〉，《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8）。〈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與策略建議〉，國家永續發展論壇圓桌會議。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 行政院國科會（1998）。《科技白皮書》。
- 呂亞力（1995）。《政治發展》。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 何畏 易家詳等（譯），Shumpeter, Joseph Alois（原著）（2001）。《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用、利息和景氣循環的考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 何建章、王積業（主編）（1984）。《中國計畫管理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何清漣、程曉農（2017）。《中國：潰而不崩》。新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 李西潭（2001）。〈邁向鞏固的民主：臺灣案例〉，載於高永光等編，《民主與憲政論文集彙編》，頁437-46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 李西潭、張孝評（2002）。〈臺灣民主化分析-Rustow與Huntington模式的檢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十卷，第二期，頁45-8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 李松森（2006）。《中央與地方國有資產產權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登輝（1972）。《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臺灣研究叢刊第 106 種。臺北：臺灣銀行。
- 李震中（主編）（1985）。《計畫經濟學（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李鵬（1997）。〈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瞭望〉。
- 谷長春、鄭德榮（1989）。《中國十年改革概覽》。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
-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 吳若予（2007）。《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臺北：檔案管理局。
- 吳若予（2004）。〈臺灣統籌分配稅款制度的政治性〉，《臺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131-65。
- 吳敬璉（2005）。《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臺北：美商麥格羅 希爾國際公司 臺灣分公司。
- 邱榮舉（1987）。《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析論其中央政制之設計》。臺北：臺大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邱榮舉、謝欣如（2009）。《臺灣憲法與政治研究》。臺北：翰蘆圖書公司。
- 邱榮舉、王保鍵（2012）。《臺灣客家運動－客家基本法》。臺北：五南書局。
- 周恩來（1956）。〈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的報告〉。
- 周振超（2009）。《當代中國政府”條塊關係”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 周嘉辰 (2019)。〈實驗主義與政策試點：中國大陸的公立醫院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1 期，頁 35-65。
- 周嘉辰 (2019)。〈第九章中國大陸勞動關係治理〉，徐斯勤 (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專書：「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與變遷》，頁 276-297。臺北：大陸委員會
- 林添貴 (譯)，Pillsbury, Michael (原著) (2015)。《百年馬拉松》。臺北：麥田出版社。
- 林炳炎 (2004)。《保衛大臺灣的美援》。臺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
-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2018)。〈有關美國 301 條款調查行動的總統備忘錄〉。
<https://hk.usconsulate.gov/zhhk/n-2018032201-zh/>
- 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 (1993)。《政策白皮書 (綱領篇)》，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 范揚松 (1994)。〈客家族群特性與企業性格會通與轉化〉，《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建會。臺北。
- 胡煜嘉 (譯)，Gold, Thomas B. (原著) (1987)。《臺灣奇蹟》。臺北：洞察出版社。
- 施世駿 (2019)。〈第八章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社會政策〉，徐斯勤 (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專書：「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與變遷》，頁 248-275。臺北：大陸委員會
- 施建生 (1984)。《經濟學原理》(八版)。臺北：施建生發行。
- 陸民仁 (1980 六版)。《經濟學》(六版)。臺北：三民書局。
- 孫兢新 (編) (1990)，《中國科學技術四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孫殿柏 (1985)。《比較經濟制度》。臺北：三民書局。
- 孫震 (2003)。《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
- 徐正戎、張峻豪 (2004)。〈從新舊制度論看我國雙首長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22 期，頁 139-180。
- 徐斯勤 (2007)。〈中國大陸中央與各省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力競爭，1993~2004；菁英政治與投資政策的議題聯結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2 期，頁 1-33。
- 曹海濤 (2012)。〈中國大陸的分權改革與地方政府投資行為-財政誘因觀點〉，《中國大陸研究》，第 95 卷，第 2 期：1-42。
- 陳玉璽 (1995)。《臺灣的依附型發展》，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第 5 卷。臺北：人間出版社。
- 陳和平 (1997)。〈節約能源是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能源月刊》10 月號，頁 1。北京。
- 陳良潮 (1990)。〈大陸政策的長期規劃〉，《經濟前瞻》，第 19 號，頁 50-53。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陳良潮 (1993)。《大陸科技發展研究》。經濟專論 (147)。臺北：中華經濟研



- 究院。
- 陳良潮（1994）。〈第五章兩岸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分析；（第四節兩岸產業技術發展能力）〉，于宗先主持，《兩岸產業競爭趨勢分析》，經建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
- 陳良潮（1995）。〈大陸科技實力剖析〉，《經濟前瞻》，5月5日，頁45-48。
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陳良潮（1996）。〈大陸科技政策的探討-「二元結構」的發展模式〉，3月，《科技報導》。臺北：科學月刊。
- 陳良潮（1996）。〈以科技系統整合做為今後發展的基本策略〉，4月，《科技報導》。臺北：科學月刊。
- 陳良潮（1996）。〈科技發展之研究與文化創新〉，《科技報導》，6月。臺北：科學月刊。
- 陳良潮（1996）。〈自由化後進口大陸能源長期策略探討〉，《能源經濟學會論文集》。臺北。
- 陳良潮（1997）。〈台灣產業與族群關係試析一以客家文化為例〉，臺北市民政局委託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辦《客家發展研討會議》，11月20-21日。臺北。
- 陳良潮（1997）。〈大陸能源環保發展趨勢與兩岸交流探討〉，《八十六年度大陸能源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 陳良潮（1998）。〈臺灣能源產業自由化的理論探析〉，《能源季刊》，28卷，1期，頁50-67。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 陳良潮（1998）。〈因應京都議定書的臺灣能源產業政策探討〉，《能源季刊》，28卷，3期，頁32-46。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 陳良潮（2000）。〈國際石油市場走向及其對臺灣石油產業發展的影響〉，《能源季刊》，30卷，1期，頁75-92。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 陳良潮（2000）。〈從亞洲石油市場型態探討臺灣石油產業國際化〉。《能源季刊》30卷4期，頁49-64。臺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 陳良潮（2003）。〈挑戰2008？台灣經濟應超越國際代工的角色〉。《臺灣綜合展望》No.7。臺北：臺灣綜合研究院。
- 陳良潮（2020）。〈從「中國模式」的特性分析探討美中貿易衝突〉，第十二屆發展研究年會。11月，7-8日，臺北：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
-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臺北：澄社。
- 陳界良（2009）。〈吳騰金古法煉製樟腦業〉，7月13日，《自由時報》。
- 許介鱗（1996）。《戰後臺灣史記卷二》。臺北：文英堂。
- 莊玉若（2013）。〈客家文創產業品牌建立之研究：以台客藍、臺灣藍、客農知香、阿金姐為例〉。屏東：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 袁穎生（1998）。《光復前後的臺灣經濟》。臺北：聯經出版社。

- 
- 張苾蕪（譯），Winckler, E. A. & Greenhalgh, S.（原著）（2005）。《臺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臺北：人間出版社。
- 張典婉（1994）。〈客家工商人的文化理念〉，《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張宗漢（1980）。《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漢裕（譯），Smith, A.（原著）（1989）。《國富論（上）（下）》（三版）。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張漢裕（1974）。〈美援期間臺灣經濟之發展及其戰略因素〉，《經濟發展與經濟思想》，張漢裕博士文集（二）。台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頁 67-104。（原載公論報，民三七年四月九日）
- 張應吾（編）（1989）。《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大事記（1949-1988）》。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梁文傑（譯），斐敏欣（原著）（2017）。《出賣中國》。新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 梁憲初（1994）。〈客家人的企業經營理念〉，《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立法 政策統合協調邁向新里程 102年 8 月 6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網址：[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立法 政策統合協調邁向新里程（102年 8 月 6 日）\(ndc.gov.tw\)](http://ndc.gov.tw)。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本會會徽〉，《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網址：[國家發展委員會-本會會徽 \(ndc.gov.tw\)](http://ndc.gov.tw)。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臺灣經濟發展歷程與策略》。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 莫雨（2020）。〈應對中國威脅 共和黨人重新思考自由放任的經濟主張〉。美國之音。
- 曾建元（2000）。〈三民主義走入歷史-三民主義研究所開出新局〉，《臺大校訊》，584期。
- 曾德清、王雲清主編（1987）。《計畫經濟學概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陶儀芬（2004）。〈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對話：以中國金融研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頁 41-61。
- 彭作奎、彭克仲（1994）。〈新竹客家地區農業經營的理念〉，《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鄒東濤、歐陽日輝（2008）。《中國所有制改革3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童振源（2011）。〈ECFA 的爭議與成效〉，「ECFA 簽署週年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37-55。6 月 11 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 黃玫瑄（2021）。《孫中山革命與東亞客家的關聯》。臺北：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靖純（2014）。〈六堆客家米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研究—以麟洛鄉徐板家客



- 家米食為例)。中壢：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 賴怡瑾(2010)。〈苗栗樟腦業的鑲嵌與轉型：以東華樟腦廠為例〉。苗栗：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溫紹炳、葉茂榮(2004)。〈臺灣樟腦業與客家人的地位提昇之研究〉，客委會委託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研究計畫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報告。臺南。
- 傅凌(譯)，Toffler, Alvin and Heidi (原著)(1993)。《新戰爭論》。臺北：時報文化。
- 經濟部國貿局(2020)。〈美國對中國301措施大事紀〉。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15&pid=636907&fbclid=IwAR2elj2zMyffL1nALKHVpvUK5o_u-cfQujks-jsXJaOryZagpMAQn8II2i4
-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編印(1998)。《國際能源統計》。臺北。
- 經濟部能委會(1998)。〈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全國能源會議預備會議。
- 經濟部能委會(1998)。〈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全國能源會議預備會議。
- 經濟部能委會(1998)。〈能源政策工具〉。全國能源會議預備會議。
- 經濟日報社。〈89年國內經濟大事紀〉。《中華民國經濟年鑑》，頁1382。臺北：聯經出版社。
- 新華網(2018)。〈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5/20/c_1122857981.htm
- 新華社(2020)。〈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20-05/18/content_5512696.htm
- 楊舒媚(2008)。《陳水扁執政與臺灣民主化發展：民主鞏固理論的分析》。臺北：臺大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雷慧英(譯)，谷蒲孝雄編(原著)(1988a)。東京：Asia經濟研究所。《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修訂版)》。臺北：人間出版社。
- ，谷蒲孝雄(原著)(1988b)。東京：Asia經濟研究所。〈第一章臺灣工業化論：序論〉，谷蒲孝雄(編)，《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修訂版)》，頁1-16。臺北：人間出版社。
- ，佐藤幸人(原著)(1988c)。東京：Asia經濟研究所。〈第三節貿易的作用〉，谷蒲孝雄(編)，《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修訂版)》，頁75-88。臺北：人間出版社。
- ，北村通子(原著)(1988d)。東京：Asia經濟研究所。〈第二節跨國公司的投資〉，谷蒲孝雄(編)，《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修訂版)》，頁101-119。臺北：人間出版社。
- 雷慧英等(譯)，涂照彥(原著)(1993)。〈第五章貿易〉，劉進慶等著，《臺

- 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頁 275-330。臺北：人間出版社。
- 趙永茂（2007）。〈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政治科學論叢》，31 期，頁 1-38。
- 趙永茂（2008）。〈二次政黨輪替後對臺灣民主發展的省思〉，《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頁 161-67。
- 趙永茂、羅又軒（2010）。〈中國農村改革與中共政權正當性之關係：以胡溫之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十一卷，第二期，頁 1-41。
- 趙紫陽（1987）。〈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 劉大年等（2011）。〈ECFA 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契機〉，「ECFA 簽署週年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103-13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6 月 11 日。
- 劉孟俊（2017）。〈中國大陸對外併購、投資策略的發展與影響〉，《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15 卷，第 9 期，頁 59-77。
- 劉孟俊、吳佳勳（2022）。〈中國大陸獨角獸與它們的產地：區域特性與資本結構的影響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65 卷，第 1 期，頁 35-70。
- 劉致賢（2015）。〈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議程〉，《臺灣政治學刊》，第 19 卷，第 2 期，頁 41-80。
- 劉德學等（2006）。胡軍（編），《全球生產網絡與加工貿易升級》。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潘德斌等（2012）。《中國模式：理想型態及改革路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蕭全政（2001）。〈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編），《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頁 63-8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蕭全政（2004）。〈經濟發展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臺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頁 1-25。
- 總統府（1992）。〈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 戴寶村（2006）。《臺灣政治史》，國立編譯館主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 瞿宛文（2017）。《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緣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
- 蘇桂富（2006a）。〈第三章中國加工貿易發展軌跡與現狀〉，胡軍（編），《全球生產網絡與加工貿易升級》，頁 51-75。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蘇桂富（2006b）。〈第四章中國加工貿易升級總體狀況〉，胡軍（編），《全球生產網絡與加工貿易升級》，頁 76-111。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BBC（2019）。〈中美貿易戰時間軸：一場逐漸升溫的持久戰〉。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986037?fbclid=IwAR0Wjr3ZTerpece2NK5YOXGso0J_zT4YA-l6SzA2c9P8V3GqMNM3PQXKsZY
- 薛絢譯，Yergin, Daniel. 原著（1991）。《石油世紀》。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 龐建國（1993）。《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貳、英文



- Allen, John (1992). "Fordism and Modern Indust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ms of Modernity, eds. John Allen, Peter Bram & Paul Lew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229- 274.
- Almond, Gabriel A. and Powell, G. Bingham Jr.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2nd.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Limited.
- Baumol, W. J. ,Bradford, D. F.(1970). " Optimal Departures From Marginal Cost Pricing", AER.
- Bergson, A. (1972). "Optimal Pricing for a Public Enterprise", QJE.
- Boiteux, M. (1960). " Peak-Load Pricing",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Brown, Vivienne (1992). The Emergency of The Economy. In: Stuart Hall & Bram Gi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p.127- 175.
- Carfagno, Bart and Ker, Michelle (2018). Trends in Trade: U.S.-China Goods Trade 2012–2017. Staff Research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ly.
- Casey, Joseph (2012) .Patterns in U.S.-China Trade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November.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US-China_TradePatternsSinceChinasAccessiontotheWTO.pdf.
- Conn, David (1978).“Economic Theor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A Partial Literature Surve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 pp.355-381.
- Eisenhower, Dwight D. (1961).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Speech"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eisenhower001.asp
- Hall, Stuart & Giben, Bram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ld, David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tuart Hall & Bram Gi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p.71- 125.
- Holloway, David (1980). "War, Militar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Alternatives (6)1: 86. IEA/OECD, World Energy Outlook . Paris.
- Koopmans, Tjalling C. and Montias, John Michael (1971).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ed. Eclestei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p.27-78.
- Lake, Anthony (1993).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eptember 21.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lakedoc.html>
- Lancaster, K.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 Mann, Michael (1988). States, War &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c.
- McGrew, Anthony (1992).“The State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ms of Modernity, eds. John Allen, Perer Bram & Paul Lew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65- 126.
- Munasinghe, M. ,Warford, J. J. (1982). Electricity Pricing : Theory and Case Study, The John Hopkins Univ. Press.
- Neuberger, Egen and Duffy, Willian J. (1976).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Boston: Allyn & Bacon.
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i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7-2009 annually).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2011 annually).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GJ,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ncyclopedia”.
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Thee, Marek (1986). Military Technology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Arm Race.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U.N. , “Energy Statistics Yearbook”.
U.S. Census Bureau (2020).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USTR(2020).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phase%20one%20agreement/Economic_And_Trade_Agreement_Between_The_United_States_And_China_Text.pd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9). 20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2, 2004-2010 annually).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illiamson, O. E. (1966). “Peak-Load Pricing and Optimal Capacity Under Indivisibility Constraints ”, AER.

